《文化情理》系列(三十七)

肩住黑暗的閘門:
我的三叔許良英

許從平 著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Jianzhu Heian de Zhamen
Wode Sanshu Xu Liangying
by
Xu, Congping

Published in 2010 by Mirror Books
©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935981-10-7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Yi Hua

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TEL:(516)338-6976

Web: 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轉載，複印，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更換

謹以此書獻給三叔 90 大壽

1992 年 8 月 2 日，許從平第一次來到北京看望三叔許良英，與三叔許良英、三嬸王來棣一起遊覽頤和園。由三嬸王來棣所攝。

2004 年 4 月 18 日，許良英長子許成鋼第一次來到故鄉浙江臨海張家渡，在許良英老宅“高臺門”前與許從眾、許從平二堂兄合影（中：許成鋼、右：許從眾、左：許從平）。“高臺門”老宅是三叔許良英於 1958 年被迫回鄉務農 20 年的住所，也是完成愛因斯坦文集主要工作的地方。

1995 年 7 月，許從平第二次進京看望三叔許良英。此照是在北京許良英中關村家中愛因斯坦像前的合影。

目　錄

前　言 / 1

1・童年的回憶　/ 7
2・青少年的理想與追求 / 22
3・聆聽三叔的教誨 / 28
4・與三叔並肩戰鬥在“廣闊天地” / 39
5・自學英語 協助三叔工作 / 48
6・出席省“貧代會” / 55
7・“文革”狂瀾的衝擊 / 58
8・三叔被關押浙大審查 / 63
9・抗爭與悲憤 / 68
10・上山造水庫 / 74
11・開始教書生涯 / 78
12・三叔與上海“四人幫”爪牙的鬥爭 / 85
13・三叔從“迷信”中開始醒悟 / 91
14・《愛因斯坦文集》出版 / 95
15・三叔告別“農民身份”重回科學院 / 99
16・王淦昌先生的關懷 / 105
17・三叔民主思想對我的影響 / 109
18・三叔主持“愛因斯坦研究討論會” / 114
19・三叔與方勵之、劉賓雁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

討論會” / 120
20・三叔主持編寫《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 / 133
21・受三叔民主思想的啟迪 / 138
22・三叔發起並起草《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 / 150
23・“八九” 腥風血雨 / 171
24・第一次進京看望三叔 / 186
25・三年不鳴 一鳴驚人 / 195
26・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 / 213
27・為實現國內寬容而呼籲 / 222
28・為王丹辯護 / 233
29・第三次北京之行 / 252
30・情繫桑梓 / 266
31・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在香港出版 / 276
32・關心故鄉教育事業 / 283
33・第四次進京 / 293
34・物理學家束星北的一個歷史“懸案 / 298
35・紀念“愛因斯坦奇跡年”一百周年 / 308
36・“堅持民主信念《紐約時報》推崇許良英” / 316
37・三叔獲得“薩哈羅夫獎” / 319
38・傳承民主理念 著述《民主的歷史和理論》 / 332

後 記 / 344

前　言

2010 年 5 月 3 日，是三叔 90 歲生日。為祝賀他的 90 華誕，我二年前就開始動筆撰寫這部書稿，謹以此書獻給三叔 90 大壽。

本書大部分內容根據 30 年來三叔寄給我的 360 多封書信以及有關資料和文章整理而成。從中可以初步瞭解他怎樣從一個絕對忠誠的共產黨員轉變成為堅定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心路歷程，以及他的民主思想對我的影響和啟迪。這種民主思想的啟蒙，對讀者可能會有所幫助，尤其對青年一代更有必要。這就是我寫作的初衷。

三叔，是我思想的源泉、精神的支柱。我的全部心靈和生命都與他緊緊地維繫在一起；他，使我逐步擺脫了極權主義制度的思想桎梏，擺脫了在這種制度下形成的思維模式，使我逐漸認清了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和人類普遍追求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三叔早年就讀於浙江臨海張家渡立本小學、海門（今椒江）慈幼院小學和東山中學、杭州浙大高工，1942 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師從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大學入學時，立志要做一個“當代物理學權威”，畢業時卻要做一個“真正的人”，即職業革命家。由於三叔急於找共產黨，婉言謝絕了王淦昌先生留他做研究助手，而去桂林尋找共產黨，未果。後來，王淦昌先生在報紙上登廣告，召他回浙大。1945 年 2 月回浙

大任物理系助教，但主要的精力用於開展革命活動。1946 年夏，三叔在重慶《新華日報》館解決了入黨問題。後任中共（地下黨）浙江大學支部書記和中共杭州工委委員，參加領導 1947 年全國性的反迫害爭自由的“于子三運動”。解放初任中共杭州市青委學生部長。1952 年調中國科學院，負責科學院出版物的政治把關工作和《科學通報》的編輯工作。1956 年調新建立的哲學研究所研究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

三叔於 1957 年因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被錯劃為“極右分子”，1958 年 6 月回老家當了 20 年農民。

我於 1961 年 5 月在臨海二中（已復名“回浦中學”）高三最後一個學期離畢業僅一、二個月時，因家庭出身問題，被下放回鄉務農，與三叔在同一個生產隊勞動，也當了 10 年農民。在此期間，我有近二年與三叔同住一室，朝夕相處。他不僅在生活上關心我，更重要的是引導我怎樣做人，如何選擇人生的道路。他走過的路和他的一言一行是我最好的榜樣；我能與他生活在一起，親聆他的教誨，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

三叔說，對自己必須高要求、嚴於律己；人生的志向要定得高。1938 年在他上大學以前家居自學時，在書桌上擺著一個座右銘，上面寫著兩條格言，其中一條是英國諺語：“想射天上飛雁的人，總會比只想著射樊籬之鷃的人射得更高。”這鼓勵著他把人生奮鬥的目標儘量定得高，以歷史上那些傑出人物的高尚行為作為自己生活的榜樣，不為市儈和庸人們的議論所左右，更是鄙視那種要爬到別人頭上做所謂“人上人”的卑劣心態。向書本上的人物學習，這種書呆子氣，三叔在小學時就養成。從那時起，他對書本上的話都很相信，書本上提倡的事，盡可能照著去做。

影響三叔一生的另一條座右銘是：“人不可有傲態，但不

可無傲骨。”這是清初文人陸隴其的話，它是我們台州人引為自豪的硬骨頭精神的一種理性的昇華，為三叔終生所信守，使他對人間的逆流惡浪能泰然處之。

三叔小時候，受祖母的影響，膽小怕死，不敢從一人高的田坎上往下跳。青年時代決心投身革命，正視生死問題，經過一年半的不懈的思想鬥爭，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沒有想到自己能活著見到“解放”，以為自己在這個日子到來之前就已經死在敵人的監獄裡或刑場上。他自比魯迅所說的肩扛閘門的人，自己扛住沉重的因襲黑暗的閘門，讓下一代進到光明自由的天地。

三叔 1940 年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嚮往共產主義理想，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認為專政是通向理想天堂的必由之路。不同於同時代其他進步知識青年，由於追求民主自由而走向共產黨，他當時極為虔誠地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到了迷信的程度。直至 1974 年在北京感受到江青在“批林批孔”中的種種表演，猛然醒悟毛澤東原來是一個大暴君和大騙子，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但那時他仍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1987 年，主張寬容的總書記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罪名被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罷黜，三叔心中僅存的對共產黨的希望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一點殘餘信念都徹底破滅；開始認識到，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這完全逆歷史潮流，造成 20 世紀極權主義大災難的禍根。三叔認為，中國應該回到“五四”，以民主、科學救治中國，開展民主思想啟蒙運動。這首先應啟知識份子自己的蒙，即通過認真的反思和學習而自我啟蒙。

為了推進中國的民主思想啟蒙運動，三叔認識到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一本夾敘夾議的關於民主的歷史和理論

的著作。這項工作得到了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三嬸王來棣的支持和合作。20 多年來他們一直致力於這部書稿的寫作。

三叔說，自己的一生可引為驕傲的是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假話（除了解放前地下鬥爭對付敵人）。一輩子“說老實話”，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

三叔對壞人壞事，嫉惡如仇，即使是親朋好友也不留一點情面。有時看起來樣子很凶，但對事不對人。三叔待人真誠、坦率，直來直去，是一個很重情義的人。三叔經常強調，致力於民主事業者，必須以“平常心”做“平常人”；人人人格平等，不可自視高人一等。

三叔高尚的人格，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敏銳的洞察力以及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為我們晚輩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財富。

三叔為追求和堅持民主和科學的真理，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他的一生，歷盡坎坷艱辛，他傳承了台州人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硬骨頭”精神，正如魯迅為紀念被國民黨秘密殺害的左聯作家柔石《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所稱道的“台州式硬氣”。

傅國湧在《脊樑——中國三代自由知識份子評傳》一書裡《愛因斯坦的影子——許良英的道路》一文中說：“從明代的方孝孺到柔石，再到許良英先生，他們的血脈裡流淌著的是同一文化的遺傳因數。許先生和他的兩位同鄉先輩一樣的硬氣，但他已擺脫了 600 年前方孝孺恪守儒家信條的‘迂’和柔石式的純真之‘迂’。所以他不斷地自我反省，不斷地超越自己，最後摒棄了他信仰大半生的馬克思主義，而且晚年的許先生和魯迅一樣對現實有著一針見血的深刻洞察力。他經歷了多次學生運動、地下黨革命、反右、文革、‘六四’……80 年

的風風雨雨，滄桑巨變，先生早已看透了一切陰謀、陽謀、吮血、賣友……”

在三叔 90 大壽到來之際，我浮想聯翩，感慨萬千，擬就詩一首，為三叔祝壽：

真理深藏傲骨在，
且將冷眼對魑魅；
逆流惡浪無所懼，
浩然正氣越千載。

1、童年的回憶

我的家鄉——張家渡鎮，是浙江臨海西鄉一座迄今已有800年歷史的古鎮，一直是區、鄉政府所在地。這裡離縣城（原台州府城）15 公里，山青水秀、風景秀麗，浙東南第一高峰海拔 1382 米的括蒼山就橫亙在境內西南面。張家渡鎮因括蒼山是 21 世紀中國第一縷曙光首照地，2002 年，改名為括蒼鎮。

括蒼山綿延重疊的山巒像一個大屏障，從東南的“望海尖”一直延伸到西南邊的括蒼山主峰——米篩浪。主峰前面還有一個叫“跑馬坪”的高峰，連同主峰，我們稱它為“括蒼雙峰”。“雙峰”以及“望海尖”都是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峰，雄偉秀拔，極為壯觀。發源於括蒼山麓的芳溪，就是從“大屏障”的中間由南向北，經村東，在村東北，匯入永安溪。永安溪發源於仙居縣，溪水自西向東，繞村北，東至永豐鎮三江村與發源於天臺縣的始豐溪匯合成為靈江，靈江經臨海縣城（原台州府城），向東南流與源於黃岩的永甯江匯合成椒江，往東經海門（20 世紀 80 年代改名椒江）入海。我們的村子叫張家渡村，就坐落在永安溪的南岸，村子的南邊有一小片平原，平原直至括蒼山北麓，當地人叫 “石塘垟”。過去，陸上交通不發達，永安溪上的長船是通往臨海縣城及海門（今椒江）的主要交通工具。過去的長船前後都是尖的，過灘頭時要用人工拉纖或肩扛才能逆水而行。

張家渡村姓許的最多，是第一大姓，其次是姓金姓李。據

歷史考證，許氏家族在東晉時從河南遷來。我祖父許振元，字則恭，號敬齋，武生，據《張家渡許氏宗譜》記載，祖父生於同治庚午年（1870）二月初三。我家的老屋就在村的最西端，名叫“西樓”的院子裡。村裡許氏 “西樓房”勢力最大，歷史上幾代人都是村裡的“頭腦”。

我父親許良其，排行老大。他後面有三個弟弟：良舜、良英、良容，一個妹妹：若沫。1920 年 5 月 3 日，三叔出生於西樓老屋。父親 11 歲時，祖父去世，最小的小叔良容還不到一周歲，三叔良英當時只有 5 歲。

1941 年 12 月 3 日，我出生於“西樓”這座古宅裡。我是老四，小名米央；哥哥叫川央（又名從眾，按許氏輩分取名，我輩“從”，父輩“良”，祖輩“則”）；兩個姐姐分別叫未央、三央；後來又有了三個妹妹：回央、妥央、扭央。據姑姑若沫回憶，我出生時，父親正在天臺縣育青中學教書，出生的當天，姑姑即寫信向我父親報喜：又生了個兒子。二叔良舜，因家庭拮据，小學畢業就在家中幫助祖母料理家務。他從小愛動手，喜歡蔬菜、果樹園藝，創辦“但種草園”，進行培育試種。三叔，在搬遷到貴州的浙江大學讀書，小叔，正在台州中學讀書。

張家渡地處括蒼山麓，在戰略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就在我出生這一年，日寇飛機連續三次濫炸張家渡，炸死平民多人，日本侵略者在張家渡犯下了滔天罪行。據張家渡《立本小學校誌》一書記載：

“1941 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許，日機三架突然從望海尖方向飛來，當時，學生們正在教室裡上課，一聽到轟隆隆的飛機聲，教師就立即組織學生沖出教室，跑到後操場旁邊

的麥田隱蔽。誰知日機就對著麥田狂轟濫炸，並且用機槍掃射。頓時，教師金汝才，學生王秀拱、許良周、胡炳坤、許四海、杜崇中、許紹文、胡加升等 8 人被炸死，血肉模糊，很難辨認，如許良周是從他身上取出課本才認出來的。當時，學生被炸傷的有許從耕、許秋仙，楊小崖、陳金芳等 4 人。當天下午，日機再次前來轟炸，炸毀房屋多間。弄得全村人人心惶惶，紛紛逃往芳溪山裡。過了兩天（農曆三月二十五日），日機又飛來三架，對學校及全村進行轟炸，耕牛一頭被炸死，房屋被毀十數間，師生沒有傷亡。

當年的張家渡戶口不多，約三百來戶，人口不過千餘人，這麼一個小集鎮，日本鬼子連續三次派飛機前來轟炸，共炸死 25 人，其中村民 12 人，教師 1 人，學生 7 人。”

我的童年是在“西樓”老屋度過的。在“西樓”老屋的東北邊有一座叫做“高臺門”的古宅，坐北朝南，是祖父在世時向別人買下的。西樓老屋，坐西朝東，大門出來僅隔一條路，就是高臺門前面的空地，人們都叫它“荒基”，是我們家的曬穀場。這裡是我童年玩耍遊戲的地方。我經常與同伴們一起射紙箭，滾鐵環，捉迷藏。

童年的記憶中，最為深刻的是高臺門西廂樓上南端的那間“書房”，這間書房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的。大人們經常在書房裡讀書、下圍棋。小時候我覺得那間書房很神秘，小孩子們進去，不能發出聲音，連腳步都要放得很輕，生怕影響大人讀書。

1935 年，三叔良英考入浙大高工電機科讀書。1937 年 11 月，日本侵略軍在杭州灣登陸，浙大和高工都搬遷，不久高工被省教育廳長許紹棣（張家渡人）下令解散。三叔只得回家。

三叔回家後，就去黃岩九峰約我父親也回家讀書。我父親曾在海門慈幼院小學教過書，1936 年在杭州民眾教育館工作，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回家鄉寄住黃岩九峰書院，研讀古書，想搞國學和鄉邦文獻。

1938 年 1 月，在高門台西廂樓南端構成了一間書房和一間臥室，父親為自己設計了一張獨特的書桌，並為四兄弟設計了四張一樣的木床，便於大家集中自學。父親把書房取名為“風翻書樓”，二叔特地為“風翻書樓”刻了個圖章。

1938 年，書樓的讀書生活，使三叔開始走上科學和革命的人生道路。三叔回家時，一心想直接為抗戰效勞，每天埋頭讀大本頭的英文書《無線電通訊原理》，並用從浙大高工帶回來的蜂鳴器練習電報收發；其間又花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在一幅大白布上畫東南幾省的地圖，用許多活動小旗標明抗戰形勢，每逢集市日（張家渡每逢農曆 2、5、8 為集市日）掛在街頭宣傳抗日，有時我父親還站在旁邊講解。

書樓建成不久，海門民眾教育館為了免遭敵機的轟炸，把一批剛買到的新書運到張家渡，藏在姨公王燕卿家。三叔獲悉此事後，向姨公借了新出版的《萬有文庫》第二集中有關物理學、科學史和哲學方面的書用來自學。接觸到《萬有文庫》中一系列介紹 20 世紀物理學新發現的書以後，三叔的志趣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雖然三叔從初中開始就對物理非常感興趣，想不到《萬有文庫》還有像相對論和量子論這樣神秘的思想新大陸，令三叔狂喜不已，整整半年，他都沉醉在狂熱的喜悅之中，下決心要終身在這個新領域中探索。與此同時，三叔還精讀了愛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觀》，深受啟發，隨後又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它也產生了好感，於是開始思考人生意義和價值問題。1939 年 1 月，三叔懷著做“當代物理學

權威”的理想，以“同等學歷”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那年，浙江大學經歷三次搬遷，最後落腳廣西宜山，三叔約了同時考取浙大中文系的邵全聲（城關人）一起，日夜兼程趕往那裡上學。

有關高臺門“風翻書樓”和“但種草園”，三叔於 1999 年 1 月 27 日給我信裡作如下的回憶：

“高臺門原是哪一家造的，我記不起了。父親大概在做木炭生意（收購山裡的木炭，運到海門賣給炭行再轉銷上海）掙了錢以後從別人手中買來的，但全家一直住在西樓。在我記憶中，只有母親生良容時，她是住在高臺門的，可能是臨時性的。1937 年 12 月底我從建德回故鄉時，大哥在黃岩九峰書院，我去黃岩看他，約他一起回家，回家後，他設計把高臺門西南樓上構成一間書房一間臥室，做 4 張一式的木床，但只有我和良容睡在那裡，那時大哥、小哥都已結婚（他們分別是虛年齡 19 歲和 17 歲結婚的），仍住在西樓。在我 1939 年進浙大後，母親和小哥才搬到高臺門住。書房的藏書，你父親多次向人誇耀‘藏書萬卷’（見於他寫的自述之類），是胡說。1938 年，全家的書不會超過 500 本。碰巧，在我們構書房時，原在海門民眾教育館工作的姨丈王燕卿家運來了民教館為躲避轟炸疏散到他家的一批商務印書館出的新書，我和大哥就向姨丈選借出一部分對我們有用的書。我借的基本上是‘萬有文庫’第二集中關於物理、科學史、哲學方面的，大哥借的是大部頭的《佩文韻府》、《十三經注疏》等，總共也不過幾百本。這些書，大概一年多後就歸還了。這一年，我是認認真真地讀了書的，是我走上新人生道路的起點。大哥坐下來讀書的時間並不多，大部分時間在臨海或別處遊蕩，他讀書象蜻蜓點水，淺嘗輒止，

翻閱目錄，做些卡片。我覺得他有小聰明，但無大志向。金劍青說他將會“聰明反被聰明誤”，不幸言中了。他取名的‘風翻書樓’，究竟是什麼意思，沒有聽他說過，我也沒有去深究。你印的這個圖章與 1938 年刻的是一樣的。原來的圖章是大哥設計，小哥刻的。中文‘象鼻岩獅子山之間’，顯然出自立本校歌。英文‘Force-From Study’，一面是‘風翻’的諧音，一面是取意於 F.Bacon 的‘知識就是力量’，當時大哥可能不知道 Bacon 的力量原文是 Power，並非 Force。Power 涵義廣而深，包括 ability,faculty,energy 和 force。而 Force 一般指的是強迫性的力量。

書樓中貼有 Farady 和 Edison 的像，是上海科學儀器公司（名稱可能不確）出版的，還有一張 Einstein 拉小提琴的黑炭畫，是大哥臨摹的。他自己也有一個小提琴，常到臨海去演奏。

那幅抗戰大地圖，是我畫的，那時書房剛構好，我常把它掛在中街泰豐店門前，用小旗標出戰局動態。大哥還曾在街上作過一次演講。

‘家書’是1939 年開始由小哥編的，你知道原件下落嗎？

‘但種草園’大概是 1934 年開始辦的。‘但種’意思近於只顧耕耘，不問收穫。那時小哥向上海、南京、奉化各地農場購買果苗和蔬菜種子。在我初中時就種過番茄，成熟後，還是我第一個鼓起勇氣先吃的。我進浙大高工後，從浙江圖書館的雜誌廣告中找到幾十個美國農場和種子公司的地址，用但種草園名義給他們寫英文信，請求寄產品目錄給小哥。那幾年，大菜園是小哥的試驗地，種有奉化水蜜桃、華盛頓臍橙、甘藍、抱子甘藍、紫葉甘藍、生菜、花椰菜、石刁柏（蘆筍）、草莓，有些種子還是向美國買來的。小哥是台州最早種植番茄（西紅柿）和甘藍（包心菜、洋白菜）、蘆筍這類新品種的人。”

小叔於 1999 年 2 月 22 日給我來信，也回憶當年“風翻書樓”和“但種草園”的情況：

“書樓建於 1937 年冬。由於抗日戰爭杭州淪陷前你父親和三叔都先後回了家，需要一個讀書處，利用高臺門橫屋樓上的空房作了裝修，同時做了書桌和四張木床（分大小），把四兄弟都集中到樓上來讀書。我當時立本小學畢業已一年多在家無事，通過二個阿哥的輔導：你父親負責國文和英文，你三叔教我算術和常識。第二年暑假他倆送我去海門考台州中學。當年我們共有 14 人同去考台中，這是張家渡歷史上第一次這麼多人去考台中，結果僅取了我一人（我算術考了滿分）。

書樓有兩個南窗和兩個東窗，書桌放在窗前中間做牢一個大書架，還有一個你娘嫁來的書廚。書都是放得滿滿的，其中大部分是《萬有文庫》，海門民眾教育館因逃難搬到上鄉來的（當時姨丈是民教館總務）。在南牆兩個窗的中間最觸目的地方掛著愛因斯坦拉小提琴的木炭畫。

1938 年暑假後，我先去台中讀書，冬天你三叔也去了浙大（當時在廣西宜山）。39 年，你二叔先去石浦寧波民眾教育館工作（當時館長是王甯適，金劍青的大女婿，原是海門民教館館長），以後又去松陽英士大學代辦農業專修科當總務。你父親獨自在家，為通訊方便，每週編一份《家常》，用複寫紙複寫給三個弟弟，連續出了將近二年。以後，你二叔回家，你父親去海游僑光中學、天臺育青中學、天臺縣中，以後又去澤國台州農校教書。

‘但種草園’在抗日戰爭以前，二叔從慈幼院小學畢業回家，第二年就接觸到一些上海、南京的農場，為了向他們索要

種籽、目錄等方便起見搞了個‘園’。但種草也很有詩意，說但種草不種別的。其實用這個名稱，當年向日本、美國寫信索要產品目錄，同南京中央農業研究院和金陵大學農學院等都有過比較經常的聯繫，要來不少種籽。在家鄉影響最大的是T字棉。這個棉種纖維細長，比家鄉的土種棉花的產量也高。不幾年，上下方圩都來調換這個棉種。他在大菜園（‘但種草園’的基地）種有葡萄（當時故鄉是沒有的）、肥城水蜜桃、天津蘋果、奉化水蜜桃等 10 多種果樹，還有各式各樣的瓜、菜。包菜是大面積種了二畝好田。”

1947 年 7 月三叔回家探親，我第一次見到三叔，那年我 6 歲。三叔此次回家探親是經過黨組織批准的，此時的他，已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

在我童年的記憶裡，三叔帶我們去象鼻岩遊玩。至今，我還記得那次“旅遊”：

那天下午，三叔與二叔一起（那時我父親在南京，小叔在杭州）帶領我哥哥川央，兩個姐姐：未央、三央，以及比我大一歲的堂姐可建（二叔的女兒），來到後門溪（即永安溪，我們當地人都叫它“後門溪”）乘長船。那時後門溪埠頭停著一排排長船。二叔向一位“船老大”借了一條長船，我們這些侄輩的孩子們都興高采烈地登上長船。三叔和二叔，一個船頭，一個船尾，各人手裡拿著撐杆撐船，船就向西朝象鼻岩進發。

象鼻岩位於永安溪上游，離村不到一公里。船在清澈見底的溪流中溯流而上，過了一段急流淺灘，前面是一泓平靜的岩下潭，綠幽幽的潭水深不見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象鼻山峭壁下的一根石柱，形似一位釣魚老翁在那裡垂釣，我們這些小孩子就大聲地呼喊起來，響亮的回音驚飛了在水面上翱翔的白

鷗。此時我們更加拚命地喊，回音在耳際響起，真是樂壞了。

船繼續溯流而上，就會看到那大象背向西延展百余米，構成刀劈斧削的懸崖峭壁，屏立在碧幽幽的溪流南岸，黑黝黝，紅彤彤，十分壯觀。峭壁西端有兩支長短不一的形似象鼻的石柱凌空伸下，遠看猶如一對大象小象相互依偎，掀鼻吮吸清流。兩鼻外側上方各有兩個窟窿，恰似象的眼睛。如果站在對岸鋪滿鵝卵石的溪灘上遠看，這象鼻岩，更是名副其實了。

三叔經常感歎家鄉景色的優美，從小就熱愛家鄉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在家鄉眾多的勝景中，他唯獨鍾情於象鼻岩。1942 年，大學畢業後為了尋找共產黨組織，三叔在桂林生活了二年。他說家鄉的象鼻岩比桂林的象鼻岩更酷似巨象，體態也更雄偉，是天臺山與雁蕩山之間最引人入勝的美景。

更令人神往的還是大象鼻子右邊水面上的一塊奇異的岩石，它和象鼻尖一起浸在深潭裡。相傳這塊岩石能隨水位高低而上下浮沉，因此人們稱它“浮岩”。在浮岩的正背面，還隱約能辨認出刻著碗口般大小的字，上面刻著宋代進士張汝鍇的著名詩篇。從小父親就教我們背誦這首“浮岩詩”，至今我還能記住：

曾入蒼舒萬斛舟，
至今鼻准蘸清流；
君王玉輅催行駕，
安得心閑伴白鷗。

“張家渡”這個地名的由來，就與它有關。詩的作者張汝鍇（1195-1269），字俞仲，號竹屋，白水洋鎮雙樓村人。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 年）進士，做過宗學博士及皇宮大小學教

授（都是教育皇室子弟的官）。大約寶祐年間，他已 60 多歲了，因丁憂還鄉，隱居在象鼻岩下，為民設渡。詩中的“蒼舒”是曹操兒子曹沖的別號，他曾用船來稱大象的重量。作者以“大象”來比喻自己，抒發詩人崇高的情懷，也是詩人潔身自好不願同流合污的高貴品質的寫照。村民為了紀念這位張進士，把溪邊小鎮“湖阜”改名為“張家渡”。從此，這首詩就在民間廣為流傳，直到 100 多年後，明代的陶凱，才把它刻在浮岩上。

這裡要介紹一下陶凱。陶凱（1304-1376），字中立，象鼻岩對岸的長潭村人，是明代眾所周知、博學多才的著名人物。朱元璋聞其賢能，曾多次下詔請他進京做官，都被他婉言推辭。後來，朱元璋下令，若固執不去，就滿門抄斬。他只得應詔進京，做了禮部尚書。他對於制定明代的典章制度、樂章禮儀皆盡其心力，有不朽之功，被時人譽為“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沛然為一代之用”。

據傳說，陶凱還有這樣一個故事：

一天，朱元璋攜文武百官一起看“吞舟之術”表演，只有陶凱一人看出其中底細。朱心想，人們常說皇帝“真龍眼”，難道自己不是“真龍天子”？陶凱才學超過自己，眼力又這麼好，想必他家鄉一定有什麼名堂，便探問陶凱家鄉有什麼名勝古跡。陶答：“臣家鄉東有獅子，南有大象，大象鼻子前有一塊浮岩，此岩能隨溪水漲落而升降，浮岩上還刻有 宋代張汝鍇的詩篇。”當時，“詠象鼻岩詩”還沒有刻在岩上，陶凱深怕自己犯下欺君之罪，連夜差人還鄉刻上詩篇。

另外，陶凱之死，據明末查繼佑《罪惟錄》載：朱元璋常常做夢，夢見有龍繞陶凱住宅，以為不利於自己的“皇帝”寶

座，由妒轉為恨，便藉口陶凱以前在禮部時部屬曾“誤用符驗”為由，將其處死。陶凱以無故而身遭慘戮，舉世莫不冤之。朱元璋之六子楚王朱楨亦痛其師之冤，自投於金水橋下。

由於三叔一直在外求學，我小時候與他接觸很少，但永遠忘不了這次遊象鼻岩時三叔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2、青少年的理想與追求

三叔小時候讀書的學校叫立本小學。

1925 年 1 月，年僅 5 歲的三叔，進入立本小學讀書。立本小學由本村金劍青於 1906 年創辦，是臨海縣第一所新式私立小學，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

1930 年 2 月（民國十九年），三叔在立本小學讀五年級。那年芳溪山裡以里程村程文槎為首的農民揭竿造反，即所謂“十九年亂”。3 月 17 日，暴動部隊進入張家渡，沖進我們家的院子，抓走當“頭腦”的許吉齋（我祖父的哥哥）。許吉齋的女兒當場中彈身亡。祖母害怕極了，當天下午就托人把三叔和二叔送到城裡，在周萍洄家住了幾天，後又轉到海門。周萍洄已早逝，他曾任浙江省議會議長，周夫人是張家渡人，與祖母交情很深，三叔和二叔轉到海門慈幼院小學讀書，直到小學畢業。1935 年，三叔在海門東山中學初中畢業，當年考取國立浙江大學代辦浙江省立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簡稱為浙大高工。

我的小學也是在立本小學度過的。我 1948 年 9 月進入立本小學，小學讀書期間，正值解放前後社會大變革時期。

解放初，家鄉附近一帶土匪活動猖獗，搞得人心惶惶，連小學生也無法安心讀書。記得有一天上午，我們正在上課，突

然教室外傳來老師一聲叫喊：“土匪已到後操場，同學們趕快回家！”我急忙收拾學習用品，迅速沖出教室，跑到街上時已無行人。回到家裡，母親立即把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帶到同院子對面許性初家後邊的附屋灶間裡躲藏起來。許性初是許吉齋的兒子，立本鄉鄉長。父親四兄弟分家後，我家仍住在西樓老屋，二叔一家住在高臺門。此前，母親曾囑咐過我們，如果有土匪來，千萬不能逃到高臺門。當地人都知道，高臺門是共產黨的老巢，怕連累遭殃。

抗日戰爭後期，二叔良舜在立本小學教書，後任校長，1946 年辭去校長職務。1947 年春，三叔約他去杭州小住，讓他接觸浙大校園的民主氣氛。二叔受到三叔革命思想的影響，回家後繼續在立本小學任教，並與浙南遊擊隊取得了聯繫，建立了張家渡地下聯絡點，這個聯絡點就設在高臺門自己家裡。高臺門西廂樓上的“風翻書樓”，就成了地下遊擊隊和革命青年較為隱蔽的聚集點和較為安全的住宿處。臨海第一批知識青年去浙南遊擊隊，就曾住宿在書樓。翌日清晨，由二叔護送到趙老爺殿村，取道黃家寮，然後再去浙南。當年浙南派來臨海城西工作的林源，以及後來浙南派來大嵩工作的陳雷等人經常來到風翻書樓。

1949 年 6 月，大嵩村民兵遭土匪襲擊，徐伯廉等人受傷後即被送到風翻書樓，由二叔去請陳敬秦醫師為傷患醫治。一名受傷者經包紮後回去，徐伯廉因傷勢嚴重隱藏在書樓 20 多天。每隔幾天，陳醫師就以來書樓看書讀報、下棋為名，為徐伯廉換藥治傷。徐伯廉的生活則由我祖母照顧。此後，徐伯廉的母親一直把我祖母認作是他們家最好的親戚。

在立本小學讀書時，我一直很用功，成績經常名列班級第一。我不但讀書好，平時還積極參加學校裡的各種活動。四年

級時，學校裡買來了洋鼓洋號和腰鼓，我還參加了學校的腰鼓隊。腰鼓隊成立後，凡是有什麼大的活動，腰鼓隊都是走在隊伍的前面，我們感到很威風。有一次，學校組織學生到芳溪山裡慰問解放軍剿匪勝利，我們腰鼓隊每人都背著大腰鼓，走了 15 裡山路到車口溪，當天下午趕回學校。小小年紀的我，第一次走這麼遠的路，的確很累。那一次慰問也是我第一次進芳溪山裡，滿山的松竹在山風的吹動下濤聲陣陣，崎嶇的山路旁邊溪流潺潺，令人陶醉！

1951 年 7 月 1 日，學校裡成立少年先鋒隊，第一批入隊的都是全校品學兼優的學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時課堂上，老師經常為我們講述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生活，“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多麼令人嚮往的美好社會！同時，還講述蘇聯現在是社會主義社會，在集體農莊裡，人人都過著幸福的生活。我們要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1952 年 12 月，中蘇友好協會在我們學校裡發展新會員，年僅 11 歲的我，成了一名中蘇友好協會會員，至今我還保存著當年簽發的《會員證》。

1954 年春季，我小學畢業，初中從那年開始春季停止招生。我在家自學半年，秋季考入回浦中學。由於經濟困難，家裡無法供我在校住宿。當時我的祖母從張家渡移居臨海城關已有一年，我就與祖母同住，通學走讀。吃飯的費用全靠三叔從北京寄給祖母的生活費。食宿雖然解決，但是每當新學期開學，我總要為湊足學費發愁。1956 年下半年，我讀初三，大姐未央從杭州幼兒師範畢業參加工作，她每月給我寄生活費，我才住校讀書。與祖母同住的兩年時間裡，祖母經常鼓勵我好

好讀書，將來要像三叔那樣有出息，平時我也以此來激勵自己。

小學時，我曾擔任過少先隊中隊長，進中學後一直擔任中隊長兼大隊委。全校一個大隊，初一、初二每班一個中隊。到初三時，因超齡離隊人數多，初三年級四個班合併成一個中隊，每班一個小隊，我是初三年級的中隊長兼大隊委。

從初二開始有物理課，教我們班物理的老師，是幾年前在張家渡小學當過校長的王稼華老師。他看我對物理特別有興趣，就指定我為物理課代表，這更增加了我對這門課的興趣。

解放後，二叔在省農業廳特產局任技術員，經常出差到黃岩、臨海湧泉等地指導柑橘栽培技術。有一次，他出差黃岩路過臨海看望祖母，那時我與祖母同住，他告訴我一個消息：三叔用筆名“林因”，最近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文章。於是，我到學校圖書館雜誌架上，找到有三叔寫的《悼念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篇文章的《科學通報》。從此，我對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開始有所關注。後來，作文課中老師佈置的題目：“我的理想”。我就把將來做一個象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作為自己的理想。

初中三年級時，少先隊大隊部曾舉辦一次“徵文比賽”活動，我寫了一篇《月球 3 號》的科學幻想故事獲得了一等獎。自那以後，我閱讀了好些有關宇宙——天文方面的課外書，還訂閱了《天文愛好者》雜誌，夢想將來成為科學家，探索宇宙的奧秘。

除了將來要做一個科學家外，立志成為像三叔那樣的共產黨員，也是我少年時的理想。要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先成為一個共青團員。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這應該是我人生要走的道路。爭取入團，就成了我當時的努力方向。

那時入團的年齡要求達到 15 周歲，但少先隊員可放寬到

14 歲。1956 年，我剛滿 14 周歲，就向班級團支部提出入團申請。11 月，我填寫了《入團志願書》，支部大會一致通過我入團的要求。可是，隨著 1957 年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上級團委沒有批復下來，我的入團問題也就一直未能解決。

1957 年夏天，我以全優（每科都得最高分 5 分）的成績初中畢業，並考取臨海二中高中（回浦中學 1956 年改名“臨海二中”，1985 年複名）。整個暑期，教師都集中搞反右派運動，一直拖延到 9 月份，因此我們入學的時間也推遲了一個月。

當時臨海二中全校僅 1000 多名師生，初中每個年級 4 個班，高中每個年級 2 個班，高一年級 100 多名新生，其中從仙居招來 20 名（那時仙居剛開辦高中）。我被編入高一（2）班（到高中畢業，我們班有 4 人考取清華大學），我到學校報到註冊後，才知道有些已被錄取到高中的同學，因家庭成分等問題被取消入學資格，我慶倖自己未被淘汰。開學後，我發現幾個月前還受學生尊敬的老師，有些已在食堂監督勞動，有些甚至被送去“勞動教養”。我能幸運地讀高中，使我更加珍惜高中階段的學習和生活，除了用功讀書，還主動靠近團組織，努力爭取進步。

暑假在家時，已聽說《人民日報》報導了三叔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回到學校後，我就趕緊去圖書館查找這份報紙。果然，在 1957 年 7 月 29 日和 8 月 3 日的《人民日報》上，分別用醒目的標題：《許良英浸透右派思想》、《許良英是黨的叛徒》作了詳細的報導。由於三叔當時公開反對“反右”運動，成為中國科學院的第一個右派。8 月 1 日，科學院借用北京大學禮堂召開第一次全院性批判大會批判三叔。我看完報紙後大為震驚，我永遠也不會相信三叔是“反黨份子”，會做黨的“叛徒”，因為我太瞭解三叔了。1942 年他大學畢業後，為

了到桂林尋找黨組織，謝絕了王淦昌教授留他做研究助手的要求；他歷盡艱險，提著頭顱投身於革命，現在怎麼會“反黨”呢？我絕對不信。

“反右”運動結束後，學校開展勤工儉學活動，學校在離城 10 多裡的靈江南岸兩水村辦起了農場。原來教我們體育的陸冬先生（回浦中學創辦人陸翰文的兒子），此時已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派往那裡監督勞動。我們有時二人扛著一個大糞桶，從學校出發抬到那裡；勞動時，如果突然遇上大雨，個個都會被淋成“落湯雞”。那時，我剛患過瘧疾，尚未完全康復，也爭取去參加勞動，以示表現“積極”，淋了幾次雨，結果瘧疾復發，搞垮了身體。後來才知道，那時，有些女同學，因經常下水田勞動，多次被雨淋濕，結果得了“婦女病”。

1958 年，全民辦鋼鐵。中秋節，全校師生連夜出發，每人都帶上了扁擔簸箕，步行五六十里路，到桐峙康穀山上擔礦石。那時到杜橋方向的公路剛開始建造，路基上滿是碎石，舉步艱難，有些年齡較大的老師也跟著去，我們都深受感動。後來，又在望華門古城牆邊築起小高爐煉鋼鐵，我們住在城牆邊上的茅草棚裡，日夜輪班苦戰。這就是大躍進時期我們的“學工”、“學農”生活。

那時上課很不正常，有時白天勞動，晚上上課；有時就乾脆整天停課勞動。因我們是高中學生，平時學習還比較自覺。

18 周歲那年的“青年節”，我在日記中曾抄錄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青春的秘密》，作為節日裡送給自己的禮物。從日記中完全可以看出，我當時在馬列主義正統的教育下所表達的人生追求。抄錄日記如下：

“今天是‘五四’運動 41 周年紀念，也是我們青年自己

的節日——青年節。這個閃耀著光輝的日子，使人有無限的感慨。這個日子是我真正黃金時代的開始，因為今年我18周歲，從現在開始我正式宣佈自己進入青年時代！

我從現在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上已擔負起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正如列寧所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真正建立共產主義的任務正是由青年來擔負。’記住列寧的教導吧：“正是這些青年面前擺著最終完成共產主義的任務，正是在他們面前擺著為共產主義而戰鬥的任務，因此，他們必須有堅強的、健康的身體，具備鋼一般的神經與鐵一般的筋肉來迎接這些任務。”

早上，我把蘇聯天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青春的秘密》抄錄在筆記本上，在這個青年自己的節日裡，就以這首膾炙人口的詩，作為送給自己的最豐盛的禮物吧！”

3、聆聽三叔的教誨

三叔在紀念反右40周年的文章《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中，曾這樣說：“我是以科學的求真精神、革命的犧牲精神，以及對革命理想和對革命領袖虔誠的信仰投身革命的。當時，以為自己領悟了純真的科學精神、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虔誠的宗教精神的真諦，認為三者是融合在一起的。遺憾的是，它卻鑄成了我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盲從和迷信。”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了反右派鬥爭，三叔卻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黨員自居，公開反對反右派鬥爭。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得意地稱自己策動鳴放和反右運動方針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右派是“自投羅網”。三叔說，他大概是自投羅網者中

最愚蠢的一個，是他對毛澤東愚忠的報答。

1958 年 3 月 1 日下午，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整風領導小組宣佈對三叔的處分決定，他被定為“極右分子”，受第二類處分，即撤銷一切職務，監督勞動，送黑龍江密山國營農場勞動，每月發 29 元生活費。三叔認為自己革命十幾年，只因為幾天的錯誤，就被當成“反革命”，思想不通，加上 1944 年起腰部患有嚴重的關節炎，經受不起東北的嚴寒，於是選擇了“自謀生路”，因此也失去了公職。

三叔被劃為“右派”後，三嬸不但沒有像別人那樣馬上與自己的丈夫“劃清界線”，依然允許三叔繼續住在家裡，而且非常同情他。三嬸所在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時的政治環境，使她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三嬸王來棣，浙江平陽人，1949 年浙江大學史地系畢業。在大學讀書時，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曾任地下黨浙大總支委員（當時三叔任地下黨杭州工委委員，領導浙大總支），為革命作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對此無端的打擊更感沉重。為什麼會對待自己的同志這麼殘酷？對於來自她準備為之獻出生命並為之奮鬥的黨的一些做法想不通，只有痛哭，當時一連哭了二個晚上。那時，三嬸已懷孕十個月，過度的悲傷使自己唯一的女兒，還沒有出世就死在自己的腹中。在她一個月產假滿後，即以包庇“右派”丈夫的罪名被開除黨籍。為了不再連累她和兩個正在上幼稚園的兒子：許成鋼、許平，三叔決定回老家務農。

1958 年 6 月，三叔回故鄉當農民。三叔回到老家張家渡時，祖母當時也隨同回來，一起住在高臺門二叔的房子。

三叔回到老家時，我還在二中讀高一。就在三叔從北京到達臨海的當天晚上，我在父親（補習中學教書）和祖母住處（租

住在城關青年巷）見到了他。見到三叔的第一印象：很嚴肅。

我從小就非常崇敬三叔，祖母經常對我講他小時候的情況，希望我長大後做一個像三叔那樣的人，我時時牢記在心。自從三叔回到故鄉，我就有更多機會聆聽他的教誨，得到他的言傳身教。

在以後的日子裡，一放假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去高臺門看望三叔。每次見面，他都非常關切地詢問我的學習和思想情況；有空就給我講述他青年時代如何確立革命人生觀，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道路，積極投身於革命的經歷。聽三叔講述，我常常聽得入了迷，仿佛自己也置身其中。

三叔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啟發教育我，對我一生的成長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這是我人生最為幸運的。

三叔為了更好的讓我瞭解他青年時的思想轉變過程，特意從箱子裡找出他當年的舊信讓我看，我讀著這些舊信，自己的思緒也隨著起伏和激動。這些信，文字簡潔、精煉、含蓄；字裡行間洋溢著三叔當年嚮往和追求真理的奔放灼熱的激情。讀著這些信，引起了我強烈的共鳴，怎會不使人受到激勵和鼓舞！我下決心向他學習，走三叔走過的路！！

那時，我當即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抄錄下這些舊信中的精彩片斷，現選錄其中的幾段：

兩年後的弟弟已抓住時代的主流，雖然我沒有乘長風破萬里浪的魄力，可是我已學會了海嘯，將喚醒醉夢中的群眾；磨練我視野的蠻性，準備為人類解放的戰鬥而效命。……但兩年後的今日的弟弟，你定會驚駭，怎麼還是一樣的粗野、稚氣！但在這粗野中有著堅韌的剛毅，在稚氣中蘊含著人類無限的愛，“人事”、“交際”、“名利”和 未來的“享受”，早

已給我棄諸東海。這裡，我自己發掘到新鮮寬闊的天地，它足以供我一生的努力與工作，可讓我肆意馳騁。……（1941.1.30 貴州遵義）

……我還更廣泛的有著對整個尊崇真理的人類的愛，我要將這許多偉大的愛熔化在生命的洪爐中鍛煉成堅韌的意志，至高的理性：我沒有淚，有的是周身奔流的血；我沒有廉價的感情，有的是嚴正崇高的理性。我們的理性包羅了情感，以血代替淚！……　　（1941.4.4　貴州遵義）

過去我僅有“硬”外殼，現在我還有周身奔流熱情衝動的血！雖然偶爾也會感到空虛渺茫，眼前一陣昏暗，但大致都能克服下來，雖然我還不能算是個有用的人，不能儘量發揮本能的潛力，還未達到生命意義的最高最豐富的境域，但是我想朝著它走。我也明明曉得這條路是坎坷培頓的，處處是暗礁危崖，而且可能必然地會在這裡喪失自己的一切，甚至得自父母的七尺之軀！但我還是要向它走。燈蛾撲火，她追求光明，而又把自己毀滅在光明裡。人家可能會笑她幼稚可憐，但是我卻對她衷心敬仰。為真理生，為真理死，才是個真正的“人”所應有的血性！

我們求學的目的也不過是為真理服役，為人類謀幸福，那末何必以學問來約束自己呢；但我們仍舊不斷地在學習，而且比過去更用功更緊張地學習。對於學問我永遠沒有自滿自足的，凡是與人類有益的學問我都想學習。然而我絕不自私，把學習當做裝飾品以自娛，以學問作為基石替自己鑄成萬人稱仰的“學者”、“專家”；學問只不過是一種武器，她在勇敢的戰士手裡就是大炮、炸彈……

理論的研究，恐怕要成為我一生不離手的武器了；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是唯一的辦法，另一方面，我還得儘量恢復我先天的本能……　　（1941.10.9　貴州湄潭）

我要走的路，對於自己沒有“利”，當然是意料中事。至於“名”，我也不希望，我不希望我的名字一定要留在歷史上，或給當代的人稱頌。此生此世我為自己所完成的可能是一無所有，除卻了生命莫大的愉悅和充實飽滿的意義。我只覺得我應該這樣做，同時這個時代也要求我這樣做，雖然我始終是赤裸裸的，說不定也會遭遇到殘害，但我絕不懊悔。（1941.11.22　貴州湄潭）

我現在變成一個這麼殘酷的人，正如你所說，一個硬漢，對於任何現實我都已能夠正視；但是另一方面，完全出乎意料的，我會有這麼熱烈的感情，過去我常以自己是無淚的男子而自誇，可是最近幾次我會不期然地流出我年輕時期從沒有流過的熱淚，這事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你應該相信，我不會暗泣，當黑暗愈深，我的血液沸騰的愈厲害——這些淚就是血，是我生命的力！……

這當感謝這三年的時光，這三年給還我全部的生命！尤其是最近一年半，雖然我在功課上學的很少，但我深深地覺得這二十月的長進抵得過以往的二十年；要到二十年後的今日，我才發現在這個世界上尚挺立著一個我。過去我也真是“硬漢”，硬的什麼？不過肯吃苦，會爭氣，歸根結底，要抑制自己還不是為了一個“名”字，希望在未來的科學史上寫上“許良英”三個字。在今天看不見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群眾，看不見過著原始生活，遭受中世紀非人的剝削和近代新式壓迫下的多

數者，而偷偷作此自私的念頭，是多麼可恥呀！在我醒覺之後，我馬上丟棄了這已被我背負多年的木乃伊，將來我可能一無所成，可能像錢塘江旁邊一顆塵砂被中秋的急潮卷去，但我絕不憂慮，絕不後悔。為個人，我已充滿了生命的意義；為人類，我正打算盡可能擔負起應盡的義務。（1942.2.2　貴州湄潭）

“研究生”、“出洋”這類夢想三四年前也作過的，但近兩年來已沒有想到一次了。專門研究物理不是這個時候呀，我不願意也不屑於這樣幹，不過千萬別誤解，這決不是我對於物理研究感到失敗，正相反，在學校裡，對於物理任何方面都不比人家差，要是我肯與人家一樣下功夫，我正可以超過人家很遠。說“發明”吧，倘若專心弄幾年，會不是沒有頭路的，問題是在我已感到有比弄物理更有意義一萬倍，更艱巨一千萬倍的任務落在我的兩肩上。我不能無視偉大崇高的事業而自私地往牛角尖裡鑽。（1942.4.3　貴州湄潭）

讀著這些激動人心的文字，我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和感染，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要嚴肅思考自己的人生問題。

自從三叔 1958 年回故鄉後，他對我講述了許多有關我父親過去的情況，原來他們說“人家兄弟如手足，我們兄弟如心肝。”後來卻分道揚鑣了，從此也斷絕了關係。我對父親有了更多、更深入的瞭解，也使我對父親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父親不再是我心目中所尊敬的人而是一個口是心非的“偽君子”，喜歡吹“牛皮”、講大話的墮落文人。當時我不但恨他，而且決定與他劃清界線。

我父親和母親的結合，是典型的封建包辦婚姻。我母親金若影，是本村最大的地主金正忠的長女。金家置有田地 300 多

畝，但沒有地方勢力，為了有個靠山保住家產，想方設法巴結有地方勢力的許氏西樓房，因此母親從小就許配給父親，年齡還比父親大二歲。父親 11 歲時喪父，兄弟姐妹五人，靠 20 多畝田地和祖母經營木炭生意生活，家境並不富裕。父親初中畢業後無經濟能力繼續升學，後來靠岳父的資助，才得以去上海復旦大學附中讀高中。讀了一年半，輟學回家結婚。

我從小與父親相處的機會很少，他一直在外工作，偶爾回家，只知道他解放前曾在南京國民黨政府當過二年“京官”，1952 年被判三年徒刑，在杭州喬司農場勞改，提前一年釋放。1954 年春季我小學畢業，那年開始，春季停止招生。我正待學在家，父親回來了。他教我讀書、作文，在他的指導下，我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快。

他從勞改農場帶回自學的俄語讀本，每本書都用白布做封面重新裝訂，他說自己勞動空閒時，就拿出來自學。現在回到家裡，仍繼續自學俄文。

父親雖然學歷不高，年青時他卻有堅持不懈的自學精神。從教小學開始，繼而教中學，直至在浙江省醫專（浙醫大前身）任國文講師。後來他還擔任過高中俄語教師，1958 年以後，致力於編纂《華俄詞典》，曾得到前蘇聯漢學教授鄂山陰博士和西安外國語學院的好評。這些完全是靠自學的，從小我很敬佩他。

父親的琴、棋、書、畫，樣樣都有一手。1954 年秋季，我考入回浦中學，放假回家時父親除了教我讀書作文外，還教我拉二胡，後來又教我拉小提琴。父親的小提琴拉得特別好，有每天拉琴的習慣，這個習慣在年青時代就已養成。據說在勞改農場裡，犯人組織的“文工隊”，他負責拉小提琴。從勞改農場回家後，父親開始撰寫題為《末代才子》的自傳，認為自

己一生走的是“中庸之道”。後來還創作長詩《原子能頌》(歌頌蘇聯第一座原子能發電站建成)和《黃河清，出聖人！》(歌頌毛澤東)，並向文藝刊物投稿。在他的影響下，我初中二年級時就開始學習寫詩。

1956 年，他根據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向全國徵集中文拼音方案的要求，擬制了一份拼音方案，寄給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結果被採用了幾個聲母。隨後，又擬制了《常用字拼音表》大幅掛圖，以及《常用字拼音》小冊子，後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在全國發行。當時全國各報刊都有詳細介紹，對普及中文拼音和推廣普通話起了一定的作用。當時，他也教我們兄弟姐妹學習中文拼音，在通信時，我們最早使用這些拼音文字。

1956 年，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黃金年”，國務院向全國招聘知識份子，父親報名參加應聘，經筆試、面試均合格。隨著形勢的急劇變化，即使“合格”了，也無法正式安排工作。1957 年下半年，父親暫時安排在城關補習中學教書。

在我的印象裡，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才子”，受人尊敬，但他對家庭沒有負起應有的責任，我們兄弟姐妹 7 人，家庭由母親一人支撐著把我們養大。1949 年解放那年，我家僅有父親四兄弟分家時分得的 4 畝田地。1950 年，老祖母去世，又分得公田四、五畝。同一年，“土匪亂”，外公從城裡乘坐長船回張家渡途中，被黃沙土匪綁架。因外公是本村最大的地主，土匪以為請到了“財神爺”，敲詐要用重金贖人。為了湊足金銀財寶去贖人，母親把自己的全部積蓄和金銀首飾也拿去湊數，終於將人贖回來。於是，外公半賣半送給我家田地五、六畝。到了 1951 年土地改革時，母親把解放後的十多畝田地也報為已有，連同分家時田地共十五畝。她以為家裡人口 9 個，平均每人不足 2 畝，總不會劃為地主。想不到，待公佈成

分時，我家在全村將近四、五十戶地主的名單中，據說是最後一個補上。小時候，我常常聽到母親怨恨自己的地主是“討來做的”。解放前後，母親經營酒店生意，艱難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解放初，由於生活困難，母親不得不將二個最小的妹妹送給別人領養。酒店一直開到 1956 年公私合營，母親也於那一年成為公私合營酒煙商店的一名營業員，直到 1958 年“大躍進”，酒煙商店解散。

三叔在評述我父親思想變化時，有這樣一段話：

“大哥 1927 年在臨海振華中學讀初中一年級時，正是‘4.12’政變後國民黨大搞‘清黨’，到處捕殺共產黨員，他們學校有高年級同學被捕，他同情被捕的同學。他寒假回家時，告訴我這件事，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共產黨’，並也產生了同情。他青年時代有點反封建禮教的闖勁，對左翼作家的‘普羅文學’（即大眾文學）作品感興趣，但是 1934 年後，他想在‘國學’中找出路。1938 年我和他共同生活了一年，發現他並不安心認真讀書，缺乏執著的鑽研精神，好誇誇其談。在政治上，他對共產黨有好感，但對革命理論並無學習興趣。1940 年後他在中學教書，抗戰勝利後在浙江省醫專（浙醫大前身）教國文。可是他不安於教書生活，一心想當官。

1946 年，他通過黃岩人林蔚的關係，到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復員委員會和國防部人力計畫司任秘書。1946 年 10 月，我隨浙大從貴州復員回杭州，獲悉他這一轉變，十分震驚，但念他青年時代還有正義感，以為通過我們過去較深的兄弟感情，對他曉以是非利害，有可能使他轉向，爭取為革命立功。除夕我和良容趕到南京，與他談了 4 天。他的反應是：一切都已時過境遷，推說自己為生活所迫，完全麻木了，現在只考慮錢和個

人利益。他認為，國民黨有這麼多飛機、大炮，延安一定要被打下來；對自己穿軍衣住在國防部，並能不時見到蔣介石而洋洋得意。1947 年秋，他又通過蔣經國轉到中央警官學校當政治教官。一年後，他大概看到蔣介石氣數已盡，記起了 20 個月以前我對他的忠告，他辭職回家鄉，路過杭州時對我說，現在才相信我說的話。”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一下：我父親 1936 年在杭州民眾教育館工作，“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回家鄉，寄住黃岩九峰書院研讀古書，想搞國學和鄉邦文獻，父親的才學深得黃岩著名紳士朱文劭的賞識。1946 年，朱文劭把我父親介紹給他的學生、時任國防部次長的林蔚。這樣，父親通過林蔚的關係，才得以到南京國民黨政府任職。

現將《黃岩名人館入選名人簡介》中有關朱文劭和林蔚的介紹，摘錄如下：

朱文劭，光緒三十年進士，與沈鈞儒同赴日本留學，回國後任廣西提法司、浙江民政廳長、江蘇政務廳長、金陵道尹，為黃岩著名紳士。熱心地方公益，興修水利，重視文教，創立對政府官員的質詢法，促成黃岩和平解放。1949 年為全國政協特邀代表。

林蔚，參加辛亥革命，1927 年即為陸海空軍司令部第二廳少將廳長，1938 年任侍從室主任。抗戰初，參與制訂抗日戰略部署。1942 年任駐滇參謀團團長，協調中英兩國軍隊作戰；1943 年隨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後任軍政部次長，國防部次長，代總參謀長。1950 年升陸軍上將，是黃岩民國期間生前唯一上將。

1948 年，我父親從南京辭職回鄉後，曾協助二叔地下聯

絡點工作，臨海解放後，曾在台州專署秘書科工作。

1950 年，三叔介紹他到杭州私立安徽中學教書。安徽中學校長叫方然（原名朱聲），三叔是他的入黨介紹人。1955 年，方然被打成“胡風反黨集團”主要成員，被捕時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長。三叔在中國科學院也因他受到牽連，被停職隔離審查。三叔被隔離審查時有兩大罪名：第一，1950 年在杭州市青委任職時，介紹“胡風反黨集團”成員方然入黨；第二，介紹反革命分子大哥到安徽中學教書。

後來知道，方然（1919——1966.9.21），現代詩人，文學評論家。在獄中關押十年，1965 年出獄。“文革”爆發，走投無路，絕望中向姑母要 2 角錢，四根香煙，說是看病，其實自殺去了，後來未返，永遠消失，人屍兩無，時年 45 歲。

另一位與我父親在安徽中學教書時的同事叫冀汸，（現代詩人，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18 年生）也被打成“胡風反黨集團”成員。在獄中四年，1959 年出獄後，由勞動局安排去安吉農場勞動改造。2004 年，他在《隨筆》上發表書評《走近愛因斯坦》，三叔來信告訴我，他是我父親在安徽中學教書時的同事。隨後，我在杭州浙江醫院幹部病房裡見到了這位歷盡坎坷的長者，現在仍筆耕不輟。

“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發生於 1955 年，這是震動中外的中國歷史上一次罕見的大文字獄。幾十位著名作家、詩人鋃鐺入獄，在鐵窗裡度過幾十年光陰，有的死在獄中，有的精神失常。受此案牽連的人達成千上萬。一個個家庭慘遭不幸，妻子兒女蒙受人間冤屈。這場文化大劫難起因於胡風和周揚的矛盾，對知識份子實施改造政策，在樹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絕對權威的環境中，胡風和朋友們只能屢戰屢敗，最終釀成了這一歷史大冤案。

記得 1955 年夏天，我剛在回浦中學讀完初一回家度暑假，突然，北京派來幾個人來到張家渡，把我們老家全部查抄遍，並搜去堆放在高臺門堂前樓上、從“風翻書樓”（土改時沒收，分給別人）搬來的舊書堆中有三叔以前寄給家裡的書信多封，其中有一封長信是談如何改造家庭的。

1956 年 5 月，對三叔的審查才有了結論。科學院黨委書記郁文告訴三叔：“這次肅反審幹對你有好處，黨組織花了很大的力量對你的歷史進行調查，調查回來的材料都說你很好，證明你是一貫積極的。”

三叔在審幹結論上簽字後，就向領導提出調他到哲學研究所從事科學哲學的研究工作。他認為自己的性格不適宜搞行政工作，而適宜從事學術研究。開始時，科學院秘書長秦力生不同意，他說：“院部正準備成立宣傳局，要你去負責宣傳局工作”。於是，三叔就給科學院黨組正式寫了一個“請調”的長篇報告，說明自己從 1938 年開始就對科學哲學問題感興趣，以後八年內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並附上一份停職審查後期他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規劃”寫的《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問題》的說明書。結果，科學院黨組批准了三叔的請求，6 月 28 日，三叔終於離開了科學院院部，到新建立的哲學研究所報到，開始過書齋的生活。

4、與三叔並肩戰鬥在“廣闊天地”

高三最後一個學期，我因病無法堅持學習而休學。在家休養了半年，1960 年下半年複學。

那年，二中高三年級只有一個班——“工農班”。1958 年，隨著全民“大躍進”，學校教育也搞“大躍進”，二中搞

試點，招收小學畢業生讀高中，快速培養，三年畢業。我這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也只能插入這個班繼續學習。

為了加強對這個班的管理，校黨支部書記兼校長金文淵親自兼任班主任。在這個班級裡，全是工農子弟，我成了班上唯一的“異類”。在他們的心目中，更是另眼看待我這個“插班生”。我很不適應學習的環境，對於家庭出身，我更有幾分自卑感。

我的家庭背景，用“漆黑一片”來形容並不過分。父親，“歷史反革命”；三叔，“大右派”。親戚中，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都是階級敵人。誰都害怕與你接近。我想：只有主動靠近團組織，積極爭取進步，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1958 年，“向地球開戰”的所謂“大躍進”開始。全國到處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豪言壯語”，到處出現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的“衛星田”。農業放“衛星”的謊言，結果造成全國性的大饑荒，從 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間，全國餓死 4000 萬人。這場大災難歸咎於“自然災害”。事實上，這三年中國氣候屬於正常，並無大旱大澇，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場大饑荒波及我們學校，1960 年下半年開始，我們中學生每月定量從 30 斤降到 20 多斤，許多學生填不飽肚皮。同時，學校不時停課，組織各班學生分組到城郊野外，撿番薯藤、採野菜，曬乾後，支援山東等地災區。

1961 年 4、5 月間，校長金文淵在全校大會上傳達有關“支援農業第一線”的文件，動員學生下放農村當農民。後來他又在班會上動員全班同學，要求每人寫決心書表決心。班級團支部也號召大家積極回應。我為了爭取進步，表現積極，也寫了

決心書，全班“下放”的竟然就我一個人！後來才知道，這次“支援農業第一線”的對象主要是初三畢業班的學生，提前畢業，到農村當會計。高三畢業班的學生並沒有政策規定，我卻成了唯一的例外。學校領導怕我在回鄉的路上會出什麼“問題”，派班長“押送”我回到張家渡老家。這就是我“爭取進步”、“向黨表決心”的結果！

回鄉勞動了 3 年後的 1964 年夏天，我想參加高考，向學校要“高中畢業證書”（與我同時“支援農業第一線”的初三同學都發給“初中畢業證書”），但校方卻給我一紙“高中肄業證書”。到縣教育局招生辦公室報名，說要有當地公社的證明，可是公社不同意，只得作罷。第二年，政策稍有放寬，公社終於同意給我開證明，我有幸參加了“文革”前的最後一次高考。我報考的志願是：杭州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經過了筆試和面試，但最後的通知是“不予錄取”。我知道“不予錄取”的原因，“政審”第一關就通不過。

據後來披露：1958—1965 年，高校招生有“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的政策。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除了推薦留蘇學生和保送生外，政審結論基本分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當時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永遠也進不了大學的門。

1958 年，三叔回鄉後，勞動積極，認真“改造”自己，幹部群眾對他一致好評。可是，1960 年全縣第一次右派會議，宣佈第一批摘帽卻沒有他的份。後來，他把自己回鄉勞動二年的思想總結彙報寄給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黨委書記郁文。郁文回信仍然稱他為“同志”，希望他早日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並指

出，只有承認自己在反右運動中犯了錯誤，才是“摘帽”的首要前提。在此之前，三叔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右派”，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反黨的思想和言論，與別的右派不同，只是當時對搞反右運動思想不通。

1961 年 3 月，我還在二中“工農班”復學讀書。一天傍晚，細雨濛濛，三叔身披雨衣，特意到二中告訴我，這次他進城參加全縣右派會議，會上宣佈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並請他在會上作典型發言，介紹自己的“改造”經驗。三叔說自己並無什麼“經驗”可談，只是承認自己在反右運動中成了阻力，犯了嚴重錯誤。

當我下放回鄉時，三叔摘掉“右派”帽子後，正好去北京看望三嬸和兩個兒子，同時為了解決工作問題。

不久，三叔從北京回來，他告訴我，為工作問題他找過中國科學院黨組織，黨委書記郁文對他說，黨組織認為當初對他處分過重，將考慮讓他回科學院工作。但目前全國都在精簡下放幹部，科學院要下放上萬人，一時無法將他從農村調回來，只能回農村等一等。

他知道我已下放回來，就開導我，既然已回到農村，就要安心務農，在農村好好幹，幹一行，愛一行。他說自己回鄉三年，勞動之餘除了認真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還買了大學教材《作物栽培學》、《土壤學》等有關農業方面的書籍來自學。他希望我也能學些馬列著作以及農業科學知識，使生活過得充實、有意義，在農村有所作為。

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我終於有了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鍛煉自己的決心。後來，三叔得知我的戶糧關係還沒有從城裡遷回來，又教育我，既然安心在農村務農，就應該將戶糧關係也要遷回來，人在農村，心也要安在農村。

1961 年下半年，張家渡大隊辦起了民校，公社聘請我為民校教師，我任教高小班語文，洪依（她因父親的“歷史問題”，初中畢業即不能升學）教數學。不久，又增設了初中班，聘請三叔教數理化，許則槎（因為“歷史問題”被開除回家）教語文。

大隊民校校長是村婦女主任李鳳飛，借用本村小學的教室，晚上上課，又叫“夜學”。

本村小學——“立本小學”，此時已改名為“城西區中心小學”，坐西朝東的一排新式平房的三個課室，是立本小學創辦時建造的。三叔和我，童年時曾在這幾個課室裡讀過書。過去了這麼多年，想不到，我們又在這孩提時坐過的課室裡，當上了“夜學”教師。那時，課室裡沒有電燈，只有講臺上放著一盞桅燈（一般船上用的）較為明亮，同桌的學生合用一盞煤油燈，雖然光線暗淡，但學員們學習都很努力。這些孩子家庭都比較困難，白天放牛或幹別的農活，晚上才來讀書的。

不久，全國貫徹中央“六十條”，改正在公社化中“大統”、“大調”的“共產風”所造成的錯誤。建立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即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並允許個人有“自留地”。

公社規模變小，原來的城西人民公社（即後來的“城西區”）分為五個公社，張家渡公社下屬的張家渡生產大隊分為 14 個生產隊。社員重新編隊，我和三叔都編入第四生產隊。

我們第四生產隊的社員大部分都住在上街，每天出工都在上街集中，早到的人就坐在沿街的石臺階上等候。屬於我們生產隊的土地有三片：灌園（即小岩下），下爛田和西塍裡。這三片土地，踏遍了我們的足跡，灑滿了我們的汗水。

那時的三叔身穿粗布衣，一身農民打扮：夏天出工，腰間

系一條短“攔腰”；冬天出工，頭戴猢猻帽（可以拉長的一種帽子），腰間系著長圍裙。可是，他戴著一副近視眼鏡，依然掩飾不住他的知識份子身份。

那時，出勤計分按照各人的“底分”，由全隊社員討論評議確定。三叔評為 5 分（後來增加到 7 分），我 6 分，（後來增加到 8 分）。全勞力 10 分，我們這些半途出家的農民只能稱為“半勞力”。當全勞力挑豬欄，我們就在田頭牽豬欄，用雙手抓起豬欄，牽在一行行的水稻或小麥中間。冬天，天寒地凍，麥田表層蓋著一層薄霜，手抓起豬欄，牽到麥行中間，雙手幾乎要凍掉了。夏天，烈日當空，水稻田裡的水燙得難受，豬欄的臭氣更是難聞。三叔牽豬欄，從不怕髒怕臭，也從不怕冷怕熱，倒是我們這些小青年叫苦連天。後來，我也鍛煉成能“接”豬欄擔，所謂“接”，就是每人挑一段距離，擔子從一個人肩上傳到另一人肩上，一直傳送到田頭。

農村有麥收，夏收，秋收季節，三叔因腰部患有嚴重的關節疾病，不能彎腰割麥割稻，生產隊照顧他打稻打麥。

四月麥收季節，為了及時插秧種田，一般都是麥子從田裡收割運回來，堆放在生產隊屋裡，弱勞動力和婦女留在那裡打麥，三叔也和她們一起。夏收秋收季節，三叔更是一名出色的打稻機手。那時使用的是雙人打稻機，靠人工腳踏。三叔幹活非常賣力，往往幹得滿頭大汗，有時打得太快，連遞稻束的人也跟不上。

夏收夏種，這是當農民一年最辛苦的季節。我們每天天未亮就出工，幹到中途，早已饑腸轆轆了，就停下來喝稀粥，稍休息一會兒。帶來的稀粥當點心，既能充饑，又能解渴。夏收夏種最辛苦時，有時要幹到午後一點多鐘，下午兩點多鐘又要出工，一直幹到摸黑回家。

夏天，每當傍晚收工回來，三叔最喜歡到後門溪（即永安溪）洗澡，我也經常到那裡。在夜色蒼茫中，西邊上游不遠處的象鼻岩，隔岸北邊的獅子山，還能隱約可見。躺在鋪滿鵝卵石的溪灘或泡在清澈見底的溪流裡，是最舒服不過了。家鄉清澈的溪水，不僅洗滌了身上的污垢，也洗去了一天的疲勞，使人變得一身輕鬆。

三叔幹活，除了不怕髒不怕累，人家不願意幹的活，他都走在前面。記得那時有一種農藥——“1605”，我們都叫它“一掃光”，由此可見殺傷力之強。許多人都不敢施這種農藥，害怕會中毒。但三叔卻挺身而出，毫無畏懼。接連幹了好幾天，也沒有叫人來替換，堅持幹到底。

除了田裡的農活，當農民最辛苦的莫過於上山砍柴。我對砍柴的情景仍留有深刻的記憶。

我們經常半夜起床，摸黑上路，推著手拉車進芳溪山裡。要走大約 20 裡的手拉車道到達山腳，停放好手拉車，然後爬上山頭。在懸崖峭壁間爬行，遇到成片的柴林，砍倒後一堆堆收拾起來，用柴繩捆紮。紮好後的柴，順著山坡翻滾下來；遇到無法翻滾，就用肩膀背起來走一段山路。到山腳往往是午後 1、2 點鐘了，肚皮早已餓得咕咕叫，這時才拿出帶來的“冷飯團”，狼吞虎嚥地吃起這頓“美餐”。吃罷中飯，拉著手拉車回到家已是日落西山了。

砍柴，我曾遇上一件最倒楣的事。有一次，剛把柴從山頭弄到山腳，準備裝上手拉車，突然間來了一位管山員，說這一片山林是他們車口溪大隊的，不由我說明，就強行把我的柴沒收了。當時我以為這一片山林都是我們大隊的，一天的辛苦落得一場空，心裡感到非常懊喪，只得垂頭喪氣推著空車回家。

砍柴，不但為了家裡燒火煮飯用，而且每年春節，我們這

些“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後來又加上右派分子，稱為“五類分子”）家庭還要給烈軍屬送“過年柴”，任務攤派到戶，這更增加了我們吃“砍柴”的苦頭。

我們在生產隊裡幹活，大部分人都比較照顧我們這些“白面書生”，但是個別人有時要捉弄，甚至於欺辱我們這些入“另冊”的人。可以說，我們是社會最底層——農民中的最底層的人。雖然我們處於這樣的社會環境，但對共產黨的信念仍未動搖，堅信人類的必由之路——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

勞動之余，三叔鼓勵我們多讀馬列著作，我帶著很高的熱情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共青團的任務》等馬列著作，企圖學會一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做一個馬列主義信徒。三叔對共產黨、共產主義事業的“愚忠”，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

有一次，我們在灌園水稻田裡幹活——耘田，即用“田刨”剷除一行行水稻之間的雜草。我與三叔隔著一坵田幹活，只聽見有人在大罵共產黨，被三叔聽見就批評了他幾句。可是此人卻反而大罵三叔“右派”、“四眼狗”（指戴眼鏡、侮辱人的話）、“假積極”等不堪入耳的話語。平時，如果有人當著三叔的面說“右派”，最刺痛他的心，而且他最忌諱聽到“右派”二字。結果，爭吵得幾乎要打起來，雙方都拿起田刨杆，幸好旁邊有人勸解才甘休。類似這樣的事，不只發生過一次。

最嚴重的一次，發生於 1961 年 12 月在田裡“削麥”（即用鋤頭在麥行間鬆土除草），生產隊裡有個姓泮的隊員，說，“明朝皇帝朱元璋在位時，把自己的家鄉搞得許多人外出流浪討飯。現在，毛主席的家鄉韶山的老百姓也一定很苦，可能很

多人也在外討飯。”三叔聽後，當即與他爭論，倆人都爭得面紅耳赤，那人罵他“右派，假先進、假積極”，還用惡毒的語言咒罵，三叔忍受不住，放下手中的鋤頭，倆人在田坎邊上扭打起來。

1958 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化”，大刮“共產風”，搞“食堂化”。高臺門的房子被生產大隊徵用，改作大隊倉庫，三叔與祖母搬到魚巷裡金家居住，高臺門對面，我們西樓原來的老屋被用作食堂。食堂大門貼有大幅標語：“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飽飯，轟轟烈烈搞生產”。到後來，食堂就遇上了坐吃山空、無米下鍋的景況，食堂每餐只能供應稀粥，到後來，連稀粥都變成了“湯”，湯清澈得幾乎能見到飯桶底。有人用鐵勺打撈米粒，攪得“丁丁當當”作響，大罵共產黨“叮鈴噹啷”。三叔聽見就批評他不該罵共產黨，雙方也曾因此發生爭吵。

1958 年 8、9 月間，“大躍進”再掀高潮，各地糧食、鋼鐵產量“放衛星”，《人民日報》報導湖北麻城出現“天下第一稻”，早稻每畝 36900 斤，三叔興奮不已，信以為真。可是生產隊裡的農民並不相信，他就與他們爭辯：黨報難道會說假話嗎？ 何況報上還有 4 個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幾年後，知道這是假的，作了批評處理。這使他相信共產黨知錯必改，容不得半點虛假，對共產黨的迷信反而加深。

1958 年，在搞“人民公社化”的同時，又搞起全民“大辦鋼鐵”。大塅裡一帶的樹木都被砍倒燒炭，供小高爐煉鋼鐵。老百姓把家裡藏有的鐵器，房子的鐵窗都捐出來拿去煉鋼。1960 年前後，開始出現全國性的大饑荒，糧食、食品匱乏，家鄉也不例外。三叔和祖母有時吃糠餅充饑，兩人都得了“浮腫病”，大便不暢通，連走路也有些困難。但三叔沒有一

句怨言，認為自己應該和全國人民一樣，克服“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困難。

在糧食最缺乏時期，三叔常對人說，“洋芋頭（即馬鈴薯）皮營養最豐富。”後來，這句話成了大家在田間勞動時的談笑資料。生產隊裡的許從友常開玩笑：“ 吃洋芋頭皮比吃豬肉營養更豐富，這是良英叔的發明。”

5、自學英語 協助三叔工作

我哥從眾，1954 年初中畢業，曾當過代課教師，1958 年去新疆八一鋼鐵廠當工人，1962 年下放回家，在我們同一生產隊勞動。在生產隊花名冊和記工簿上，姓名順序，我們叔侄三人的名字排在一起，無論是點到記工分，還是分配糧食，先叫到三叔，然後是我哥和我。

1963 年下半年，我哥結婚，娶了個會繡花織布的農村姑娘，但是不識字沒有文化。因我家的房子很狹小，我無處住宿，就搬到高臺門與三叔同住一室。

三叔住的小房間，是在高臺門西首正房間的後半間，前間住著祖母。小房間面積僅有 10 多平方，三叔睡的木床，還是 20 多年前為了在“風翻書樓”讀書自學，四兄弟同時做的。他的床南北朝向，我就在東西方向加了一張小床。房間裡唯一的裝飾，就是他床頭的那張于子三烈士半身塑像的畫片，它雖然只有比明信片稍大一些，但三叔卻非常珍愛它。

1962 年，當時正處於中蘇論戰高潮，毛澤東企圖與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要使中國成為全世界革命理論中心，為此，必須把各國著名自然科學家的哲學、政治思想言論編譯出來，供批判之用。科學界首選的對象自然是愛

因斯坦。8 月，三叔原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組（組長于光遠）寄來一份《關於自然科學問題的重要著作選譯擬目（草稿）》，向三叔徵求意見，並委託他負責編譯《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出版時改名：《愛因斯坦文集》）。三叔給這個擬目提了 27 條修改意見，並表示願意接受這項編譯任務。

1963 年 1 月，三叔在北京住了 4 個月，從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借來能夠找到的全部文獻資料，包括許多與愛因斯坦有關的書籍，其中有名家所寫的多種愛因斯坦傳記。他從北京帶回一大堆書後，就夜以繼日地閱讀、選編、翻譯。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開始投入這項工作。

在我與三叔同住一室的時候，正是他在這既是臥室，又是工作室的小房間裡進行緊張的譯述工作。此時，三叔已經完全擺脫了田間勞動，用稿費向生產隊“購買”工分。無論嚴冬還是酷暑，他廢寢忘食地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化在編譯工作之中，每天工作時間長達 14 個小時以上。

三叔床前的一張方桌，就成了他的辦公桌。桌子上放著一個長方形的卡片盒，以及攤開一本書那麼大的斜著的 “小書架”，翻譯的書就放在上邊。大隊發電廠晚上八、九點鐘就停電，三叔就點上煤油燈繼續翻譯到深夜一、二點鐘。有時我一覺睡醒，他還在聚精會神地在微弱的燈光下伏案寫作。

1963 年三叔在北京期間，獲悉上海科委秘書李寶恒曾計畫編譯愛因斯坦著作，於是就找他合作。但因他工作忙，只分擔小部分翻譯工作。1964 年 10 月，三叔的翻譯工作已完成了原定計劃。書名《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共選譯了 200 多篇文章，50 多萬字，包括了愛因斯坦有代表性的科學論文和社會政治思想言論。由於國內階級鬥爭的氣勢越來越猛，《愛

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出版受阻。利用等待出版的這段空隙，三叔寫了一篇 9 萬字的評論性文章《編譯後記》，並在此基礎上寫了一部 17 萬字的專著《愛因斯坦的世界觀》書稿。

為了試探外界反映，三叔把《後記》和《世界觀》稿中論述哲學思想部分的要點，寫成了一篇 25000 字的論文《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經李寶恒略加修改後，聯名寄給《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發表於 1965 年的第 4 期上。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對此文很是讚賞，認為學術批判文章就應該這樣寫，要《紅旗》雜誌轉載。于光遠知道此文主要是三叔寫的，黨刊不能刊登右派的文章，於是要李寶恒把它壓縮一下。李的初稿剛寫好，“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他成了“閻王殿”（中宣部）在上海的第一個“黑幫分子”受到衝擊。

“文革”開始揪出了“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另一個“三家村”：北京龔育之，上海李寶恒，浙江許良英。為了調查李寶恒與三叔的關係，上海方面派專人來張家渡。

《瞭望》週刊 1984 年第 37 期，曾發表新華社記者胡國華的報告文學：《綠色的文集》。文章第一節是這樣描述的：

一九六六年夏季，天氣格外炎熱，連一向涼爽的浙東臨海縣的山鎮張家渡，也受了沉悶氣壓的影響，讓人覺得濕熱難耐。有一天，由杭州開來的班車上下來一個人，住進鎮上的一家小旅店。

翌日上午，他在張家渡公社的一間辦公室裡，召見了一位年近半百的“老農”，見了面，劈頭就問：“你就是許良英嗎？你知道我為什麼找你？”

許良英衣著頗土氣，短衫吊袖，肥褲低襠，可一身老農的穿戴卻無法掩飾蘊蓄著的書生氣，他沉靜的答道：“不知

道！”

“我是上海科委系統的，叫徐永德。這次鑽山溝找你，是為核對一件大事。你認識李寶恒嗎？”

“認識。”

“李寶恒給《紅旗》寫了一篇《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這是一株大毒草。現在，李寶恒已被揪出來了。他說這株毒草是和你共同泡製的，是真的嗎？”

許良英很痛快地回答：“可以說主要是我寫的。有問題，責任也在我。”

徐永德不禁一愣，繼而又有些不相信地問：“那文章上怎麼沒你的名字呢？”

許良英笑了笑說：“這篇文章實際是我寫的愛因斯坦著作的譯後記，李寶恒是我搞翻譯時的合作者，所以也掛了他的名字。文章最初發表在去年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第四期，因考慮到我是右派，編輯部未署我的真名，只用了‘林因’二字。”

徐永德不無蔑視的說：“哼！你現在有沒有認識到文章觀點的反動？”

許良英依然不卑不亢的說：“沒有。”

徐永德拉開手提包，取出一疊稿子，說：“我上過大學，多少懂點科學……。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對立統一關係，你認為‘只是通過相對論，人們才獲得了本質的認識。因此，對空間和時間的本質認識，可以說是愛因斯坦對科學的最大貢獻’。這兩者的關係，明明是列寧最早在《唯物論和經驗批判主義》作出科學論述的，你怎麼歸到他身上去了，你這不是有意美化他嗎？”

許良英從容不迫地說：“不錯，列寧是在這本書中，對空間和時間的關係作過精闢的論述。但他的觀點是在一九〇八年

發表的。而愛因斯坦的觀點，則是在一九〇五年發表的，時間要早三年。”

徐永德臉上現出了複雜的表情，不知道是相信還是反駁好。

許良英繼而又說：“如果你不相信，回去可以查《列寧全集》第十四卷。這一卷正好我也參加了校閱，譯後記中有我的名字。他們兩人論著的發表時間，我都進行過核對，結論不是輕率得出的。”

坦率的言詞，有時像一股暖流，能融開敵意的堅冰……。經過兩個回合的交鋒，徐永德對許良英的態度開始轉變。他發自內心地說：“看來你還真有些學問。可你怎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呢？”

徐永德真誠的詢問，使許良英洞開了緊閉多年的心扉……

聽了許良英的敘述，徐永德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你是個好人！”

從此，他和許良英建立了友誼。回上海後，他未講過一句對許良英不利的話。後來，他因公開反對張春橋、王洪文，被逮捕入獄，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徹底平反。可見，善惡即便一時雜處，也終究會涇渭分流，不相見容的。

1966 年 7 月中旬，上海科委派徐永德到張家渡，在村子裡住了 4 天，經過幾個回合的思想交鋒後，他對三叔表示信任和同情，並要同三叔交朋友。

自從三叔擺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轉到翻譯工作後，勞動之餘，我也開始自學英語，並協助三叔做些工作。如抄錄有關愛因斯坦的資料卡片，謄寫譯稿等。

在中學讀書時，我對英語就比較感興趣。在三叔從北京帶

回的一大堆有關愛因斯坦的著作中，其中有一本向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借的美國出版的書：《The Story of Albert Einstein》很吸引我。此書不但英文比較淺近，而且內容也令我感興趣，於是，我就試著翻譯。在試譯過程中，我的英語水平有了提高。後來，三叔在北京所借的書中有些要及時歸還，我就把未翻譯的後半部分原文全部抄錄下來，以備把它譯完。

《物理學的基礎》（Foundation of Physics）是一部名著，作者：R.B.琳賽和H.馬根腦（Robert Bruce Lindsay & Henry Margenau）。此書在西方國家有一定影響，許多談論物理理論分析的文章常提到這本書。

在《物理學的基礎》中譯本的扉頁上，三叔寫有這樣一段文字：

“這本書的原著是1946年1月9日開始讀的，那天各報特大標題：‘停戰令下！’但不到三個月，發覺自己完全上了當，也就拋棄了全部物理。想不到十一年後，重新過著讀書的生活，要把它抓回來，1957-1958年間陸陸續續把它譯出來，譯完後就作為廢紙丟在北京。1962年9月，哲學研究所和商務印書館要我編譯《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為了解決我的生活問題，他們主動地把這部譯稿拿去出版了。‘譯後記’是1958年6月離開北京前寫的，1963年6月稍加修改。”

1942年，三叔浙大畢業時，王淦昌先生要留他做研究助手，由於三叔急於要找黨的關係，婉言謝絕了，然後去桂林尋找地下黨組織。1944年9月桂林淪陷前後，三叔在桂黔邊境山區流浪了半年。王淦昌先生在貴陽報紙上登廣告，召三叔回浙大。1945年2月，三叔回貴州湄潭（浙大搬遷至此）任物

理系助教，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用於革命工作上。

1956 年，三叔結束了他在科學院的行政工作，調入新建立的哲學研究所，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的研究工作，重新過著書齋的生活。為了溫習已荒廢多年的英文，他又撿起《物理學的基礎》，繼續翻譯，並與出版社簽訂了約稿合同。1958 年他被處分，失去了黨籍和公職。他留在北京家中，繼續翻譯這部書稿，直至完成。當寫信給出版社詢問有關此書的出版問題時，回答是“時過境遷”，不再履行“約稿合同”了。

1963 年，商務印書館正式向三叔約稿，並且決定出版其舊譯的《物理學的基礎》一書，還預支了此書的稿費，使三叔可以用來向生產隊購買“勞動工分”維持生活。當商務印書館寄來《物理學的基礎》一書的校樣，三叔分配我為此書的“索引”，把頁碼按照譯本修改。後來還發給我編這部分的稿費，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工資”。《物理學的基礎》於 1964 年出版。

那時，三叔叫木匠做了一個約 80 公分長、20 公分見方的卡片盒裝滿了愛因斯坦的資料卡片，其中部分卡片是三叔叫我替他抄錄的。

勞動之餘，我還替三叔謄抄譯稿。那時三叔所用的稿紙都是商務印書館提供的，商務印書館的稿紙都是 16 開大張。三叔每譯好一篇文章，我就替他在稿紙上重新謄清一遍。我非常幸運地成為這些文章的第一個讀者。雖然愛因斯坦的科學論文我無法讀懂，但其他的文章我還是能看懂的。

1972 年我開始當民辦教師，記得 1974 年 10 月，我在更樓中學教書時，還曾收到商務印書館直接寄給我的“抄稿費”。

“文化大革命”期間，稿費一律取消。那年三叔正好為出

版《愛因斯坦文集》，在商務印書館做臨時工，每月工資 50 元。他向商務印書館領導交涉：目前雖已取消了稿酬制度，但以前曾經簽訂過的約稿合同的《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尚未拿到稿費，因為那時我們都在生產隊當農民，沒有工資收入，要求他們支付此書稿的“抄稿費”。結果，他們給我寄來了三十五萬字（按每千字 2 角計算）的抄稿費。在文革期間，能收到這筆稿費，真是不容易！

6、出席省“貧代會”

我自從回鄉後，除了在大隊民校教夜學外，還積極參加大隊俱樂部活動。

從讀初中開始，我就學習拉二胡，音樂成為我的業餘愛好。下放回鄉後，我用學校退還給我的學費買了一把小提琴帶回家，勞動之餘練習。

1964 年春節期間，為了配合階級鬥爭教育，大隊俱樂部排演了《楊立貝》一戲。此劇描述於潛縣一位老農因蒙受不白之冤到處喊冤告狀的故事。我妹回央，活潑、聰穎，從小就喜歡演戲，小學畢業，因家庭成分問題不能升學，後來進城西區業餘文工團，農閒時演戲，此時也在劇中扮演角色。我則參加樂隊，用小提琴伴奏越劇。

可是，不久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更緊。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對我們這些“四類分子”子女的歧視也更加劇。大隊不但停止了我在俱樂部的活動，還不允許我再繼續在夜學教書。

直到 1965 年，全國各地貫徹中央“二十三條”，我們這些“四類分子”子女，被稱作“可以教育好子女”，我在俱樂

部的活動和夜學教書也恢復了。

不久，報刊上發表了周恩來總理在新疆接見知識青年時的講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中國青年報》也為此發表《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的社論。報刊上逐漸出現介紹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入團入黨事蹟的報導，其中介紹遼寧省一個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孫雲傑在自己家鄉入黨的事蹟，給予我很大的鼓舞，我決心向他們學習。以前，我每一階段都向團組織寫一次“思想彙報”，此時，我又提筆向公社團委彙報自己的思想情況，並重新提出要求入團的願望。

1966 年 3 月 22 日，公社幹部來到我家，通知我與井頭大隊黨支部書記、省“貧協”委員程明忠一道去杭州，參加浙江省貧下中農代表大會，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23 日下午，程明忠約我一起進城。翌日清早，滿載代表們的專車從臨海開往杭州，下午三點鐘左右，汽車駛過錢江大橋進入市區，我驚喜地看到眼前的景象，仿佛自己已置身於仙境之中。西湖沿岸，蔥郁的草木在陽光的掩映下，更加顯得嫵媚；一簇簇嬌豔的花朵，含笑開放，好像在迎接到來的客人……。人們都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真有到了“天堂”的感覺。

我們臨海縣代表團下榻湖濱的新泰旅館，我和程明忠同住在三樓窗口朝向西湖的一室。

25 日上午，浙江省貧下中農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開幕式在省體育場舉行。大會由省委副書記陳偉達主持，省長周建人致開幕詞。

隨後幾天的會議，我們台州地區代表團分會場，設在解放路的杭州市政協禮堂。會議期間還組織我們參觀杭州植物園、梅家塢大隊（以產茶葉聞名）、古蕩公社、半山鋼鐵廠。其中

一個晚上，在杭州機床廠與工人們舉行聯歡活動。

出席這次“貧代會”的，每縣都有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名義參加，我就是臨海縣的一名。會議的最後一天，共青團浙江省委還特別召集我們這些“代表”，舉行了一次座談會。

在座談會上，我作了題為《一輩子讀毛主席的書，一輩子改造思想》的發言。我現在還保存底稿，抄錄幾段如下：

“在一段時期內，我比較抓緊政治學習，特別是毛主席著作的學習。通讀了《毛澤東選集》第一、第二卷，對重點地地方做了筆記。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從這裡我們認識到自己所受的家庭影響，看清家庭的剝削階級本質，決心與家庭劃清界限，徹底背叛家庭。《矛盾論》中又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說明，一個人的進步完全靠自己的主觀努力，靠自覺革命。革命靠自己，這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

……

“在我思想發展的過程中，使我進一步體會到不讀毛主席的書，不時刻改造自己的思想，就會走彎路，就會迷失方向。我充分認識到自己身上存在許多問題，頭腦中兩個階級意識的鬥爭還會經常出現。思想改造並非朝夕、一月、一年的事，而是長期，一輩子的事，我一定要一輩子讀毛主席的書，一輩子改造思想，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隨時革頭腦中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立場、觀點、方法上來個徹底改造。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

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

我不過剛剛走上革命的道路，黨和人民就給與我這麼大的鼓勵和榮譽，我被邀請來杭州以“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出席這次會議，我學習毛主席著作還非常不夠，想想真是慚愧。開會期間，參觀了一些工廠和人民公社，我親眼看到祖國日新月異的光輝成就，結識了農業戰線上的老模範和先進人物，我的心激動極了！我感到我們祖國能夠如此繁榮富強，我越發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永遠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我從杭州開會回來不久，大隊團支部在大隊民兵連連部（因團員都是基幹民兵）舉行支部大會，會上一致通過我的入團申請。我想不到自己在 9 年後又一次被支部大會通過入團，與上一次相似，又遇上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上級團委仍未正式批下來，我的入團問題也永遠成了泡影。

在杭州開會時，大會發給每位代表一本《毛主席語錄》。當時這個“小紅本”還比較稀罕，我帶回來，全大隊我還是第一本，許多人都很羨慕，我也因此引以為榮。後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這個“小紅本”，人手一冊隨身帶，什麼“早請示”、“晚彙報”，什麼“批鬥會”……都要用上它。這個“紅海洋”中的“紅本本”是林彪一夥的“創造”，我卻把它視為“珍寶”，還作詩加以頌揚，這首《語錄本呀身邊藏》發表在臨海縣文化館主辦的刊物《農村俱樂部》1966 年第 20 期上。

7、“文革”狂瀾的衝擊

1966 年 5 月，報刊上發表“五·一六”通知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開了。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對人的“靈魂”要進行一場革命。

我們這裡的“文革”首先發端於城西中學，他們學校的紅衛兵到張家渡街上“破四舊”，搜查“四類分子”家中的“四舊”物品，包括金銀財寶以及其他物品，有的沒收，有的放在大街上焚燒。在學校裡，“革命”師生首先抽出了第一批“牛鬼蛇神”，首當其衝就是陳天彪先生。

二年前的清明節，陳先生與我們一起春遊尤金嶺，寫下歌頌大罌民兵英勇鬥爭的詩歌，當時他覺得此詩寫得很得意，於是把它抄貼在學校的壁報上。“文革”開始，有人把這首詩重新拿出來，認為它是“反動詩”，是他反革命本質的暴露。其中一句“黑暗叢中一點紅”（原詩句已記不清了），說是把當前大好形勢描繪成一片黑暗；“一點紅”意指妄想反革命東山再起。並且向陳先生算老帳，說解放前，他在《回浦潮》刊物上發表反共文章，是反革命的“老手”。說我們四個人：一個“反革命老手”、二個“右派”、一個“地主兒子”，在尤金嶺聚在一起，搞“反革命”復辟活動，企圖推翻革命政權。

此事很快傳到公社，為此，公社領導找我談話，向我瞭解有關情況。我把遊尤金嶺的整個過程敍述了一遍，並且指出此詩並不反動，它是歌頌大罌民兵英勇鬥爭的事蹟。我把陳先生寫這首詩的動機和經過詳細地向他解釋，說明當時我們談論的話題是，大罌民兵鬥爭的事蹟，詩的內容顯然是描寫和歌頌他們，怎麼會變成我們要搞“反革命”活動呢？由於我前不久剛從杭州開會回來，公社領導認為我是“四類分子”子女中的一個先進典型，因此，也相信了我的話，三叔和小叔也免遭因此事而受到衝擊。

“文革”剛開始，公社領導和張家渡法庭負責人都曾找我去個別談話，並交代我，如果社會上及“五類分子”（包括“右派”）中，有什麼情況要及時向他們彙報。我認為自己是剝削階級家庭的叛逆者，滿腦子裝著“永遠跟黨幹革命”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成了他們的“馴服工具”。

有一件至今還使我感到內疚的事：

同村的許紹棨先生，1948 年浙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一直在回浦中學任教，擔任語文教研組長及高三畢業班把關老師，1957 年被打成“右派”，送農場“勞動教養”，1961 年回老家張家渡勞動。有一次，我與他在西門外路上不期而遇，從城裡一道步行回家，一路上他講了一些對現實不滿的話。“文革”開始後，我竟把他所說的這些話當作“材料”向領導彙報，並寫大字報揭發。

另外還有一件更使我內疚的事：

一天下午，我到中街理髮店理髮，當我踏進店門，就看見一個青年，坐在理髮椅上看報紙。當天的報紙上登載了有關揭發“三家村”（即鄧拓、吳晗、廖沫沙）“罪行”的報導。他一邊大聲朗讀，一邊大發議論。他稱讚“三家村”是英雄好漢，聲稱自己是鄧拓的“兄弟”。我即與他爭辯起來，但他並不認輸、堅持自己的看法。當天，我就向公社領導作了彙報，揭發他的“反動”立場。

不久，大隊召開“聲討鄧拓黑幫分子”大會，公社領導要我在大會上發言，我還準備了發言稿。那時，我只是愚忠共產黨、迷信毛澤東，受騙上當，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不自覺地充當了他們的“馴服工具”，現在想起真是可歎！可悲！

近查閱到《被迫害自殺的著名人士名錄》，文化大革命時期非正常死亡 2000 萬，傷殘無數，僅自殺的名人就有五、六

十位，鄧拓排在第一位：

鄧拓——1921 年生，福建閩侯人。八大代表，北大教授，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等職。1966 年因《三家村》、《燕山夜話》等冤案受迫害。5 月 16 日戚本禹發表批判文章，說他是“叛徒”，隨後又看到“五·一六”通知，絕望至極，於 5 月 18 日凌晨，服安眠藥自殺身亡，成為那段非常歲月裡的第一個以死抗爭的殉道者。

1966 年秋天，“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揪鬥“牛鬼蛇神”，戴高帽遊街，滿街大字報……已司空見慣。除了城西中學的“紅衛兵”小將們來到村子裡抄家揪鬥“牛鬼蛇神”外，大隊基幹民兵連也組織了“紅衛兵”，出動“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

在滿街大字報中，攻擊三叔的大字報最多，他成了全村主要的打擊對象。藉口“破四舊”，有人揚言要把三叔家裡所有的書，一把火燒盡。在大字報中，最聳人聽聞的有：“許良英三上北京接受鄧拓的黑指示”、“許良英譯‘黑書’”、“許良英從北京帶回大筆反黨經費”、“許良英組織反革命集團”、……

從 9 月份開始，台州地區“四清”工作隊進駐我們大隊，直到 12 月份撤離。隊員都是台州地區各單位的幹部。

工作隊裡有一位來自台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幹部，大家都叫他“老趙”，他專門管“五類分子”。針對大字報上的那些胡言亂語，三叔找老趙，澄清事實真相，並向他講述了個人的歷史，老趙聽後，表示同情。後來，這位“老趙”，還把我們這些“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子女組織起來辦“學習班”，夜裡學習，地點放在小學課堂裡，老趙指定我做他們的“班長”。

大字報中對我的攻擊也不少。在一次大會上，大隊“貧協”主席氣焰非常囂張，“勒令”我交出在杭州開會的“代表證”，罵我這個地主的兒子竟敢冒充貧下中農。有人還放出空氣，說三叔、小叔和我是張家渡的“三家村”。

“文革”第二年，即 1967 年，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所謂“造反派”，我這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充當了他們的吹鼓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樂隊“主把”。

開始階段，我們城西區範圍內，有個叫“城西區貧下中農造反總部”（簡稱“貧總”）的造反派，屬於“保皇派”（又叫“老保派”），他們佔領了城西區委大院，設立他們的“總部”，並組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調集全區各單位有文藝才能的人排練節目，準備在春節期間，赴全區各地巡迴演出。因樂隊缺少拉琴的，他們看中了我這個曾經出席過省貧代會的“地主兒子”，也把我吸收進去。

1968 年，“貧總”失勢，又出現了另一個造反派組織：“城西區造反派聯合司令部”（簡稱“城西聯司”），占了上風。至此，兩派的“武鬥”也開始發生。

“城西聯司”這個造反派組織，主要是由城西中學原來受壓、出身較差的師生一派——“向陽兵團”（屬“井岡山”派組成），後來擴大到全區各公社、大隊，他們也成立“井岡山”造反組織。

“城西聯司”的“司令”，是城西中學學生、“向陽兵團”頭頭楊金國，人們叫他“楊司令”。數學教師龐獻國是“城西聯司”的頭頭之一，許多人都叫他“龐太師”。

這年春節期間，他們也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以城西中學學生為主，並吸收全區各單位的文藝骨幹，我也被吸收做樂隊的“主把”。有時，樂隊只我一人，我用“板胡”

伴奏，聲音很響亮。宣傳隊的足跡，幾乎踏遍全區各公社的大小村落。

由於我們都迷信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革掉人們醜惡靈魂的革命，要積極參加。

當時，我們都認為“城西聯司”這一派，是代表正確路線的，為了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我們都竭盡全力支持他們。三叔也認為“城西聯司”這一派是正確的，積極支持他們。

三叔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1966 年 1 月，讀到《人民日報》社論：‘哲學工作者，打起背包，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滾一身泥巴’，覺得自己最近三年來雖然身在農村，卻日夜鑽在書稿之間，實在很危險，於是立即恢復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生活。1966 年 5 月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我可以說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這是因為我始終迷信毛澤東和黨報，黨所號召的我都聞風而起……，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我以當年參加地下黨的心境支持造反派，協助他們寫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但盡力勸阻造反派之間的武鬥。”

“文革”狂瀾衝擊著每個人的靈魂，最終，釀成了種種“惡果”……

8、三叔被關押浙大審查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三叔恢復了全天的田間勞動，但經常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外調人員。

解放前，三叔曾擔任地下黨浙江大學支部書記和杭州工委組織委員，大部分地下黨員都經過他的審批入黨。解放後，這些地下黨員大多數擔任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的領導職務，“文

革”中他們就成了接受審查和批鬥的“走資派”。這些外調人員來到張家渡，有時把三叔從田頭傳喚到公社，有時直接來到家裡瞭解情況，有時一天竟然來了好幾批，只好輪流進行。

1968 年 5 月的一天，突然來了一批人，先把三叔傳喚到公社，然後押上停放在張家渡對岸小海門公路上的車子（那時張家渡還沒有通汽車），直接把他帶走了。原來是杭州市革命委員會和浙江大學革命委員會派來專車，押送三叔到浙江大學審查。

解放前，地下黨浙大支部和杭州工委都屬上海局領導，“文革”期間，整個上海局系統的地下黨被懷疑是叛徒、特務組織。

三叔被關押在浙大審查長達 11 個月。開頭 5 個月，他住在浙大招待所，還有人身自由，寫了 23 萬字的浙大和杭州地下黨組織情況的材料，同時接待了數以百計的外調人員，寫有關的證明材料。到了 11 月中旬，情況發生了轉變，三叔成了“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被關進浙大行政大樓五樓，接受“隔離審查”。審查期間，他寫了 10 萬字的自傳。後來浙大開了三次批鬥大會，批鬥大會一次比一次升級，第一次批鬥大會，把他押到台下聽批判，後二次用“噴氣式”解押上臺。

第三次批鬥大會，是關於“于子三、吳大信事件”。會上第一個發言的題目：《于子三事件中許良英之流造什麼反革命輿論？》，發言者說，于子三是“軟骨頭”、“叛徒”；而許良英卻說他是烈士。並且污蔑 1957 年 2 月三叔在北京商議紀念“于子三運動”十周年的座談會是“反黨黑會”。

三叔於 1969 年 5.月 16-19 日在關押期間，寫下了《關於于子三運動的一些情況》的交代材料，現抄摘其中幾段：

“于子三在被捕前，他在政治上還不十分成熟，從 1947

年 5 月中旬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到 10 月 26 日被捕這五個多月，正是他迅速成長的時期，他的世界觀還沒有完全定型。但他被捕後，經受了三天的酷刑和折磨，迫使他在出賣革命還是犧牲自己這兩條道路作出抉擇的時候，他毅然選擇了後者；為了保衛黨，終於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此，把他定為革命烈士，該是沒有錯。”

“被人說成是‘右派’言行的、‘向黨中央施加壓力’的、‘企圖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1957 年我在北京召開的所謂‘反黨黑會’的真相如下：

從青年時代直至今天 30 多年來，我每次想到為革命事業而犧牲的先烈，心情就無限激動。無數先烈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可歌可泣的事蹟，是使我在 1940 年開始獲得新生命（真正的政治生命）的最大啟示，也是我以後用來向別人進行革命教育的重要題材。30 年來，每當我從書報上，從電影或戲劇裡，從廣播裡，看到或聽到革命烈士犧牲的事蹟（甚至是非常簡短的報導）時，沒有一次不是熱淚盈眶或淚流滿腮的。因此，我對為人民利益而獻出生命烈士的紀念，一向十分關心。于子三的犧牲，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他為了保護黨和革命同志的安全而獻出自己青春的生命，每次想到這裡，我心裡就非常難過。因此，對于子三的紀念，是我的良心所不能忘懷的。

1957 年初，我想起 10 月 29 日是于子三殉難十周年，考慮到于子三的墓，當年草率下葬後迄今未修過，如今十周年了，應該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而且也應該把他的事蹟和當年鬥爭的史實整理總結一下，這對於青少年學生進行革命教育也是一個很好的資料。1957 年春節，我去《中國青年報》社看鐘沛璋，同他商量這件事。他是《中國青年報》的副主編，

1947.12-1949.2 任杭州工委委員，‘于子三運動’後期，他也是知道的。我建議由我們兩人發起，邀請在北京的于子三生前好友和當年共同參加過鬥爭的地下黨員（大部分已在北京工作）開個小型座談會，來討論如何推動籌備于子三殉難十周年紀念事宜。地點就定在《中國青年報》社。因為這件事有關青年的革命傳統教育，應該得到團中央的支持。鐘沛璋表示完全贊同。我們商定於 2 月 10 日下午開個會，參加者的名單由我開列，邀請信由他執筆，並直接由他發出。”

當時與三叔關押在一起的有反動學術權威、浙大副校長王國松等人。在關押後期，他們在三叔身上搞不到什麼東西，就強迫勞動。一日三餐，要他把給其他關押人員吃的飯菜，從底層挑到五樓。

1969 年 5 月 20 日，他們對三叔宣佈審查結論：1、個人的歷史全部是清白的，未發現有與 1956 年科學院審幹結論相矛盾的問題；2、整個系統的地下黨組織屬於毛主席路線，是紅線。

這裡要補述幾點情況：

于子三烈士，山東牟平人，1925 年生。1944 年秋，考入浙江大學農學院農藝系。1947 年，擔任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10 月 29 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殘暴殺害，引發了全國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于子三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最後一次全國規模的學生運動。全國 20 多個大中城市、15 萬學生參加了鬥爭。這次全國學生的反迫害鬥爭，譜寫了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光輝一頁。

在運動前期，三叔任地下黨浙江大學支部書記；運動後期，任杭州工委組織委員，參與領導整個運動的全過程。三叔

在一篇回憶文章，描述《于子三運動尾聲的一個難忘場面》中寫道：

“1948 年 4 月上旬，即于子三安葬後的三個星期，當時地下黨上海學委通過上海各校學生自治會，組織各校學生以‘春遊’的名義，來杭州掃于子三墓，同杭州學生串連。臨別前，兩地學生在浙大工學院廣場舉行聯歡晚會。會上有一出由上海學生演的活報劇《張開希競選》。先出場的是袁世凱，他競選總統，隨後稱帝。接著上場的是一個同蔣介石完全一模一樣的人，也搞‘競選’總統。緊接著來了一個美國流氓，前者慌忙跪下，美國流氓用衛生棒敲著他光禿禿的腦袋，喊著：‘My dear son,Chiang Kai-shek!’原來‘張開希’就是蔣介石的英文譯音。當時國民黨當局正在南京召開所謂‘國民大會’上演一出‘選舉’蔣介石為‘總統’的醜劇。這個活報劇維妙維肖地，也是最真實、最直接地把這醜劇搬上舞臺。它的大膽、潑辣，實在驚人。在廣大群眾保護下的這樣一次突擊演出，敵人竟對之無可奈何。由此可見，通過于子三運動，青年學生的思想革命化是大大前進了一步，而于子三墓也就成為青年學生進行革命自我教育的一個重要場所。不僅如此，解放後，1950 年 10 月世界青年代表團，1951 年 5 月國際學聯代表團訪問杭州時，也都曾特意祭掃于子三墓，並聽取我們關於于子三運動的介紹。”

解放初，三叔時任杭州市青委學生部長，他親自接待了這二批外賓的來訪。

座落在杭州西子湖畔鳳凰山麓的于子三墓，如今是“萬松書院”旁的一個重要旅遊景點；每年“清明節”和烈士犧牲日，都有當年的戰友和青年學生前來掃墓，如今烈士的英魂也得以告慰。

9、抗爭與悲憤

三叔關押在浙大審查期間，張家渡就開始有許多傳言：說他是出賣過 6 個同志的“大叛徒”，在杭州已經“關進監獄”……；後來又傳出：城西區召開全區幹部大會，宣佈三叔是城西區“反革命總根子”。流言蜚語傳得很緊。

三叔在浙大審查結束後，即寫信告訴小叔他回家的日期。於是那天，小叔約了從眾哥特地趕到永安溪對岸的小海門車站迎接（那時張家渡還沒有通汽車），為了早些告訴三叔村裡對他的風言風語，使他有個思想準備。

1969 年 5 月 25 日，三叔在浙江大學革命委員會兩名人員的陪同下，回到了故鄉。對於以上傳言，同來的浙大革委會人員聽後，也感到驚異，他們對三叔說：“你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麼可能成為叛徒呢？在浙大也沒有人這樣懷疑過你。”他們的審查已經有了結論，他們當著張家渡公社革委會負責人的面，對此問題作了澄清，可是這些頭頭根本聽不進去。那時，區和公社一級的革命委員會的實際權力都掌握在“拿總”的手裡。“拿總”這個角色一般由原來的武裝部長充當。

公社革委會頭頭、“拿總”周xx說：

“你們上級的審查，是你們上級的事；我們下面還是要審查他文革的事！”

8 月，區裡正在醞釀要召開全區萬人批鬥大會，點名要批鬥全區“反革命總根子”許良英。這次要批鬥三叔的策劃者是新上任的城西區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葉紹雲，文革時沒有黨委，區革命領導小組組長即相當於區委書記。他剛到任，就瞭解到三叔是“大右派”，文革中支持造反派活動。

要批鬥三叔的消息傳開後，我還以為只是“傳聞”而已，不相信是真的。因為三叔在浙大審查已有結論，沒有什麼問題，怎麼還會遭到批鬥呢？後來，得知消息確鑿，為了使三叔免受這場劫難，我不顧一切，直接找到區、社領導，據理力爭，但都無濟於事。

在此之前，批鬥三叔的消息我一直瞞著他，怕他受不起這麼大的打擊。8 月 29 日下午，三叔年邁的奶姆（三叔從小吃她的奶長大的。我們都叫她“糖坊婆”）神色慌張地告訴三叔，昨晚全大隊貧下中農開會，宣佈明天要開全區萬人批鬥大會，主要批鬥他。三叔得知後，即去找公社革命委員會頭頭說理。在這些人面前，還有什麼理可說！他們根本聽不進去。

三叔回到家裡，情緒開始惡化，我們都不斷的勸說和安慰他。他說自己解放前參加共產黨，時刻準備犧牲自己，沒有指望能活著看見革命勝利。在介紹新黨員入黨時，也是這樣教育他們的。想不到，革命成功了，在用生命換來的共產黨天下，竟會受到如此的對待！說自己從小受到台州人“硬骨頭”精神的薰陶，無法忍受這種凌辱，只能以死來抗拒。

批鬥大會召開的前夜，我們把家裡所有的菜刀、剪刀之類的東西都藏起來，我徹夜守在三叔的身旁，以防發生意外。小叔也一起來勸說三叔。

在我們感到絕望時，小叔突然想起自己在大隊蠶桑場勞動，場長是公社“拿總”姓周的老婆，比較熟悉，單憑著這一點點關係，他說自己親自去他家一趟，作最後一次“說情”。此時，已是午夜時分，但小叔還是敲開了他家的門，無論小叔怎麼說，這位“拿總”就是不“領情”，依然口氣堅定地說：“許良英一定要批鬥！”

整夜，三叔都斜躺在床上，我一直守候在床邊。他情緒壞

透了，我還是要勸他幾句。他感歎地對我說：“我終生遺憾的事，是再也不能做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因為這個領域中國至今還是空白。”在他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祖國科學的發展和自己的責任。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是反革命呢？

那時，三叔住在正房間的後間，祖母住在前間。作為“五類分子”，小叔當天要參加批鬥大會，大約凌晨三點多鐘，他起來燒粥，因為我們整夜未吃一點東西，肚皮確實有點空了，也需要吃點。粥煮好了，從隔壁灶間傳來小叔的聲音：

“米央，粥煮好了，快來拿！”

我應聲到了灶間，剛拿起碗筷，就聽見後間有異常動靜，我急忙放下碗筷，迅速沖了進去，聞到了很濃的農藥“敵敵畏”的氣味，發現三叔半身躺在床上。我即刻用手扒開三叔的嘴巴，並大聲呼喊起來，小叔即刻趕來，迅速跑到正堂前呼叫，鄰居們聞訊趕來。毫不遲疑，我和另外一人各抬起三叔的一條大腿，昌友表叔抬起頭部，迅速向城西區衛生院奔跑而去。對門的秀根表叔已跑在前頭，敲開了位於下街的衛生院大門。

一路上，我一邊抬著三叔，一邊哭喊著，三叔早已失去了知覺。當抬到衛生院時，醫務人員已在那裡等候，醫生叫我們把他放在堂前走廊的石板地上。看到三叔躺在石板地上的那種慘狀，慘不忍睹，我哭也哭不出聲來，心如刀割，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幾乎要暈倒在地上，此時的悲痛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這是一個血和淚交織的時刻，我永遠忘不了！！

王池宗醫師翻開三叔的眼皮，發現瞳孔已經放大，生命正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我們萬萬沒有想到，三叔早已把“敵敵畏”藏在身上，隨時預備用生命來抗爭，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

王醫師和二位護士“小周”和“小戴”立即採取搶救措施。經過他們的及時搶救，三叔還處於昏迷狀態。接著，把他

轉移到單獨的病房裡隔離開來。不久，大門口和病房前都有民兵站崗，把我也趕出衛生院，只留下小叔一人，不允許我們親屬進去探望。

那晚我徹夜未眠。天亮後，外面的世界似乎變了樣，。我帶著滿腔的悲痛和憤恨，拖著疲憊的步履，蹣蹣跚跚地從衛生院出來，我永遠記得那天是 1969 年 8 月 30 日。在這個世界上，難道容不得正直、善良的人生存下去？“公理”何在？“天理”何在？那天正好遇上“市日”（農曆 7 月 18 日），趕市的人並不多，更多的是來自全區 5 個公社參加批鬥大會的所謂“革命群眾”。

走到街上，發現十字路口及大會堂對面商店上方，張貼著醒目的大標語：“許良英畏罪自殺就是叛徒”、“許良英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等等。“許良英”三個字顛倒寫著，還加上“xxx”。

萬人批鬥大會會場設在村東下橫溪（即芳溪）的溪灘上。我回到家裡吃過早飯，拖著木拖（那時還沒有塑膠拖鞋），無精打采地隨著人群走向會場。

走在半路上，我遠遠地就看見兩個被五花大綁、胸前掛著牌子的人解押赴會。走近一看，原來是城西中學的教師陳天彪和城西區供銷社的職工柴大忠。他們二人胸前分別掛著寫有沒“歷史反革命分子陳天彪”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柴大忠”的牌子。

據說，柴大忠是復員軍人，在供銷社工作。有一次看電影，銀幕上出現林彪的畫面，他說此人像個“奸臣”，因侮辱“偉大”的林副統帥的罪名，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大會原定批鬥三人，因三叔缺席而少了一人；否則，三叔也會像他們兩人一樣，被五花大綁。

大會主席臺設在溪西岸大壩的壩頂上，由於旱天，沒有溪水，“革命群眾”就在溪灘鵝卵石上席地而坐。雖已是初秋氣候，但還是感到一陣陣的悶熱，我更感到自己呼吸急促，坐立不安，因為我的心還依然牽掛著三叔的安危，腦海裡夢幻似地翻滾著昨夜發生的一幕幕慘狀。

批鬥大會即將開始時，突然聽到“轟隆隆”一聲巨響，有人高喊：“飛機來了！”一陣風似地，整個會場大亂起來。人們以為飛機要丟炸彈了，亂成一團，四處奔跑。此刻，我的腦子還來不及反應過來，就隨著人群逃離會場。由於我腳上穿著木拖，被別人撞了一下，跌倒在石子溪灘上，雙膝蓋擦破了皮，流血不止。我到衛生院去敷藥止血，那裡已擠滿了在會場上擠壓受傷的人。

後來，聽說人們逃散以後，只有少數人被叫了回來，批鬥大會就這樣草草收場。據說，“轟隆隆”一聲巨響，原來是樂隊的一隻大洋鼓從壩頂上滾下來，有人以為是飛機來轟炸。這難道是一個意外事件嗎？不，它是“天意”！是“天理”不容他們這樣折磨和殘害無辜的人！那天，幸好三叔以死來抗拒對他的折磨和對他人格的侮辱；然而，他被隔離在衛生院的病床上，是否已轉危為安，卻令人十分擔憂。

整整一天，三叔呼吸困難，象有什麼東西阻塞在喉頭。醫生告訴小叔，要隨時把喉頭的痰弄掉。那天，他不知用了多少帶棒的棉團，伸進三叔的嘴裡，撚掉阻塞在喉頭的痰塊。那天，蒼蠅飛到嘴邊都死掉，可見，“敵敵畏”的毒性是何其大。

夜幕降臨，廣播站開始播音，三叔一直昏迷不醒，此時雙腳開始動彈起來，接著“啊！”了一聲，才慢慢蘇醒過來，說自己好象做了一場夢。後來，他回憶說，當時聽到廣播正在播送有關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的消息。

三叔在衛生院住了五、六天后，把他轉移到門山腳的“雞坊”（即孵小雞的作坊）單獨關押隔離。公社革委會頭頭周某來威脅三叔，揚言還要繼續批鬥他，當場兩人就爭吵起來。三叔斬釘截鐵地表示：“要批鬥，不怕再死一次。”弄得周某無言以答。

三叔曾經告訴我，他青年時代投身革命，就決心為革命獻身。當年，在解決個人的生死問題後，就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道路，把個人的安危，包括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在他身上，真正體現了魯迅先生所稱讚的“台州式硬氣”，他的寧折不彎的“硬骨頭”精神，令人敬佩！

為了營救三叔，我們想盡了一切辦法。過了幾天，三叔從隔離室托人帶出他寫給臨海縣革命委員會的申訴信。我白天進城，怕被搜身，要被抓回來，於是趁夜闌人靜的時候，走小路進城。

進城後，我打聽到臨海縣革命委員會主任陳海濱的住處，是在臨海一中（即台州中學）旁邊的一座舊式洋房裡。

中午，我找到陳海濱的家裡。敲著宅院的大門，一位中年婦女出來開門，我說明了來意——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一定要見陳主任。她說：“陳主任正在午睡，不能接見客人。”我不顧她的阻攔，徑直闖進陳的房間。因天氣炎熱，房門開著，陳主任赤膊躺在床上還未入睡，見我闖進來，即刻坐了起來。我簡要的說明了幾句，就把那封申訴信放在桌子上，那個婦女吵吵嚷嚷地過來，把我趕了出來。

從陳海濱處出來後，我考慮是否還有其他途徑來營救三叔。我想起了同村在銀行工作的徐杏飛，請她能否想想辦法。

來到她家，我簡單地向她講述，她當即表示願意幫忙。她說，縣革委會的“畢營長”，她很熟悉，而且也比較信任她，

畢營長在縣革委會裡還是一位實權派人物。於是，我拜託她及時向畢營長反映情況，使三叔免於批鬥。

在這種異常惡劣的政治氣候下，一般人對我們都避而遠之，不敢接近，怕受連累；而徐杏飛卻能伸出援助之手，使我感激不盡，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這一次的鼎力相助。

三叔關押在“雞坊”的日子裡，從公社那裡不時傳出還要批鬥他的“傳聞”，後來，也就無聲無息了。

三叔關押在那裡 20 多天后回到家裡，一場劫難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三叔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說過，共產黨員要五不怕，即一不怕開除黨籍，二不怕開除公職，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監獄，五不怕殺頭。我有幸都體驗過了，的確沒有什麼可怕。可悲的是，我並沒有因此而醒悟，依然五體投地地迷信毛澤東。”

10、上山造水庫

張家渡村的南邊約五、六裡處，有一處風景點——西山。西山也叫“葛溪嶴”，小學讀書時，老師帶領我們“遠足”到那裡，記憶裡對此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西山背靠括蒼山，山嶴裡的青流從懸崖峭壁上直瀉而下，形成了壯觀的瀑布，傾注在山腳的龍潭裡。沿著山間溪坑，放置著一座座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水碓、水磨，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流水從龍潭下來，衝擊水輪旋轉，發出“咿呀，咿呀”聲，與水流“嘩啦，嘩啦”聲，水碓的舂米聲交織在一起，宛如演奏一曲優美的交響樂，悅耳動聽!

張家渡附近東南，靠近門山，有一自然村——“門山

后”，座落在我們生產隊田片——灌園北邊，住著十來戶人家，全村人幾乎都姓“葛”。

我小時候，曾聽大人們講過，有這樣一個傳說：

門山后有一個青年，一天上西山砍柴。當他砍好柴，挑著柴擔從山上下來，在一塊大石頭上，看見兩位白髮長須老翁正在下棋。青年很好奇，於是放下柴擔，在旁邊觀看他們對弈。看呀，看呀，一直看到他們一局又一局不分勝負，他們走完了最後一局，這位青年才意識到天色已晚，得趕緊挑柴回家，於是告別了兩位老翁。

青年人回到村裡，好像一切都變了樣，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家門，出來開門的竟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再三詢問才知道他是自己的重孫。青年人講述了自己在山上所遇到的情景，大家才恍然大悟，說他在天上遇見了仙人。這真是“天上一刻，地下一年”了！

從此，“葛仙人”的傳說就流傳下來，西山因此又叫“葛溪嘂”。後因“農業學大寨”，當地人希望“葛溪”變“穀倉”，於是把“葛溪嘂”改名為“穀溪嘂”。

三叔在小學讀書時，對地理學很感興趣。在科學院工作時，他買了一冊蘇聯出版的《世界地圖集》足有四、五斤重，價格也很貴。當時，除了地理研究所公家買了一冊外，個人買的，就只有他。這冊地圖集，是他帶回老家所有書籍中最大、最重的一本。1958 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化”，成立了城西人民公社（即後來的城西區），組織人員繪製全公社地圖，他被抽調去。他幾乎爬遍了全公社的大小山頭，走遍了各個村落，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繪製了一幅高質量的《城西人民公社土埌分佈圖》，後來送到縣裡，受到好評。三叔在 1970 年寫的《自傳》中有這樣一段回憶：

“1958 年 9 月，鄉公所交給我畫全鄉地圖的任務。10 月公社成立後，領導上有要我畫一張全公社的地圖，我帶著一個羅盤、一個講義夾和冷飯包，爬上不少山頭觀察地形，畫了一張全公社 200 多平方公里土地的地圖。1959 年 1 月，為了搞土埌普查和土地規劃（這是省裡佈置的，2 月間曾在我們公社召開全縣現場會議），公社又要我負責（還有別人合作）畫萬分之一的詳細地圖。畫這地圖時，雖有國民黨的五萬之一軍用地圖作參考，但那個舊地圖錯誤百出，需要實地觀察。我們畫的地圖很大，要八全張圖畫紙拼成一幅，又由於不同用途，要複製六、七份，前後花了兩個月才完成。畫規劃圖我特別高興，因為這是故鄉社會主義建設的藍圖。”

當時，三叔在完成繪製地圖後就曾向領導建議：在葛溪嶴造水庫，可發電 1，000 千瓦。這個建議終於在 20 世紀 70 年代得以實現。

1970 年冬，在“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張家渡公社決定在葛溪嶴山上建造水庫，並在山下建造水力發電站。現在的穀溪嶴水庫是一個高山、高壩水庫，壩高 37 米，庫容 147 萬立方米。

為了打好這一仗，在張家渡公社領導下，傾全公社之力，動員各大隊勞動力上山。我們生產隊社員也分批，背起被席，帶上勞動工具，輪流上山，每批半個月，住宿在下崖山村農民家裡，有時還要挑燈夜戰。當時的水庫工地，炮聲隆隆巨石走，飛車滾滾土搬家，幾十人一組用繩索拉的大石滾在壩基上來回滾壓泥土，一片繁忙的景象。

三叔和我也曾輪流到山上幹活。三叔幹的活是挖土、耙土；我幹的活是用手拉車運送泥土到壩基上。

三叔上山在水庫工地幹活，除了忍受艱苦的勞動和惡劣的

生活環境，還被人冷嘲熱諷，說他是“區委書記”什麼的。因為那場“以死來抗爭”的劫難剛過去不久，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就以此來尋開心。

另外，這裡敍說一下，1971 年 12 月 6 日發生在水庫大壩工地上的一幕：

是夜，滿天星斗閃寒光，呼嘯的夜風陣陣吹，穀溪罅山頭天更冷，勞動號子聲聲壯，群眾的勞動熱情非常高漲。井頭大隊第一生產隊隊長程明滿正帶領社員拉動石滾幹得熱火朝天。程明滿拉石滾的位置，離大石滾最近。拉呀拉呀，石滾已迫近大壩的頂端，由於慣性作用，石滾還是快速向前滾去。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為了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程明滿挺身而出，毅然沖向前，迫使石滾急剎車。由於用力過猛，身體失去了平衡，巨大的石滾經程明滿身上碾過，其他社員脫險了，可是，程明滿卻英勇地犧牲了。

程明滿的事蹟在水庫工地上傳開後，張家渡公社號召向程明滿學習，為早日建成水庫作貢獻，水庫工地上再次掀起了熱潮。

為了配合向程明滿學習的宣傳，城西區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葉紹雲把叫到我到區委大院，要我根據程明滿的事蹟，編寫一篇說唱材料。我欣然接受了，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寫出了題為《熱血澆開大寨花——歌唱程明滿》的說唱材料。我把稿子拿給葉紹雲看，得到他的讚賞。不久，大隊俱樂部排練了這個節目。這個節目還參加縣及地區的文藝會演，也獲了獎。後來，臨海縣文化館主辦的《農村俱樂部》，也發表了這篇說唱材料。

後來，水庫工地上工傷事故時有發生。一次，張家渡大隊下街生產隊在挖泥土時，突然土方大面積下塌，當場壓死隊長許良標，壓傷社員多人。與我同住一個院子的小青年潘祖平，

當時也被壓在泥土下，挖出來後立即送往醫院搶救，最後是雙腿殘疾。

這座凝聚著全公社社員的鮮血和汗水的水庫，終於在 1975 年建成。水頭落差 300 米的穀溪壩水電站，也於 1977 年建成。這是全縣第一座裝機容量在 1000 千瓦以上的鄉辦水電站。

水庫工地勞動的情景，在我的腦海裡時常浮現，根據水庫和水電站的意境，我曾作了一首詩，題為：《留在人間永照耀》發表在臨海縣徵文辦公室編的《革命文化》1972 年第三期。

留在人間永照耀

飛虹橫跨深山壑，
攔住銀河從天落；
托出天上星和月，
留在人間永照耀。

11、開始教書生涯

自從三叔“自殺”事件發生後，我逐漸從悲憤中慢慢清醒過來。對當時的社會現實，許多問題我想不通，企圖從馬列著作中找到答案，於是，我又重新學習《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並寫下了一篇學習體會：《徹底背叛剝削階級 堅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學習<共產黨宣言>的一點體會〉。扉頁上引用了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中的一句語錄：“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

抄錄其中幾段：

“……正當階級鬥爭非常激烈的時候，一小撮階級敵人又利用社會上出現的極‘左’思潮，以反動的血統論來壓制剝削階級子女來‘造’自己家庭的‘反’、革老子的命。一度，我也曾被這種反動血統論束縛著，思想消沉，認為家庭成分決定一切，

‘出身不好’的包袱壓得我止步不前。更有甚者，社會上還散佈著這樣一種謬論：‘一代地主，下一代都是地主；一代富農，下一代也是富農，成份永遠不變。’”

“這次，我通過《共產黨宣言》的學習，使我更清楚地知道那種反動血統論者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寫道：‘如果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以暴力消滅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無產階級的終極目的要徹底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消滅剝削階級，這是一場長期、嚴重的階級鬥爭。如果按照血統論的說法，老子是地主，兒子必定是地主，孫子仍然還是地主。倘若這樣子子孫孫傳下去，剝削階級不是永遠也消滅不了嗎？……

“環顧五洲四海，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帝、修、反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唯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春。《共產主義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創的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徹底勝

利的時代已經到來了，為了儘早完成這‘兩個決裂’，為實現共產主義事業而終身奮鬥，讓我們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不斷提高革命自覺性，跟上時代發展的需要。正如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說的：‘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我寫好這篇學習體會後，通過城西區文化站陳大法，遞交給區革領組組長葉紹雲。這篇文章得到他的賞識，後來，聽說他在一次幹部會議上，還表揚我這個地主子女，馬列著作學得不錯。

區革領組組長葉紹雲，大家都叫他“大葉”（因為還有一位副組長也姓葉，叫“小葉”）。他比較開明，工作能力也很強，大會上講話很有水平，在全區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一位難得的農村幹部。

三叔自殺的當天上午，“大葉”曾親自去衛生院指示醫生要盡力搶救；晚上他帶領幾個人到高臺門三叔家，名為“抄家”，實則對祖母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三叔的自殺，他知道自己負有責任。

三叔從“雞坊”隔離釋放回家後過了一個階段，通知他去區委，說從更樓公社某人家裡抄家時，抄到一瓶進口藥，上邊說明全是英文，要三叔去那裡翻譯一下。三叔進了區委大院，大葉和區裡其他領導十多人已等候在那裡。他們並非要三叔翻譯什麼進口藥的說明書，只是一種藉口而已。實際上要三叔當著大家的面說說自己過去向黨交待了的歷史是否都已清楚，如果清楚了，就在偉人像前發誓。三叔站起來發誓，表明自己的歷史是清白的，沒有任何隱瞞。當場，三叔就看出大葉臉上流

露出內疚的表情。後來，大葉和三叔經過多次的接觸和交談，互相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承認三叔是“老革命”，兩人的關係也開始密切起來。原先他策劃批鬥三叔，他知道自己是錯誤的。1972 年 1 月，他破格推薦我到台州師專（台州學院前身）英語班學習並安排我工作，正是為了有意補救他的錯誤。

1971 年，設在金華的浙江師範學院（浙江師大前身）一分為三，即一部分搬到台州，一部分搬到麗水，一部分留在金華。當時，台州師專開設了英語班。

“文革”開始後，大學停止招生，後來恢復招生，但採取“推薦”工農兵上大學。那時，師專英語班有兩個班，一班的學員都來自台州各縣，我讀的二班的學員都是臨海各區推薦上來的，全校唯獨我一人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成了師專裡的“異類”。為此，臨海縣教育局領導在一次會議上說，這是“落實政策”。

通過在台州師專半年的培訓學習，我終於當上了英語教師，開始我的教書生涯。

我原來作為城西中學推薦上來的，本該回到那裡，但是我考慮，倘若回到家鄉，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學生和家長還是把你看成是“地主兒子”，難以開展工作，因此，我向領導提出要求“回避”，異地分配。1972 年 8 月，我來到了更樓公社中學任教英語。

“文革”後期，每個公社都辦起了中學，城西中學的教師分散到各公社中學，更樓中學的負責人，即校革命領導小組組長龐獻國就是原來城西中學教師、“城西聯司”頭頭。在學校後山和離校 6、7 裡的“金珠竹坦”，學校專門開闢學農基地，我到更樓公社中學後，他指派我和另外一位教師負責學農基地。於是，我經常帶領學生到那裡勞動。

1974 年，“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全國各地燃燒。遼寧出了個“白卷英雄”——張鐵生，北京出了個“造反英雄”——小學生黃帥。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有一名女生，因厭學英語，英語考試交白卷，在試卷上寫著“不學 ABC，照樣幹革命”後，投水庫自殺，江青一夥知道後，製造了所謂“馬振扶事件”，當時在全國影響很廣。該校校長和多名教師被迫害致死。因“馬振扶事件”的影響，剛開始在農村開設的英語課，此時也受到衝擊，學生不願再學 ABC，我們英語教師的日子也很難過。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葉紹雲也受到了衝擊和批鬥。有一次，在張家渡大會堂，召開全區各機關單位幹部和全區中、小學教師參加的批鬥大會，批鬥的對象是“二葉”——“大葉”（葉紹雲）和“小葉”(區革領組副組長葉少雲)。

那天學校專門為此停課，我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待我從更樓趕到會場時，大會堂已擠滿了人，我只好在最後一排落座。

批鬥大會上，只見造反派上臺，個個滿嘴胡言亂語，其中一個人上臺揭發葉紹雲，說他“階級路線不清，讓地主兒子許從平混進教師隊伍”，並將這作為他的一條主要罪狀。

我聽到自己的名字，怒火滿腔，有些人還轉過頭來，看看我這個“異類”。難道他們要把我“趕出”教師隊伍？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已作好了思想準備。

自從 1970 年冬穀溪墈水庫上馬以來，全公社所有勞動力都必須按照每個人的底分負擔“水利義務工”，三叔和我也不例外。後來，三叔去北京在商務印書館做臨時工，我在更樓中學教書，都要用現金購買水利工分，因為我和三叔的戶口和糧食關係還在生產隊裡。我是個“民辦教師”，每月工資僅 30 元，購買了水利工分，剩下的就不多了。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階級成份”就能決定一切，無論是你的前途，還是婚姻。在農村，象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誰家的姑娘會嫁給“地主兒子”，做一個“地主婆”？即使與我一樣家庭出身的姑娘，也不會嫁給你，因為她們嘗夠了因家庭成份不好而吃的苦頭，以免世世代代做“地主”。我想：我這輩子只能做個“光棍”！

我 30 多歲了，還沒有找到對象，家裡人都替我著急。為此，三叔也曾親自出面寫信，托人替我介紹。

後來，我雖然當上了民辦教師，但許多人對“家庭成份”，還有很多顧慮。

1973 年 11 月，我在一中聽課、三叔從臨海動身去北京那一天，有人給我介紹對象，小學民辦教師，家庭成份為貧農。她不嫌棄我的家庭出身，願意嫁給我，我以為自己找到了比較理想的人選，就同意了。1974 年春節，我草草地結了婚。當時三叔在商務印書館做臨時工，他知道我要在春節結婚，從北京寄來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二冊精美的筆記本，作為送給我的結婚禮物。由於婚前瞭解不夠，婚後性格不合，經常鬧矛盾，甚至吵鬧，使我後悔莫及。

1974 年 11 月 8 日，兒子出生，取名許曉光。他母親不願自己帶孩子，我只好在更樓中學附近找了個奶娘，每月要支付我工資一半的“奶錢”，另外，還要向生產隊購買水利工分，我的生活極度困難，連吃飯也成了問題。

我在更樓中學任教了三年。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我不得不自找門路，終於找到了可以落實我戶糧關係的地方——白毛公社江溪大隊。

白毛公社地處城西區東北角、與大石區接壤，距離張家渡 30 多裡。江溪大隊又在白毛公社西北的山嘎裡，背靠大石許

嶴嶺，跨過嶺頭就是大石區。由於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與外界交往也少。江溪大隊由 8 個自然村組成：江溪、後坑、橫山腰、東安、嶴裡、高坎頭、胡嶴陳、山根。我的口糧落實在高坎頭生產隊。

江溪小學，是白毛公社中心校，二年前開辦“戴帽子”初中班，只有初一、初二各一班，但缺少英語教師。我到校後，擔任二班英語，以及初一的語文，並兼班主任。

江溪小學大門坐西朝東，這裡周圍的山不高，但自然環境淡雅、優美，另有一番風味。學校門口小橋流水，前面有一片翠綠的竹林，鬱鬱蔥蔥。夏天，鑽進茂密的竹林，恍若置身於一個清涼的世界。

這裡的農民純樸、熱情、好客，對老師很尊敬。由於自然村比較分散，江溪是大隊的中心點，有些社員常來學校作客閒聊，與教師相處很融洽。其中有些人喜歡演戲，愛好越劇。“文革”前，村裡常常在農閒時演戲，但“文革”期間，除了“革命樣板戲”，其他一律禁演，尤其是農民所喜歡的越劇，說是“帝皇將相、才子佳人”戲，農村的文化娛樂生活極度貧乏。

大隊幹部知道我愛好文藝，會拉胡琴，希望我組織他們排練文藝節目在春節期間演出，以滿足廣大群眾對精神生活的渴求。

在排練節目的過程中，我們得到區文化站陳大法的大力支持，他特地聘請了有經驗的文藝骨幹來指導，大大地提高了表演水平。記得當時有一個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節目，我還特地進城向台州越劇團借來戲服和道具。

1976 年農曆正月初一夜，在學校大操場的戲臺上，我們的演出開鑼了！操場上擠滿了觀眾。在這偏僻的山嶴裡，這麼多年來，難得又聽到優揚的唱戲聲；看到穿著華麗戲服的演員

在臺上表演，而且扮演者都是他們的熟人，觀眾都十分開心。

整個春節期間，我們的節目在全公社各大隊巡迴演出，受到當地群眾的普遍歡迎。

1976 年，是中國人民最難忘的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10 月，“四人幫”被粉碎，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1977 年春節期間，我們又排練了歌唱周總理、怒斥“四人幫”、歌頌華（國鋒）主席的歌舞等節目，在本大隊和附近各大隊演出。

1976 年、1977 年這二年的春節，我都在江溪度過，我在江溪生活了四年。在江溪的這段時光，我常常憶及。

12、三叔與上海“四人幫”爪牙的鬥爭

三叔與生死搏鬥過後兩個月，1969 年 11 月，中國科學院突然派一個人來到張家渡找他。此人帶著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說現在正在批判世界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特地派他來借。聽到這個消息，使三叔十分吃驚：中國的一場“文化革命”，竟要向一個逝世多年的外國科學家開刀！

中國科學院派來的這個人名叫陳慶振，是物理研究所的。他說要借用愛因斯坦著作的全部譯稿，並說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已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定為理論批判的重點，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出版的《紅旗》雜誌上發表。三叔告訴她，愛因斯坦著作的譯稿全部在上海李寶恒處。陳慶振說：上海也在組織批判愛因斯坦，兩地的資料互相封鎖。於是，他把三叔留下的初稿和資料卡片全部借走。他為人正直，說他原來不懂相對論，要從批判中學習。三叔坦率的告訴他：愛因斯坦無論在

政治上、哲學上、科學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公開批判他，會損害我國的國際形象。

後來才知道這場“大批判”的背景：原來，陳伯達之流的“理論家”出於打擊迫害知識份子的需要，故意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哲學上的相對主義混為一談，把前者當作後者的活標本。在他們的授意下，北京上海相繼成立了“相對論批判組”，霎時間，中國上空刮起了一股批判愛因斯坦的逆風。上海批判組乾脆稱：愛因斯坦“一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有錢便下跪”，“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的相對論是“一面黑旗”……

1971 年 10 月，三叔從報上獲悉商務印書館改名為“東方紅出版社”，並已恢復業務，他即抱著試探的心情給他們寫了一封信，打聽是否可以履行原來的合同。出人意料的是，商務印書館回信，讓他儘快把譯稿再寄去。於是，他便給早已“解放”的李寶恒寫信，詢問譯稿的下落。李寶恒告訴三叔，《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和《愛因斯坦世界觀》兩部書稿都於 1969 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強行“借用”（留有沈賢銘具名的借條），他們不願意歸還原稿，只允許由他們抄寫一份歸還。三叔不同意，寫信給沈賢銘和“寫作組”，要求歸還原稿，他們置之不理。

後來打聽到“寫作組”的頭頭叫朱永嘉，三叔於 1972 年 2 月 28 日給他寄去掛號信，告之本人將於 3 月下旬去北京，要求他必須在路過上海前歸還兩部書稿，否則將訴諸法律。3 月 23 日，他果然把《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書稿交還李寶恒；但對《愛因斯坦世界觀》這部書稿，卻推說“下落不明”。顯然，這部書稿對他們正在進行的批判愛因斯坦運動十分有用。

當時，三叔已與剛“解放”的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秦力生恢復了聯繫。他對三叔所處的逆境十分同情，說要解決三叔的“右派”問題和歸隊問題，主動要他去北京。

1972 年 3 月 29 日，三叔把《愛選》譯稿帶到北京，交給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一個星期後得到答復：此稿重要，決定盡速出版；同時表示願意出版未見下落的《愛因斯坦世界觀》書稿。三叔在北京 2 個月，甄別和歸隊全部落空，但發現了不少 9 年來國外新出版的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資料。於是，繼續與李寶恒合作，分頭補譯新資料，並復核原譯稿。

三叔趕回張家渡後，就著手開始譯稿的修改和補充工作。9 月 18 日，三叔收到在北京新認識的一位青年朋友的來信，信上問道：“我從新華書店的新書征訂目錄上看到，上海最近將出版《愛因斯坦言論集》，不知道是否就是你的譯稿？”

三叔立即趕到臨海新華書店，查看了上海《科技書征訂目錄》，發現上面果真列著《愛因斯坦言論集》的征訂廣告，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說明中注明：本書由復旦大學《愛因斯坦言論集》編譯組譯。看內容介紹和篇目、字數，都和他的譯稿相同。哪有這樣巧的事情呢？莫不是譯稿被盜印了？

為了揭露和抗議這種明目張膽的強盜行為，三叔決定親自去上海一趟。三叔到上海要找的對手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寫作組”。當時沒有證明和介紹信是行不通的，何況住宿、買車票都要用到介紹信。三叔到張家渡公社革委會要求開具證明，但遭到拒絕；於是，越級找城西區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葉紹雲。三叔說明了原委，他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使三叔的上海之行才得以實現。

1972 年 10 月 12 日，三叔到了上海，帶了城西區“革領組”開具的介紹信，先找到當時上海市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

委員會”，一位青年接待了他。開始，那人頗通情達理，聽了三叔的說明情況後，便表示說：“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果真的這樣做，那就不對了！”三叔補充說：“這事恐怕不能怪出版社，責任可能在大批判組。”

那人一聽，不禁臉色驟變，連連擺手說：“這事我管不了！”三叔這才知道，“大批判組”是惹不起的。他只得又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待他的人認真看了他帶過去的原稿，僅表示可以把情況向上級反映。

三叔回到落腳的閘北旅館，李寶恒突然推門進來，告訴他：“朱永嘉決定派人和你談判。”

第二天上午，在李寶恒工作的上海市委幹校的辦公室裡，三叔見到了朱永嘉派來的代表孫某。孫某說：“我轉達朱永嘉的意見：（1）承認這部書稿是以你的譯稿為基礎的，出版時可以加上署上你的姓名；（2）現在出書，一般都不給稿費的，考慮到你的特殊情況，可以給你稿費；（3）商務印書館的書出不出的問題，由我們聯繫，你不必過問；（4）可以考慮今後你的工作安排問題。”

這分明是企圖用名利來引誘三叔就範，但三叔卻不為所動，客氣而又冷淡地說：“謝謝你們的關心，我的工作問題你們不必操心。商務印書館出不出書的問題用不著你們管，因為我同他們簽訂了約稿合同。既然承認是我的書稿，你們要出，只能從中選一部分。為了向讀者負責，我必須看校樣。你們要出這部書稿，為什麼不給我和商務印書館打招呼呢？”

“因為你給朱永嘉寫信的態度不好！”

三叔動肝火了，偷了別人的東西，別人查問，置之不理，還要怪別人態度不好，豈有此理！

第二天，李寶恒告訴三叔：“孫某向朱永嘉彙報後，朱永

嘉火了，說：‘我們出我們的書，與許良英無關。’看來問題不好辦了。”

朱永嘉是“四人幫”中二大員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親信，他們之所以要不擇手段地出版這部譯稿，是有原因的。當他們剛把這部譯稿搶到手時，本想把它當作批判資料印行的，後來，“風向變了”，批不得了，他們就偷偷抄了一份，打算以自己的名義公開出版。這在以“文化”為名的運動中，也等於搶立了一功。他們原以為，三叔是“摘帽右派”，好對付，沒料到，他竟軟硬不吃……

於是三叔寫信向毛澤東主席申訴。因為以前的《科學通報》的一位女同事說，她父親覃正是國民黨元老，與毛澤東有深交，她與毛澤東身邊的人也有交往，可以轉送給毛主席的信。但她退回了三叔這封信，說要與上海的頭頭打官司，沒有人敢轉遞。三叔只好轉向周恩來總理申訴。申訴信請中科院竺可楨副院長和秦力生副秘書長轉交。他們徵求吳有訓副院長（物理學家）的意見後，把三叔的申訴信轉給國務院。這封由科學院出面轉交的申訴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 年 3 月，他們派上海人民出版社兩位負責人到北京找商務印書館負責人丁樹奇、陳原商量，達成協定並上報國家出版局。協議規定，上海的書改內部發行，商務印書館的書按原計劃公開出版，不受上海影響。

上海的抄稿經過改裝，拖了一年，才於 1973 年 10 月出版，書名改為《愛因斯坦論著選編》，原來的“編譯組”不見了，但在《編譯說明》中列了復旦大學 12 位教師（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說是他們“集體編譯的”。並說，“在編譯過程中，曾參考許良英、李寶恒於 1962 年至 1965 年間的舊譯稿。”

對此，在張家渡老家的三叔獲知後感到相當氣憤，於 1973

年 11 月 5 日寫在此書的扉頁上的批註中，有這樣的字樣：“正文 197 篇，共 533，000 字。他們自己譯的共 30 篇，33，000 字，占 6%！94%是抄別人的！”“總共 12 人譯了 30 篇文章，而另外 166 篇抄了別人的譯稿，只不過做了一些校改（何況有許多改錯的），這就可以算是由這 12 個人‘集體編譯’，對別人的譯稿只是參考而已？既要搶先出版抄稿，又要把別人的稿說成是‘舊稿’，也實在太不光明正大。”

在與上海的“四人幫”爪牙的鬥爭取得部分勝利後，三叔決定擴大譯稿內容，從原來的一卷擴大到三卷，書名改為《愛因斯坦選集》。商務印書館也同意這個意見。鑒於李寶恒當時在上海，無法繼續合作，三叔又約了范岱年和趙中立兩位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朋友合作。他們兩人 1957 年都受三叔的“牽連”而被劃為“右派”。1973 年 11 月，商務印書館約三叔去北京工作，給他每月 50 元生活費（1977 年出書後，從稿費中扣除），並幫助他解決住宿問題。開始三叔住在中關村科學院招待所，以後住到商務印書館在珠市口新開辦的僅有兩個客房的小招待所。

三叔到北京後，商務印書館把他新擬選題計畫列印出來向有關人士徵求意見。國家科委一個幹部對書名《愛因斯坦選集》大加指責，認為“選集”只能用於革命領袖，現在要給“資產階級科學家”出“選集”，用意何在？於是，于光遠建議改名《愛因斯坦文集》，三叔同意了。

1973 年商務印書館與上海方面協商並上報國家出版局協議中規定，《愛因斯坦文集》按原計劃公開出版。但在 1976 年 1 月第一卷付印時，商務印書館當權者下令改為“內部發行”，而且規定封面不得用紅色，書名不得燙金。

按照文革期間流行的“思想”來看，不能燙金，道理是顯

而易見的：書名燙金，實則等於美化資產階級學者的行為。為什麼不能用紅色呢？那是因為，紅色是革命的象徵。那時不是時興“紅海洋”嗎？於是，這套文集的封面最後設計為素雅的淡綠色。

這引出了《瞭望》週刊 1984 年第 37 期發表的報告文學《綠色的文集》，詳細地介紹了《愛因斯坦文集》在出版過程中充滿離奇色彩的故事，即記述了三叔與“四人幫”上海爪牙鬥爭的經過。

文章最後感歎道：

“封面是綠色的，悅目卻不顯眼，綠色就綠色吧！好在愛因斯坦是不會計較的。經過一場磨難的中國讀者，也學會了不光憑‘符號’，而是依據內容來衡量一部著作的價值。”

13、三叔從“迷信”中開始醒悟

1973 年 11 月，三叔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為《愛因斯坦文集》出版的事去北京。他從臨海出發的前一天，我正好在一中聽課。那天夜裡，我和三叔借住在一中陳建元先生的平房宿舍，我還記得與三叔同睡一床的情景。

陳建元先生是三叔浙大高工同學，自從 1962 年在縣政協會議上重逢以後，二人來往密切。因為三叔在城關熟人很少，如果進城，唯一的去處就是陳先生家。1985 年，三叔的小兒子許平，與陳先生的小女兒陳罕立結婚，從此，老同學又成了老親家。

三叔開始在商務印書館做臨時工。1974 年 9 月，46 萬字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交稿，三叔正著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又遇上了“批林批孔”運動。11 月，商務印書館換

了兩個不學無術的新領導，他們視三叔這個“右派分子”為敵人，千方百計想把三叔趕回農村，但當面卻欺騙三叔，說讓他回浙江老家繼續搞《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證每月寄生活費。三叔當時信以為真，就受騙上當回到了張家渡。回家不到兩個月，他們就停發了生活費。

三叔從北京回來，我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他在北京目睹了“四人幫”上演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鬧劇，使他從 34 年來一直對毛澤東的“迷信”中開始猛醒過來。

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從 1938 年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 1940 年決心投身革命以後，就對革命導師和領袖崇拜到迷信的程度。1956 年對斯大林的迷信雖然被破除了，但對毛澤東的迷信依然如故。即使被劃成右派以後也如此。凡是毛澤東的主張，我都衷心擁護；凡是黨報所宣傳的，我都深信不疑。‘文革’時，我也義無反顧地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提著腦袋支持造反派。可是，‘批林批孔’時江青的一系列表演，把我搞糊塗了。特別是那年 7 月，她在天津關於‘儒法鬥爭’的講話，說最近出土的劉邦夫人呂後的玉璽應該大力宣傳；又說，唐朝以前男女是平等的，女的可以有‘面首’！她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竟然是男的可以有小老婆，女的可以有小丈夫。與此同時，一位朋友告訴我有人從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看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維特克（Roxae Witke,女）1972 年對江青的訪談，江青說自己在重大問題上是能對毛澤東施加影響；延安時反對毛與她結婚的那些老黨員在文革中一一受到清算。

這使我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原來是一場騙局。他們借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之名，目的無非想把中國倒退兩千年，回到皇

權專制時代，實現封建法西斯統治。由此回想起來，1957 年反右運動和 1958 年以後的大躍進也都是騙局。自詡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就是專門玩弄權術和詭計的大騙子。1957 年以來，黨報充滿謊言，我都一直信以為真。受過科學訓練又立志追求科學真理和革命真理，甚至當了 17 年專政对象後，我仍然絲毫覺察不出自己 34 年來所崇拜的領袖竟然是這樣一個暴君和騙子。我為自己的極端愚昧感到羞愧。

回憶‘文革’‘初期讀到紅衛兵傳播的毛澤東 1958 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坑了幾百人，我比他多幾百倍。‘對資產階級，良心還是少一點好’。當時我只覺得有點奇怪，但未往深處想。現在對照他在‘文革’時所作所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這是他暴君心態的自我表白，是反右陰謀全面勝利後的一種得意忘形的表演。”

1974 年底，三叔被趕回張家渡後不久，中國的政治風向又起了變化。1975 年夏，趙中立寫信告訴三叔，國務院成立政策研究室，于光遠是主要成員之一。這個研究室領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這是三叔爭取回原來的哲學研究所工作的好機會。10 月，三叔決定去北京，到張家渡公社革命委員會要求開具“出行證明”，遭到他們的拒絕；到北京後，商務印書館也不予接待，三叔不得不作為“黑戶口”借住在趙中立家，一住就將近半年。

三叔剛到北京時，恢復工作確實有點希望，于光遠也為他盡力。可是，一個月後風雲驟變，突然發生了清華大學的“劉冰事件”，接著就是一陣批“右傾翻案”風和“批鄧”風，于光遠又一次被打倒，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於 1975 年 9 月交稿後，商務印書館表示第三卷能否出版是個問題，因為這一卷全是社會政治言論。幸虧三叔剛到北京時，于光遠通過出版局局長石西民幫助三叔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第三卷內容風險大，范岱年考慮到自己家庭負擔重，不便參與，於是，三叔又約請老同學張宣三接替他。

正當三叔準備返回老家時，接到商務印書館的通知，同意他繼續第三卷的編譯工作，生活費發到 1976 年底止。

1976 年 3 月，商務印書館終於又讓三叔住在珠市口招待所，並在編輯辦公室工作。

商務印書館地址在王府井大街，三叔每天清晨去上班、晚飯後回招待所，都要經過天安門廣場。半個月後，在三叔每天上班早晚必經的天安門廣場，爆發了因悼念周恩來總理而引發的“天安門事件”，三叔耳聞目睹了事件的始末。

從 3 月下旬開始，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陸續出現了悼念周恩來的花圈、挽聯、詩歌。悲憤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來悼念剛於三個多月前逝世的周恩來總理，以及表達對“四人幫”的強烈憤慨。這種場面真是感動人心，三叔每天至少要在那裡停留兩三個小時，噙著淚，凝視這一切，深深感受到這樣一條真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經受了十年災難，人民已經覺醒了，任何高壓、欺騙都已經不能使歷史走回頭路。到了 4 月初，整個天安門廣場更是擠滿了人，悼念活動一浪高過一浪。這完全是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但官方卻認為是有幕後操縱，終於在 4 月 5 日清明節這天晚上，動用槍彈，掃射無辜的群眾，進行了血腥的鎮壓。

緊接著開始清查所謂的“反革命”，認為鄧小平是“反革命總根子”，又掀起了新一輪的“批鄧”運動。

7 月 28 日淩晨，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在北京，市民整整一個月只能露宿街頭。要不是這場大地震，到秋天，商務印書館必定又要把三叔趕回老家。

地震餘波未盡，9 月 9 日，毛澤東去世。此時人們意識到，國家的災難可望有個盡頭了。果然，不出一個月，大家奔相走告，惡貫滿盈的江青集團於 10 月 6 日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10 月 16 日，三叔給我來信，這樣寫道：“‘四人幫’徹底垮臺的事，想你們已經聽到傳聞了吧。事情發生在 10 月 6 日夜裡。聽說清華、廣播電臺、教育部、文化部等單位都已軍管，北大大批判組已被查封。這是比 9 月 13 日林賊自我爆炸更要大快人心的特大喜訊，首都人民這一個星期來無不感到揚眉吐氣。現在已正式傳達到 19 級，但只是口頭的，沒有文件，等傳達到地方，恐怕要很久了。外間有些傳聞，十分離奇，顯然是不可信的，應該以正式傳達為准。”

14、《愛因斯坦文集》出版

就在獲悉“四人幫”被抓的當天，三叔約了呂東明和趙中立去頤和園，泛舟昆明湖，三位老朋友一起，共享這勝利的喜悅。

那天，三叔泛舟昆明湖受了風寒，回來後就咳嗽不止，拖了一個多月，飯也吃不下。

12 月 7 日上午，許成鋼一定要他父親去醫院檢查。X 射線檢查結果是：右肺全部有陰影，中間還有一個直徑 2 釐米的空洞。醫生診斷是患嚴重肺結核。

當天下午 3 時，商務印書館的責任編輯陳兆福來電話，說：“告訴你一個特大喜訊！”三叔冷漠地回答：“有什麼可

喜的？我告訴你一個可悲的消息，我得了肺結核！”他說：“對你最重要的莫過於《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現在第一卷的樣書已到，望即來看。”三叔懷著喜悅和憂愁交織在一起的心情，立即去商務印書館辦公樓。路過前門轉車時，突然咳了一口痰，一看竟是血。

10 分鐘後，三叔到了商務印書館辦公樓。他撫摸著這部經歷了十四個寒暑、三次赴北京、二次去上海、多災多難的書稿，十分激動：終於印成了書。它真正成了名副其實的“嘔心瀝血”的產物。

拿到樣書，三叔百感交集。此時，病魔也在步步緊逼。回到招待所後，三叔依然咯血不止。第二天半夜，一連咯了一茶杯的血，他隨即被送到北京肺結核病醫院。住院兩個月，一直沒有查到結核病菌，於是醫生懷疑他患的是肺癌。許多朋友聽到消息後，都以為他活不多久了，紛紛趕來探望。三叔自己卻泰然處之，可是最後也沒有查出癌變的跡象。事後估計，當初患的可能是急性支氣管炎。

在結核病院住了將近四個月後，1977 年 3 月，三叔終於回到了商務印書館。編輯室主任高崧和陳兆福很照顧三叔，讓他住在辦公室裡，邊工作，邊休養，一直住到 10 月。

3 月 3 日，三叔在結核病院寫給我的信中說：“我的病已好了，最後診斷，既非結核也非腫瘤（曾去腫瘤醫院會診二次），僅是炎症而已。現病灶已全消，決定明天出院。但我的幾個老朋友、成鋼和商務的同志一定要我轉到普通醫院再住一段時期，我拗不過他們，只好答應去住一個星期再回機關。‘四人幫’垮臺了，商務頭頭對我態度也大改變，他們已同意我出院後就睡在辦公室裡，不必再去住招待所了。大病初愈，工作成堆，特別是寫揭批“四人幫”的文章，我是急於要工作了，

不能讓時間白白浪費掉。”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印了 25000 冊，1977 年 1 月開始發行。雖然只允許“內部發行”，但書店公開陳列，不到半年就賣光了。

1977 年 7 月，商務印書館決定重印《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並改為公開發行，要三叔寫一篇《前言》。三叔花了 5 天時間趕寫出 15000 字的初稿，列印出來向周培源等科學家徵求意見。此時，一位專管政治思想的編輯室副主任說，此稿不能用，認為是在“美化資產階級”。三叔與他爭辯，他暴跳如雷，說三叔要奪他的權。另一位曾受他尊重和信任的朋友來信說：此稿“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勸三叔“頭腦不要發熱”、“放任靈魂深處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感情冒出來損害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既然阻力重重，只好請周培源先生寫序。他欣然答應，但要三叔代為起草，說只要把原來的《前言》稿壓縮成 5000 字，並要參考他本人 1955 年發表的悼念愛因斯坦的文章。三叔一一照辦了。

1978 年 3 月，刊有周培源序言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版終於出版了。3 月 14 日，愛因斯坦誕辰 99 周年，《人民日報》第三版全文發表了這篇序言。當晚，新華社以《中國出版〈愛因斯坦文集〉》為題，用中文和英文向海內外發佈消息，介紹了周先生序言的主要內容，特別是對愛因斯坦的高度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

這條消息中還說，《文集》的編譯工作是由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許良英主持，三叔立即去信要求更正，嚴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學家”，更不是什麼著名人物，我不過是一個農民，一個沒有公職的人民公社社員；編譯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們 5 個編譯者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難的

同志，只不過選題計畫是我擬訂的，工作量也較大而已。

新華社發佈的有關《愛因斯坦文集》出版發行的消息，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到 1980 年 3 月第三卷出書為止，全部出齊（第二卷於 1977 年 11 月出書）。三卷共選譯了 410 篇文章，共 135 萬字，是當時世界上收集愛因斯坦思想資料最完備的文集。

到 1994 年為止，《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共印刷四次，第二、第三卷分別印刷三次。此書在社會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在從新中國成立之後到《愛因斯坦文集》出版之前，除了關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少量翻譯介紹之外，《愛因斯坦文集》首次全面地將愛因斯坦的科學和思想介紹到國內。

1977 年下半年，原來與三叔一起在杭州從事地下黨組織領導工作的鐘沛璋（曾任地下黨杭州工委委員），反右前曾是《中國青年報》的副主編，告訴三叔一個消息：胡耀邦恢復工作後，有一次在青年工作幹部會上，說他最近買了一本書，叫《愛因斯坦文集》，非常好，雖然有些內容他讀不懂，但讀懂的地方對他啟發很大。

1978 年 9 月三叔應邀參加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右派”改正問題的座談會。主持會議的中共中央組織部經濟幹部局局長柯裡（他是三叔地下黨領導）也告訴三叔，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他於 1977 年 12 月出任中組部部長）幹部會議上曾號召大家學習《愛因斯坦文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能夠注意到像《愛因斯坦文集》這種科學家的著作，並予以特殊的重視，是十分罕見的。這不僅表明胡耀邦的思想開放和好學精神，也可以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說明此書的影響。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報紙上曾公佈當時大學生最愛讀的 10 種書籍的調查，《愛因斯坦文集》就名列其中。由此可見，

當時《愛因斯坦文集》在大學生這個有一定代表性的社會群體中的影響。

15、三叔告別“農民身份”重回科學院

1978 年 3 月 27 日，三叔給我來信：

“我的工作，一直到最近才正式解決。3 月 8 日科學院黨組會議上討論了我的‘恢復工作’問題，一致通過了。以後李昌同志又據此打了個報告給方毅同志（他在政治局內分工管科學、教育），方毅同志已於前兩天批下來了。目前北京戶口又卡得很嚴，戶口調動已基本上凍結，我的問題真是落實政策問題，不受戶口和勞動指標的限制。但是具體落實，恐怕還得費時日。工作安排原來說是去新成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編輯部，但我自己還是希望去科學史研究所搞研究工作，那邊也歡迎我去。因此，究竟去哪里，一時還定不下來。估計四月份總得離開商務。工作定下了，打算回故鄉取書。”

1977 年 8 月，為了解決回科學院工作問題，三叔寫了一個報告給中國科學院黨組，請秘書長郁文轉交。4 個月後，于光遠告訴三叔，替他說好話的人已經不少，郭沫若院長，竺可楨、吳有訓副院長，秦力生和郁文都替他說情了。問題主要卡在具體掌管人事權的幹部那裡。科學院實際負責黨組工作的李昌不敢做主，將三叔的情況報告給國務院。1978 年 3 月，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又是政治局委員）為此將三叔的報告批給國務院政工組，三叔的工作問題才得以解決。方毅在批示中，說明這是“重新參加工作”（不算落實政策），工資不少於 100

元。

科學院通知三叔回科學院工作時，要他重操舊業，即從事科學哲學（自然辯證法）方面的工作，但他則希望研究近現代科學史和科學思想史，因為在這個研究領域，中國還是個空白。

經過交涉後，科學院終於同意三叔到新成立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這個所是 1975 年成立的，由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成立於 1956 年）擴大而成，原來只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三叔去了以後，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才開始開展世界近代和現代科學史的研究。1978 年 6 月 1 日，三叔在他們研究所管人事的趙科長和老朋友趙中立（他是三叔哲學研究所同事，1957 年因受三叔的 牽連被劃為“右派”）的陪同下，從北京回到了故鄉。

得知三叔回來，當天我即向學校請假，從江溪趕回張家渡。

我來到高臺門，看到的情況令人吃驚，家裡已“門庭若市”，與以前“門可羅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前，為了與三叔這個“右派分子”劃清界線，許多人都敬而遠之；如今，一批又一批人來看望他。三叔對此種情狀非常反感。

晚上，區政府在張家渡大會堂召開有區級各單位幹部和城西中學師生參加的大會，邀請三叔和趙科長到會講話，三叔謝絕了這個邀請。

在大會上，趙科長首先介紹了三叔這次恢復工作的情況，引來了全場多次的熱烈掌聲。同時還介紹三個月前在北京剛開過的全國科學大會的情況。

第二天，三叔陪著二位北京客人遊覽象鼻岩，客人對這裡如詩如畫的山光水色讚不絕口。

然後來到村東下橫溪新建的大橋。在大橋上，趙中立為我們拍了一張合影照。合影的人有：趙科長、三叔、二叔、小叔、

從眾哥、我，以及從白水洋趕來的表妹羅連新。因為三叔這次從北京回來，二叔、二嬸也從杭州特地趕回張家渡。

第三天，三叔約了趙中立一起爬山，參觀穀溪壩水庫。小叔和我，以及同生產隊的許則槎（原在玉環工作，1958 年被開除回家，與三叔有深交）陪同他倆遊玩。

當我們一行走在去穀溪壩水庫的路上，我的腦海裡就浮現出幾年前在水庫工地勞動時的一幕幕情景。我和三叔都曾在那裡幹過活，每次輪到，一干就是半個月，勞動的強度和生活條件的惡劣，可想而知。

我們爬到山崗頭，轉了個大彎，就來到了下崖山村。當年，我們民工就分散住在這個村子的各戶人家。

當我們到達水庫大壩壩頂時，大家都汗流浹背。這裡，曾經是灑下我們汗水的地方，如今已形成了一個人工湖。

水庫背靠大山——括蒼山，抬頭遠望，青山掩映在湖面，陽光照射上面，碧波漣漣，令人眼花繚亂。

景色雖美，卻無心欣賞。大家都靜靜地聆聽著三叔講述他的憂慮——對國家、對民族、對這個黨——的憂慮。“四人幫”雖然已被打倒，但中央高層仍然鬥爭激烈……。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前途……，這一切會是怎麼樣呢？怎不令憂國憂民的人擔憂？

這次三叔回故鄉只住了一個星期，最後一天去了白水洋姑姑家，二叔、小叔和我一起陪同。

姑姑若沫，比三叔大四歲，是兄弟姐妹五人中唯一的女孩，上世紀 40 年代嫁到白水洋。解放前她與姑丈羅瑞霆都在嘉興一所小學教書，解放後，因子女多，姑姑在家料理家務，姑丈仍在當地小學教書。1958 年暑假，全縣小學教師集中縣裡學習，在學習會上有人誣告姑丈解放初“通匪”，他不承認

就遭到嚴刑拷打。後來，姑丈受不了皮肉之苦，最後屈打成招，被開除回家當農民。他的冤案到 80 年代初才得以平反。

白水洋，臨海西部的一個大鎮，地處臨海、仙居兩縣交界，交通便捷、商業發達，距離張家渡 20 裡。

從張家渡出發，經象鼻岩過渡，沿著永安溪北岸，向上游走去，遠遠就看到在溪岸高聳著形似花冠的岩石——“花冠岩”。再往前走，約距白水洋一半路程，就是“太尉殿”。此處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斬子”的地方。據傳說，當年倭寇入侵，戚繼光在白水洋指揮作戰，兒子不聽軍令，結果以軍法處之。

三叔曾不止一次讚歎這一帶是永安溪秀麗景色的精華。以前，三叔去白水洋，總喜歡步行，他說，這樣可以一路欣賞沿途的風光。

我們一行到了姑姑家，他們早已作好了接待的準備。休息片刻後，在他們一家人陪同下，我們去附近祖母的墓地。

祖母的墳墓，在白水洋南邊約四、五裡的上洪村附近磨坑水庫上坎一座小山邊上。墓的朝向正好是張家渡方向的括蒼山，西南直對小山頂上的羅渡古塔，。為什麼祖母去世後，不葬在張家渡而葬在白水洋呢？

1973 年，三叔正忙於《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工作，沒有時間和精力來照顧年邁的祖母。

有一段時間，姑姑和姑丈接祖母來白水洋住，他倆對祖母都很孝順。祖母病重，他們仍然細心照料她老人家。

記得那年，我在更樓中學教書，特地請假去白水洋看望祖母。那時，她已病得不輕，她流著淚對我說：“米央，我想回張家渡去！”我聽到這句話，看她傷心的樣子，我頓感心酸。

我只好勸慰她：“三叔工作太忙，您在這裡姑丈姑姑照顧

得這樣好，就好好在這裡養病吧！”

據說，後來祖母覺得自己已活不了多久，還嘮叨著執意要回老家。人老了，總想葉落歸根，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那年，祖母去世。祖母去世後，三叔認為要移風易俗，就地安葬在白水洋。姑丈和姑姑思想也比較解放，願意接受三叔的決定，盡這一份孝心。

祖母當年的墳墓比較簡單，只用幾塊石板砌成。1982 年，姑丈和姑姑寫信給三叔，建議重新修建墳墓，三叔表示同意，並寄來所需要的費用。

經過一定的儀式，把祖父在張家渡的“遺骨”也移到這裡與祖母合葬。墳墓的正面還刻有碑文，碑文是姑丈起草的。

三叔離開故鄉後，又在杭州停留了將近 10 天，中間曾到新安江水電站參觀。當時，原浙江大學地下黨員鐘伯熙任新安江水電站站長，他盛情邀請三叔去那裡參觀。鐘伯熙，80 年代曾任杭州市市長。

6 月 17 日晚，三叔回到了北京。趙科長比三叔早一星期回到北京，三叔的戶糧關係都由他辦妥了。至此，三叔終於告別了整整 20 年（1958.6——1978.6）的“農民身份”，回到科學院。

歷史又是這樣的巧合。三叔自從 1938 年家居自學，接觸到當代物理學的新天地，懷著做“當代物理學權威”的狂熱，跨進了浙江大學校門，到 1958 年剛好整整 20 年。被打成“右派”後，三叔回故鄉當農民到重回科學院，又是整整 20 年。從 1938 年，到 1958 年，再到 1978 年，多麼令人難忘而又富有戲劇性變化的年代！

此時的三叔，已開始從對共產黨、毛澤東的“迷信”中猛醒，這是他第二次人生轉折的起點。他說：“故鄉不僅養育了

我，也是我兩次人生轉折的起點。”

1978 年 12 月，根據中發“1978 年 55 號文件”的精神，開始平反“右派”。隨後，三叔的“右派”問題也得到了徹底平反。

1979 年 2 月，三叔被劃為“右派”的原單位：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總支，發出“平反通知”，寄到我任教的江溪中學，但學校裡沒有一個黨員，於是，校長把這份“平反通知”收到當天就給了我，我一直保存著。現抄錄全文如下：

江溪中學黨支部:

你單位許從平同志之叔許良英同志，原系我所研究人員，1958 年劃為右派，根據中發‘1978 年 55 號文件’精神，我們對許的右派問題進行了復查，經查，許良英被劃為右派分子是屬於錯劃的，予以改正。決定恢復許良英同志的政治名譽、恢復黨籍、恢復原行政 13 級的待遇。

請你們接到此通知後，將許從平受許良英右派問題株連的有關結論資料全部從檔案中撤出銷毀，若過去我所寄出此類材料退回或當著許本人銷毀。

此致

敬禮

中共哲學研究所總支委員會

1979 年 2 月 12 日

不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報導了三叔等人“右派”問題得到平反的消息。

16、王淦昌先生的關懷

1977 年，“文革”期間停止了十年的高考開始恢復。學校開始抓教學質量，我所任教班級英語，在全區舉行的統考中，平均成績均名列前茅。

1978 年，教研活動也開展起來，全區成立英語教研大組，我任副組長。此時，城西中學陸續調回在“文革”期間分散到各公社中學的教師，也調集其他優秀的教師到區中學。

1978 年暑假，我參加台州地區高考試卷評卷工作，住在地委招待所。城西中學領導即來要調我到他們學校。我考慮到自己到江溪任教這幾年，由於口糧問題得到了解決，又不擔負水利義務工，生活開始有所改善，所以執意不去。

第二年暑期，全縣英語教師集中臨海一中，學習培訓一個月，我擔任城西區小組的輔導師。城西中學新任書記張忠良找我談話，再三要調我到城西中學任教，我還是以原來的理由加以拒絕，但他堅持說：“口糧的問題，先調再說。”

1979 年 9 月，我來到了城西中學。城西中學在張家渡村南邊約三、四裡的井頭大隊，與張家渡隔著門山、王莊山兩座小山，從張家渡到那裡，需經過我們生產隊灌園田片。解放前，張家渡人許維茂，在上海做生意賺了錢，因在張家渡本村買不到合適的地基，所以在井頭買地造洋房。1958 年，“臨海一初”（即臨海縣第一初級中學，振華中學前身），從城裡搬遷來城西，就以這些洋房為基礎，合併鄰近的“門宮”尼姑庵，再加以擴大，改名為城西中學。

1978 年，城西中學開始在全區優秀小學畢業生中招收 100 名初一新生，1979 年又招了 100 名。我到城西中學後，就任教這幾個班級（初一、初二）的英語課，兼初二（1）班班主任。第一年參加全縣英語統考，我所任教的初一年級的平均分

名列全縣第一，比臨海一中同年級的成績高 5.6 分。後來，我還在全縣英語教研會上作了專題經驗介紹。一年後，我開始任教高中英語。

我調離江溪時，當地幹部和群眾並不同意，他們希望我留下，但迫於區裡的壓力不得不放我走。我調走後，他們不分配給我口糧，這又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困難，但城西中學領導也無能力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我想起給教育部長蔣南翔寫信反映情況，以求解決。

我把信寄給了三叔，他又把我的信請李晨（時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轉交蔣南翔。

1981 年 11 月 9 日，三叔給我回信：

“給蔣南翔的信，我及時寄給李晨，他回信說已轉去。我估計不會起多大作用，因為蔣南翔的教育思想一直很保守，死抱住 17 年不肯放，片面強調質量、大砍各級學校、大砍民辦教師，大概就是他的主意。要他發慈悲，恐怕是不可能的。這種思想僵化的狀態，在各級領導中都普遍存在，這正是國家命運可悲的地方。中央多次強調要改革，但碰到這類幹部也就無可奈何了。今年春天，周培源訪美歸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觀感，結果被教育部認為大逆不道，周（已 80 歲高齡）不得不辭去北大校長職務，這種事真令人寒心。”

後來，我又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信，也請三叔轉，三叔回信說：

“你給胡耀邦同志的信，我讓黨校一位同志轉交他的一位秘書（也住在黨校），估計他本人不一定會看到，他的秘書總會考慮處理的。上次寫信給蔣南翔，無異於與虎謀皮，因為大砍民辦教師這類主張就出自此人。”

1983 年的一天，我從報上獲悉，三叔的恩師王淦昌先生

擔任全國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我想起給他寫封信，也請三叔轉交。

我很快收地到三叔的回信：

“你給王先生的信，當天我就轉去，並附了一封信，介紹你的情況，也講了自己在農村生活時對這個問題的感受。今天接到他的回信，轉寄給你看看。閱後請寄還我。王先生是我的恩師，真是能與民同憂。他對你的信如此重視，並為此專門寫了個建議。當然，他沒有實權，但能由他和千家駒這樣的學者多多呼籲，終會有可能逐步解決的。”

王淦昌先生給三叔的信如下：

良英同志:

你好!

你侄子許從平的來信已收到，這次人大會議，大家對我國教育情況，意見很多，特別是中小學的情況，大家很不滿意，我們教、科、文各專業委員會已準備起草一個《普及小學教育法》，希望將來通過後，小學教育能普及一些。至於民辦教師生活很苦，很多人也反映了，已轉教育部設法解決。我已把你侄子的信交給常委會辦公室，請他們負責瞭解情況，設法解決問題。當然一時也不會有明顯效果的。但現在農村經濟好轉，各方面已督促把民辦教師的待遇提高些。我們也專門寫了個建議：要求民辦教師的待遇與公辦教師相同，不知有效否。以後若有意見，仍請見告，大家多呼籲，可能就有效果。

此致祝

好!

王淦昌
83.6.26

後來，三叔給我的信上又提到：

“你反映的情況給王先生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前不久，李文鑄來，說他見到王先生時，王先生同他談我國教育工作問題，特別講到農村教師生活太苦了。”

李文鑄，王淦昌先生的學生，李政道同班同學，浙江大學物理系地下黨員，80 年代曾任浙江大學副校長。

王淦昌先生是我國成就最突出的物理學家，一生中有三項工作在國際上領先：（1）、1941 年，驗證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2）、1959 年，在前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在那裡利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高能加速器研究基本粒子，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3）、1984 年，提出鐳射慣性約束核聚變的創議；同時，他對我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和爆炸試驗以及核工業的建設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王淦昌先生是著名的核子物理學家，也是我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1978 年，他出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即核工業部）副部長。王先生，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日理萬機，工作繁忙，竟然對我這個農村民辦教師無名小輩如此關懷，怎能不使人萬分感動！

王淦昌先生對三叔的關愛有更令人感動的事：

1973 年，三叔為《愛因斯坦文集》一書的編輯來北京，商務印書館每月給他 50 元生活費。一年後，他又被趕回張家渡，生活費也停發了。王淦昌先生得知這個情況後，決定用“王

京”的化名，從四川核基地按月給三叔寄出 30 元錢，支持三叔的生活。

王淦昌先生當時身處機密性極高的國防科研領導崗位，自己也曾多次受到批判，竟然主動地包下一個在農村“改造”的“極右分子”的生活，可想而知，要擔當何等的風險！

更難能可貴的是：1989 年和 1995 年三叔發起的二次簽名活動，都得到了王淦昌先生的鼎力支持。兩次簽名都由他領銜。

第一次，1989 年初，三叔起草並發起了科學教育界致中共中央公開信，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言論自由，呼籲釋放政治犯，有 42 名知名科學家和知識份子簽名；第二次，1995 年，三叔起草了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有 45 名知識界知名人士簽名。這兩次的簽名活動，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7、三叔民主思想對我的影響

1980 年，在總書記胡耀邦的宣導下，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領導成員請科學家給他們開設“科學技術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的講稿主要是三叔起草的，錢三強主講。

7 月 20 日下午，三叔他們應邀來到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講座地點設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室，書記處的多數成員和國務院多位副總理都來聽講。大家圍著一張長桌坐，胡耀邦總書記就坐在三叔的對面，他聽得很仔細，不時在講稿上塗畫，很少發言。講課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課後，留三叔他們吃晚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馮文彬作陪。

隨後，講稿全文在《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

三叔曾給我來信指出：“《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的有不少錯誤，尤其是結論第一條最後幾句話是荒唐的，這是由於臨時被李昌和他下面的一個什麼主任改了。經過我和李佩珊同志的說理鬥爭後，李昌承認錯誤，稿子基本上按原來的樣子改回來了。”

不久，三叔給我寄來了由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已改正過來的講稿單行本。在這篇講稿中，三叔著重寫上這樣一個論斷：“兩百年世界歷史的實踐證明：科學和民主是人類的兩大柱石，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這個重要的論斷，是對六十一年前“五四運動”啟蒙精神的重新呼喚，其意義是多麼重大！自此之後，三叔一再呼籲：當今中國需要開展一場民主思想啟蒙運動。

寫到這裡，不妨補上一段“插曲”，令人難免發笑：1980年入夏以來，鄰村開始有人謠傳三叔“已經死了”。不料這個謠傳，越傳越廣，傳到了我的耳朵。當時我根本不相信。我把這個情況寫信告訴三叔，他回信說：

“接讀你 8.18 信，知道我竟然已經死了，不覺大笑。就在 8.18，我曾寄你一信，諒已收到。上個月，杭州也有同志來信，說我患重病，一些關心的同志都著急，搞得我啼笑皆非。事實上，只要你細心的看一看 7.25《光明日報》上那張中央書記處聽課的照片，就不會相信這個謠言了。當然，那張照片印得不清楚，但仔細看看，還隱約辨認出來的。我們所裡的同志都看出來了，聽說那天晚上電視也有這個場面。故鄉好事者這種杜撰的本領我早已領教過了，同我直接有關的至少有四、五次。不管別人動機如何，作為笑料記錄下來，也是有趣的。”

1981 年 2 月，三叔發表了《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一文，文中對“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命題作了更充分、更全面的論述。他說：

“當今世界的現實是：由於科學、技術、生產的高速發展和人民意志對國家事務的有力影響，今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機構同半個世紀以前已大不相同。資本主義不僅從‘死亡線’上掙脫出來，而且還出現了這樣的‘奇跡’：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消滅，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竟然已經在某種意義上開始初步實現。而且，體力勞動者的隊伍正在日益縮小，在許多現代化的生產單位中，其總人數已少於腦力勞動者。這就意味著，社會的主體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工農階級，而是知識份子。顯然，這樣的社會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這樣的奇跡所以能夠實現，科學和民主是其內在動力。”

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

“總之，科學能使物盡其利，民主能使人盡其能；一個能使物和人都充分發揮作用的社會，必然會有無窮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說，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顯然，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要實現現代化，科學和民主是根本，是關鍵。”

此文發表於《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 年第一期。三叔寄來這篇文章，我認真閱讀，反復學習了多遍，收穫不少，思想認識也有很大的提高。

1978 年，結束了閉關鎖國的自我封閉狀態，使我們有機會看到世界現實，呼吸到外界的新鮮空氣。60 多年前被列寧判定已處於“垂死階段”，以後又被毛澤東詛咒“一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世界，不僅沒有死去，反而顯出旺盛的生命力。我們再也不會相信以前所宣傳的那些謊言，我開始重新審視以前所受到的“正統教育”。

後來，我把這篇文章推薦給我們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張忠良以及其他教師，大家都為它叫好！張忠良還在全區中小學校長會上，介紹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引起與會者的熱烈反響。

1982.4.1，我收到三叔的來信，信上說：

“幾封信都收到。我的那篇文章在故鄉引起這麼強烈的反響，使我十分欣慰。事實上，這樣的文章，在今天是不合時尚的。前一段時期，氣候發生了變化，‘凡是’派又張牙舞爪，擺出‘一貫正確’的架勢，棍子、帽子在空中亂飛；不少好心人在替我捏汗，甚至連劉賓雁也說我的文章‘太厲害了’。不過截至今天，我還只聽到贊同的意見，沒有聽到根本反對的意見；上海人民出版社竟還敢主動約我寫書，要給我出文集。在目前情況下，我當然不會去考慮這個問題。這篇東西，原是去年 10 月在全國科學史大會上‘宣讀’的。當時以為不會有刊物主動要發表，既然發表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將來如果要付出代價，我也都心甘情願。”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驅散了中國上空“階級鬥爭”的烏雲，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成為舉國上下的主旋律。隨後，全國所有地主、富農摘帽，“右派”平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得到昭雪，升學、參軍、入團、入黨不再受“家

庭成份”的限制。當時，我萌發了要求入黨的願望，以實現我少年時代的理想：“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因為我長期所受的共產黨正統教育，在我的靈魂深處已根深蒂固。

1981 年 6 月 1 日，三叔來信，指出我如何正確對待入黨問題：

“接到 5.10 來信，知道你已申請入黨，這當然是好事，首先表明唯成分論的束縛終於打破了；其次也表明你對自己有嚴格要求，有勇氣考慮這個嚴肅的問題。但怎樣認識現實的黨，以及在當前應該怎樣看待入黨的問題，恐怕你還沒有充分考慮。我在 1974 年以前一直把黨看得很簡單，甚至 1957 年受到那樣的挫折以後也沒有改變。1974 年在北京看到所謂‘批林批孔’和江青的表演，腦子裡才開始複雜起來，對許多根本性的問題開始思索起來。去年 10 月寫的那篇短文，就是這種探索的一個紀錄。可以說，現在的黨已不同於五十年代初期的黨，更不同於解放前的黨，特別是黨風問題，實在令人擔憂。你既然已經申請入黨，對這類問題應該進行非常嚴肅認真的思考，這樣，入黨的動機也就有可能比較正確。因為忙，在信上不可能多寫，只能講點抽象的、原則性的話，如果見面談，當然可以講得更仔細些，”

三叔的指教，使我開始重新考慮入黨問題，我要改變自己原來的思維模式，反思自己的心路歷程。三叔的那篇論文《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正好為我指明了方向。

三叔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思想還沒有完全擺脫馬克思主義框框的束縛，他雖然也已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論點已經過時，或者本來就是錯誤的，但以為加以必要的修補和改造，馬

克思主義還會是有生命力的。胡耀邦總書記的一席談話，使他對共產黨還抱有一種幻想。

1981 年 5 月中旬，中國科學院召開第四次學部委員會大會，三叔應邀列席。會議結束時，胡耀邦請大家到中南海懷仁堂座談。他作了熱情洋溢的鼓勵性講話，結尾談到了當時正在開展的“反自由化”。他說，有人很害怕，以為又要搞“文革”那樣的整人運動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決不搞整人運動！”“如果問我你能擔保以後永遠不搞整人運動嗎？我可不能擔保，因為我不能擔保我自己！！”三叔聽了這番肺腑之言，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後來，三叔對人說：“只要胡耀邦在臺上，共產黨還有希望。”

可是，從 1981 年開始，“太上皇”鄧小平，每隔一年發動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7 年，又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罷黜了總書記胡耀邦。這使三叔心中僅存的對共產黨的一線希望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一點殘餘信念都徹底破滅了。1988 年 11 月，在全國現代化理論研討會上，三叔第一次公開提出：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並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導致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政，也導致中國“五四”民主啟蒙運動在“五四”後一年就夭折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回到“五四”，開展民主啟蒙運動。而這種啟蒙，首先必須啟知識份子自己的蒙。

18、三叔主持“愛因斯坦研究討論會”

我在城西中學曾任教三屆高中畢業班英語，每年高考，高中畢業班任課教師要隨班帶領學生進城參加高考。每年高考全

縣考場分設在一中和二中，理科設在一中，文科設在二中。

1983 年，我帶領文科學生到二中參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二中教導主任梁夢雲老師瞭解我的情況，他主動提出想調我到二中。後經過王良漢校長的同意，決定正式調我到二中任教。以前，我在二中讀書時，王校長曾任教我高三物理，他對我的情況也比較瞭解。

1983 年 9 月，我來到闊別二十二年的母校——臨海二中（1985 年複名“回浦中學”），當時，我的身份仍然還是一名“民辦教師”。9 月 9 日，我收到調入二中後三叔的第一封信，他告訴我：

“11 月中旬，我們可能去美國訪問，時間只有三個星期，因此只能限於東部幾個城市。他們已來電報安排學術報告時間，我準備帶兩篇文章去，但文章還沒有功夫動筆。此外，大百科全書的賬欠著一大串，實在夠狼狽的。出國，我本來不願意考慮，因為英語聽、說都不行。這次好在我們所裡去年有位同志去哈佛大學進修，他可幫助我翻譯，這樣我也就不妨硬著頭皮試試看，去見見世面。”

三叔訪美歸來，於 12 月 24 日給我來信：

“17 日淩晨訪美歸來，就收到你的信。……

這次在美國三周，訪問了 6 個城市，21 個學術單位，同 40 多位科學史家交談過。我們還曾在波士頓、哈佛和馬里蘭大學作過學術報告。美國學術界濃郁、開朗、自由的學術空氣很值得我們學習，而且他們對我都很熱情友好。目前我們正在看帶回的資料，準備向科學史界做個詳細的彙報。”

訪美期間，三叔應美國波士頓大學“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中

心”主席羅伯特·科恩（Roberts · Cohen）教授的邀請，為他主持的“科學哲學討論會”上，作了題為《愛因斯坦的理性論思想和現代科學》的演講，三叔是應邀在這個國際學術中心講學的第一位中國學者。

1984 年 12 月，我的轉正問題解決了，我終於成為一名公辦教師。我寫信告訴三叔，他於 1985 年 1 月 16 日回信說：

“1.6 信收到。知道你的轉正問題已解決，非常高興。多年來一大心事總算有了著落，以後應該可以安心地工作了，希望為故鄉的教育文化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

三嬸在信上也附筆：

“從平：祝賀你解決轉正問題，盼注意身體，在工作上更上一層樓。”

同時，三叔在信上告訴我：

“為要切除前列腺，前天我去了友誼醫院，大夫給我開了住院通知單，但病床沒有空，只好暫時在家等著。聽說手術要做一、二個小時，出血很多，手術後要再住院一個多月。可是我 3 月開始工作就會緊張，如果半個月內住不進醫院，恐怕要推遲到 5 月以後。3 月下旬我要去杭州開‘愛因斯坦研究討論會’（由我和方勵之主持），又要給浙大講兩節課（我已答應浙大掛個兼職名義）。4 月中旬 G. Holton 將來華講學，我得陪他。去年感恩節，Holton 夫婦舉行家宴，請了成鋼和匡輝，對他們非常熱情。前年 11 月我們訪美時，對我們也很熱情。”

G · Holton，即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物理學史家霍爾頓。

得知三叔將於 3 月下旬來杭州開會，我借此機會到杭州看

病。由於多年生活的艱苦，工作的辛勞，我原來體質也不是很好（二中讀書時，農場勞動淋雨後引起），調入二中後不久就病倒了，身體一直不是很好。

“愛因斯坦研究學術討論會”於 1985 年 3 月 25 日——29 日，在浙江大學舉行。為了紀念愛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和狹義相對論創立八十周年，促進我國關於愛因斯坦研究工作的開展，中國引力與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和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物理學史委員會聯合發起召開這次研討會，由三叔和方勵之教授主持。

3 月 28 日下午，即會議的第 4 天，我到達杭州後，即去浙江大學招待所找三叔。據會議工作人員說，三叔他們正在三樓開會，我上樓在會議室門外張望，發現三叔一隻眼睛用紗布包紮著，正在高聲講話，我在門口喊了一聲“三叔”，他立即叫我進去。

三叔和方勵之教授坐在一張三人沙發上，看我進來，他們讓開位置，叫我坐在他倆的中間，三叔就向方勵之教授和在座的人介紹我。然後，繼續他們的會議，我坐在那裡聽著他們的發言。

原來，前一天，方勵之教授對浙大師生作了題為《漫談改革》的演講，但學校當局百般刁難，不讓更多的學生前來聽講，三叔剛才高聲說話，正是當著浙大幾位領導的面“發火”。原計劃第二場由三叔作有關民主的演講，已出了海報，因三叔患眼疾，臨時取消。

那天，會議安排去紹興參觀，三叔沒有去，約了二叔、小叔以及許可建、周光梁（二叔大女兒、女婿）、羅新星（姑姑的女兒）等人一起遊西湖。他們一行人在孤山“樓外樓”二樓吃中飯，一邊用餐，一邊欣賞西湖風景。當用餐完畢，三叔走

下臺階時突然感到右眼不舒服，就去浙大醫院眼科檢查，經過包紮，回到招待所。第二天的會議閉幕式，本來是由三叔主持的，這樣只好改由別人代替。同時，他們討論第二天怎樣安排三叔上午到醫院看病和下午乘飛機回北京等事宜。

第二天上午，三叔在他的二位研究生：劉兵（現清華大學教授）、熊偉和浙大的何亞平老師的陪同下，去“浙一”醫院看病，我也一同乘車隨行。三叔在眼科作了仔細的檢查，然後作了些處理，就回浙大招待所。

中午，浙大姚德昌教授與家人一起，為三叔送來豐盛的午飯。可是，三叔眼睛看不清東西，這位老教授就細心地喂著他吃。臨走時，三叔囑託他，要照顧好我在這裡幾天的住宿。

下午，杭州市市長鐘伯熙來看望三叔，並與浙大幾位領導一起，在招待所門口為三叔送行。當時，我提出要一起乘車送三叔到機場，因浙大校方領導也要有人去送行，他們派來的車子沒有空的位置，我只得作罷。

我只好站在招待所門口，惘然若失地目送三叔乘坐的車子漸漸遠離而去。與三叔整整 7 年沒有見面了，這次好不容易能見到他，本來以為可以好好暢談，多聽聽他的教誨，可是，又是這麼不湊巧，我深感遺憾！

在這次研討會開幕式上，三叔和方勵之教授都作了精彩、富有啟發性的演講。三叔在題為《作為偉大思想家和世界公民的愛因斯坦》的演講中說，愛因斯坦是一位有著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愛因斯坦關心社會，關心政治，關心人類的命運，他認為人只有從自我中解放出來，只有奉獻於社會，其生命才有價值。他在一切重大事件上都要表明自己的態度，並認為對邪惡勢力的沉默就是犯同謀罪。愛因斯坦的作為是每一個正直知識份子的行為楷模。

方勵之教授作了題為《愛因斯坦和二十世紀物理學》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回顧了愛因斯坦對相對論和量子論的貢獻，展望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發展的趨勢。他指出，在愛因斯坦之後，量子電動力學、弱電統一理論、大統一理論、超引力理論和宇宙學等的探索和發展，基本上是沿著愛因斯坦所開創的思想路線前進的，愛因斯坦一些以前未被注意的思想正在發掘出來。這一切，正是促進人們思考這樣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問題：為什麼自然規律具有它們所具有的形式？為什麼宇宙由構成它的物質成分所構成？宇宙中這些物質成分是如何起源的？宇宙是如何達到它如今的結構的？

逗留在浙大招待所的幾天，我除了認識方勵之教授，還認識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劉盛際教授、清華大學何成鈞教授等人。一年之後，劉盛際教授的新譯著《愛因斯坦傳》出版，他特意給我寄來一冊，我非常感謝他。

這次愛因斯坦研究學術討論會，與會代表 50 余人，提交論文近 40 篇。會後，三叔和方勵之教授主編《愛因斯坦研究》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出版。

幾個月後，三叔給我寄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的《研究生》，刊有方勵之教授 3 月在浙江大學演講：《漫談改革》的全文。方教授時任科技大學副校長。

方勵之教授在《改革漫談》的演講中指出，大學應該是自由研究和教學的中心。他說，“議會政治的一個特點，就是在開會議的時候，議員們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因為議會本身是立法者，如果它再受法律的約束，那麼誰又來立法呢？這就是矛盾。所以必須要求議員可以批評法律，改變法律，才能真正形成立法的作用。”

接著，他說，“我想借用這個道理，我們知道大學是一個

探求真理的環境，我們不是立法者，而是自然界、社會規律的探索者、發現者。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中，對已有的人的發現，已有的人的成就，也可以提出異議，不受任何約束；這就是大學的特徵。”

同時，他指出，就是在宗教神學鼎盛的中世紀歐洲大學裡，“研究神學的人可以批評神學、改變神學、發展神學。”當時歐洲的大學可以不受大學圈子外面的教規所制約，更何況我們今天呢？沒有任何新思想不可以演講，這就是大學講臺所必須有的特徵。大學應該出思想的地方。他說，“我認為大學裡邊大家說是教學的中心也好、是研究的中心也好，其實質是思想的中心。如果大學不出現什麼思想，那麼，這個大學就沒有什麼意思。所以，大學就不應受某些思想的約束。對任何一種思想我們都可以提出疑問，加以研究和發展。”

19、三叔與方勵之、劉賓雁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

1986 年 11 月，三叔與方勵之、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一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

劉賓雁（作家、《人民日報》記者，曾被劃為“右派”），1977 年先後，三叔在商務印書館當臨時工時，他也在那裡當臨時工，開始認識。由於有類似的坎坷經歷，二人一見如故。

11 月 14 日，劉賓雁和方勵之以及夫人李淑嫻（她是方勵之北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學，後留校任教），來到三叔家（北京中關村 812 樓 704 號）聚會，討論發起召開這個會議的問題。經共同商議結果，決定由他們三人發起，完全以民間形式，不同任何官方機構或學會掛鈎，經費由各人捐助。通知由方勵之

起草，通知所列的研究主題內容主要是三叔提供，聯繫地址設在三叔家。會議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

_先生：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即將滿三十周年了。反右運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不瞭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面地瞭解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難以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撥亂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歷史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識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我們社會中蘊藏的蓬勃生機。

反右運動的許多當事人，已年過花甲，應該及時把有關史料收集和保存下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這一段歷史變成留給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識。為此，我們發起舉行學術討論會，開始這一歷史研究，其主題應包括：

1. 史料的收集，當事者的經歷或見聞，統計資料；
2. 反右運動的國內和國際背景；
3. 反右與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關係；
4. 反右對政治道德的影響；
5. 反右運動的歷史、社會根源；
6. 反右之後“左派”及右派的運動軌跡；
7. 反右與今天的開放、改革、現代化。

我們邀請您參加討論會，歡迎提出自己的報告，請告知您的報告題目，每個報告限在一個小時左右，會後將根據報告，選編成文集出版。

會議時間：1987 年 2 月 3-5 日

會議地點：北京（具體地點待定）

費用: 全部自理, 確有困難者請來信告知, 以便為你籌措。收到通知後, 請您於 198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回信, 告知您是否能參加, 以及您參加會議的報告題目。

聯繫地址: 北京中關村 812 樓 704　許良英
發起人: 許良英 劉賓雁 方勵之
1986 年 11 月

這是 1949 年以來第一次由個人發起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反映十分熱烈。他們發出大約 40 封信，除費孝通、錢偉長外，都立即回復，而且都充滿熱情。回信者有化學家袁翰青，水利學家黃萬里，電影評論家鐘惦棐，雜文家曾彥修，翻譯家劉尊棋，老報人徐鑄成，文學家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數學家曾肯成，浙江所謂“沙楊反黨集團”骨幹孫章祿和沙文漢夫人陳修良等。有不少並沒有邀請的右派，也主動來信要求參加會議。

12 月上旬開始，合肥、武漢、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當局歸咎於方勵之。據說就在這個時候，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寄給他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邀請信交給當局，並附了這樣的意見：方勵之是一個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不同的。

12 月 30 日上午，鄧小平召見胡耀幫、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訓話，批評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說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要開紀念反右運動 30 周年大會。趙紫陽把三叔誤為王若望，把“反

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三個人立即開除出黨，並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不久，錢偉長果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6 年歲末，空氣非常緊張，方勵之成了宣傳工具批判的對象，他們三人發起的會也在內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三叔的恩師王淦昌先生特地來到他家，勸他們在目前情況下，不要開這個會。第二天（元旦）一早，三叔去看剛從合肥回來的方勵之，他提出，鑒於目前政局動盪，而對方的謠言太多，無法平心靜氣地討論學術問題，原定於 2 月初的會議只能推遲，方也完全同意。兩天后，三叔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黨委書記正式向三叔傳達黨中央不准他們開這個會的指示精神，說如果一定要開，矛盾的性質就會轉化（即將轉化為“敵我矛盾”），並同時通知各單位，不讓收到邀請通知的人參加會議。

1987 年 1 月 7 日，三叔給我來信，信的全文如下：

從平:

信已收到。

現在情況又來一個急轉彎，一種多年未聽到的熟識的聲音又開始喊叫，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和二十年前。但時代畢竟不同了，對這種喊叫很難有一呼百應的反響了。人們需要真正的安定團結，希望上下都能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因此，目前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冷靜地觀察和思考。我的情況一直很好，請勿念。

我們發起的會決定不開了，寄上一張通知給你看看，不妨留作紀念。

祝

好!

三叔

1987.1.7

三叔寄來以作紀念的通知全文如下：

____ 同志:

新年好!

很高興收到你的回信，許多同志建議，原定的反右運動學術討論會，目前以不舉行為宜。我們接受這一建議。至於有關這個專題的學術研究，如有準備發表或已發表的論文和其他有關文稿，仍歡迎您寄贈。

此致

敬禮!

許良英 劉賓雁 方勵之

1987.1.3

1987 年 1 月 16 日，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臺，辭去了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趙紫陽接替了他的職務。據說，當時在開除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 3 人的黨籍之後，還準備再開除 10 人，王震在中央黨校宣佈了，三叔名列第一位。

1987 年 2 月 20 日，三叔又給我來信，信的全文如下：

從平:

信收到。前一時期關於我的傳聞不是沒有根據的。當時是說要點名批判十幾個人，在方、劉、王之後，緊接著就是我、于光遠、白樺、李洪林等人。春節前夕，情況有變化，這就是四號文件的精神。以後究竟會怎樣，誰也不知道。任它風吹浪打，我都捫心無愧，心安理得。我是研究歷史的，又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對任何歷史事件都要加以客觀的剖析，絕不迷信盲從，浙先賢于謙、張蒼水、秋瑾、魯迅，和我們台州的方孝孺，都是我師。記得 1938 年春天，在故鄉自學時，偶讀到陸隴其名言：“人生不可有傲態，但不可無傲骨。”即錄之作為座右銘，所謂自古文人無行，就是有真正傲骨的文人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我在 1948 年以前沒有想到自己會活到中國解放之日，如今我已活了兩世，還有什麼可以牽掛？這兩個月，我健康狀況和精神狀況都很好，你不必掛念。2 月 16 日，英文《中國日報》第 6 版有一篇關於中關村“科學城”生活的報導，想不到這裡面有三段講到我的情況。這是去年 12 月上旬的一次採訪談話，拖到兩個月後才發表，而且還突出地介紹我，表明國內氣氛已有所改變。聽說香港和美國的報紙已報導我也將挨批判，《中國日報》發這個報導也可能是要澄清一下。由這一點，你也可為我松一口氣。

祝

好！

三叔

1987.2.20

《浙江日報》批方勵之的文章，請設法寄來看看。又及

半年後，香港《百姓》半月刊主編陸鏗（老報人，又名陸

大聲，因說話大聲而得此名，曾被打成“右派”）等人，接去了三叔他們的通知，於 1987 年 6 月 8 日在香港召開“反右運動 30 周年歷史學術討論會”，參加者 132 人，有 14 人發言。6 月 16 日，《百姓》半月刊同時還刊登《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大會檢討特輯》，其《特輯》題記這樣寫道：“今年六月八日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紀念。中共建政的歷史證明，反右是一切災難的根源。因為自反右起，中共即在大陸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殘害一切生機，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幾乎斷送民族的命脈。“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了十億神州能夠擺脫左毒的危害，我們發表這一專輯，用為殷鑒。”

《特輯》對這次大會情況作了報導，抄摘幾段如下：

六月八日在香港舉行的“反右運動三十年曆史學術討論會”，短短兩個半小時，挖掘了反右運動的根源，總結了反右鬥爭的教訓、回憶了當右派分子的慘痛，實為高度濃縮 。在香港，大概這真是比較理想的了。五七年以後出生的香港人，對“反右”是陌生而莫名所以得，由於少有與右派分子接觸的機會，根本無法瞭解“反右”的禍害；加之中共對反右總結的不夠徹底，更缺乏足夠資料作深入研究。因此這次討論會對香港人來說是“反右”的初級課。由此觀之，大會吸引了好多年輕人和學生參加，實在是一項成功。不僅吸引了年輕人，更有新加坡、加拿大、美國的華僑和臺灣雜誌的負責人慕名而來。

吸引人的，自然不是梨園酒店的金碧輝煌，也不是主辦者的名氣，而是“反右運動”的重大意義。徐東海、李怡、陸鏗三人，在香港這個不曾受反右波及的地方舉行反右紀念會也能有此成績，假若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原來發起的反右討論會能順利進行，當能轟動大陸，引發群起探索的(516 風氣，造

成一股國人大反思的旋風。許、劉、方的宏圖胎死腹中，那損失實非一聲惋惜所能概括。

《特輯》還刊載了一篇介紹三叔的文章，題為《“五不怕”的過來人——許良英》（作者：陳棘蓀）題記寫道：

“毛澤東號召共產黨員‘五不怕’，指的是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開除公職、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監獄、不怕殺頭。

許良英，這位畢生為民主與科學獻身、研究自然科學史的學者，就是‘五不怕’的過來人。也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歷史學術討論會”的第一個倡議者。”

該文最後一節“走愛因斯坦的路”這樣寫道：

“愛因斯坦的道路就是許良英走的道路。許良英從對愛因斯坦的研究中體會到關心社會，關心人類的命運，逐漸成為當代科學家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傾向。在這方面，愛因斯坦的一生就是一個典型。而許良英從自己切身感受中認識到，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甚至於人的權利。因此，他為人，為民主自由大聲疾呼，甚至聲稱：不惜為民主自由獻出自己的生命。

去年 11 月他約同劉賓雁、方勵之發起組織“反右運動三十年曆史學術討論會”。當北京發生了“一·一六”之變後，此會就開不成了。但他仍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和維護真理的精神豪邁地表示：“這頭殺在民族有用的地方，死而無憾！”

為了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2007 年 6 月 29 日和 30 日，

百餘位五十年前反右運動的倖存者和研究者，齊聚在美國加州大學和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圖書館，舉行“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通過學術論文和專題討論，回顧和反思這段扭轉當代中國發展方向的歷史事件。

研討會上三叔的論文《當代中國大災難的開端——紀念反右 50 周年》由王丹代為宣讀。現選錄論文（二）、（三）、（五）：

（二）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運動?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是妨礙他統治的禍患，但國家建設又離不開知識，於是建國伊始就發動改造知識份子運動，要把他們改造成馴服工具。對那些他認為不完全馴服的人，就饗以鐵拳。反右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其根源在於毛澤東敵視知識份子的心態。對於這個問題，王來棣 2003 年的論文《一貫敵視知識份子的毛澤東》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此處介紹兩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史實。

在國共合作時期的 1925 年，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發表論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一部分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位“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時在 3 個刊物上刊出，並出過單行本。1951 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此文是開篇，但文字刪去近半，上述這些話全不見了，卻又加上原文所沒有的“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這一公然偽造歷史的鐵證，以前未引起學界注意，連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也未發現。

1957 年 7 月 7 日，毛澤東沉醉於反右運動的勝利，在上海接見 30 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壯著膽問毛澤東：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這個

曾被毛澤東讚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勇敢的旗手”的魯迅，在 1957 年必然也會成為右派，並且還要坐牢。

（三）、毛澤東是怎樣發動反右運動的？

這個問題，在 1977 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可以找到基本答案。請聽：

“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為了引螞蟻出洞（以後改稱“引蛇出洞”），毛澤東 1956 年 4 月提出“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即“雙百”）方針。一個月後，我還聽到中宣部長陸定一向知識界的報告。他強調，要貫徹“雙百”方針，必須“有獨力思考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有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我都信以為真，並深受鼓舞，以為中國的思想自由、學術繁榮的黃金時代即將來臨。

可是毛澤東 1957 年 1 月的這篇講話中，向黨內高級幹部洩露了天機：

“康得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

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

“百家”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 99 家，原來都必須服從於馬克思主義的“統治”，這算什麼“爭鳴”？所謂爭鳴，要不是滑稽雙簧的鬧劇，就是冒出洞來遭誅滅。

為了巧設誘敵深入的圈套，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出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歷時 4 個小時的講話，給人一個假像：經歷肅反運動後，靠工資生活的工作人員，都是自己人，可以享有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自由的鳴放。隨後又召開了歷時 8 天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召開了 5 次各界知識份子的座談會，並對全體作了一次長篇講話，反復重申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精神。最後提出共產黨準備整風，懇切地希望黨內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即所謂“整風鳴放”

3 月 17 日，毛澤東起程去杭州。路過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時，他都召集當地幹部講話，交待鳴放政策的底細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發出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為了顯示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誠意”，毛澤東於 4 月 30 日又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拋出不少誘人的釣餌，如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但附和這一意見的人，40 天后統統被打成右派。

經毛澤東和全黨組織“誠懇”的動員，並在“言者無罪”的保證下，鳴放開始了。黨報天天整版刊載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不到半個月，毛澤東向黨內中層以上幹部打招呼，通報 4 個月前向高級幹部部署的計畫，用一個障人耳目的題目《事情正在起變化》，說即將可以“聚而殲之”了，他自欺欺人地斥責“右派倡狂進攻”，並估計：“右派大約占 1%、、3%、5% 到 10%，依情況而不同。”

6 月 8 日，反右運動終於出籠了，《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

假惺惺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這對於沉浸於“雙百”方針產生黃金時代的幻想之中的我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我無法容忍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公開反對反右運動，於是成為科學院第一個受全院批判的右派，後被定為“極右分子”，回老家當了 20 年農民。

（五）“關於 20 年前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

最近讀到何家棟 2006 年 6～7 月間寫的遺稿《劉賓雁與共產黨》(《開放》雜誌 2006 年 12 月號)，其中談到：“反右 20 年紀念活動的事，這事劉賓雁做的不夠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許良英、方勵之和我四個人發起”。又說，“他要出去採訪，回來再把我的發起信拿來你簽名，我也答應了，可是賓雁（？）又把這事告訴錢偉長了，又邀請錢偉長來參加發起這個活動。”讀後感覺十分意外和詫異，有必要對事實作個澄清。

何家棟文中所謂“反右 20 年紀念活動”，顯然是指 1986 年 11 月我們發起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這個設想是方勵之首先提出來的。他想與我、劉賓雁三人共同發起。1986 年 11 月 14 日方勵之夫婦和劉賓雁來我家聚會，討論此事。我與方、劉都有將近 10 年的交往。會上劉賓雁並未提出要請何家棟參加發起。而且那時我和方勵之對何家棟並不瞭解，即使劉賓雁提出來，我們也未必會同意，因為我們並不是想搞一般的紀念活動，而是要開一個學術討論會，邀請參加者都要求有一定的學術水平。3 年後，我與何家棟在一次會上第一次見面，他告訴我，1986 年劉賓雁曾要他編一本右派回憶錄。很可能，他把這兩件事記混了。

至於錢偉長，劉賓雁並不熟悉，而我在 1953 年就認識，方勵之對他也很熟悉。劉賓雁不可能找他談這個討論會的事。

我們三人在討論邀請名單時就有他的名字。參加會議的通知是我寄給他的。想不到他出賣了我們。作為獎賞，鄧小平賜給他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官位。

這裡不妨順便說一下，1987 年，隨著胡耀邦被迫下臺，方勵之、劉賓雁都被開除黨籍，我為何得以倖免。

1986 年 12 月，合肥、上海、武漢、杭州、南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當局認為是受了方勵之的影響。12 月 30 日上午，鄧小平召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訓話，嚴厲批評胡耀邦反對自由化和制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方勵之和劉賓雁、王若望要開反右運動 30 周年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三人立即開除出黨。趙紫陽把我誤為王若望，把：“歷史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方、劉、王三人受公開批評時，官方都為各人印發了言論摘編。《劉賓雁言論》中最後一篇竟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全文。要劉賓雁對這個會負主要責任，實在冤枉。因為這件事是方勵之創議的，通知也是由他執筆；三個人的排名順序又是我在先；劉賓雁已在中途宣佈退出。鄧小平宣佈開除方、劉、王三人黨籍後，還準備再開除 10 人，王震在中央黨校宣佈了。這 10 人當中，我首當其衝。大概由於趙紫陽發了善心，我們得以暫時倖免。”

在這一事件中，“太上皇”錯點“鴛鴦譜”，垂簾聽政罷黜總書記，這是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下，中國歷史上的一出悲劇！

8 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臨海東湖散步，遇見大葉（葉紹雲），他對三叔一直比較關心，他對我說：“你三叔又出問題了，他

怎麼不吸取歷史教訓呢？”我即把這一情況寫信告訴三叔，他於 8 月 27 日回信說：

“你信中說我似乎又出了什麼問題，還說有什麼文件？怎麼未見下文？我想莫非是 1 月發的《劉賓雁言論摘編》中有我和劉賓雁、方勵之三人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探討論會的那封信？這封信的內容有什麼錯誤？發起這樣一個學術討論會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你說大葉認為我沒有吸取歷史教訓，恰恰相反，我們就是因為正是這個歷史教訓才發起開這個會的。也可能大葉說的所謂教訓，同我所理解的相反，指的是個人得失。如果是如此，那時庸人之見，不是一個真正共產黨員所應有的。我在這裡，老同志、老朋友很不少，年初風暴起後，他們很關心我的命運，但沒有一個人認為我們有什麼過錯，要吸取什麼歷史教訓。相反的，大家都為國家、民族的厄運而憂心忡忡。我記得 1974 年我在商務當臨時工時，大葉參觀大寨後路過北京來看我，我告訴他當時“批林批孔”的真相，他恍然大悟。這一次，如果他也能來當面談談，大概也會清醒些。你沒有大葉的那些政治包袱，方勵之在浙大講稿全文早已讀過，難道你竟也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疾風知勁草，人不能做隨風飄蕩的落葉。是非公理自有公論。人心向背，永遠是歷史進程的決定因素。國運、民心是大事，個人遭遇算得了什麼？要真正改革，要實現現代化，沒有譚嗣同這樣的志士，是不可能成功的。”

20 三叔主持編寫《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

1985 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三叔和生物史家李佩珊共同主編的《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th Century），在三叔寫的本書 《結束語》中，有一節標題為“政治民主和學術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1986 年 12 月下旬，《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節文字，對當時各地湧現的學生民主運動起到了相互呼應的作用。現選錄幾段如下：

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毫不含糊地向我們展示：凡是有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時代，學術和文化必然興旺發達。中國的春秋戰國、希臘的雅典時代和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這樣的繁榮時代。相反，凡是不允許有思想自由的時代，學術和文化必然停滯甚至枯萎。歷史上稱為黑暗時代的歐洲 1000 年的中世紀，就屬於這種陰暗窒息的時代。

關於思想自由對人類進步的必要性的認識，同人人生而平等，並都有不可侵犯和轉讓的權利，以及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的確立，都是人類徹底擺脫以思想統制、封建特權、等級制度和人身依附關係為標誌的中世紀封建傳統的精神大解放。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是現代文明的基本前提。資產階級就是以此為號召，把勞動人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推翻了封建統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採取一系列有利於民主和科學的措施，其中最有深遠歷史影響的是在思想上實行寬容政策，這就是只要不觸犯法律，容許各種思想自由發表，自由爭論。這種寬容政策是對科學有力的保護，使古代歷史上曇花一現的所謂“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成為持續存在的現象。這是人類精神文明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一旦社會有了這種寬容精神，那種把思想上的“異端”看作是洪水猛獸，以致要把布魯諾當眾燒死，用刑訊強迫伽利略放棄地動說這類歷史悲劇，也就有可能不再重演。整個 19 世紀的科學史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遺憾的是，到了 20 世紀 30 年代，歷史卻又出現了反覆。這就是在歐洲冒出來的一股瘋狂的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它使德國政權淪於納粹黨徒手中，從而使德國科學遭到了浩劫。由於對猶太人、民主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進行的殘酷鎮壓，德國科學家總數中有 1/5（柏林一地則有 1/3）被解雇或被迫逃亡，其中諾貝爾獎獲得者逃亡國外的就將近一半（達 19 人）。曾在 19 世紀後半期和 20 世紀初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德國，在世界科學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民主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這種中世紀的悲劇理應不會再重演，可是，就在戰爭結束後 3 年，在蘇聯竟出現了學術騙子李森科之流稱霸科學界的鬧劇，於是，生物遺傳理論、化學共振論、數理邏輯，甚至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都被指責為“偽科學”和“反動理論”。在這之前，著名遺傳學家瓦維洛夫遭政治陷害，冤死獄中。這種嚴重損害社會主義國家聲譽的悲劇，在已經認識到蘇聯科學政策的錯誤並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政策的中國，竟於 1966 年——1976 年間又以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名義，變本加厲的重演了一次，整個科學領域和所有科學家都成了所謂“全面專政”的對象，使 1949 年以後中國迅速發展起來並已初具規模的科學事業的基礎遭到嚴重摧殘。中世紀的悲劇居然會在科學昌明的 20 世紀中葉在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一再重演，這是近代科學和現代科學史中最令人痛心的事件。這個使親者痛、仇者快，以無數正直科學家的淚和血以致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慘痛歷史教訓，必須引為殷鑒，永志不忘。

回顧幾千年科學發展歷程中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正視我們自己身上由於盲目自我折騰所造成的創傷，應該可以清晰地

看到：要使科學事業順利發展繁榮昌盛，必須要有容許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社會條件，而這種社會條件必須有政治上的民主制來保障。科學和民主相輔相成，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是現代文明的基礎，也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國之本。背離民主，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踐踏，必然出現人壓迫人的現象，科學也必然受排斥，受摧殘，這是在最根本意義上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離。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重的教訓。”

由於民主必須貫徹多數決定的原則，“學術民主”就不是一個完全合乎科學的概念。因為學術上的是非只能通過自由爭論和科學實踐去解決，而不能通過由多數人決定的表決形式去解決。政治民主給人民以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政治保證，但不容許任何人（無論是多數還是少數）對學術上的是非有裁決的權利。因為知識和科學真理不同於人類社會行為的準則，不是靠多數人的意志來決定的。而科學真理的發現初期往往難以為多數人所接受，如果要在科學領域中機械地實行多數決定原則，可能會混淆是非。當然，在科學組織的管理和科學事業的行政領導工作中，還是必須貫徹民主原則的。

在政治民主保證下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是一種尊重少數、保證少數的寬容精神。它要求學術上的是非問題由學術界同行自己去評議，防止外界特別是行政力量的干預。固然，同行評議也難免會出差錯，但由於科學界同行之間有自己的共同語言、共同的是非標準和道德準則（即所謂價值觀念），在

認識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經常有回饋作用的自我調節系統，因此，認識上的錯誤也就比較容易得到改正。非同行的外界干預只能使這種回饋和調節作用中斷，錯誤不但難以改正，反而會節外生枝，引起 無端的混亂。總之，由於科學的發展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外界（包括行政和輿論）不可去橫加干涉，而應容許科學界有充分的自主權。科學研究工作本身應該有科學家來領導，外行要強行領導內行，只能導致科學的災難。

《20 世界科學技術簡史》的問世，填補了我國學術上的一項空白，曾獲得學術界的一致好評。

《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第二版於 1999 年出版。本版總字數為 126 萬字，比第一版增加了 40 萬字，大部分章節，都作了改寫。本書文字簡潔，論述嚴謹，資料豐富。本書是學術性專著，資料更為豐富新穎，論述更為嚴謹全面，學術價值高，參考價值更大。

《讀書》雜誌 2000 年 9 月，發表金克木的文章《倒讀歷史》，高度評價了此書，稱“題為簡史，實是大書。”

《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 年 4 月，發表范岱年的書評：《回顧 20 世紀科學技術進展的巨著——〈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第二版）評價》一文中指出：

與國際上的科學技術專史相比，本書在掌握第一手原始資料和討論問題的深度方面，可能有所不及。但據個人所知，國外還沒有一部內容如此廣泛全面的 20 世紀自然科學和技術史巨著。其總字數超過 120 萬字，而所反映歷史的時間下限直到 90 年代初甚至 90 年代中期。我們知道，我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起步比先進國家要晚很多，過去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方面，特別側重於史料的考辨。而近現代世界科學技

術史研究幾乎是空白。所以本書（特別是第二版）的出版，在我國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是我國現代世界科學技術史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許成鋼曾為此書寫過計算機一章中的兩節。其中一節論述“計算機與社會”。以蘇、日、中計算機發展史為例，分析為什麼在某些科學技術領域發展中，例如計算機領域，計畫制度會起負面作用。其中基本的道理是，計畫制度是以事先專案選擇為基本方法的。當科研面對的目標清楚時，事先選擇科研專案的制度問題不大，甚至可能有優點。但當科研領域面對的不確定性特別高時，計畫制度的本質性缺陷就表現得特別突出。此時市場制度的優勝劣汰方式，特別是風險資本制度，可能更有益於科研的發展，計算機在不同制度中的發展即表明這個道理。在這一節中，許成鋼對日本的計畫體制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也作了分析。

許平也曾參加該書第二版中有關電腦這一章的編寫工作。他是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武漢水運工程學院畢業，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結構材料研究所工作，並在該所獲得碩士，後獲得博士學位，他和妻子陳罕立在事業上都有所成就。

陳罕立，研究員，中山大學畢業，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部工作。女兒許蒙，廈門大學畢業，現為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科學研究生。

21、受三叔民主思想的啟迪

三叔自從回科學院後，除了從事世界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還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民主的文章，呼喚民主、自由、人權！

三叔非常關心我，凡是他發表的文章，或剛寫好的文章的

列印稿，他都很及時地寄給我，幾十年如一日。這些文章成了我豐富的精神食糧，使我從中受到了民主思想啟蒙教育。這是我一生最為幸運的。三叔，是我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源泉；是他，使我逐步擺脫了極權專制制度下的思想束縛和在這種制度下形成的思維模式；也使我逐漸認清了普世價值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民主化。

1986 年以後，三叔致力於民主思想啟蒙和對各種反民主思潮（主要是新權威主義）的批判。

1986 年 6 月 26 日，三叔接受《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為自由正名》的訪談中，抨擊了“反自由化”的荒謬，《新觀察》雜誌 1986 年第 20 期刊載了這篇訪談的全文。

《新觀察》1988 年第 20 期又發表了三叔的文章《從一個譯名反思民主意識》對“少數服從多數”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批評，現選摘幾段：

Majority decision 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則之一，可直譯為“多數決定”或“多數裁定”，意思是：有關社會集體的公共利益問題，由全體成員投票表決，按照多數人的意願執行。這個名詞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中介紹雅典民主制時就出現過，一直沿用至今。而“少數服從多數”以及“民主集中制”則是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提出的黨的組織原則；為了嚴酷的革命鬥爭的需要，特別強調“集中”和“紀律”，嚴格要求每個黨員對黨組織，特別是對黨中央的“服從”。民主制所說的“多數決定”，雖然在一定情況下也要求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決定，這主要是在保障公民和社會安全的法律、法規方面，例如交通規則、公共衛生制度等，經多數人決定後，人人都得遵守；否則，公共秩序無法建立，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但是“多數決定”原則並不意味著，凡是多

數人做出的決定，少數人都必須服從。因為民主的一個原則是：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應受到尊重，每個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特別是各項個人自由的權利（即人權）。如果事事都要聽眾多數人的決定，那就是不可能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與多數人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就會遭到政治迫害 ，一切新思想就會被扼殺在萌芽之中，科學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都將不可能。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真理總是由少數先進分子首先認識到，而往往不能立即為多數人所接受。無條件的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必然會無視少數人的利益，甚至會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這就成了多數人的暴政，即暴民統治，民主制本身必然也蕩然無存。30 年代德國納粹政權的出現就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例證。1933 年，打著“民族社會主義”（縮寫為 Nazi）即納粹旗號的希特勒騙取了多數選票，當上了德國總理，隨即在多數人支持的名義下，實行滅絕猶太人的暴行，並發動企圖統治全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條件下的服從，對人類只能是犯罪。

把 Majorty decision 譯成“少數服從多數”決不是簡單的翻譯錯誤問題，它反映了目前我國學術界對民主概念的混亂，反映了我國很大一部分知識份子對民主意識（包括公民意識）的淡薄甚至缺乏，這對於實現現代化是十分不利的。這樣說，決不是要貶低學術界同行，它不過是我自己經過了漫長曲折道路，付出了極大代價後才醒悟到的一點認識。青年時代我懷著救國救民的熱望，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抗日、反蔣鬥爭，為實現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當時認識很簡單，以為推翻了腐敗透頂的國民黨政府，由共產黨掌權，中國就民主了，因為共產黨是全國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這種信念持續了 35 年，直到在狂熱的造神運動過程中清醒過來以後，才開始

理解到中國只有“為民做主”的傳統，而根本沒有“民主”的傳統，民主概念和公民概念對於我們都是十分生疏的。雖然我們也強調“民主作風”和“群眾路線”，中國古代某些開明皇帝和所謂體察民情的清官也很懂得，只是他們沒有現代那套動聽的語言罷了。

即使在我對民主的真實意義有了一點認識以後，我還是習慣於把“少數服從多數”和“多數決定”等同起來，直到前幾年發表的文稿中，都反映了這一錯誤，鑒於認識這一錯誤來之不易，似乎值得記錄下來，供有志於民主事業的同志參考。

顯然，“少數服從多數”，是“多數概念”的畫蛇添足，是對後者的一種扭曲。同樣，也使人聯想起，“民主集中制”也使“民主制”概念的畫蛇添足。民主集中制概念的產生，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於對“民主”的誤解，以為民主就是無政府主義，人人都可以為所欲為。事實上，“民主”概念來源於 2500 年前的雅典，希臘文 Demokratia，原意是人民統治，或人民主權，它是以法治（不是人治）為基礎，凡是各種會議上經多數人表決同意的決定都得執行，因此，民主本身就已包含集中的意思。這樣，“民主集中制”按字義上是雙重的集中，必然對民主產生了強加的限制，使民主名存實亡。特別是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表明：主權不在人民，而在一個居於萬民之上的指導者個人或集團，這就談不上真正的民主。如果承認民主是人民統治，即人民是主權者，不存在受人支配的主權者，那麼在“民主”之上還有什麼“指導”和“集中”可言？民主不需要有自外於人民的“指導”者。以“人民之主”自居者，要不是神話中的“救世主”，就是歷史中存在過的“君王”。

產生“民主集中制”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實際革命鬥爭的

需要，這就是列寧當初在創建布爾什維克時，為了強化革命政黨的戰鬥力，需要有嚴格的組織紀律，需要建立黨中央集權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實行一般的民主制。這對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是無可厚非的，否則，革命就不可能勝利。可是，在和平建設時期，要把革命和戰爭時期用於黨內的民主集中制推廣到國家政治生活，以取代世界歷史上早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要求全國人民都做訓服工具，其後果的嚴重性已是有目共睹。今天世界上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為了實現現代化，無一例外地都必須進行改革，其癥結就在於此。我國在 1957 年把是否擁護“民主集中制”作為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之一，這一歷史錯誤值得認真總結。

1988 年，三叔除了撰文揭露“民主集中制”的反民主實質，還發表了有說服力的文章《駁民主緩行論》。他有力地駁斥了認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四種流行說法：一、民主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中國的經濟仍然非常落後，因此不能實行民主；二、中國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後，人民將不會行使民主權利；三、中國沒有民主和法制的傳統；四、現在實行民主會導致社會動亂，影響經濟改革，只有在完成經濟改革之後才能實行民主化。對前面兩個觀點，三叔具體對比了兩百年前美國的情況，當時美國的經濟和教育都不如今日的中國，但是美國卻選擇並且成功地實行了民主制。對於第三點，他反駁說，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中國的東西，可是人們並沒有對它表示非議；而民主思想事實上比馬克思主義還早幾十年傳入中國的。因此，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對於第四點，他從當時中國經濟改革失誤的例子指出，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這篇文章中，他還駁斥了金觀濤的所謂“民主只是一個朦朧的理想，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以及當時正在流行的電視劇《河

殤》中關於民主的基本特徵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學性”的荒唐說法。他認為，某些人鼓吹的新權威主義、新民族主義、新英雄主義是一股反民主的逆流。對於中國來說，除了民主之路，我們別無其他選擇。

1988 年 5 月，已畢業離校的劉剛（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回北京大學發起組織傳播民主思想的“草地沙龍”。地點放在北大校園內賽凡提斯塑像前的草地上。第一次，請方勵之主講，第二次請三叔主講，三叔作了有關“民主思想啟蒙”的演講。這個沙龍只舉辦 5 次就被迫停止了。11 月，歷史系學生王丹和技術物理（即核子物理）系學生武運學等接下去辦了一個“民主沙龍”，一直持續到 1989 年 4 月。在隨後爆發的震驚世界的學生運動中，王丹和劉剛都起重要的領導作用，“六四”後他們都被通緝、判刑。

1988 年 11 月，在有 200 多人參加的“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的開幕式上，三叔指出：“馬克思主義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否定民主。馬克思曾洋洋自得地說，他一生最大的創造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恩格斯和列寧一再宣稱，有國家就沒有自由，只有在國家消亡後，才有可能自由。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政，根源就在於這種與現代文明歷史潮流相悖的指導思想。”

會後照相時，坐在三叔身邊的李銳責問三叔：“你為什麼要批評馬克思？”以後在他公開出版的日記上還說，許成鋼不像他父親那樣“偏激”。

1998 年 12 月 30 日，三叔給我來信說：

“李銳日記中稱讚成鋼穩重而批評我偏激的話, 1993 年春節時他也當面對我說過。他在 1989 年 1 月日記上這樣寫，顯

然是由於對我於1988年11月“全國首屆現代化理論研計會”上的發言不滿。這個會是民間學術討論會，有200多人參加，開了三天，我只參加第一天的會。我和于光遠、黎澍、李銳、于浩成、蘇紹智等9人被請上“主席臺”。開幕式上我們9人都發了言，我著重批駁民主緩行論，指出Marx的最大歷史錯誤是反對民主主張專政，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也源於《共產黨宣言》。休會照相時，李銳坐在我旁邊，他對我說：‘你為什麼要批Marx？’在他心目中Marx是批不得的！1993年春節見面時，我對他的新著《毛澤東的青年和晚年》中一味吹捧毛提出批評，他很不高興，說我1992年發表的《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闖了禍’，並說‘你的兒子許成鋼比你穩重’。根據以後更多的瞭解，我覺得他和多數的黨內開明派（如于光遠）名利心太重，過於看重個人既得利益。前一時期被很多人叫好的李銳在15大的發言稿，就充分地表露了這種心態。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現象。”

可是，2008年2月6日，三叔給我的信上說：

“來棣編了一本《中共創始人訪談錄》，請李銳寫序，他欣然答應。現寄去他序言稿的影本。李銳同志近幾年思想變化很大。20年前，他說我‘偏激’；4年前見到我，說‘現在我同你一樣！’”

為迎接“五四運動”70周年和《人權宣言》問世200周年，三叔於1988年9月至1989年4月間，寫了一系列文章，闡述民主，如上文提到的《駁民主緩行論》，還有：《中國的反民主逆流》、《民主和科學是一切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五

四”和中國的民主啟蒙》，以及《新權威主義新在哪里？》等。其中以《‘五四’和中國的民主啟蒙——紀念“五四”70 周年》影響最大。

1989 年 5 月 8 日，被迫停刊的《世界經濟導報》出版終刊號，也發表了此文。但題目被編者改為《民主是安定團結唯一可靠的保證》。編者按語這樣寫道：

“許良英先生說，‘五四’啟蒙思想家把現代文明實質歸納為民主和科學，是對世界歷史研究一項創造性的重大貢獻。考慮到目前“新權威主義”、“精英統治”、“開明專制”等論點十分熱鬧，他希望重新認識“五四”精神的偉大意義和現實意義，由此展開一個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啟蒙運動。”

據同村一位當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的學生說，那時他們班上每個同學都複印了這份報紙上的這篇文章，並向全校和社會廣為傳播，現選錄文章最後部分：

民主意味著什麼？縱觀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初步認為，民主概念的基本內容可以歸結為：

一、確認人人生而平等，每個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轉讓的權利，即人權。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權貴（無論是人還是寡頭集團）的臣民或馴服工具。

二、確認“主權在民”的原則，全體公民通過“多數決定”原則來實行統治，不言而喻，處於少數地位的公民依然受到法律保護，依然享有公民的各項權利。

三、這種統治只有通過公民的自由贊同來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強迫的和非法的手段。由此，通過定期的公民自由

競爭和選舉，少數派也可能成為多數派，多數派也可能成為少數派，一切取決於選民的意願。

四、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公僕，始終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政府首腦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選舉產生，並直接向選民負責；發現有不稱職的，可以隨時通過法律程式予以罷免。

要實行民主，必須以如下各項的保證為條件：

一、公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公民可以公開地發表各種不同的政治見解和對領導人的批評，而不受到迫害和報復。（終止以言論或文字治罪的歷史，廢止新聞、出版的檢查制度。）

二、嚴格實行法治，廢止任何形式的人治。（終止人治和以權代法的歷史。）

三、實行權力制衡，防止絕對權力的出現。（杜絕專制獨裁的可能性。）

四、嚴禁軍隊干預政治，軍隊只聽命於政府首腦。（杜絕軍事政變的可能性，終止軍國主義和軍政府的歷史。）

以上八點，可以說是民主的要義，缺一不可。

由此可見，開展民主思想啟蒙，實質上就是喚醒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建立人權和法治觀念。對於封建遺毒深重、文化落後、有 11 億人口的大國，這無疑是一項長期而艱苦的任務。

這篇文章曾在 1989 年 5 月的天安門廣場上反復廣播。“六四”後，該文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定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民主自由人權方面的代表作。

我受到三叔民主思想的啟迪，充分認識到，為了實現民主化，首先必須要“啟”自己的“蒙”，在學習民主理論的過程中，在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的同時，並去影響周圍的人。

1987 年 9 月，我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當時，我校有二名“民進”會員，他們動員我加入這個組織。我學習了有關“會章”和會史，使我對它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1945 年，創建者馬敘倫等人，以“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現”為立會宗旨，我認為這也是今日中國所需要的。

我把此事寫信告訴三叔，9 月 24 日，他在回信中說：

“你參加了民主促進會，也好，免得再費心思去‘爭取’入黨了。目前中國的民主黨派，你也不可存在什麼幻想，以為真會能起促進‘民主’的作用。說穿了，不過是政治花瓶，一種點綴而已，不過，那裡總還聚集了一批知識份子，彼此交往接觸，多瞭解到各方面的情況，精神上也有個寄託。”

我入會時，臨海的“民進”組織只是個支部，入會審批直接由“民進”省委會。第二年（1988 年），成立了臨海市委員會，隨後，我們回浦中學支部也成立了。

1992 年，我開始擔任民進回浦中學支部主任委員，直至 2006 年（連任四屆）。我利用這個有限的空間，在支部會和各級“民進”組織的會議和刊物上，發表自己對民主的認識。

民進浙江省委會舉辦有關“統戰理論”的徵文活動，我撰寫了《試論民主黨派的政黨意識和民主意識》一文，被入選《徵文集》。我在文中指出：“作為民主黨派成員，除了具備政黨意識外，還必須具備高度的民主意識。既然是民主黨派，不具備政黨意識就不能稱之為‘政黨’，民主黨派不具備民主意識，就違背了它的立黨宗旨，並無法履行其民主監督的職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兩者缺一不可。”

民進中央主辦的《民主》雜誌 1992 年 9 月號，曾發表一

篇題為《民主與權威》的文章（作者：邱在鈺），一開頭就說：“民主與權威是對立的統一，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建設過程中，必須對這一問題加以重視和考察。”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於是寫信向三叔請教。

11 月 16 日，三叔給我回信指出：

“你和邱在鈺對民主和權威的看法都是不正確的。權威並非貶義詞，也不是同民主不相容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不是各人可以為所欲為。民主是以自由、人權和法治為基礎，貫穿民主制度的多數決定原則，決定作出後，任何人不得隨意違反，這就是權威。但這是法治的權威，並非個人權威。因此，民主本身就包含權威，包含集中。說民主與權威是對立的（或對立統一），在邏輯上是不通的。我 1988 年在《新觀察》上發表的短文中對‘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批判，已講清了這個道理。在社會生活和學術領域中，權威的存在並不一定是有害的，而法律的權威和學術上真正有成就並能啟迪、獎掖後進的權威，卻是十分需要的。但我們要堅決反對以樹立個人或少數寡頭絕對權威的所謂‘權威主義’，這是反民主的專制獨裁和人治。

邱在鈺的文章不能說完全錯，但他對民主概念有不少誤解，如再三提到‘極端民主’特別是最後談到什麼‘同情’、‘執政黨的集體領導’，都是鸚鵡學舌的官腔。”

根據三叔的指教和提示，我撰寫了一篇題為《我對民主的一點認識》論文，發表在民進浙江省委員會的會刊《浙江民進》。現抄錄其中幾段：

倘若我們對民主的概念和它的基本內涵稍作深入的探討，就不難發現，民主與權威的關係是對立的統一，在邏輯上是不通的。

民主概念早在 2005 年前就已明確定義，這就是希臘文的 demokratia 的原義：人民統治或人民主權。這種統治是通過“多數決定”（英文 majority decision）的原則來實行的。2500 年前的古希臘雅典就實行過歷史兩百多年的民主制，行政、軍事領導人和司法人員都由自由民主選舉產生。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使個人價值和個人尊嚴開始得到重視，隨後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就把公民意識，主要是保證個人自由的公民權利作為民主概念的基本內容之一。兩百年前美國獨立時即實行民主制，開國元勳華盛頓連任兩屆總統後，堅決拒絕繼續連任，而且也沒有以“你辦事我放心”為理由來指定所謂的“接班人”。

民主概念的基本內涵可歸納為：確認人人生而平等，每個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轉讓的權利；確認主權在民的原則，全體公民通過多數決定的原則來實行統治；這種統治職能通過多數公民的自由贊同來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強迫和非法手段，任何官吏和代表都是人民公僕，始終受人民的監督。顯然，民主本身就包含著自由和法治，而自由是一不妨礙他人為前提的。

民主不是無法無天，各為所欲為的無政府主義，民主需要法治的政府和必要的社會秩序。民主是以法治（不是人治）為基礎，貫穿民主制的是多數決定的原則。決定作出後，任何人都不得隨意違反，這就是權威。但是法治的權威，並非個人權威。因此，民主本身就包含權威，包含集中，兩者並非是“對立的統一”的關係。

“權威”並非貶義詞，在社會生活和學術領域中，權威的

存在並不一定都是有害的，而法律的權威和學術上真正有成就並能啟迪、獎掖後進的權威卻是十分需要的，但我們堅決反對樹立個人或少數寡頭絕對權威的所謂“權威主義”，這是反民主的專制獨裁和人治。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之上，因此，它必須樹立法律的權威，人人都必須尊重和遵守法律（首先是憲法），但堅決反對樹立個人的權威，使任何人凌駕於法律之上。

22、三叔發起並起草《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

為了紀念《人權宣言》發表 200 周年和“五四”運動 70 周年，推動中國民主進程，1989 年 2 月，三叔和他的老同學、地理學家施雅風發起、並由三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實現民主，杜絕腐敗；保證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釋放一切因思想、言論被判刑或勞改者，終止因思想、言論治罪的歷史。一共有四十二人簽名，主要是自然科學家，也有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以自然科學家為主的群體發表政見，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時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中央是比較明智的，他們指示科學院各級黨組織，不要找簽名者談話，以免他們感到壓力。3 月 18 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還邀請三叔和三嬸，以及施雅風吃飯，希望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那天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談了很多問題，三叔還交給他一份 1977 年以來因言論被治罪者 16 人名單，並詳細介紹了他直接瞭解的徐水良的情況。總的說來，當局比較開明的態度，營造了早春的民主氣息，為隨後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激發的群眾性民主運動作了鋪

墊，成為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我於 3 月 8 日晚，在收音機裡聽到了《美國之音》記者就這封公開信，對三叔所作的採訪報導，並當即錄下這段訪談。這盒錄音帶，我於 1992 年 8 月，第一次進京看望三叔，作為一件珍貴的歷史記錄，送給他。

現根據錄音，整理如下：

“3 月 6 號, 本台已經報導了中國有 42 位科學家聯名上書中央, 在這 42 位當中有自然科學家 28 名, 其中中國科學院 21 人, 社會科學家 13 人（中國社會科學院 7 人), 6 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和 2 位作家。在簽名的 42 位知名人士當中, 教授、研究員 38 人, 副教授和副研究員 4 人; 學部委員 9 人, 全國人大代表 3 人, 全國政協委員 5 人。《美國之音》記者隨後走訪了主要發起人許良英教授, 下面請聽採訪談話的部分內容:

記者: “在寫給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信件中, 為什麼強調民主? ”

許良英: “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都要改革, 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民主是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 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更民主, 現在比他們更不民主, 而且人家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 我們說它是資產階級的加以否定, 自己搞的一套東西, 造成災難。社會主義國家今後要改革, 根本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政治改革搞不好, 不搞政治民主化, 經濟改革必定失敗。一個不受人民監督的政府必然腐敗, 這是歷史的規律。”

接著許良英教授談到了中國報刊雜誌上活躍的新權威主義思潮:

“今年是‘五四’運動 70 周年, 法國大革命的 200 周年, 我們到處呼籲要很好地紀念‘五四’和紀念法國大革命, 應該

開展一個民主思想啟蒙運動，這是我們在幾次會議和寫文章，學術界都已形成共識。但當我們對‘五四’運動還沒有開始紀念的時候，報刊上出現一系列文章宣揚新權威主義，宣傳‘專制’，什麼‘精英統治’、‘強人政治’、‘開明專政’，把亞洲‘四小龍’作例子，認為專制也可以把經濟搞上去，這個我們堅決反對。這使我們想起歷史上，‘五四’運動之前，有個袁世凱，想做皇帝，他們搞了一批御用文人，叫做‘籌安會’。它的目的是說中國人民思想差，不能搞民主，一搞民主就會亂，那麼就需要安定，要安定就需要皇帝，有了皇帝就會安定。新權威主義與他們的論調完全一樣，他們這個論調是七十六年前“籌安會”的借屍還魂。”

記者：“那麼，在那封信裡，為什麼要強調政治體制改革？”

許良英：“社會主義沒有民主的話，必然要變成希特勒那樣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緬甸宣佈解散的叫做“社會主義綱領黨”，他們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中國造成幾次大災難，“反右”運動中，有五十五萬人，占知識份子的10%，被打成“右派”，我也是其中一個。“大躍進”，搞什麼“大煉鋼鐵”，放“衛星”，畝產可以到幾萬斤、十幾萬斤，結果造成餓死人二千萬，“文化大革命”更不必說。所以這樣，就是因為沒有民主。這個問題，1981 年中央在“決議”上已寫明，說中國建國以後，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應該把民主建設作為一個重要任務，結果我們沒有搞，所以造成“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三叔於 1989 年 3 月 23 日，給我來信，說：

“剛才鄒達祥一位朋友杜二嘉送來你們 3.9 信，想不到你們聽到當天‘美國之音’後竟會如此緊張，連寫信也要別人轉。你們是對形勢估計不足，現在已是 80 年代，不是 50 或 70 年代了！我於 3.6 和 3.11 曾寄你兩信，收到沒有？

我和方勵之一切如常，你們不必擔憂。

我們這封信簽名的大多是知名科學家（這是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誰也不敢對我們施加壓力。簽名者沒有人被找去談話，上面規定不准下面領導人找我們談。僅有的一次是 3.18 下午閻明複（書記處書記兼統戰部長）請我、雅風和來棣去談了三個半小時（另有東明、李晨作陪），並請我們看成鋼等 5 人訪台的錄影和吃飯。我見面就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怎麼成了統戰對象？’他說是請老朋友（10 年前我認識他）來，為的是聽取意見。下午 4：00 到統戰部，直到晚上 8：30 才離開。你們看，有什麼可緊張的？

這封信是 1 月中旬開始醞釀的，春節前就已簽了不少名，因我病情反復了幾次，擱下了。42 人中浙大校友 13 人（11 個同學，2 個當時的教授），浙大地下黨員 8 人，這可說是浙大的光榮。

為了這封信，的確是費了不少精力和時間；發出後，來訪的記者絡繹不絕，正常工作很受影響，沒有時間寫信。”

1989 年 4 月 1 日，香港《百姓》半月刊刊載一篇“北京專訪”：《訪許良英談聯名信及與中共的分歧》（記者：張結鳳）。全文如下：

閻明複請許良英吃飯

中共中央統戰部向寫聯名信的知識份子伸出手來了。

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許良英與他的老同學施雅風所發起的聯名信，提出了包括釋放政治犯在內的四項建議，由於簽名的四十二位人士都是著名學者，半數以上是中共黨員，亦有三名人大代表和五名政協委員，如此份量令當局不得不予重視。

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複約晤許良英夫婦和施雅風，表示要‘交朋友，聽意見’。

許良英接受本刊專訪時說，閻明複對他們這封信是基本肯定的。閻明複表示：這封信沒有問題，信裡講的都合情合理，有些問題中央是要考慮的；不會很困難，也不會不理，閻明複還說到，這封信發表以後，假如聯名者有誰受到壓力的話，馬上向他反映。

許良英認為：這表明了當局不會對四十二人施加壓力。可見這在國內第二封有關政治犯問題的聯名信，對當局觸動很大，而且信內沒有一句話是當局能夠反駁的。

這封信於二月二十八日發出致各中央領導人和機構，十多天后便由統戰部長出面處理，即使當局未必接受信內建議，也算是有點影響了。

為什麼不可以向外發佈？

當晚的談話，許良英談到了與中央的兩點分歧，第一點是有關聯名信的處理方式。

閻明複說：聯名信是公民的權利，可是捅到國外去，被人利用，在國外引起強烈反應，就很不好了。

許良英則反駁：這封信不僅向中央反映意見，也要公佈使全國人民知道，而且信不是馬上向外發，隔了一個星期，讓領導人有時間來考慮。二月底寄給中央，至三月六日才發佈消

息。期間有人要求索閱也不給，一直到三月六日，也不是開記者會，只是有記者問就給了。過程光明磊落，動機無可非議，為什麼不可以公開呢？假如國內報紙要登的那當然好，你卻不登，那麼國外報紙要我就給他了。因為簽名的過程很長，很多人知道這事，老早就有外國人來問。

許良英當時還對閻明複說：你們中央領導人經常把一些新消息向國外捅，出口轉內銷，你們都可以這樣做，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美國之音’發表這封信，我感到沒有歪曲，沒有惡意利用。本來大家不知道這封信，一廣播大家都知道，這是好事情嘛！

對於官方輿論指責聯名信向中央施壓力的說法，許良英亦對閻明複作了說明。許說：信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中央應該接受，假如中央接受了，就不會感到壓力了。你們覺得受到壓力是你們的事，不是我們的事，我們從來沒想到要施加壓力。

請統戰部與方勵之交朋友

第二點分歧是許良英主動提出的，許良英替方勵之辯護。官方認為方勵之是不可接受的人，許良英則認為：方是中國最優秀的科學家，有學問、有膽識，而且憂國憂民，在沒有出黨之前，一直在學校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好黨員要開除出黨，我忿忿不平！

三月初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到中央黨校作報告，說方勵之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其實方勵之早已澄清，他反對的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他反對的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

許良英向閻明複表示：你們不瞭解方勵之，像他這樣優秀的人，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呢？你們應該研究一下，與方勵之交朋友。

閻明複不愧是搞統戰工作的，對許良英此尖銳建議，只答以‘研究研究’。

統戰部為了聯名信的事約晤許、施等發起人，因此他們也就寫信的動機作了說明，更進一步提出意見。當時他們起草這封信的時候，主要是因為對社會風氣很感憂慮，認為發展民主是當前的迫切問題，去年的連串事例，給人的感覺是民主倒退了。以選舉為例，文代會、民主黨派、婦聯等都取消了差額選舉，回復等額舊制。正在冒起的‘新權威主義’思潮，他倆認為是另一種專制的表現。

許良英指出，倡議‘新權威主義’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吳稼祥；不能以一般學術思想等閒視之。他對閻明複說：中國要搞專制，是非常危險的事，你們要清醒，不能接受這樣想法。閻明複連忙澄清：中央並沒有討論過‘新權威主義’；這不是中央的意思。

肯定大陸有政治犯

對於官方否定有‘政治犯’，許良英認為這是掩耳盜鈴的說法，據他所清楚瞭解的也有好幾個。他當晚曾向閻明複提了一個較少為外間知悉的例子：他的一位年輕朋友徐水良，因為辦民刊，八一年被捕，沒有審訊就判十年。當時徐的妻子正懷孕，而徐被捕與受審的過程她全不知道，一切秘密進行。徐水良曾在刊物上寫道：審判四人幫、林彪反革命集團，應該審判他們的後臺。判決書中就以這一句話而指其意圖推翻共產黨。許良英非常清楚此案原委，因此他很肯定地說這是‘政治犯’。

閻明複的答復其實頗能代表中央的態度，他說：冤、假、錯案是有的，可以個別處理，用不著為此發動簽名嘛！閻並答

應將徐水良的資料送給司法部門處理。

不管閻明複是懷柔或敷衍，他對四十二人聯名信的態度尚算是平和的。許良英感到，當局目前不會對這四十二人施壓力。他說，最初三十三人受到很大壓力，很多人被找去談話。不過，當四十二人聯名信出來之後態度改觀了。沒有人被找去談話。

許良英舉出他個人經歷的例子：聯名信公開後，自然科學史所的黨委書記想瞭解情況，但又不敢找許，找了一位副研究員來問。副研究員沒有簽名，不清楚情況，請書記直接去問許良英，書記還是不敢。後來副研究員與許良英說起這件事，許良英詳細向他介紹了，於是他便可以去‘彙報’了。後來黨委書記打電話給許，約時間見面，一直沒約好。書記在電話中說：聯名信沒有問題，但為什麼卻要捅到國外去呢？

繼承知識份子不怕死精神

當然，許良英在發起這封信的時候，並沒有信心一定不出問題。政治氣候風雲變幻，誰能有信心作出準確判斷？他只是基於一種信念：知識份子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敢於承擔風險；若什麼都怕，國家還有什麼希望？

許良英解釋他這種不怕死的精神，其來有自。他指出：聯名信中十三人是浙江大學的師友，十一人是他的同學，兩人是教授，原核工業部副部長王淦昌便是他的老師。

浙江大學的民主傳統是怎樣的呢？從一九四二至四八年，每個學期浙大都有學生、教師被國民黨抓起來，當時的校長竺可楨，非常關心學生，每個學生被捕，他都去監獄看望，並盡力營救。一九四七年，一位名叫于子三的學生被捕，三天之後便死於獄中，官方說他是畏罪自殺，但竺可楨卻公開吶

喊：這是千古奇冤！

因為于子三被害一事，惹起了全國十五個城市鬧起學潮，形成‘于子三運動’，為當年全國三大學潮之一。

許良英於四二年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四七年之際，任中共（地下黨）浙大支部書記，過去這種官方與知識份子之間的鎮壓與反鎮壓，他都一一目睹。

到了今天，社會腐敗成風，‘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民主倒退，種種漏弊能不令關心國家民族者痛心。許良英感慨，在解放前還有這樣正直敢言的校長竺可楨，為什麼到今年竟然沒有人出來講話？他感到很難過。他認為自從反右以後，歷次政治運動將人搞得怕了，變得噤若寒蟬、明哲保身，可是知識份子的良心哪里去了呢？為此，向中央寫信的構想形成了，而一找當年浙大的同學，大家都毫無猶疑地簽。

從種種跡象看來，四十二人聯名信有一定的影響力，可是，它還沒有形成‘壓力’，要中央馬上接受，並不樂觀，它的作用，只能是長遠的。”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9 年 4 月號，刊載對三叔的訪談，題為《四十二人公開信發起人許良英：科學家聯名發表政見史無前例》（記者：施華）。全文如下：

三月十六日長途電話訪問

問：請問許教授，您發起這封簽名信，是在三十三人公開信之前還是之後？

答：我們早得多，我們是在一月中旬就開始搞了。我有個老同學，叫施雅風，他原來是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所長，近年到了南京。一月中旬到北京來開會，我們是大學同班畢業，他

是地下黨員，我也是地下黨員，我們很要好。他來了，我們談國家大事，大家對國家的情況很憂慮。黨風搞得這麼壞，想起我們年輕時搞革命，革到現在變成這樣子，叫人很難過。我們就想，寫封信給中央，算是提幾個建議吧。當時我們還找了幾個我們浙江大學的老同學，也是地下黨員，一起商量。信是我起草的，分頭找人簽名。

共產黨員占一半以上

問：據說簽名的有一半是黨員，是嗎？

答：一半以上。有十三個是我們浙大的，大都是我的同學，還有我的老師王淦昌，另一個是浙大的教授嚴仁賡，是浙大的教務長。浙大占了十三個，我們覺得很光榮。

問：這些人現在大部分在北京嗎？

答：大部分在北京，而且大部分是黨員。

問：現在簽名的有四十二人，有沒有您找過而拒絕簽名的科學家？

答：我是逐個跟人談的，每一個人都談一兩個小時。絕大多數我找的人都是同意的，覺得這時候提這些建議很重要。不同意簽這封信的只有四、五個人。

問：談了一兩個小時還不同意，原因是什麼呢？

答：有的人是驚弓之鳥，怕簽了這封信對個人不利，或者家裡人不同意。有的人是對當前局勢很失望，覺得寫這樣的信沒有用。

問：其實許教授您覺得有沒有用呢？

答：我覺得應該有用。

問：有些意見已經講過很多了，比如教育經費的問題，中央不是不知道，但是當牽涉到錢怎麼用的時候……。

反對‘以言治罪’

答：我們只是反映情況嚴重，如一級教授現在也要申請困難補助，還有人自殺，這是太嚴重了。重要的是要民主，因為自從今年一月起，報上連篇地、大量宣傳‘新權威主義’，公開說要搞專制。我們很惱火。今年是‘五四’七十周年，法國大革命 200 周年，我們認為應掀起一個新的民主啟蒙運動。結果，我們底下的還沒開始推動民主，報上就連篇地宣傳‘新權威主義’要搞專制。這樣子很危險。我們希望中央領導人冷靜一點，不要聽這幫人胡說八道。聽他們胡說八道會把中國引向災難，我們不允許。這是我們寫這封信的根本原因。

問：你們第三點提出來的‘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青年，這算不算是‘三十三人公開信’所說的政治犯呢？

答：是政治犯。‘三十三人公開信’提出這問題以後，有人認為‘政治犯’的說法，在中國不太確切。比如說，江青也是政治犯，那就麻煩了。因此，我們想把事情講得更清楚、更根本一些。所以我們用‘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的說法，就是指不要搞文字獄。大赦可以解決過去的問題，但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根本的問題就是不能搞文字獄。

問：最近人大、政協要召開，國內的報章及領導人談話，都強調要穩定，意思似乎是搞民主，搞簽名信，就會妨礙了改革、開放所需要的穩定的環境，許教授對這有什麼看法？

答：我的看法剛剛相反。我覺得要穩定，要安定團結，唯一的保證就是民主。不民主不可能穩定。不民主，搞專制，一定造成人心不穩。什麼經濟問題，什麼官倒、腐敗問題，都使人心渙散。在這種情形下，用專制，用強制的辦法，對不同意見加以鎮壓，必然引起大亂。只有允許大家發言，政府有什麼

方針、辦法，也告訴大家。如果大家同意政府的方針、辦法，任何困難、風險，大家都能承擔，安定團結才能做到。從世界歷史上看也是這樣，民主國家就能安定，不民主國家是沒有安定的。這是我研究歷史多年來得到的結論。

問：您提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不是就指人權呢?

答：就是人權。

是不是壓力，不在於我們

問：中國官方的講法是，用公開信、簽名信的辦法，就是向政府施加壓力。

答：我們寫這封信，是‘本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以赤誠的愛國心’提出建議，希望過去一些不好的事情改正，以後不要再做。出發點完全是愛護國家，黨員更處於愛護黨。這些意見，如果領導人能夠聽得進去，能夠接受，那就根本不存在壓力問題。倘若他們認為他們的觀點和我們差得很遠，不能接受，那麼他可能覺得這是壓力。從我們這邊來看，我們的目的是希望他們接受，不是要施加壓力。所以是不是壓力，問題不在我們這邊，而是在於領導人聽不聽得進去。我們有許多老科學家過去是不問政治的，他們聽了我講的情況，知道有些年輕人因為思想問題而定罪，有的人聽了就流眼淚，他們覺得我們應該為青年人說話。如果領導人聽了這些建議，把思想犯放了，事情就很簡單了，有什麼壓力呢? 但不肯放，那就覺得有壓力了。所以是不是壓力，不在我們這邊。

問：你覺得這次你們搞的公開信，會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呢?

答：我估計不會。現在情況不同了，不像五十年代、不像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了。整個政策的開放改革，加上世界潮流、

人心所向。我想大概不會。

問：但是穿點小鞋，比如說不準出國啦之類呢？

答：這有可能。但我是有思想準備的。我年輕時，參加地下黨，為了國家民族，為了民主，根本不考慮個人利害得失。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當了二十年農民。我這一生，像毛澤東講的‘五不怕’我都經歷過了，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覺得在這時候，不表示我們的意見，是對不起我們的國家，對不起我們的人民，對不起我們的青年。

信已在政協常委會提出

問：現在，像您這樣，有這種感情的人，多不多呢？

答：多不是很多，至少在我的過去的老同志中間，這樣的人還是有。其中有一個我們的老同志，七十九歲了，當談起有這麼一個青年，因為寫了文章坐了十年牢，他就很難過。叫他簽名，他說，好，你叫我簽名，我覺得很光榮。這是五十多年黨齡的黨員了。

問：是哪一位呢？

答：孫克定。他原來是新四軍的，南京解放時他以新四軍的身份接管中央研究院。原來地位相當高的。這個人，非常樸實、正直。

問：四十二人裡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吧，您估計他們會不會在人大、政協提這些問題呢？

答：有三個人大代表，五個政協委員。其中一個政協常委，在三天前的政協常委會上，他已經把我們信的內容講了。他說會上反映不錯，有好多人的意見同我們差不多。

問：是誰呢？

答：叫蔣麗金，七十歲了。

問：其他社會上的反應呢?

答: 有人說, 中國這麼多科學家, 一起在政治上發表意見, 在歷史上沒有發生過。四九年以後沒有過, 四九年以前也沒有過。因為科學家一般都是不大管政治的。

要為青年人說話

問：對建議的第三條, 即因思想、言論、文字而判罪的問題, 是不是跟科學家的關係比較小?

答: 很特別的是, 絕大多數簽名的人, 都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三條, 覺得要為青年人說話, 要保護青年人。

問：蔣麗金在政協常委會提出來, 有沒有人反對呢?

答: 沒有聽說。前天碰到她, 她說提出來以後, 反應蠻好嘛。

問：所以你不覺得沒有用?

答: 據我瞭解, 領導上已經在認真地考慮這些問題了。至於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這些建議, 就還不知道。到現在為止, 沒有聽說他們認為我們這封信有什麼不好。

問：但官方不是說不同意用公開信的方式嗎?

答: 我們沒有說這是公開信, 但也不保密。我們是寫給領導人的, 上月廿八號寄出, 過了一個時期就向外宣佈。宣佈時不開記者招待會, 不主動發, 人家跟我們要, 就給他。我們希望, 一方面讓領導人知道, 另一方面也讓社會知道。我們希望中國有一次民主啟蒙運動, 讓人民知道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此這封信若能在社會發生影響, 也是重要的。

問：國內的報刊會不會發表這封信呢?

答: 大概不會。這個情況我知道, 不會。

問：聽說您在寫一本《民主論》是嗎?

答：我跟我愛人王來棣在寫，不過這書名已經被人家搶先了，有兩個人在用了，所以書名大概要改一下，改為《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已寫了七、八萬字，要寫出來得明年了。

問：您的身體好嗎？

答：身體不太好，所以簽名信的事也搞得拖拖拉拉，搞了兩個月。當然，三十三人的信比較簡單，同意就簽就是了。我這個是一個一個地找人談，每一個人都得談一兩個小時。

問：當局對你們的信是不是與三十三人的信有區別呢？

答：可能對我們的信，反應好一些，因為我們這些簽名的科學家，大部分都是工作很好的，都是很有成就的科學家，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就有九個。文藝界老是有許多意見，當局可能惱火一點，科學界可從來沒有發表過這樣的意見，所以領導人可能會認真考慮一下。”

這封公開信發表於 2 月 26 日，自然也影響了北京的大學生。一個半月後，由於悼念胡耀邦引發的歷時近兩個月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當局無視舉世公認的人權和人道準則，不顧國際輿論，悍然動用軍隊和坦克，殘殺和平表達反腐敗，爭民主訴求的學生和市民；並無中生有地誣衊方勵之夫婦是操縱這次運動的“黑手”，他們不得不進美國大使館避難，後遭通緝，被迫流亡海外。

在這次運動中，三叔也被指控為僅次於方勵之的“黑手”，當時官方報刊稱他是方勵之的“密友”。

***附：《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

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思想解放為先導，以開放、改革為基本國策的我國現代化事業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儘管中間出現一些曲折和失誤，但總的發展方向還是順應民心和世界歷史潮流的，這個十年確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進中遭到嚴重的障礙：腐敗成風，‘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教育、文化事業面臨嚴重危機。繼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為此憂心忡忡。為了使現代化事業不致夭折，我們這些長期戰鬥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線上的老年和中年知識份子，本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以赤誠的愛國心，懇切地向你們提出如下建議：

（一）在堅持開放、改革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因為世界歷史經驗和中國現實告訴我們，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經濟改革和整個現代化事業的必要保證。只有實現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難以避免的困難，全國人民會樂意共同承擔；通過群策群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而且，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只有實現民主，在廣大人民的監督和有效輿論的監督下，‘為政清廉’才有可能實現。反之，不受人民監督的政府，就無法杜絕腐敗現象。這一歷史必然規律，早已為人所共知。

（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條件，是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只要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各種不同意見都可以公開發表，對任何領導人的批評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全國就會出現一個活躍、舒暢、和諧的局面，公民的民主意識就可以充分

發揚，這是安定團結唯一可靠的保證，改革由此可以順利前進。

（三）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將為我國政治史開創一個新紀元。

（四）對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卻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應予以必要支持。盡可能增加教育經費和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識份子（包括老、中、青和已離、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目前已有若干 50 年代的一級教授申請困難補助，最近又有 78 歲二級高級工程師因生活困難而跳樓自殺身亡。這顯然不利於現代化事業，也有損國家形象。

以上建議如蒙採納，將是國家民族之大幸，70 年前‘五四’運動先驅者所宣導的民主和科學得以在中華大地上真正發揚光大，也將為建國 40 周年創造喜慶的氣氛。

此致

敬禮

錢臨照　王淦昌　施雅風　許良英　過興先　薛禹穀
葉篤正　黃宗甄　胡世華　朱兆祥　周明鎮　許國志
蔣麗金　孫克定　汪　容　劉源張　茅于軾　胡濟民
嚴仁賡　張宣三　杜汝揆　于浩成　張顯揚　李洪林
包遵信　劉盛際　邵燕祥　吳祖光　王來棣　顧知微
戈　革　劉　遼　張昭慶　梁曉光　張崇華　厚美瑛
吳國楨　蔡詩東　曹俊喜　蕭淑熙　周禮全　梁志學

1989 年 2 月 26 日

簽名者:

錢照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王淦昌(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施雅風(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所、南京地理與湖泊所研究員、學部委員)

許良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過興先(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研究員)

薛禹穀(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研究員)

葉篤正(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學部委員、全國人大代表)

黃宗甄（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編審）

胡世華（中國科學院軟體所研究員、學部委員）

朱兆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

周明鎮（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學部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許國志（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蔣麗金（中國科學院感光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學部委員、全國政協常委）

孫克定（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汪　容（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

劉源張（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全國人大代表）

茅於軾（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胡濟民（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教授、學部委員）

嚴仁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張宣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杜汝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于浩成（中國法制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張顯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

李洪林（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劉盛際（北京外國語學院社會科學部教授）

邵燕祥（作家）

吳祖光（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王來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

顧知微（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地學部學部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戈　革（石油大學北京研究生部教授）

劉　遼（北師大物理系教授）

張昭慶（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梁曉光（中國科學院感光化學所研究員）

張崇華（國家環境保護局科技司司長）

厚美瑛（中科院物理所副研究員）

吳國楨（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全國人大臺灣省代表）

蔡詩東（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

曹俊喜（中國人民大學外國經濟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蕭淑熙（中國科學院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

周禮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梁志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附]　許良英關於 42 人聯名信中的兩點說明

1、關於第三點“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

治罪的”，我直接瞭解的有南京制藥廠的徐水良。他系浙江大學化工系 1968 年畢業，“文革”初曾任浙大“革委會”常委。1975 年秋，他在南京新街口張貼了批判張春橋、姚文元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兩篇文章的大字報，即被捕。“四人幫”覆滅後，他依然被關押，經我和他的親友多方呼籲、營救後，直至 1979 年才出獄。1981 年中央 9 號文件（取締“非法刊物”）後，他又在南京被捕，未經公開審判，也不讓家屬見面，被判處十年徒刑，理由是他編了一期油印刊物《學習》，撰文指出林彪、“四人幫”的後臺應負責任。他不服，一再上訴，未果。1986 年初，他妻子寫信告訴我：他心臟病嚴重，患高血壓，而獄中醫療條件差，勞動又重，非常悲觀，覺得可能死在獄中。我為此感到非常難過，立即寫了一份保釋他監外就醫的保證書，說明他服刑已近五年，保釋後如發生任何問題，我願負全部責任，因為他 1979 年第一次出獄後到北京，我曾同他深談過多次，認為他是一個熱情、愛國、有為的青年。保證書通過中組部寄出，如石沉大海。他家庭經濟很困難，下有小孩，上有老母，我經常寄些錢和書去，希望他在獄中多讀些馬列原著和世界歷史、現狀的書。

“文革”後發生的類似案件，據我瞭解的還有：

（1）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王申酉，因寫了長篇批評毛主席錯誤的文稿，1977 年被判處死刑，當年已被處決。這是張志新第二，報刊上卻未報導過。華東師大黨委早已整理出有關他事蹟的大量材料，但始終未能發表。

（2）魏京生，1979 年在北京被捕，判刑 15 年。

（3）任畹町，1979 年在北京被捕，勞教四年。因組織“人權同盟”。

（4）徐文立，《五四論壇》主編，1981 年在北京被捕，判

刑 15 年。

（5）劉青，《五四論壇》副主編，1981 年被捕，原判勞教 3 年，後改判徒刑 5 年。

（6）劉念春，劉青的兄弟，《五四論壇》成員，判三、四年。

（7）趙南，《探索》主編（繼魏京生之後），勞教三年。

（8）楊靖，《五四論壇》成員，判刑八年。

（9）陳爾晉，雲南人，《五四論壇》成員，判刑八年。

（10）王希哲，1974 年著名的“廣州大字報”（提出林彪集團是“封建法西斯體系”）的三位作者之一，1985 年在廣州被捕，判刑 15 年。

（11）陳旅，參加任畹町組織的“人權同盟”，勞教三年。

（12）薛明德，業餘現代派畫家，重慶人，勞教四年，後又在勞改營就業 2 年。

（13）張曉輝，北大歷史系一年級學生，1986 年在北京被捕，判刑三年。

（14）陳波，寧波建新工業公司職工，1987 年 10 月在寧波被捕，判刑六年。

（15）楊孟達，中國人民銀行寧波分行職工，1987 年 10 月在寧波被捕，勞教 2 年。

2、關於第四點：

五十年代的一級教授（工資 350 元，目前的一級教授已降為 255 元）申請困難補助的，據我們瞭解有：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高濟宇和戴安邦，中國科學院前化學所所長柳大綱，他們三人都是學部委員，都已八十多歲。此外還有杭州大學生物系教授董聿茂。

跳樓自殺的高級工程師是輕工業部設計院的著名土建工

程師華國英，今年 78 歲，曾留美，是五十年代的一級工程師（信中誤為二級），曾任第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去年退休，今年 1 月 25 日從四層樓上跳下自殺身亡。

許良英

1989 年 3 月 10 日

23、“八九”腥風血雨

1989 年，風起雲湧、席捲全國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和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都應該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寫上濃重的一筆。正如三叔在《‘89’十年感言》一文中所說的“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 1989 年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以其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結局震撼了世界，導致東歐、蘇聯極權主義政治的全面崩潰，結束了持續 40 年的冷戰，改寫了 20 世紀的世界史 ，也必將改寫中國歷史。”

1989 年 8 月，大地出版社出版了《驚心動魄的 56 天——1989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9 日每日紀實》，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

書中三次點了三叔的“名”。抄摘如下：

“3 月 8 日，北京大學等校貼出許良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勵之密友）等 42 人《致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的公開信》。《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

的青年。’”

“4 月 28 日，上海市委作出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正確決定，引起知識界一些人的強烈不滿。嚴家其、包遵信、蘇紹智、許良英、張顯揚、吳祖光、于浩成、李南友、戴晴、蘇小康等 30 餘人，散發了題為《捍衛新聞自由——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

“5 月 23 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參加者有嚴家其、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許良英等人。決定創刊發行《新聞快訊》。當晚，該會號召入會的知識份子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靜坐示威。”

據三叔後來告訴我，《捍衛新聞自由——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是他建議嚴家其起草的。另外，5 月 23 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成立的會議，三叔並未參加，但事先他同意作為發起人之一。

書中記載：“5 月 10 日，晚上，中國人民大學工會青年部在校內舉行報告會，戴晴、包遵信等在會上發表煽動性的演講。”

事實上，那天晚上，三叔也應邀參加人大青年教師主辦的“五四”70 周年紀念會，並在會上講了話。但書中並未點他的“名”。

三叔在講話中指出，學生的基本任務是學習，不可長期罷課，希望各校立即復課；並且嚴肅指出，學生運動應保持自己的純潔性，不要讓校外人插手，因為民主運動很複雜，什麼人都會進來，有人會利用學生為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火中取栗，

使學生成為個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三叔於 5 月 16 日給我來信，其中一段這樣寫道：

“說我回臨海避風的謠言實在太可笑了。當然，有些人確視我為眼中釘。5.10 晚，人民大學‘青年教師聯合會’舉辦‘五四與當代中國’報告會，請了七八個人，每個人只講 20 分鐘，我最後發言，講得稍長一點。想不到一兩天后內部通報就講了這件事。可見這些人是夠神經過敏的。我那晚講話是建議學生立即復課 ，要保持學生的純潔性。”

兩天后，即 5 月 12 日，三叔的好友，北京師範大學物理教授劉遼告訴他，北師大的學生準備絕食。同一天，王丹一個要好的同學也告訴他，北大也在醞釀絕食（要求當局收回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三叔深感不安，估計後果十分嚴重，於是，請這位同學轉告王丹，不要搞絕食，但他們已聽不進去，根本無濟於事。

八九民運期間，三叔心臟病嚴重發作，活動很少，但始終關心運動的進展，希望運動能夠健康地、合乎理性地發展。避免節外生枝，在必要時向大家提些建議。

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第六天，即 5 月 18 日晚，三叔應邀參加了作家李陀和文學評論家蘇煒發起的知識界聲援學生的會。那天絕食已進入第六天，已有兩千多學生暈倒，送醫院搶救，情況十分危險，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參加這樣的會，李淑嫻也與他同去，而方勵之認為三叔的意見也可以代表他的意見。會上三叔第一個發言，講得很激動，他強調，這次民主運動已取得空前的偉大勝利，其規模在世界歷史上也無先例；它大大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民主意識。但也要看到，中國的民主

化是一個漫長過程，一時不可要求過高，應考慮可行性問題。與運動所取得的成績相比，政府是否公開承認錯誤已成為次要的小事，而且在中國歷史上，要政府認錯，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為此繼續絕食，準備犧牲自己的性命，完全不值得，相反，青年朋友應保重身體，以迎接新的戰鬥。因此，我們必須緊急呼籲學生停止絕食，並撤離廣場回學校，準備以新的形式繼續推進民主進程。

會上討論很激烈，多數人同意他的意見，最後表決，二十幾人同意勸說學生立即停止絕食，反對的僅有三、四人。會上決定成立“知識界救援團”，任務是勸說學生停止絕食，並發起募捐，提供物質援助。這次會議整個氣氛是健康的。

可是，誰也想不到，當時當局已經決定對北京實行戒嚴，並從全國調集幾十萬軍隊兼程趕來北京，學生們將要面對的已是鐵和血。

《人民公安》雜誌 1989 年 11 期，刊載公安部副部長顧林昉在中宣部等五個單位聯合組織的形勢報告會上的發言，題為《從動亂和暴亂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鬥爭》，文中三次“點”了三叔的“名”，其中提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三叔名列首位。

現選錄其中一段：

“……，三是蠱惑和煽動高校的青年學生，挑起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去年方勵之、李淑嫻等人鼓動原北大研究生劉剛和在校生王丹在北京大學搞了個‘民主沙龍’，一年來先後活動了 23 次。他們既請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夫婦演講，又請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進行鼓吹資本主義，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演講，還請西方和港、台記者採訪、錄音、錄影。劉剛原

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1987 年 7 月畢業，到浙江寧波一個公司工作，同年年底辭職，表示要當‘職業革命者’。劉剛在北大共搞了五次‘民主沙龍’活動。因為他不是北大的在校生，去年 6 月被北大校方趕走。王丹認為這種活動不能斷，要接著搞，他們先後請方勵之講了‘北大的傳統與現在的任務’，請吳祖光講了‘知識份子的問題’；請許良英講了‘談民主思想啟蒙’；邵燕祥講了‘黨的腐朽與民主自由’；請戴晴講了‘中國知識份子命運’、‘抨擊中共高層人士和中國現行社會制度’；任畹町講了‘西單民主牆’和‘魏京生問題’；李淑嫻講了‘教育危機’和‘聽取選民意見’；包遵信講了‘學潮的歷史功績’等。這期間王丹等人還寫了‘專制必將滅亡’、‘自由必將來臨’。通過這些活動，他們把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的鬧事情緒煽動了起來，用包遵信的話來說，是起了‘火種’的作用。

在‘民主沙龍’活動的基礎上，王丹等人籌辦了《新五四》刊物，聘請了 30 名‘顧問’，都是李淑嫻介紹的，大部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包括許良英、方勵之、李淑嫻、于浩成等人。”

當年，當權者稱“六四”為“暴亂”，後來改為“風波”，再後又稱為“事件”。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不讓人們談論，要使人們逐漸遺忘，“六四”似乎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漸行漸遠了。

可是，有這樣一位“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還是中學生的 17 歲兒子蔣捷連在“六四”中彈身亡。不久後，丁子霖女士就擦幹眼淚，開始了對遇難者家屬及傷殘者進行尋訪工作。她把受難者的名字、年

齡、職業、遇難經過，一個一個地記錄下來，讓世人從這些具體的活生生的事例，去瞭解“六四”歷史的真相。

1994 年 10 月，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了《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一書。到 1994 年 8 月止，她尋訪了 100 多家，其中死難者家屬共 96 家，致殘者則有 49 人。

丁子霖女士，在她的“紮好傷口，擦幹淚痕，尋訪受難者親屬——《‘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序言”中這樣寫道：

“這裡我要特別感謝許良英先生、魏京生先生和在國內的其他朋友們。他們的關心和幫助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在我們的尋訪工作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甚至於進行不下去的時候，是許先生率先給與我們精神上、道義上的支持。”

2007 年 1 月，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了《趙紫陽軟禁中談話》一書，記述者：宗鳳鳴。

李銳在本書“序言”中寫道：

“1989 年，耀邦去世，學潮驟起。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丟棄權位，並失去自由，遭受漫長的軟禁，一直到去世。

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後者是這個黨的‘大腦’。

這兩任總書記都積極推進改革事業，並且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並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引發了歷史悲劇。”

趙紫陽於 1989 年 5 月下旬開始被軟禁，直到 2005 年 1 月

17 日逝世，被剝奪了一個公民和黨員應有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他的一位同鄉和摯友宗鳳鳴（曾任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黨委書記），以“氣功師”的名義，從 1991 年起，至 2004 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兩位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殘酷鬥爭的老戰友，在北京富強胡同趙紫陽的家中，解除心障，探討真理。每次談話由宗鳳鳴記錄整理。

《趙紫陽軟禁中談話》在香港出版，三叔收到此書後，即複印全書，寄我一冊，使我有幸及時地讀到如此珍貴、重要的史料，瞭解到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

當權者把這一次運動定性為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暴亂”，居然動用幾十萬大軍，用機槍、坦克予以鎮壓，並且認為有幕後指揮，要抓“黑手”。他們認定方勵之就是“黑手”。三叔被指控為僅次於方勵之的八九民運的“黑手”，當時官方報刊稱他是方勵之的“密友”。

“六四”血案後，方勵之夫婦首先被通緝，他一家人不得不逃進美國大使館避難。接著 21 名學生也被通緝，這樣大規模的公開通緝政治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年來還屬首次，在歷史上也不多見。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名列第一號人物，為首的，竟然是一個年僅 20 歲的大學生！

“六四”後的幾天，我侄兒許江甯從張家渡特地趕來，神色慌張地告訴我：“張家渡到處在傳說，三叔公已潛逃回來，有人在‘大門頭’（汽車在此過渡，當時永安溪大橋還沒有建造）看到他。” 為此，我日夜坐立不安，有時夜不能眠，擔心著三叔的處境與安危。

又從我妹許妥央家——愛國鄉山頭何村，傳來消息，她被鄉幹部叫去查問。與此同時，我小姐許三央，她嫁在杜橋海邊的一個小村，有幹部來向她交待：如有外地來人，先要向他們

報告。

我大姐許未央，在仙居縣教育局工作，當地公安局曾派人到她家調查，一開口就問：“你家裡最近有沒有來過客人？”大姐說：“沒有。”來人神氣十足地說：“還說沒有？前天晚上，有人看見有一老一小倆人來到你家，你要老實交待！”大姐堅定地說：“沒有就是沒有，怎麼可以亂講呢！”

市公安局也曾派人來到我校，調查我的情況。我擔心，可能會來我的住處“抄家”，就把與三叔有關的信件和材料轉移到另外地方藏起來。

不久，又傳來消息，有人看到三叔的名字已列在“內部通緝”的名單上；又有謠傳說，他已潛逃到海外去了。

當時我想：像三叔這樣甯折不彎的“硬骨頭”，面對殘酷的鎮壓，絕對不會“逃跑”的。二年前，他在給我的信上明確地表示：“國運、民心是大事，個人遭遇算得了什麼？真正要改革，要實現現代化，沒有譚嗣同這樣的志士，是不可能成功的。”三叔早已下決心，要做像譚嗣同這樣的志士，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怎麼會臨陣“逃跑”呢？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確實有人勸三叔離開北京，暫時到外地躲避一下，但他沒有同意。他當時已 69 歲了，身體又虛弱，他說：“如果被捕，我將死在獄中。”

8 月，大姐未央所在的單位派她到北京參加一個學習班。她到北京後，不敢打電話給三叔，怕他已被通緝，或已到了海外。到京後的第三天，她壯著膽子，拿起電話筒試探，接電話的是三嬸。她說，“三叔正在洗澡，等一會再打過來。”這時，大姐才松了一口氣，幾個月來一直懸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下地。第二天，她就去看望三叔。

大姐從北京回來後，告訴我三叔目前的情況，他安然無

恙，一切都好，我們都感到無比欣慰。

2006 年 6 月，“六四”17 周年之際，香港《開放》雜誌發表了題為《許良英慨評八九民運——訪中國著名學者許良英先生》的訪談（記者：李衛平）。

全文如下：

題記: “中國自然科學史學者許良英先生在‘六四’周年之際，回顧並高度肯定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也嚴厲批評學生絕食不撤離廣場等錯誤。認為應該汲取教訓，認識中國民主之路的艱難，應有韌性和遠見。”

“許良英先生是抗日戰爭期間參加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一九四七年先後任中共浙江大學支部書記、杭州工委委員，一九四九年以後任中共杭州市青委學生部長。一九五二年調中國科學院負責出版物的政治把關和宣傳工作。一九五六年調哲學所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因為反對‘反右’運動，成為科學院全院批判的第一個右派，定位‘極右分子’，失去了公職與黨籍，回浙江臨海老家當了二十年農民。一九七八年六月，許先生重新回到科學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

許良英先生鶴髮童顏，步履穩健，思維十分敏銳，言語流暢，除去牙齒全部脫落，露出些許老態，外人根本無法想像，這是一位已八十六歲的老人。許先生鄉音濃厚，有些話筆者聽不清，他幽默地說：牙齒掉光了，漏風，發音不準了。

問：一九八九年，學生起初是悼念胡耀邦，您當時是否預測到，學生運動會轉向反腐敗、爭民主，發展成為全民規模的

民主運動?

許良英：事前完全預料不到，一九八八年間，人們普遍認為當時的大學生只是關心個人利益，不關心國家命運，很多人為此憂心忡忡；誰也想不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以後，他們表現出如此高的政治熱情，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絕食這種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方式，為中國的民主事業抗爭。當然，這種變化與一九八九年年初開始的政治氣氛有很大的關係。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會討論第二年工作時，我提出明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和《人權宣言》發表二百周年，應該以紀念‘五四’，宣傳民主、人權為重點。方勵之、吳明瑜、李佩珊、李昌等人都贊同，于光遠最後拍板：明年，紀念‘五四’是我們研究會的主旋律。一九八九年初，我發表了好幾篇闡述民主理念的文章，批判當時的反民主逆流，尤其是官方輿論吹捧的新權威主義。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要求釋放魏京生。之後北島等三十三位作家發表聯名回應。二月，我與老同學施雅風發起了給中共、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進行民主改革，終止因思想、言論治罪的歷史，，一共有四十二人簽名，主要是自然科學家，也有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中國歷史上，以自然科學家為主的群體發表政見這是第一次，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中央反應是比較明智的，他們指示科學院各級黨組織，不要要找簽名者談話，以免他們感到壓力。三月十八日，統戰部部長閻明複還請我們夫妻和施雅風吃飯，希望充分地聽取我們的意見。那天，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談了很多問題，我還交給他一份一九七七年以來因言論被治罪十六人的名單。總的來說，從一月到三月先後有四批共一百一十位知識份子聯名發表公開信，以及當

局比較開明的態度，營造出了早春的民主氣息，為隨後胡耀邦含冤去世而激發的群眾性民主運動作了鋪墊。

問：八九民運時，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許良英：我當時心臟病嚴重發作，活動很少，但始終關心運動的進展，希望運動能夠健康地、合乎理性地發展，避免節外生枝，在必要時向大家提些建議。比如，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下達指令：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動亂；對它不能手軟，要避免流血，但也要準備流血，有軍隊可對付，不怕形象不好，只要經濟上去就可以了；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不許蔓延到中小學和工廠。還再一次指責已經去世的胡耀邦：胡耀邦的錯誤就在於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不堅決，否則不會有今天的動亂。中共太上皇這一殺氣騰騰的諭旨第二天就向各單位普遍傳達，並成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的基調。我意識到一貫心狠手辣的鄧小平是準備殺人了，勸學生不要再上街。學生為了要求收回《人民日報》社論，於四月二十七日舉行了一次理性的、和平的、有秩序和自我克制的遊行。四二七大遊行後，我建議他們準備復課，建設校內民主，把‘學生會’改組為‘學生自治會’。由於當局拒不收回給學潮錯誤定性的社論，學生不願在毫無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復課，於是出現了曠日持久的頂牛局面，使運動逐步偏離了理性。學生絕食的第六天，五月十八日晚，我應邀參加蘇煒、李陀發起的知識界聲援學生的會。會上我第一個發言，強調這次運動已取得空前的偉大的勝利，我們必須緊急呼籲學生停止絕食，並撤離廣場回學校。絕大多數與會者贊同我的意見。會上決定成立‘知識界救援團’，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可是誰也想不到，當時當局已決定對北京實行戒嚴，學生將要面對的已是鐵和血。

問：您如何評價八九民運？八九民運應該分為幾個階段？

許良英：這次運動，參加人數之多，鬥爭之激烈，影響之深遠，都創中國學生運動歷史之最，超過‘五四’，超過‘一二九’，是空前的。中國的青年人有這麼高的政治熱情，為了國家民族命運寧願犧牲自己的精神，真是驚天地泣鬼神。而‘六四’血洗長安街的悲壯結局，更是震撼了世界，導致東歐蘇聯極權主義政權全面崩潰，改寫了世界歷史，也必將改寫中國的歷史。

整個運動可分為四個階段。一九八九年一月到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前，一百多位知識份子的一系列呼籲是隨後群眾性運動的醞釀和前奏；胡耀邦去世到四月二十五日是第二個階段；‘四二六’社論到五月十二日是第三階段；五月十三日絕食到六月三日晚開始的大屠殺是第四階段。在我看來，前兩個階段都很健康，合於理性。絕食使運動偏離了理性，完全為激情所支配，難以冷靜、理智地對待險象環生的極端嚴峻的現實。雖然其激發出來的民意非常令人感動，但代價過去高昂，而且使中國民主化進程倒退了幾十年。

問：八九民運期間，公眾是否有失策之處？從中我們應該吸取哪些教訓？

許良英：當然有，比如絕食，我當時就表示反對。因為絕食激化了矛盾，後果難以預測。五月十二日，我的好友，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劉遼告訴我，北師大的學生準備絕食。同時北大也有同學告訴我，北大也在醞釀絕食。於是我請他轉告王丹，不要搞絕食，但他已聽不進去了。要瞭解絕食的起因和‘絕食團指揮部’的產生和運作，應該讀一讀一九九三年德國萊茵筆會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根據兩位絕食發起人的自白，可以說他們當時的

動機不僅缺乏理性，且近於荒唐；而廣場‘絕食團指揮部’的產生，根本不符合民主原則。

同樣荒唐的是‘五一七’聲明。公開罵鄧小平是慈禧，事實上沒有錯，但在矛盾已經激化，群眾的情緒處於沸騰狀態的臨界點時，發表這樣的聲明，決不是個人的政治表態和勇氣問題，而是把運動引向何方和怎樣看待千百萬群眾的生命安全問題。

又如‘六四’前幾天，有學生領袖聲言在期待流血，並且‘血流成河’，以激發全國人民奮起反抗，但她自己卻不願意與大家一起流血。這一心態令人震驚，似乎曠古未聞，仔細辨識，其間赫然有毛澤東、江青陰魂的幻影。

慘痛的血的教訓應該使我們認識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漫長而崎嶇，必須有韌性，有遠見，不可浮躁、急於求成。要清醒地認識現實和主客觀條件。在群眾運動中，口號和要求的提出，必須事先充分考慮其實際可能性；明知不可能實現，不可執意堅持，否則，會使問題複雜化，節外生枝，產生難以逆料的不利後果。任何群眾性運動的號召，都必須對群眾的生命安全負責，絕不能以熱血青年的生命為兒戲、賭注。那不是民主政治家的作為，而是翻雲覆雨、謀取個人權勢的醜陋政客的無恥行徑。

問：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在處理事變時有沒有做得不妥或不到位的地方？

許良英：趙紫陽原來對民主缺乏認識，一九八八年還主張新權威主義，一九八九年年初開始思想有大轉變，能夠理性地對待八九民主運動，反對戒嚴，十分難能可貴。但由於鄧小平始終掌握著軍權，並掌握政治決策的最後決定權，僅在兩年前就曾罷黜了總書記胡耀邦。在鄧小平面前，趙紫陽戰戰兢兢，

活動空間有限，無法實現自己的主張。

問：這是否意味著‘八九’民運被鎮壓是不可避免的?

許良英：是的，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就已下了這個決心。那次講話中他還說過：‘要用二十萬人的生命來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在公安部工作的於浩成就聽到過這個傳達。學生絕食期間，鄧小平親自去外地調集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雖然‘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但無數死者的血卻驚醒了千百萬倖存者。正如一個俄羅斯老共產黨員（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所說的：鄧小平的‘六四’大屠殺葬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為，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的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政權鎮壓人民的手段比納粹更兇殘，必須盡速推翻。半年後就出現了東歐、蘇聯劇變。

問：您年輕時參與學生運動是為了反腐敗、爭民主，幾十年後，學生們走上街頭，訴求同當年一模一樣，您怎麼看這個歷史現象?

許良英：實際上我當時並不懂民主，以為共產黨掌權了，就民主了，以為共產黨是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現在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還不如以前，官吏的貪污腐敗比國民黨時期還要嚴重得多。

問：未來還會發生類似事件嗎?

許良英：歷史進程非常複雜，恐怕很難簡單重複，但世界民主潮流不可逆轉，一九八九年以後共產獨裁國家只剩下四個，遲早都得變，賴不了多久了。

問：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2009 年 6 月，在“六四”20 周年之際，香港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周良霄和

顧菊英編著的《忘卻的紀念——八九民運紀實》（42 萬字）。此書以三叔 1999 年寫的《“89”十年感言》一文作為“代序”，在“代序”的附記裡，三叔這樣寫道：

“本書編者周良霄、顧菊英伉儷，長期從事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史料編輯工作。他們承襲了中國古代歷史學家的秉筆直書、彰善癉惡的優秀傳統，本著史學工作者的良知，以無畏精神，衝破官方設置的禁錮，盡多年的心力，搜集編纂親身經歷的民族災難‘文化大革命’的史料，以及以‘6·4’血腥屠殺為結局的可歌可泣的‘89’民主運動的史料。出於相互信任和共鳴，他們要把我3年前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10周年的《“8·9”十年感言》一文作為他們編的後一部史料的代序，我欣然同意，並感謝他們的好意。

由中共‘第二代核心’鄧小平一手製造的‘6·4’大屠殺，被前蘇聯共產黨幹部判定為‘葬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它改寫了世界的歷史，自然也成為中國人民的最大情結。只有通過這一不可逾越的歷史關口，中國大陸才可能出現民主、法治的曙光。本書的問世無疑會有助於這一進程的進展。

一年前，海外出版了一部巨著《中國“六四”真相》，作者張良（筆名）自稱是中共中央機關的幹部，海外媒體如獲至寶，搞得沸沸揚揚，以為製造血案的內幕可大白於天下。這部令人翹首以待的‘名著’，我終於有幸借來拜讀。完全出人意料，讀後不僅感到失望，而且感到受愚弄、欺騙。凡是當年身在北京，並關心國家民族前途，關心青年學生命運的人，都知道要動用軍隊來鎮壓學生，要準備流血，這番話是早在 1989 年 4 月 25 日鄧小平就對政治局常委（當時趙紫陽出訪朝鮮未在場）下達的口頭指令，第二天各單位都普遍作了傳達。前不

久讀到于浩成在海外發表的文章，說當時他所在的公安部還傳達了鄧小平一句令人毛骨悚然、毫無人性的狂言：‘用 20 萬人生命換取 20 年穩定！’可是，標榜為六四‘真相’這部書中關於鄧小平的講話，僅僅重複 4 月 26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所有見不得人的猙獰血腥的話統統不見了。這是明目張膽的掩蓋真相，自欺欺人地愚弄天下人！不諳中國權術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對這種有意掩飾要害的偽裝信以為真，並由此推論出許多荒唐可笑的論斷。他在此書的《前言》中斷言：鄧小平‘堅持不許流血’；李鵬‘對流血事件不應當擔負任何直接責任’；‘屠殺事件’的發生，是由於‘訓練不夠的部隊當時已經失控’。原來屠殺的責任全部在下面的士兵！如果這也算是‘真相’，那麼，我們記憶猶新的上世紀 3 0 和 4 0 年代甚囂塵上的希特勒和戈培爾的謊言豈不也都成了真理？！”

24、第一次進京看望三叔

到北京看望三叔，是我多年的願望；這個願望終於 在 1992 年暑假實現了。

因為我是第一次去北京，三叔事先就給我寄來北京地圖，並在信上指示我如何找到他家。

他在信上說：“出火車站後向左邊（西邊）走不遠，乘 103 路電車到動物園（終點站），再換乘 332 路公共汽車（去頤和園，快車、慢車都行），到黃莊站下（不要到中關村下），右邊（路東）一片高樓群就是科學院宿舍，812 樓是最北靠西（馬路邊）的 16 層塔式樓，有電梯。每層共 4 家。”

在杭州，我托堂妹許紡連（二叔的女兒）找熟人買到臥鋪

票（當時車票緊張）。8 月 1 日，我乘上了去北京的列車，第二天中午 11 點就到達。

我根據三叔在信上所提示的位置，12 點半就找到了他家，乘電梯上了七樓，在他家門口發現一張“下午 2 時前午睡休息”的字條。為了不打擾他們休息，我又下樓等了一個多小時。待到 2 點鐘，我上樓按響門鈴，三叔出來開門接我進去。

我在杭州出發前，紡連妹就已打電話告訴三叔我到達北京的時間，所以，他中午沒有休息，一直等著我的到來。他說，“你早就該叫開門，太傻了！”原來，他們還為我準備了中飯呢！

我與三叔，自 1985 年 3 月在杭州見面後，一晃就過去了七年；三年前，又經歷了“六四”這麼重大的事件，看上去，三叔似乎蒼老了許多，但精神還是很好。第二天，他和三嬸一起陪我到頤和園遊玩。

頤和園離中關村不遠，我們乘公共汽車去。三叔上車下車動作靈便，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說自己與三嬸每星期都來頤和園萬壽山上活動一次。

進了頤和園大門，我說，“我和三叔倆人從來沒有拍過合影照”，三嬸說，“今天你們兩人要多拍幾張。”

從長廊到昆明湖畔，三嬸拿出照相機，一路上為我們拍了多張合影照，還請別人代拍我們三人的合影。

後來，我們爬上萬壽山北麓，在那裡，他們二人各自做著健身操。三叔說：“我做的這套健身操，是自己編的。”我站在旁邊，觀看他們倆精神飽滿、動作自如地鍛煉身體，我由衷地祝願他們倆健康長壽安享晚年！

天安門廣場一直是我所嚮往的，第三天我就去了那裡。我有個學生名叫張雲飛，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在中國聯合國協

會工作，地址就在天安門東邊的南池子大街，與勞動人民文化館毗鄰，她陪同我一起參觀天安門廣場，然後又參觀故宮博物院和毛澤東紀念堂。

回到家裡，三叔得知我參觀毛的紀念堂，就嚴厲地批評我，不該看“毛的屍體”。我接受他的批評，的確是我的認識不足，覺悟不高，是非不分。1949 年以來，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運動，“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正是這個毛澤東；三年前的“六四”，正是毛澤東的繼承者鄧小平下的命令，調動幾十萬大軍，用坦克和機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難道這一切都遺忘了嗎？從 1919 年的“五四”，到 1989 年的“六四”，中國現代史上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天安門廣場就是最好的見證！

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到三嬸，她和三叔都非常關心我，詳細地詢問我近年的思想、工作和個人生活情況，使我感受到長輩對我的關愛和親情是多麼深厚！

三叔還與我盡情地回憶在老家張家渡生活的那段時光，家鄉的山，家鄉的水，家鄉的一草一木，家鄉的父老鄉親……，有歡樂，也有悲憤。

當回憶到 1969 年 8 月的那次“以死來抗爭”時，三叔說：“到現在我還不清楚究竟發生在哪一天，我只記得躺在衛生所病房裡一個星期左右，有一天廣播傳來胡志明去世的消息。”

我告訴他，“這是 8 月 30 日，農曆 7 月 18，正好是張家渡市日。”他說：“現在回想起來，‘文革’初期響應毛澤東號召，提著腦袋去參加‘文革’，是夠愚蠢的，是自己中毛澤東的毒太深。”

我住在三叔家 18 天，每天早晨，三叔準備早餐：牛奶、蒸雞蛋、麵包。他喝一大袋牛奶，我只喝一小袋就夠了。他說：

“多喝牛奶、多吃香蕉對身體有好處。”

中餐，三叔親自下廚房為我們做飯。他做的中飯是“大雜燴”，把昨天晚餐剩下的冷菜，加上麵條或餃子，放在一起，一鍋子煮。

中飯後，在書房（兼會客室）裡，三叔攤開躺椅，就半躺在上面休息。他叫我也拿來一張躺椅好好休息，有時怕我受涼，還拿來毯子給我蓋上。

下午 4 時，保姆（鐘點工）來做晚飯，6 時開飯。下午 5：30 至 6：30，是“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第二次中文廣播時間，三叔每天必聽。大家一邊吃飯，一邊聽廣播，如聽到重要新聞，三叔就會端著飯碗，湊到收音機旁，側耳傾聽。晚上，他總是要收看“浙江衛視”的新聞節目，瞭解家鄉的發展和變化。

這幾天，三叔還給我看他與三嬸合作撰寫的《民主的歷史和理論》書稿。三嬸已寫好中國部分，三叔撰寫的國外部分只寫好開頭幾章。三叔說：“在寫作過程中，需要一邊讀書，一邊思考。因為西方的歷史，原來並不熟悉，要讀大量的書，才能形成一個明晰的歷史脈絡，所以寫作進度慢。”

“六四”後這三年時間裡，三叔撰寫自傳——《回顧與反思》。已寫到 1957 年“反右”。我有幸讀到這部分自傳，對三叔一生的心路歷程，有了比較深入全面的瞭解，深受啟發和教育。他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理想主義追求，和“覺今是而昨非”的反省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

《回顧與反思》：《一、山鄉的童年（1920–30，故鄉）》，開篇是這樣寫的：

“我於 1920 年 5 月 3 日出生在浙江省臨海縣西鄉張家渡

村（現是臨海市城西區張家渡鎮）。張家渡離縣城 15 公里，居民 360 戶（現超過 700 戶），北瀕清澈的永安溪，西南屏障著括蒼山主峰。括蒼山海拔 1382 米，是浙東寧、紹、台、溫、金 5 個地區所屬 30 多縣境內最高的山，也是離海岸 60 公里內整個中國大陸沿海地帶最高的山峰。故鄉是個山明水秀、景色綺麗的半山區，可惜物產並不豐富，可耕地面積小，人民生活比較困苦。故鄉人有台州人所特有的強悍、耿直的性格。魯迅在悼念柔石的文章中曾稱讚台州人的硬骨頭。的確，台州人見於史冊的很少有文人墨客，而最為後人稱頌的正是連“滅十族”也不怕的明初方孝孺（方孝孺、柔石都是寧海人，寧海歷史上屬台州）。”

我在中學讀書時，語文課本裡有魯迅的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此文追憶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的左聯作家柔石。文中說：“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這模樣的。”魯迅先生所稱道的“台州式硬氣”，深深地銘刻在我少年的心靈裡。

《明史》中尚有記載這段歷史：

明代大儒方孝孺，面對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殺侄篡位，召他草詔天下。他一身孝服，一路痛哭，捨身救法，痛斥朱棣：“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命逮其親族，“縛而戮之”，正學（方孝孺）面不動色，惟罵詈而已。朱棣大怒，令武士用刀抉其吻，剔其舌，將其磔殺。

朱棣以極刑處死了不怕“滅十族”的方孝孺，先滅他的“九族”，再“瓜蔓抄”，牽涉到方孝孺的門生，共 873 人，全部死於非命。方孝孺的弟弟方孝友，綁赴刑場處死的時候，

當場作詩：

吾兄何必淚潸潸，
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鶴，
旅魂依舊到家山。

台州位於浙江中部，介於寧波、溫州之間。唐武德五年（622年）始置台州府，設府治於臨海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臨海一直是台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後，也是台州專署所在地，直至1994年，撤地設市，遷至椒江。椒江原名“海門”，歷史上是屬於臨海的一個鎮。

方孝孺的“硬氣”和風骨，早已注入家鄉的山山水水，注入家鄉人的靈魂和血液中。

《回顧與反思》:《四、愛因斯坦＋馬克思（1939，故鄉）》，其中一節文字抄錄如下：

1938年2月，海門民眾教育館為了避免敵機轟炸，把一批新書運到張家渡，藏在我的姨丈（民眾教育館職員）家，我和大哥就去借來幾百本，主要是新出版的《萬有文庫》第二集。大哥那時的興趣在鑽老古董，即所謂“國學”，專門找古書擺在自己的案頭。但他經常在外面（主要在縣城）活動，在家專心讀書的時間不多。我則老老實實地在家讀書，特別是這批難得的新書，立即強烈地吸引著我。第一本讀的是L.Infeld的《物質與量子》（開明書店另有一譯本，名《科學在今日》，原著出版於1934年），接著讀了自己兩年前買的小冊子羅素（B.Russell）1920——1921年訪華時的講演錄《物的分析》，以及愛因斯坦

的《相對論淺釋》，Reichenbach 的《原子及宇宙》，P.R.Hegl 的《物理學之基礎概念》，C.G.Daiwin 的《物質之新概念》等 15 本關於現代物理學的通俗讀物。它們生動扼要地描述了物理學在 20 世紀的新發展，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相對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時間和空間的相對性，物質與能量的等價性，思維空間，有限而無邊的膨脹宇宙，，波粒二象性，測不准原理，等等。這些概念，我聞所未聞，簡直不可思議，因為它們同我以前學過的古典物理概念完全格格不入，使我眼花繚亂，象進入一個神秘的新天地，我意外的發現這一科學思想的新大陸，真是又驚又喜，於是它就成了我忘卻眼前的苦悶，逃避現實的世外桃源。整整半年，我都沉醉在這種狂熱的喜悅之中。我從初中起，對物理學一直是最感興趣的，想不到它竟然還有這樣一個全新的領域，我當時下決心要終生在這裡面探索。

於此同時，我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問題。在這以前，我不喜歡（實際上也不懂）抽象的哲理，以為這是“形而上”的“玄學”，而我是要學“形而下”的科學和技術。改變我這種幼稚看法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個文集《我的世界觀》。此書是我 1937 年 2 月在杭州買來的，葉蘊理譯，是巴金主編的《文化生活叢刊》之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7 年 1 月出版，以前覺得抽象難懂，沒有認真讀它，現在則硬著頭皮，下決心要把它讀懂。我以前讀書貪多圖快，囫圇吞棗，這個時候才開始領會到精讀的樂趣。這位偉大科學家的一些關於人生和人類事務的發人深思的警句，在我的心弦上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例如，“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決定他在什麼程度上和在什麼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此處和下麵的譯文錄自 1979 年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這是我自己 1963 年在故鄉譯的，葉蘊理的譯文有些地方不太好懂。）“我從來不把安

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後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人生最美好的是“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現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

愛因斯坦的許多精彩言論中，當時最使我感到震驚的是他關於國家和個人關係的論述。小學上“公民”課時，讀到孫中山所說的，中國所以受帝國主義侵略，是因為中國人“自由太多”，“成一片散沙”，淪為“東亞病夫”，我深信不疑。可是愛因斯坦卻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個人，並且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他還以辛辣的語氣嘲笑那些盲目順從的人：“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以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由此我醒悟到，國家的存在是應該為個人（公民），而不是反過來，個人的存在是為了國家。此外，如果“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些話雖然當時也很欣賞，但隨著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後，把它當作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而拋棄了。直至 1994 年識破毛澤東所以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騙局以後，才深深領悟到愛因斯坦這些

話都是可以傳頌千古的至理名言。

受了愛因斯坦的啟迪，我第一次認真地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應該作一個怎樣的人。那時我在書桌上錄了幾條“座右銘”，其中有兩條決定了我一生的。一條是：“人不可有傲態，但不可無傲骨。”這是清初文人陸隴其的話，把我們台州人的硬骨頭精神作了理性的昇華，為我終生所信守，使我對人間的逆流惡浪能泰然處之。另一條是英國諺語：“想射天上飛雁的人，總會比只想射樊籬之鷓的人射得更高。”這鼓勵著我把人生奮鬥目標儘量定得高，以歷史上那些傑出人物的高尚行為作為自己生活的榜樣，不要為市儈和庸人們的議論所左右。從書本上的人物學習生活，這種書呆子氣小學時就已養成，從那時起，對書上的話我都很相信：書上提倡的事，我盡可能照著去做。例如初中二年級時讀到一本談飲食營養的書，說日本有個營養學家認為素食有益健康。從此，我就堅持每天只吃兩頓飯，即使肚子裡沒有覺得飽也絕不再吃，因而成為全校吃飯最快的人。這一習慣直至 1944 年，才被流浪生活完全打破。

從“硬骨頭”到“傲骨”，是三叔一生做人的信念和準則。從三叔命運多舛的一生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一身浩然“正氣”和凜然風骨。

這裡轉錄著名詩人邵燕祥，在三叔 70 歲生日時的祝壽詩：

真理深藏即可呼，
興亡何事付唏噓。
魚能入海猶相憶，(憶涸澈相濡，焉能“相忘於江湖”？)
蘭不當門也被鋤。(龔自珍成句。)

拋盡韶光頭尚在，(于子三案時我尚在中學。先生適在浙大領導學運，倏四十餘年矣。)
望穿夜色眼全枯。(杜詩: “眼枯即見首，天地終無情。”)
平生豈是無知己，
得友如君膽氣粗。

右一首，工拙不計謹錄賀
良英先生七秩大壽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四日　燕祥

※注: 此詩原文是豎直寫的，故寫“右一首”。

25、三年不鳴　一鳴驚人

1989 年，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後，全國處於極端嚴重的恐怖和窒息中，中國歷史倒退了幾十年。1992 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肯定經濟改革要繼續搞，官方輿論出現一片喝彩叫好聲，三叔卻給他們潑冷水，發表了題為《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的文章。

“六四”後，這是三叔三年中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文中譴責“六四”暴行，痛惜民族厄運；指出不受監督的政府必然腐敗，而腐敗是社會動亂的催化劑；並尖銳指出：如果人僅僅是經濟動物，那麼應歌頌經濟增長率 11%的納粹政權，高呼“希特勒萬歲”了，何況他搞的也是“社會主義”！同時又指出，既要改革，就得順應當今世界的歷史潮流，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認真開展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實現政治民

主化。

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辦的雙月刊《未來與發展》，1992 年 10 月 25 日出版的第五期。刊出時有幾處文字上被編輯改動，如“特別是 1989 年 6 月 4 日那出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之後”被改為“特別在震驚全國以至全世界的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改得稍為隱晦，但無損原意。此文的發表，被中共中央宣傳部認為是出版界最嚴重的政治事故。這期刊物立即被封禁，編輯受整肅，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組織文章圍攻。

1992 年 12 月 18 日，三叔給我來信說：

“聽說我的那篇文章，使王忍之、賀敬之這些人氣得跳起來，到處大罵我‘反動’，科協頭頭要把刊物停刊。結局會怎樣，我在等著瞧。”

1993 年 2 月 17 日，三叔又來信說：

“12 月《中流》（文藝界稱它為“下流”）和《人民日報》內部出版的《理論參考》都有臭文大罵我，罵我沒有中國人的氣味，不滿我仍在‘逍遙自在’（意思是“逍遙法外”），他們恨不得要吃了我，可是無損我一根毫毛。”

1993 年 2 月 17 日，《美國之音》在“新聞人物”欄目中，介紹三叔的情況：

“今天的新聞人物，我們要為各位介紹中國的民主鬥士許良英。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 1 月 29 號發表刊載一篇文章報導中國國內和政府持不同政見的異議分子重提‘政治權力’的問題。文章中提到知識界知名的宣導民主的老前輩許良英。說許良英先生是宣導民主的老前輩決不誇張，早在方勵之、王若望之前，許良英先生就是宣導政治民主的一位勇士。方勵之甚至於把許良英先生稱作是他最優秀的老師之一。德高望重的許良英老先生今年已經是 73 歲。

《箴言報》特別報導了許良英先生由於‘六四’事件三年之後，於去年十月十五日發表了一篇一鳴驚人的文章，題目是《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這篇刊登在中國未來學會發行的《未來與發展》雙月刊第五期。文章一出，當局立即禁止這份刊物的發行，而且還試圖把已經流傳出去的儘量收回。但是這篇文章反而洛陽紙貴，人們爭相傳閱。許良英的文章的要點包括：中國過去進行‘反右’、‘大躍進’，還有‘文革’和三、四十年代法西斯的倒行逆施相同，是一種“歷史大倒退”。十年改革開放以來，民主寸步難行。特別是‘六四’那出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後，民主自由被視為洪水猛獸，堅持主張民主的人被斥為‘敵對分子’，又仿佛回到了‘反右’和‘文革’的年代。

許良英還說，要實現現代化，卻拒絕文明社會所公認的價值觀，要改革，卻在歷史潮流面前固步自封；要改革，卻不讓人民呼吸外界的空氣，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絕無成功之可能。許良英呼籲中共領導人清楚對‘和平演變’一詞的‘心理障礙’。他說，‘和平演變’和‘改革’實際上是同義詞，有何可怕。

許良英是浙江省臨海縣人，1920 年出生，1942 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隨後留校任教時秘密加入共產黨，並且擔任

該校中共地下黨的支部書記。中共建立政權後，進入中國科學院工作，1957 年，就如同千千萬萬其他知識份子一樣被劃成右派，這位曾經為共產黨賣命，立下許多汗馬功勞的科學家，此後卻被下放到農村整整 20 年。1986，許良英曾經和方勵之、劉賓雁三位共同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引起鄧小平等人的極大不滿，致使會議流產。‘六四’期間，因為身體狀況不允許，許良英沒有上街遊行。此後三年他足不出戶，一直到這篇文章刊出。這是‘六四’以來第一篇正面抨擊中共的文章，而且文辭犀利，看樣子許良英老而彌堅，他的思想和意志並沒有被鎮壓下去。”

1992 年 12 月 12 日，香港《明報》刊載題為：《刊登許良英求民主文章<未來與發展>被迫停刊》的報導：

[本報專訊]　北京官方《未來與發展》雙月刊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首度發表公開要求更大程度民主的文章，已被中共中央下令停刊。

法新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稱，《未來與發展》十月號刊登了老資格的人權活躍分子許良英的一篇文章，被當局於上周下令停止一切活動。許良英是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流亡離心分子方勵之的摯友。

許良英的文章講中國的領導人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另外一篇由著名異議分子、法律學者于浩成撰寫的評論則提出警告，說如果共產黨不走向民主化，政權就會動搖。

兩名異議分子都不同意領導人鄧小平的“進行經濟改革，但並不需要同時推進民主化”的論調。

暫未清楚停刊令是否永遠有效。

據悉，禁令頒佈前，約二萬本該期雜誌已在外面流通，有關文章的影印本也在知識份子之間流傳。

七十二歲的許良英是中國科學院的自然科學家。他在題為“沒有政治民主的改革不能成功”的文章中辯稱，如果沒有採取步驟引入更大的民主，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市場改革。

他指稱，如果北京政府堅持走目前的道路，他堪可與希特勒比擬。

文章說：“假若經濟增長是量度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那麼值得‘讚美’的應該是希特勒的德國而不是亞洲的‘四小龍’。基於它的‘偉大成就’，我們應該高呼‘希特勒萬歲’。”

許良英又駁斥了“中國能步亞洲‘四小龍’模式後塵”的說法，指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發展皆始於私有經濟，與中國不同。

許良英在文中還稱：“在中國，民主寸步難行。”

“特別在震驚全國以至全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民主和自由被視為瘟疫一樣，支持民主的人被打成‘敵人’。”

他反駁北京官方“吃飯是最基本的人權”的說法。“人不再是指滿足於吃、喝、拉、撒的動物了。”

《未來與發展》是中國科技協會正式向當局登記註冊的官方刊物。

自今年八月開始，這本雜誌開辦了一個叫“中國未來十年改革的前景和困難”新版，邀請著名自由派學者撰文。

于浩成在他的文章中則指“少數領導幹部”害怕民主。他警告，如果不改革，中共專政將受到威脅。“這個任何聲音也聽不進情勢，已經充滿了危機，不能再壓住了……領導層低估

了中國人的政治醒覺。”

他補充說: “改革不能單單在經濟領域進行, 政治和文化也要一起開放。”

許良英和于浩成兩人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時都很活躍。于浩成在當局鎮壓之後被扣留, 後來被開除出黨。

據瞭解, 許良英和于浩成的有關文章上周引起中共高層的注意後, 負責統管該雙月刊的中國科技協會黨組連忙下令雜誌停刊。

12 月 15 日,《明報》又刊載了題為《官刊載其文可能要停刊　許良英慨歎求民主何罪》的“特稿”：

北京官方刊物《未來與發展》因刊登知識份子許良英要求政治民主的文章而面臨可能遭停刊的命運, 而事實上許良英在文中強調的正是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

友人引述許良英表示, 經濟改革需以政治民主化配合, 這是他的一貫主張。他指出, 中國的經濟改革在轉型過程中, 以權謀私的官倒問題嚴重, 近幾年來當局為求穩定, 連在報上也不許提。

許良英撰文談政治民主, 強調中國須尊重人權, 實行法治, 保證思想、言論、出版、新聞自由以及和平集會、結社自由, 才有助於經濟改革成功。

高齡七十二歲的許良英, 是中國科學院屬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已離休。他早年鑽研物理, 四九年以前參加中共革命工作。他因受愛因斯坦嫉惡如仇的觀念影響, 性格率直敢言。

《未來與發展》是中國科協屬下中國未來學研究會的刊

物，平時刊登科技文章，最近一期載了一組由多位知識份子執筆開放改革的文章，其中許良英和于浩成的兩篇提及政治民主。于浩成那篇較低調，許良英的言論則較尖銳；另外幾篇是談經濟改革的。

據悉，該刊的主管機構中國科協黨組曾作內部討論，要它停刊，但還待新聞出版署批，尚未正式公佈。

至於該幾篇文章在《未來與發展》中刊登，其實有一段小故事。原來，那些文章是許良英等是早在今年五月應友人代香港一份新刊物約稿而寫；後來那份香港刊物沒辦起來，文章則輾轉流傳開去，並在《未來與發展》上刊登出來。許、於等是在該刊出版後才知情。

許良英說，他本來沒想到那篇文章可以在國內發表，而《未來與發展》予以刊登，他很感謝，沒想到該刊為此而承受很大壓力。他說：“其實要求改革和民主並無不對！”

另一位敢言的知識份子于浩成在文中也是提出對中國改革的希望。他呼籲當局實行十三大曾提出的黨政分開、新聞自由、以及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于浩成並呼籲人大成立一個與人大常委會平衡的憲法監督委員會，監督憲法的實施。這一意見他在十年前就曾提出，當時未被採納。

六十六歲的法學家于浩成，是前任公安部屬下群眾出版社社長，一直從事民主、法制和人權的理論研究，並宣導政治體制改革。他在六四事件後被監視居住一年半。其後他多次申請出國，至今未獲當局答復。

于浩成原任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和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在六四事件後均已被撤銷。最近北京討論修憲，都並沒有邀請他出席。

香港《前哨》雜誌 1993 年 1 月號的“新聞人物”專欄，刊載題為《反左老將許良英》的報導（作者：陸民聲）。

題記寫道：

最近被中共查禁的《未來與發展》雜誌中許良英先生的文章，是“今後十年中國改革的前景與問題”大型筆談會中最無顧忌，批判中共現行政策最痛快淋漓的一篇。江澤民在《國內動態清樣》批示：對自然科學界的這類人不能掉以輕心。方勵之則曾說許良英先生是他最優秀的老師之一。

全文如下：

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大陸中國未來學會主辦、公開發行的《未來與發展》雙月刊第五期，刊登一篇自然科學界的著名反左老將許良英先生撰寫的文章:《沒有政治民主 改革不可能成功》。文章發表後沒有幾天，中共政權就下令查封這個刊物，同時命令將已經發行的第五期“盡可能收回”。

但是，已經發行出去的不但沒有被收回，中共的這一禁令反而令許良英的文章身價百倍，未來學會的一位同仁說：“從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北京市的所有影印機起碼有一半印過《未來與發展》第五期，而且，都是指名要複印許良英的文章。

中國著名自然科學史專家

許良英先生與王若望先生一樣，都是早年投身中共、最後又成為中共獨裁政權叛逆的大陸著名民主運動領袖。只是因為許良英先生由於年事已高，且患有嚴重心臟疾病，所以只是把

主要精力放在民主理論及中國民主歷史的研究和寫作上，較少投身街頭運動或外出演講，這才使得他的大名在外界不如方勵之、王若望等人的名字響亮。實際上，許先生比起方勵之、王若望先生來，是中共政權中更早公開站出來宣傳政治民主的一位勇士，而民主理論上也堪稱眾多大陸民主運動志士的先鋒。許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方勵之多年前就說過“許良英先生是他最優秀的老師之一”。

許先生是浙江臨海人，生於一九二零年，他一九四二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隨後留校任教期間秘密加入中共，擔任浙江大學中共地下黨的支部書記，後來又擔任過地下黨的杭州市工作委員會委員。

中共建政後，許良英被中共調入中國科學院，負責宣傳工作和《科學通報的》的編輯工作。一九五七年，他因言論罪，被中共開除黨籍，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回原籍強制其接受“勞動改造”。此後，這位地下黨出身的科學家不但被剝奪了政治權利，而且被剝奪了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權利，在家鄉務農整整二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以“敵我矛盾按人民矛盾處理”的結論被允許回到北京，七九年被宣佈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恢復黨籍。

政治民主的傑出理論家

回到北京後，許先生繼續從事他研學多年自然科學史工作，成為大陸在這個學科不可多得的高級專家，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浙江大學兼職教授及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常務理事。其最為傑出的學術建樹是主持編輯了三卷本的《愛因斯坦文集》，主編了《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和《愛因斯坦研究》，撰寫了《王

塗昌和他的科學貢獻》、《科學和哲學》等在大陸自然科學史界頗有價值的著作。

在從事自然科學史研究的同時，許良英先生從七十年代末即開始以鼓吹自由化、宣傳政治民主為己任。他先後著、譯有《科學·民主·理性》、《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民主和科學是現代國家立國之本》等著作，其散見於大陸各報刊關於宣傳民主理論的文章更是不勝枚舉。目前，他正與夫人合作，抓緊撰寫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國民主史》。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許良英先生曾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共同發起籌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後來，由於被邀請的“民主人士”中有人將此事報告中共中央，引起鄧小平等人的極大不滿，會議流產。事後，在鄧小平下令將方勵之、劉賓雁開除黨籍時，也有中共左派認為許良英也應被開除黨籍。但因為鄧小平沒有直接點他的名，許良英才得以被恩准“內部批判”

八九民運高潮前後，許良英由於身體情況不允許，不適於室外活動，所以只是應邀到王丹、劉剛等人在北京組織的沙龍集會中作過關於中國民主問題的演講，沒有正面參加更多的運作活動。所以，在事後的“清查”過程中，一直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左派們無法拿出“動亂”事實來說服中國科學院黨委，這一來，許良英也沒有被公開宣佈開除黨籍。但在同時進行的清黨過程中，中國科學院黨委也不通知他參加黨員審查過關所必須履行的“黨員重新登記”。

三年不鳴，一鳴驚人

“六四”鎮壓後的三年多時間，許良英先生閉門不出，堅決不與中共政權合作。《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是這位老先生“六四”以後第一次發表政論文章，而這篇文章也

是“六四”鎮壓以後在大陸上公開見諸報刊的第一篇正面抨擊中共“六四”鎮壓及事後持續的政治高壓政策的文章，真是“三年不鳴，一鳴驚人”。

這篇文章本來是為“今後十年中國改革的前景與問題”大型筆談會而寫的，本來要發表在香港某雜誌上，後來許先生乾脆將它見諸於大陸的公開報端。與許先生同時為這個大型筆談會撰稿的另幾位知名人士也都同許先生一樣，是出身共產黨的共產黨叛逆，包括“六四”後被中共開除出全國人大常委的胡績偉及險些被開除黨籍的十三屆中顧委委員于光遠、李銳等。而許良英的文章則是所有人文章中最無顧忌，批判中共現行政策最痛快淋漓的一篇。

指中共政權等同於法西斯

許先生在文章中把中共過去進行過的“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同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專制及三、四十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倒行逆施等同，認為這都是“人類歷史回到中世紀的一種‘返祖現象’，是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的歷史大倒退”。

他在文章中說：“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根深蒂固的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作祟，民主始終寸步難行。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出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後，民主自由被視為洪水猛獸，堅持主張民主的人被斥之為‘敵對分子’，時間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棍子、帽子滿天飛，稍有獨立思想的言論、著作一概被禁，而騙子、流氓、娼妓的胡話、夢囈卻使權貴們如獲至寶，正義之士無不為中華民族的厄運而唏噓。”

諷刺鄧小平政策無異於納粹

許良英先生在其文章中批判說：“如果人僅僅是經濟動物，生產力的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那麼值得稱道的並不是亞洲‘四小龍’，而是希特勒當政時的德國。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到年底，德國失業率就減少了三分之一，以後逐年下降，到一九三八年已不到百分之一（原為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五年內，（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六十八，平均年增長率百分之十一，其中生產資料生產尤為迅速，五年內將近翻了一番。根據這一‘偉大功績’，我們應該高呼‘希特勒萬歲’了，何況他搞的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簡稱‘納粹’，按德文原意該譯為‘民族社會主義’）。那些鼓吹不搞民主也能發展經濟的說客們，竟沒有一個敢於公開宣揚如此輝煌的納粹經驗，實屬莫大遺憾。”

單純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

許良英先生認為：“人畢竟已經不是只滿足吃、喝、拉、撒的動物，人是理性動物，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尊嚴。正如陳獨秀於一九一五年所說的，‘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讓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力，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這就是經過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主義啟迪而覺醒了的、並且經過十七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用科學思想和民主思想武裝起來的現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實現現代化，卻拒絕現代文明社會所公認的價值觀；要改革，卻在歷史潮流面前固

步自封；要開放，卻不讓人民呼吸外界的新鮮空氣——這種本末倒置，無異於洋務運動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絕無成功之可能。”

許先生說：“有人以所謂‘四小龍’為例，認為單純的經濟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龍’本來就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經濟起飛並無體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國大陸首先碰到的是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權和官吏受不到廣大人民和獨立輿論的監督，必然“官倒”猖獗，腐敗成風，社會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這是歷史的規律，誰也逃脫不了。不受人民監督的政權，必然腐敗；而腐敗和官倒是人民無法忍受的，它們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和催化劑。”

認為“和平演變”與“改革”是同義詞

許良英先生在文章中懇請中共領導人消除對“和平演變”一詞的“心理障礙”。他說：“‘和平演變’源於英文 Peaceful evolution，evolution 的意思是‘進化’，是指漸進的發展。與之對立的是‘革命’（revolution），是指通過暴力對社會制度作徹底的改變。所謂‘改革’，就是一種進化，是逐步走向現代的發展。這是全國人民早已認同了的取向。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已飽受戰爭和動亂之苦，中國需要改革，當然只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不應該走‘暴力革命’的老路。因此，改革本身就是一種 peaceful evolution。‘和平演變’與‘改革’實際上是同義詞，根本不是吃人的老虎，有何可怕？”

勸告中共領導人放棄“千年帝國”夢想

許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人用斯大林的語言，把改革說成是對某種體制的‘自我完善’（筆者注，這是江澤民‘十四大報告’中的語言），這純屬形而上學的幻想。斯大林不承認他統治下的蘇聯社會有什麼內部矛盾，而高唱所謂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去年蘇共的猝亡和蘇聯的崩潰證明了這種‘一致’和‘自我完善’的虛假。自我封閉性的‘自我完善’是與開放性的改革相對抗的，實質上是對改革的否定。人類社會是永遠在進步的，改革也必然永無盡頭，不存在任何預先設定的終極目標。千年帝國，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個夢。”

呼籲人權要求釋放思想犯

許良英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一鳴驚人”，還在於他敢於直言中共人權已成為“國際輿論譴責的對象”，要求釋放所有思想犯。

他在文中直言道：“要實現政治民主化，首先必須切實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和平集會結社自由之權利。絕不可因國內的人權問題而成為國際輿論譴責的對象；應該果敢地結束中國幾千年來因思想、言論、文字治罪的歷史，使所有因思想言論而入獄者獲得自由。”“也只有這樣，回歸祖國後的香港才能確保繁榮，臺灣海峽兩岸統一才能實現。”

*附：《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

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

隨著 1989 年東歐、蘇聯的巨變和 1991 年的海灣戰爭，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抗和冷戰，從歷史上消失了。雖然地區性衝突、民族糾紛、宗教和意識形態的鬥爭還會長期繼續下去，但是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而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 20 世紀上半期。世界和平有了保障，嚮往和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這是經歷了紛爭、戰亂、磨難的 20 世紀在最後十年為未來的新世紀準備的獻禮，是科學、民主和理性的偉大勝利。

早在 1915 年，陳獨秀就把現代文明歸結為科學與人權；1919 年他又把人權擴大為民主。1924 年孫中山也說，“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沒有辦法可以反抗”，並且強調：“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可是進入 30 年代，歐亞幾個大國出現逆流，這就是德、意、日三國猖獗一時的法西斯；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專制；以及 50 年代以後出現的中國“反右運動”、“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類自我折騰。這些都是人類歷史回到中世紀的一種“返祖現象”，是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的歷史大倒退。歷史終於克服了這種倒退，不過代價是無比高昂的，包括億萬人的生命。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們從現代迷信中清醒過來，於是有十年改革開放的局面。改革的目標，1981 年確定為：建設一個“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人們為這個目標所吸引，對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由於根深蒂固的幾千年封建傳統的作祟，民主始終是寸步難行。特別是 1989 年 6 月 4 日那出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之後，民主自由被視為洪水猛獸，堅持主張民主的人被斥為“敵對分子”。時間彷彿又回到

了“反右”和“文革”年代，棍子、帽子滿天飛，稍有獨立思想的言論、著作一概被禁，而騙子、流氓、娼妓的胡話、夢囈卻使權貴們如獲至寶，正義之士無不為中華民族的厄運而唏噓。

現在，從南到北驟然又吹起強勁的改革之風，人們為之雀躍，似乎又出現了希望，但是這次改革，談的只是經濟改革和發展生產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諱言民主。這種拐腳的改革能否成功，殊堪懷疑。

有人以所謂“四小龍”為範例，認為單純的經濟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龍”本來就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經濟起飛並無體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國大陸首先碰到的是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權和官吏受不到廣大人民和獨立輿論的監督，必然“官倒”猖獗，腐敗成風，社會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Lord Acton）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這是歷史的規律，誰也逃脫不了。不受人民監督的政權，必然腐敗；而腐敗和官倒是人民無法忍受的，它們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和催化劑。

如果人僅僅是經濟動物，生產力的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那麼值得稱道的並不是亞洲“四小龍”，而是希特勒當政時的德國。1933 年 1 月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到年底，德國失業率就減少了 1/3（原為 33%，600 萬人），以後逐年下降，到 1938 年已不到 1%。1933—1938 年 5 年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68%，平均年增長率 11%，其中生產資料生產尤為迅速，5 年內將近翻了一番。根據這一“偉大功績”，我們應該高呼“希特勒萬歲”了，何況他搞得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簡稱 Nazi“納粹”，按德文原意該

譯為“民族社會主義”）！那些鼓吹不搞民主也能發展經濟的說客們，竟沒有一個敢於公開宣揚如此輝煌的納粹經驗，實屬莫大遺憾。

人畢竟已經不是只滿足吃、喝、拉、撒的動物，人是理性動物，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尊嚴。正如陳獨秀於 1915 年所說的，“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力，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這就是經過 14-16 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主義啟迪而覺醒了的、並且經過 17-18 世紀啟蒙運動，用科學思想和民主思想武裝起來的現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實現現代化卻拒絕現代文明社會所公認的價值觀；要改革，卻在歷史潮流面前固步自封；要開放，卻不讓人民呼吸外界的新鮮空氣——這種本末倒置，無異於洋務運動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絕無成功之可能。

這裡應消除一個心理障礙，這就是對“和平演變”一詞談虎色變的心態。“和平演變”源於英文 Peaceful evolution，evolution 的意思是“進化”，是指漸進的發展。與之對立的是“革命”（revolution），是指通過暴力對社會制度作徹底的改變。所謂“改革”，就是一種進化，是逐步走向現代的發展。這是全國人民早已認同了的取向。整個 20 世紀，中國人民已飽受戰爭和動亂之苦，中國需要改革，當然只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不應該走“暴力革命”的老路。因此，改革本身就是一種 peaceful evolution。“和平演變”與“改革”實際上是同義詞，根本不是吃人的老虎，有何可怕？

有人用斯大林的語言，把改革說成是對某種體制的“自我

完善”，這純屬形而上學的幻想。斯大林不承認他統治下的蘇聯社會有什麼內部矛盾，而高唱所謂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去年蘇共的猝亡和蘇聯的崩潰證明了這種“一致”和“自我完善”的虛假。自我封閉性的“自我完善”是與開放性的改革相對抗的，實質上是對改革的否定。人類社會是永遠在進步的，改革也必然永無盡頭，不存在任何預先設定的終極目標。千年帝國，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個夢。

總之，既要改革，就得順應當今世界的歷史潮流，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認真開展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實現政治民主化。應該認識到，政治民主化是經濟改革和安定團結的可靠保證，人民充分發揮了主動性和積極性，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難以避免的困難，全國人民就會樂意共同承擔；而通過群策群力，也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要實現政治民主化，首先必須切實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 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和平集會結社自由之權力。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理應率先恪守聯合國有關人權的各項公約，絕不可因國內的人權問題而成為國際輿論譴責的對象；應該果敢地結束中國幾千年來因思想、言論、文字治罪的歷史，使所有因思想言論而入獄者獲得自由。

鑒於民主思想在中國的輸入和傳播歷史短暫，而反民主的舊傳統十分頑固，即使在知識份子中間，民主概念也常常遭到曲解。因此，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必須通過不懈的艱苦奮鬥才有可能逐步實現。在當前，首先應該爭取的是公民的基本合法權利，即保障人權。

一個尊重人權、實行法治的民主中國，是 20 世紀 90 年代對未來中國的呼喚。也只有這樣，回歸祖國後的香港才能確保繁榮，臺灣海峽兩岸統一才能實現。那時，在太平洋西岸崛起的，將不是什麼第五條小龍，而是真正的東方巨人！讓我們永遠記住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26、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

1993 年，中國政府為北京申辦 2000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需要改善 1989 年“六四”血案後的國際形象，先後釋放了王丹、魏京生等思想犯。可是，申辦奧運未獲成功，於是當局故態復萌，1994 年 2 月開始在北京、上海等地大肆拘捕持不同政見者。為此，3 月 8 日，三叔起草了《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這個呼籲書，第二天即完成簽名徵集工作，他即給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各寫了一封短信，說明：“這個呼籲書是我起草的，這是一批憂國憂民的老年和中年知識份子強烈的心聲，望您認真、鄭重地考慮這一關係國家命運的問題。”

在這個呼籲書上簽名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物理教授劉遼、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蔣培坤和丁子霖夫婦、歷史學家王來棣、詩人邵燕祥、作家張抗抗，以及三叔本人。

3 月 11 日，美國《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以《七位中國知識份子呼籲結束政治鎮壓》為題，發表了記者 Patrick E. Tyler（邰培德）對三叔的訪談；在第 10 版上刊登了呼籲書的全文；並且在《新聞摘要》欄中選用呼籲書中的一句話：“舍人權而侈談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作為這一天報紙的警

句。

3 月 12 日晚，我在收音機裡收聽到《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欄目中，就此事對三叔所作的採訪報導，我當即錄下這段採訪談話。整理如下：

聽眾朋友，《改善人權狀況呼籲書》的起草人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教授，星期六遭到公安局的軟禁，許良英教授表示，他作為在中國用理性呼籲改善人權的人，自身的人權馬上就受到侵犯。他表示，如果被捕的話，他將進行絕食抗議。請聽本台駐洛杉磯記者書國福發來的報導：

七位中國大陸學者聯名發表的《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呼籲書》，通過西方傳媒廣為報導以後，已經引起中國當局對這些連署人的另眼相看，負責起草這篇《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呼籲書》的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教授許良英，他星期六上午在北京住所接受本台記者越洋電話採訪的時候表示，他已經失去了行動自由，“我告訴你，現在我這裡有警察，而且整個上午不讓我出門，朋友也不讓進來。”許良英表示，監視他的警察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來的，因為他們不讓他會晤正在北京進行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有記者問我，克里斯多福要來，來的話，我願不願意見克里斯多福，我說，我自己主動要求沒有，但是克里斯多福要找我談，我是願意的。這句話，可能他們當局很惱火，剛才上午來了三個中國科學院黨組領導人，找我談，勸我不要同克里斯多福談話，講了很多大道理，什麼國家安全啦等等。我就向他們提出幾個要求：去把警察全部給我撤了，把丁子霖家的電話恢復，把盯她的便衣警察也撤了，這樣情況之下，我可以考慮。倘若你們不這樣做，我們呼籲改善人權的人，對我們侵犯人權，相反，我可能會主動去找

克里斯多福。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現在到了這麼一種程度，講道理，用理性呼籲改善人權的人，人權馬上就受到侵犯。”

《呼籲書》的另一個簽署人丁子霖教授，星期五許良英去看望她，她家的電話被切斷。“我的情況比較嚴重，丁子霖可以自由，但現在不讓我出去，剝奪了公民的政治權利。剝奪成這樣的程度，這是我不能容忍的。”

許良英教授曾經與公安局警察理論，要求說明他被軟禁的理由，他非常憤怒被如此對待。

“上午八、九點鐘，本來我不知道，我的兒媳去上班，打電話回來，告訴我有警察把守我們家門口，我下去看，果然有二人。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保護知識份子’的”，我說：“‘保護知識份子’是這樣保護的嗎？”他說：“‘二會’期間，怕有壞人來。”我說：“太不像樣子了”，我說：“是否站稍為遠一點行不行？中國是文明國家，要文明一點。” “他們不但不講理，卻這樣對待我。剛才我出門去拿報紙，這兩人把我攔住。”

我說：“你們剝奪我的權利”，他說：“是‘上面’規定”，我說：“‘上面’規定什麼，你拿出證件來，說我是犯罪分子嗎？”他說：“不是”，“不是，為什麼這樣攔我？”他說：“是奉更高當局命令行事，‘上面’交代的”，我說：“‘上面’是什麼人物？”

許良英起草的《呼籲書》強調不可以捨棄人權而侈望現代化，否則，就無異於緣木求魚。他呼籲當局要果敢地結束中國幾千年來因思想、言論、文字治罪的歷史，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而被關押人員。這篇呼籲書公開以後，為一些連署人所帶來的後果是許良英事先沒有預料到的。

“完全出乎我的預料，因為他們記者向我採訪時都問，說政府會對你怎麼樣？我說估計不會怎麼樣。除非它發瘋了，過去以為它不會發瘋，現在它真的發瘋了，看它發到什麼程度。”

被軟禁的許良英教授是中共的老黨員，他表示，如果真把他抓起來，他要絕食到死來表明自己的心跡：

“把我抓起來，我準備死在監獄裡，這我已講明。我準備不吃藥，不喝水，不吃飯，準備死在監獄裡，做中國第一個為人權而死的人，像過去的譚嗣同一樣，這也好，我已活到七十四歲，我已活得夠了！我解放前提著腦袋搞革命，那時沒有想到會見到解放，我沒想到會活到 49 年。現在能見到了，看到國家被搞成這個樣子，我的生死問題青年時就不考慮，現在用不著擔心，我會從容地對待。”

“做中國第一個為人權而死的人，像過去的譚嗣同一樣！”三叔的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我受到強烈的感染。

回顧中國近代史，記載有晚清的“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的發起人和主要領導者康有為，1898 年 1 月 29 日（農曆戊戌年正月初八）上書光緒皇帝《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此折是康有為提出的統籌全局、盡變舊法的綱領性文獻。6 月 11 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宣佈變法開始。9 月 21 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宣佈重新訓政，將光緒皇帝囚禁。從 6 月 11 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書，到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為時僅 103 天，故史稱“百日維新”。

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下令廢除變法詔令，命令軍警大肆緝拿維新人士。康有為是情罪重大的首犯，在政變發生前一日逃離北京，後在英國領事館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梁啟超躲進

日本駐華公使館，後在日本人掩護下逃往日本。日本人勸譚嗣同逃跑，他不聽，慷慨陳言：“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9 月 25 日，譚嗣同被捕，在獄中他撿起地上的煤渣在牆壁上，寫下這首絕命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

9 月 28 日，譚嗣同與另外 5 名維新人士（史稱“戊戌六君子”）押赴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行刑。當時，圍觀的群眾達上萬人，在行刑前，譚嗣同大聲說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說完，劊子手舉起了屠刀，譚嗣同人頭落地。譚嗣同，這個鐵骨錚錚的改革者，給戊戌變法的歷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曾經多少熱血男兒聞之淚下，詩人們感歎“中華民族自古至今最為感動天地的人物就是譚嗣同！”正因為如此，即便在風聲鶴唳的滿清屠刀下，譚嗣同慷慨就義，尚且有義士劉鳳池等深夜帶人前往刑場收屍，將譚嗣同頭顱與屍身縫合，殮棺暫厝僧寺。翌年，派人不遠數千里扶柩南歸故鄉湖南瀏陽城南崇豐鄉南流橋唐家鋪。

100 多年來，中華大地歷經變亂，但無論誰都對這個“我自橫刀向天笑”的民主革命先驅者心懷敬意，傳誦他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譚嗣同雖然被殺了頭，但他的精神永存；如今仍在激勵著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而奮鬥的人們！

3 月 12 日，大批警察進入三叔家的宿舍區，並堵住他家的門口，把他軟禁了三天，引起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3 月 13 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以及臺灣《中央日報》、《聯合報》等都報導了這一消息，並配發了路透社記者 11 日在三叔家中愛因斯坦畫像前拍攝的三叔照片。路透社記者在照片的文字說明中說：

“大陸民主運動老將許良英，12 日在北京寓所抱怨中共當局包圍他家，是不准異議人士與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會晤的典型施壓作法。”

3 月 16 日，美國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海外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報紙），發表了題為《中國大陸七位學者作家的人權上書》的社論。社論全文如下，值得一讀：

“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第二次會議十日揭幕的前一天，中國大陸有七位學者和作家，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及人大委員長喬石，呼籲中共當局尊重人權。八屆二次人大揭幕之後一天，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親訪北京，要求中共當局改善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中共對克里斯多福帶去的美國壓力，以強硬的立場、羞辱的手法，斷然拒絕。中共對其統治之下的七位學者和作家冒犯虎威、掬誠進言，也能以強硬的立場、羞辱的手法，扼殺這封請願書的影響力嗎?

這封題為‘完善我國人權狀況’的請願書，一針見血指出：‘舍人權而侈談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

這封請願書的簽署者，包括老科學家許良英、歷史學家王來棣、哲學家丁子霖、蔣培坤、詩人邵燕祥、物理學教授劉遼、

通俗小說作家張抗抗。這封全文不超過七百字的請願書，提綱挈領闡明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人權的莊嚴意義，特別引述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重要內容，呼籲中共當局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問題而被關押的人。請願書的結論是，‘只有尊重人權，確保公民各項應有的權利，社會才會有真正的安定，否則，只會激化矛盾、誘發動亂，以後一發不可收拾。’

自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血案’之後，大陸社會出現過一陣難堪的沉寂。許多優秀青年被殺、被關、或逃亡海外。許多心地清明的知識份子，不得已明哲保身，三緘其口。有些見機而作的人，利用當局推行改革開放的背景，抓住機會‘一切向錢看’，謀取實利，改善生活。中共當局順水推舟，拿經濟成長的資料，來遮掩它對人權的惡劣紀錄。一則曰，國情不同，不能用西方的標準來看中國的問題，再者曰，中國人民能夠獲得溫飽，這就是最基本的人權，中共甚至以鼓吹民族主義情緒為手段，指斥外國人民和政府關心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是‘干涉內政’，顯然希望由此激起激昂的民意，擺脫人權問題的壓力。

人民能夠吃得飽，穿得暖，都是基本權利，但現代的人權觀念，不僅物質方面能夠滿足生存需要便算滿足，聯合國人權宣言有很清楚的規定。正如許良英等七人強調的：‘人應該有獨立的人格和尊嚴，享有不可轉讓和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首先是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這就是現代人的人權意識。中共當局至今不肯承認這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則，硬是違背歷史的發展法則，與現代世界思潮背道而馳。中共抱著這種封閉的心態而追求現代化，不是緣木求魚嗎？

人權意識的覺醒，浩浩蕩蕩，莫之能禦，不是任何暴力鎮

壓所能阻絕的。尊重人權，不只對國家民族有利，對廣大人民有利，就是對有意‘深化改革’的中共當局也是有利的。號稱‘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動亂、大悲劇，以至五年前的天安門血案，流血犧牲的固然大都是善良民眾，也有些良知未泯的黨員和幹部同受其害。

法國人在二百零五年之前就明白揭示，‘對人權的無知、忽視或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中國大陸七位學者和作家請願書中慨乎言之：‘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同樣印證了這千古不易的真理。’中共應該以誠懇謙遜的態度，切實矯正過去的錯誤，朝著真正現代化的方向，勇敢的大步向前。所謂‘深化改革’，不只是在經濟財政的圈圈裡打算盤，更應該提升到精神與思想的層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如果隨時受到殘暴的鎮壓與打擊，國家就永遠不會有真正的現代化。

中國的知識份子，歷來都以崇高的使命感自我期許，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與爭取人權和自由的努力是一貫的。人權如果沒有保障，民智不能發揮，什麼奇禍慘變都可能發生，還談什麼立心立命?

這七位學者和作家都是大陸上知名之士，他們明知請願上書，有如專制時代批人主之逆鱗，對他們個人難免有不可測的後果。但他們不計得失安危，義無反顧，提出忠告，這番苦口婆心，表現了中國讀書人的責任感和道德觀，中共當局絕對不可用羞辱的手法對待他們!

中國大陸十一億人口中，七個人不過是滄海一粟，一封七百字的請願書，也難與人大會場上當權者所作洋洋萬言報告的氣勢相比，可是，他們七人的道德勇氣和真知灼見，自有其警世意義和永恆價值。”

3 月 31 日，三叔給我來信，全文如下：

從平:

3.25 信收到。

3.16 曾寄你一信，附有呼籲書和 The New York Times 的三篇新聞稿，可能已被人偷走了。

VOA 的訪談，當時我是錄了，但干擾嚴重，不清楚。你如錄得清楚，將來可放給我聽聽。

想不到曉光的老師也關心這類問題。

附寄三份你們感興趣的材料。以後如有新的，當陸續寄去。

祝

好!

三叔

1994.3.31

我生活已恢復正常，望勿念。又及

*附：《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

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

近來，北京、上海等地發生了多起因思想言論問題遭到當局拘捕、拘詢的事件，國際輿論譁然。關心國家民族命運、有志於我國現代化事業的有識之士無不為之震驚，並深感不安和憂慮。

綜觀人類文明發展史，現代文明發端於人的現代化，即人的覺醒，擺脫古代和中世紀專制的思想禁錮，認識到人應該有

獨立的人格和尊嚴，享有不可轉讓和侵犯的基本權利，首先是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這就是現代人的人權意識。舍人權而侈談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205 年前法國的《人和公民權利的宣言》即已明白揭示：“對人權的無知、忽視和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同樣印證了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隨著 20 世紀 40 年代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爭取和維護人權已經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識。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宣告：“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中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並且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理應率先恪守聯合國有關人權的各項公約，而不應因國內的人權問題而成為國際輿論的譴責對象。

為此，我們呼籲當局果敢地結束我國幾千年來因思想、言論、文字治罪的歷史，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問題而被關押的人員。我們認為，只有尊重人權，確保公民各項應有的權利，社會才有真正的安定；否則，只會激化矛盾，誘發動亂，以致一發而不可收拾。

許良英　王來棣　丁子霖　蔣培坤

邵燕祥　劉　遼　張抗抗

1994.3.9

27、為實現國內寬容而呼籲

1995 年 4 月，三叔獲悉 1995 年是聯合國寬容年。他根據

自己多年來對科學史和近代文明史的研究，起草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

呼籲書指出：寬容是現代文明的基礎和前提，而中國幾千年定於一尊，不容有第二種聲音的遺風至今未衰，這是實現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必須上下努力，改變這種狀況。為此，希望當局以寬容精神對待各種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不再把有獨立見解的人當作“敵對分子”；重新評價“六四”事件，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和信仰問題而被關押的人員，結束我們自古以來的文字獄這一不光彩的傳統。

這個呼籲書得到了幾位知識界德高望重的前輩熱忱支持，如三叔的恩師、88 歲高齡的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91 歲高齡的老作家樓適夷先生、以敢於直言著稱的老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倫理學教授周輔成先生和劇作家吳祖光先生，他們都認為寬容是醫治我國社會病態的良藥。

鑒於缺乏寬容是全社會的通病，不僅要向當局呼籲寬容，也要向社會公眾呼籲寬容。因此，三叔除了請有成就的科學家，還有選擇地請 1978-1979 年北京西單民主牆時期和 1989 年民主運動的代表性人物簽名。他們共 8 人，都是素質較好而受過不寬容待遇的年輕有為者。他們都主張中國民主化道路必須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反對搞地下組織和地下活動，反對搞造反運動，而這些也是寬容精神所要求的。

這份呼籲書由王淦昌先生和樓適夷先生領銜，簽名者共 45 人，其中自然科學家 21 人，社會科學家 12 人，文學家 4 人。45 人中將近半數是中共黨員，而其中大多數是老地下黨員（至少 15 人）。

5 月 15 日，三叔以個人名義分別給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寫信，並附有呼籲書和簽名者簡介的

影本。

寬容呼籲書於 5 月 16 日公開發表後，當晚《美國之音》發佈了有關消息，和記者對三叔的採訪談話。世界各大新聞媒體也都相繼報導了這個消息，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為了在國際寬容年裡，進一步在世界上提倡寬容精神，全球各國、各行各業的一批知名人士共同發起了一個簽名運動：凡是支援這個呼籲書內容的人士，不分國籍、種族和宗教信仰，都以簽名的方式，表達了對人類價值和尊嚴的一致，和對中國大陸這些勇敢的科學家、學者、人權人士表示支持和敬意。

這個運動不設時限，在世界各國由積極參與的組織和個人推動。到 7 月 17 日，已經有來自北美、歐洲、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各地 1120 名知識界人士，在這個寬容呼籲書後面簽了名。其中有 10 位是諾貝爾獎獲得者（5 人獲和平獎、2 人獲化學獎、2 人獲生物醫學獎、1 人獲文學獎）。

寬容呼籲書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是，在國內，當局卻反而顯得更加不寬容，對簽名者進行威脅、監視，簽名者先後有 7 人被警察傳訊，拘捕了黃翔、王丹、劉念春三人。1996 年 10 月，被關押 17 個月後的王丹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刑十一年。

在寬容呼籲書發表的第二天，來了一批警察“守護”三叔住的那座樓的樓門口（他們這座樓有 6 個簽名者）。自從 1994 年 3 月三叔他們發表《改善我國人權狀況的呼籲書》以來，這已是司空見慣了。

5 月 18 日下午，劉剛的弟弟劉勇和原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學生武運學，要來看三叔，迄未見蹤影，直到一個多月後，劉勇來電話，說他們那天剛進樓的電梯，就被警察扣了，他們在拘留所關了一個月，武運學一直下落不明。

5 月 21 日晚，浙江大學有位女研究生找三叔談她的畢業論文事，她下樓後被警察扣留了 4 小時，直到深夜 12 點才放她回去。她身上還帶有三叔托她帶到杭州轉寄給我的有關呼籲書材料的信件，幸好未被警察搜去。三叔寄給我的重要信件往往不知道在哪里“失蹤”，所以他不得不用另外信封，不寫上自己的地址，到別處郵局投郵，這樣才可“平安”收到。

我與原任妻子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1988 年終於離婚。1992 年 12 月，我再婚，妻子章桂蘭，黃岩人，普通工人。1995 年 7 月，我偕同妻子，第二次進京去看望三叔，住在木樨地三叔小兒子許平單位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宿舍。

到京後的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告訴三叔：我和桂蘭打算上午到圓明園遊玩後，再去中關村。由於我們在那裡玩得較遲，順便在外面吃了中飯，午後才到他家。

三叔告訴我們，昨夜他家的電話被竊聽，當局知道今天有美國負責人權方面的人士來訪，上午突然又來了警察“守護”在他家的樓門口。

三叔見我們上午沒有到他家，曾多次下樓看看情況，以為我們被警察“扣留”了。我們的到來，才使他放心。

在他家吃了晚飯，三叔不放心我們單獨回去，與三嬸一起，一直把我們送到公車站，看著我倆上車後，才放心地回去。

另據三叔說，美國電視臺來到他家拍攝採訪錄影，搶在《寬容呼籲書》發表的前夜。當他們得知第二天《紐約時報》將要發表呼籲書，就趕在前夜 11 點鐘來採訪。果然，第二天就有警察“守護”家門口，不讓任何人進入。這個有 10 多分鐘的錄影，1998 年，我第三次進京時，三叔親自放給我看。

1994 年 6 月，三叔被選為美國紐約科學院院士。

7 月 17 日，三叔來信說：

“……一個星期前收到紐約科學院（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公函，通知我已被該科學院選為‘院士’（Fellow），並寄來院士證書（1994 年 6 月發），還邀請我今年 9 月去參加科學院的年會，由於健康條件，我是不會去。”

1995 年 9 月 21 日，三叔獲紐約科學院頒發的“科學家人權獎”，表彰他對中國民主化發出的呼籲和為民主自由作出的貢獻。這項人權獎是以紐約科學院前院長佩格爾斯（Heinz R. Pagels）命名的。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方勵之等，也曾獲得此獎。紐約科學院院長在宣佈評獎結果時，特別提到三叔 1995 年 5 月發起的關於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紐約科學院曾在國際科學界為此呼籲書徵集簽名。

我於 1995 年 10 月 2 日晚，在《美國之音》的“中國報導”節目第一條新聞中聽到以上消息的。不久，三叔給我寄來了他在接受頒獎時的“書面發言”。

“書面發言”，全文如下：

女士們，先生們：

感謝紐約科學院頒發給我 1995 年度 Heinz R. Pagels 科學家人權獎。由於不能親自去領獎，只好委託摯友方勵之教授代為領取。

鑒於人權與寬容密不可分，而今年又是聯合國寬容年，5 月間我聯合 44 位老中青知識份子（多數是科學家）發表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在國內外引起了相當廣泛的反響。聽說北美、歐洲、亞洲、非洲各地已有數以千計的科學家、知識份子和社會活動家在這份寬容呼籲書上簽了名。但令人不解的是，1995 年已過去三分之二，而聯合國至今未見公開發佈有關“寬容年”的文告和號召。為此，我強

烈希望紐約科學院和有關人士通過各種管道，敦促聯合國迅速開展關於“聯合國寬容年”的各項活動，特別是向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國家，深入、持久地宣傳寬容精神和人權思想，使《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精神得以普及深入到全世界各個角落。

我國人權紀錄之糟，世人有目共睹。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有賴於國內外關心人權人士的不懈努力。遺憾的是，美國某些在中國做生意的政客，出於商業的私利，竟昧著良心為中國當局踐踏人權的惡行辯護。最近，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也加入了這一為虎作倀的行列，他以卑劣的手法破壞我們的寬容呼籲書的聲譽。對此，我已於 7 月 30 日撰文予以揭露。現在，我也希望紐約科學院和美國朋友關注類似事件，盡可能使科學界不再出現象 Lenard 和 Stark 這樣甘為納粹幫兇的敗類；即使出現了，也能及時予以迎頭痛擊，以保持科學聖殿的淨潔。

讓我們攜手為捍衛全人類的人權共同奮鬥到底！

謝謝！

許良英

1995 年 8 月 19 日於北京

1996 年 4 月 22 日晚，我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聽到三叔被評選為“傑出民主人士”的消息報導，此獎由美國中國民主基金會頒發。

4 月 23 日晚和 4 月 24 日早上《美國之音》報導了同一消息。

5 月 5 日晚和 5 月 6 日早上，《美國之音》報導頒獎儀式在美國三藩市舉行，同時播放了方勵之在儀式上代三叔領獎時，介紹三叔情況的講話。

1989 年“六四”後，方勵之教授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從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轉移到第三國，隨後才來到美國。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是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海外媒體曾多次報導，三叔是方勵之的密友。他說：“我的政治觀點都來自許良英！”三叔於 1994.7.17 給我信上曾提到這件事：

“隨信附寄 Merle Goldman：《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書中幾個片斷的影本。文中加劃的，都是錯誤和不準確的。作者是 Boston 大學中國歷史教授，近 20 年出版過二本關於中國知識份子的書，可惜她不懂中文，無法深入瞭解中國的實情。1987 年她和丈夫（是蘇聯問題專家）、孩子來看過我們，以後又見過三次面。5 天前（7.12 晚）她來時，我談了對她這本書的一些意見。當我指出，P.199 上說我的‘民主觀很大的影響了他的年輕同事方勵之，方勵之又轉而影響了中國的學生’，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方勵之是根據自己在國外的親身感受而獲得民主思想的。想不到 Goldman 反駁說：1991 年方勵之在波士頓親口對她說過：‘我是搞科學的，我的政治觀點都來自許良英！’方勵之會說這樣的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將來有機會見到方勵之時，要問個清楚。”

*附：三叔致江澤民、喬石信和《迎接聯合國寬容年　呼籲實現國內寬容》及簽名者簡介：

致江澤民、喬石

今年是聯合國寬容年。我根據自己多年來對世界科學史和近代文明史的研究，深感寬容在人類文明發展中至關緊要，而

我國傳統文化中卻缺乏寬容精神，習慣於定於一尊，強求思想意識一律。寬容精神的缺乏，正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主要障礙。為改變這一狀態，我起草了一個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得到了我的恩師、八十八歲高齡的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和幾位知識界前輩（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作家樓適夷先生等）的支援，也得到了許多學術界朋友（大多是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幾所著名大學的教授）和一些青年朋友（他們都身受過不寬容之害）的支持。現寄上有四十五人簽名的呼籲書，請本著自己的職責予以考慮採納，以利我國現代化和社會安定。

此致

敬禮！

許良英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迎接聯合國寬容年　呼籲實現國內寬容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聯合國大會通過“48/126”號決議，宣佈一九九五年為“聯合國寬容年”（The United Nations Year for Tolerance），以紀念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弘揚聯合國宗旨所體現的基本精神：寬容。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又是安全理事會中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自應認真執行這一決議，使對於我國比較陌生的寬容精神，得以在我國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教育等領域中生根茁長。

寬容是人類文明的標誌，是現代文明的基礎和前提。西方啟蒙思想家從反對中世紀封建神權專制統治的長期鬥爭中認識到寬容之可貴。他們及其後繼者在取得政治自主權之後，不

走歷史專制王朝的老路，而是以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作為建國基本原則，不強求意識形態的一律，對各種思想、信仰、習慣、行為採取寬容態度，容許少數人有保持和公開發表自己見解（包括政治、宗教、科學、文藝等方面）的自由。由於有了這種寬容精神，科學、文化呈現了持久的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那種把思想上的“異端”看作洪水猛獸，以致把布魯諾（Bruno）當眾燒死，用刑訊強迫伽利略（Calileo）放棄地動說這類歷史悲劇，也就不再重演。

反觀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幾千年來定於一尊，不容有第二種聲音的遺風至今未衰。一九五五年，由於上書陳述自己的文藝觀點，胡風及其同伴被作為“反革命集團”定罪，受牽連者二千餘人。一九五七年，響應“整風鳴放”號召敢於直言的知識份子統統被打成“右派”，人數占全國知識份子總數的 11% 以上（至少五十五萬人），至於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對文化進行“革命”的十年浩劫，更是一場消滅異己的民族大災難。一九七八年以後情況有所改變，上述冤假錯案基本上得到平反，初步出現了寬鬆局面，經濟開始高速發展。可是，由於缺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所必需的寬容精神，結果還是導致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場震驚世界的人間慘劇，以及隨後一系列侵犯公民基本權利事件。

為迎接聯合國寬容年，我們當盡力傳播現代文明所不可缺少的寬容精神，促使《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這一聯合國宗旨在我國真正落實。

為此，我們希望當局：

（1）以寬容精神對待意識形態、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種見解，不再把有獨立思想和獨立見解的人當作“敵

對分子”，加以壓制打擊、監視、軟禁，甚至拘捕。

（2）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並釋放尚在獄中的有關人員。

（3）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和信仰問題而被關押的人員，果敢地結束我國自古以來的文字獄這一不光彩的傳統。

同時，我們也希望全社會培育尊重他人的寬容精神，宣導以理性、公正態度處理各種矛盾和衝突，以和平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見解，避免激化矛盾的極端情緒，切忌暴力行為，只有這樣，我國才有可能穩步走上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道路。

當然，提倡寬容，決不意味著不分是非善惡無原則的一團和氣，更不是從容聽任敗壞道德、危害社會的惡行，寬容同現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概念密不可分，相輔相成。寬容是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條件。寬容體現為對人權和自由的尊重，又以道德準則和法律為界限。當前我國腐敗成風，權錢交易，侵吞公共財產等貪污腐化現象比比皆是。對所有禍國殃民的竊國盜賊必須除惡務盡，嚴懲不貸。但必須認識到，沒有民主監督，特別是獨立輿論的監督，腐敗不可能根除。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Lord Acton）早在一百零八年前就已指出：“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一七八九年法國的《人權宣言》更是明白昭示：“對人權的無知，忽視或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應該成為我們舉國上下的共識。實現寬容，必將有力地推進當前全國人民所關心的反腐敗鬥爭。

世界需要寬容。中國需要寬容。我們希望，通過聯合國寬容年的各項活動，我國自古留存至今的不寬容狀況得以開始改變，寬容將逐漸成為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共同精神財富。

寬容呼籲書簽名者簡介

王淦昌：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八十八歲。

樓適夷：作家、翻譯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顧問，九十一歲。

楊憲益：翻譯家，八十歲。

周輔成：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八十五歲。

吳祖光: 劇作家，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許良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呼籲書的發起人和起草人。

林　牧：原中共西北大學黨委書記，呼籲書的發起人。

過興先：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研究員，原學部副主任。

薛禹穀：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

朱兆祥: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原寧波大學校長。

胡濟民：北京大學核子物理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

黃宗甄：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編審。

汪　容：浙江大學理論物理教授。

王來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中立：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副教授。

胡亞東：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研究員，原所長。

王悅先：浙江農業大學生物化學教授。

李佩珊：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黃　煒：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業務處處長。

董光壁：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范岱年：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周明鎮：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世界古生物學會主席。

許國志：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原副所長。

蔣麗金：中國科學院感光化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常委。

丁子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蔣培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胡作玄：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　遼：北京師範大學理論物理教授。

董延凱：北京師範大學數學教授。

王富仁：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授。

吳　震：西北大學物理教授。

王若水：原《人民日報》副總編。

汪子嵩：原《人民日報》理論部副主任。

張宣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原副所長。

梁志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黃　翔：詩人。

包遵信：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淩雲：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員。

陳小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貴仁：原華岳出版社副總編。

王　丹：原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

吳學燦：原《人民日報》記者。

江棋生：原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

劉念春：原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

楊　海：原青島海洋大學環境生態系學生。

28、為王丹辯護

王丹，原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1989 年中國民主運動的主要活動骨幹。“六四”事件後，被中共當局列為 21 名被通緝的學生之首。1989 年 7 月被捕，1991 年被判處 4 年有期徒刑。他坐了三年又八個月的牢，1993 年 2 月，獲得假釋出獄。出獄後第三天，王丹就由他父親王憲曾陪同來看望三叔。他說在獄中交代，他思想受三叔和方勵之、李淑嫻夫婦三人的影響最大，三人中又與三叔交談次數最多。獄方如獲至寶，認為他們三人該是他的“黑手”了，他是受了三叔他們的“指使”。他坦然回答：“如果我當初真的聽了許良英他們的話，我就不會來到這裡（指監獄）。”事實也確實如此。

三叔與王丹認識是在 1988 年秋天，他當時只有 19 歲，已在北大政治系讀了一年，剛剛轉到歷史系，他知道三叔 1957 年因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而被劃為“極右分子”，1986 年 11 月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想同三叔討論如何寫反右運動的歷史問題。在這次交談以前，王丹曾在由劉剛發起的“草地沙龍”上聽過三叔的演講：《談談民主概念的基本認識》，活動場所在北大校園內賽凡提斯像前面的草地上。“草地沙龍”中止了半年，王丹約了二、三十位同學辦起了“民主沙龍”。

王丹在發起“民主沙龍”的同時，又參加了歷史系同學組織的“文革歷史研究會”。12 月，王丹曾為研究會籌辦的刊物採訪過三叔。這個刊物流產後，他和一些同學辦了一個油印刊物《新五四》，請了不少校外的顧問，三叔也在其中。在此後半年內，三叔與王丹有過多次交談，議論的主題是從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到新權威主義和籌安會，以及當前的中國民主思想啟蒙運動問題。

1989 年 3 月，三叔還曾約王丹談心，勸說他，學生的基本任務是學習，首先要把功課學好，要好好完成 4 年學業，不要放棄學業成為社會活動家。隨後就爆發了學潮，三叔與他 4 年沒有見過面。學潮期間，三叔也曾給他們潑冷水，認為學生的基本任務是學習，不可長期罷課，希望各校立即復課；在他們醞釀絕食時，也盡力勸阻，但都無濟於事。

王丹於 1993 年 2 月恢復自由後，仍然不時受到監視、干擾、跟蹤。1994 年“六四”後，公安機關對他的監控更加嚴密，也更加嚴厲。平時，總有八、九個人，兩輛轎車，一輛摩托車，駐守在他家樓下的傳達室，進行 24 小時嚴密監控。王丹只要一出家門，“便衣”、機動車、摩托車一齊出動，緊跟其後。對於這種非法的跟蹤行為，王丹曾多次提出抗議，還控告到法院，均視若罔聞。後來，這種非法行為發展到更加嚴重，從跟蹤到恫嚇，王丹不得不向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士發出求援，《求援信》全文如下：

向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士發出的求援信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針對中國公安部門對我採取的非法監控行為，我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訴書，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侵犯我的人權。十二月七日，政府對我採取了瘋狂的報復措施。當日，我依慣例去北京圖書館看書，一出家門，六七個便衣特務就四面跟蹤上來，汽車、摩托車在我身後盤繞，表示示威。在北京圖書館閱覽室裡，幾名便衣用極為難聽和惡毒的下流言辭對我進行辱罵，並當面表示：“你一出門，就打死你。”幾個人還當場商議：“他一出來就揍他。”

中共當局的這番舉動毫不掩飾地暴露了它的踐踏人權、橫

行無忌的本來面目。他們不顧國際輿論的譴責，步步升級地加緊對我的迫害，更是明目張膽地向國際人權理念挑戰。

自從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出獄後，我始終堅持呼籲加快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我的一切行動都以“理性、非暴力、合法”為原則。但是即使如此，也不為當局所容，現在當局已經借手下人之口，明白無誤地向我表示了欲置我於死地的決心，我的生命安全受到毫不掩飾的威脅。

我知道我將會為了中國的民主化事業付出生命和鮮血的代價，這個時刻眼看就要到來了。但是我絕不為此而畏縮一步，我發誓：在死亡降臨到我身上的最後一分鐘，我也不會放棄和平抗爭，不會放棄為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貢獻我微小的努力的決心。

我呼籲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士關注我目前受到的政治迫害，我呼籲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其他國際人權組織做出反應，敦促中國政府停止對我的迫害行為，並承諾保障我的人身安全。我向所有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士求援，請你們伸出無私的手，幫助我擺脫對生命的威脅，幫助我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王丹

1994.12.7

緊急發自北京

1994年12月10日——11日，《美國之音》的“中國報導”節目，接連播送如下內容：

二十二名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人士最近發出聯合公開信，支持中國前學生運動領袖王丹控告北京市公安局違反公民

權的行為，並要求中國警察停止對王丹的騷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姜川的綜合報導。

“素有‘中國良心’之稱的中國著名科學史專家許良英先生，同多名其他中國知識份子聯合發出呼籲，要求中國公民和外國觀察家加強對中國人權狀況的監督。這封公開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國警察停止繼續騷擾學生領袖王丹，並藉此使世界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惡化予以關注。

據《南華早報》和法新社報導，早先時候王丹曾狀告北京市公安局，說其違反了他的公民權利。現為自由撰稿人的王丹說，‘在他發出起訴書的兩天后，公安局便衣跟蹤他到圖書館，並威脅說要打死他。公開信對北京市公安局的行為表示震驚和憤怒’，並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威脅王丹個人安全和自由的行為。公開信同時說，他們希望所有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國內和國外人士更加密切地注意這一事件的發展。

法新社說，今年 75 歲的許良英教授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1993 年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所改善，但是今年的情況要惡化了許多。法新社援引許良英的話說，今年夏天雖然監視有所減少，但在加拿大總理訪華期間，他卻被便衣警察軟禁在家。

今年三月期間，許良英教授和他的妻子王來棣，會同丁子霖等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聯合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寫信，敦促他改善中國人權狀況並譴責逮捕異議人士的行為。法新社報導說，王丹在給國際媒體的一封傳真聲明中呼籲，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停止警察的迫害行為。法新社說，雖然王丹幾天前已經把對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訴書郵寄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但是法院的發言人表示，他們並沒有收到這一起訴。另一方面，世界人權組織發表聲明，譴責北京市公安局的行為，並同時對在公開信上簽名的 22 位中國異議人

士的安全表示關注，認為他們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發表這封公開信的。”

為保障王丹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的緊急呼籲

自從今年六月份以來，王丹受到了當局的全天候監視，並進而發展到被貼身跟蹤。十二月七日上午，王丹依慣例去北京圖書館看書，六七名便衣特務從四面跟蹤而來，並以汽車、摩托車在王丹身後盤繞。在北京圖書館閱覽室裡，便衣特務們用極為難聽和惡毒的下流言詞對他進行辱罵，並威脅說：“你一出門，就打死你。”幾個人還當場議論：“等他一出來就揍他。”

當局的這種舉動嚴重地威脅著王丹的人身安全，是對人權極端粗暴的踐踏，我們感到震驚和憤慨。希望當局立即解除對王丹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威脅，並希望國內外關心人權的人士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

許良英、王來棣、丁子霖、蔣培坤、林　牧、包遵信
劉　遼、馬少方、楊　海、吳雙印、張建康、楊寬興
閔　琦、邵　江、劉念春、宋旭民、馬少華、劉賢斌
張宗愛、鄭寶和、高軍生、王淩雲

1994.12.8 北京

我們的呼籲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喬石委員長暨各位常委：

我們看到王丹發出的求援信和許良英先生等發出的緊急呼籲後，對於這一事態的發展極為關注。我們支援上述呼籲，希望當局本著理性的原則，在法律的範圍內對這一問題作出妥善公正的處理，並呼籲解除對王丹人身自由的限制，確保他的人身安全。

楊憲益、吳祖光、陳小雅

鄭緒光、郭海峰。

從 1994 年開始，儘管公安部門對王丹及其他持不同政見者嚴加監控，但這只能控制他們的行蹤，卻無法遏制他們渴望自由、追求民主的理念。一種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他們時刻關注國家的進步、民族的命運。

1995 年 5 月 15 日，發表了由王淦昌先生領銜、由三叔起草的《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在這個呼籲書上，王丹也簽了名。這個呼籲書，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可是，在國內卻反而顯得更加不寬容，當局對簽名者加緊了監視、威脅。

在呼籲書發表後的第三天，我收聽到《美國之音》記者對王丹的採訪談話。當記者問他：“你在呼籲書上簽了名，當局會對你怎麼樣？”王丹回答：“他們對像王淦昌先生、許良英先生那樣的人，不會怎麼樣；可是，他們對我，可能要把我抓起來。”果然，被王丹所言中，不出所料，沒過幾天，5 月 21 日，王丹在家中被警察帶走，並且再次被抄了家。

王丹在“失蹤”17 個月後，於 1996 年 10 月 3 日被“正式”逮捕。王丹的命運牽動著海內外許多人的心。

王丹再度失去自由一年後，三叔即表明，如果又給王丹判

刑，他要公開為他辯護，以示抗議。因為他認為自己對王丹有比較深入的瞭解，確信他不僅無罪，而且是當前變革時期中推動社會進步的健康力量，他有責任讓世人瞭解王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1996 年 10 月 30 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王丹 11 年徒刑。

王丹被判重刑，舉世譁然。許多國家的政府感到震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言論自由是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承認的權利，他呼籲“中國當局赦免這位勇敢的人物”；英國政府對王丹被判重刑表示：“我們對於王丹接受的重刑感到驚愕。”……他們“促請中國政府表現仁慈，早些釋放王丹”；法國政府對中國不理會歐洲人的感受和關注感到失望。法國加入要求重審此案及修改判決結果的聲音；捷克總統哈威爾發表聲明，對王丹再次被判刑“深表不滿”；即將訪問中國的瑞典首相佩爾松發表談話，認為中國政府判決王丹“應受責難，它顯示中國的人權政策正在倒退。”

當三叔得知王丹被判以重刑，極為憤慨，他不顧當局的阻撓和重重壓力，奮筆寫出《為王丹辯護》一文，向世人昭示真相。

三叔根據事實和情理，對王丹這一莫須有的罪名，予以徹底批駁，指出這種判決與“反右”、“文革”時的無數冤案如出一轍，是國家、民族之不幸。他為這位 1970 年出生、已坐過 5 年牢、願為中國民主事業獻身的青年的善良而純真的心聲所感動，噙著熱淚寫完這個辯護書。11 月，三叔給我寄來一封流亡巴黎的自由撰稿人安琪寫給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同人的信的影本，全文如下：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同人:

你們好!

十月三十號，王丹被判十一年重刑，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重視，貴台對此也作了報導。遺憾的是，國際關係重經濟、輕政治的價值取向，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在中國政府以經濟利益相要脅的情況下，失去了應有的壓力。因此，中國政府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重判王丹，應該引起國際社會的反思。

讀到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許良英先生《為王丹辯護》的文章，很有感慨。這是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為民運領袖辯護的最有分量的文章。作者用說理和分析事實的方法，從法理的角度，對中國政府的倒行逆施進行了批判，既有歷史性，又有現實性。這樣一種理性批判，透徹而有深度，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我想即使中國當局看了，也難以否定其客觀性。

同時，作為密切關注王丹成長的學者，許先生對王丹的評價是中肯而符合實際的。王丹的思想成熟過程和他的為人，使我們感到首先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而不是飛在天上的“明星”。我認為，民運精英如果能忘記自己幻化的光環，首先承認自己是一個人，真正關注人類的終極理想，那麼，中國的民主事業才有了基本的出發點。

許良英先生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下，公開為王丹辯護，顯示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懷和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大無畏精神，對此我表示由衷的敬佩。

由於《為王丹辯護》不可能在國內公開發表，特請法國國際電臺將此文播出，以便讓更多的人聽到這種正義的聲音。

謹此

致意!

流亡巴黎的自由撰稿人：安琪

1996.11.19

王丹被判刑後，發配到遼寧錦州監獄關押。在國內外正義呼聲的壓力下，中國當局於 1998 年 4 月 19 日，將王丹“保外就醫”，直接送達美國。王丹終於獲得了自由。

在王丹初到美國不久，有記者採訪他，這位嚮往讀書、志在成為一個獨立知識份子的青年學子，在紐約與記者進行了坦誠的交談。

《北京之春》1998 年 6 月號，發表了題為《對獨立知識份子的真誠嚮往——訪‘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的訪談錄（記者：亞衣）。現選錄其中幾段：

記者：前面提到您在八九民運之前就參與校園民主運動，包括參加“草地沙龍”以及後來主持“民主沙龍”。請說一說這方面的活動過程。

王丹：“草地沙龍”是劉剛主持的，1988 年 5 月 4 日開始，第一次請的就是方勵之，然後每週一次，先後請過許良英、邵燕祥、吳祖光和洛德、包伯漪夫婦。到了 6 月，北大發生了柴慶豐事件，“草地沙龍”也就這樣結束了，前後總共舉行過 5 次。可是我覺得這種沙龍的形式非常好，停了可惜，就邀請一些人重新開始，叫“民主沙龍”，從 88 年 11 月份開始，一直到 89 年 5 月，每星期一次，自由參加，在沙龍開始前先貼出海報，通知活動時間。我們先後請了吳祖光、李淑嫻、戴晴、任畹町等，都是一些自由化的知識份子。主要是傾聽他們介紹一些思想界的發展情況，使得學校與校外保持一種溝通。每次活動就是主講人來了之後就向他提問，討論交流。我們的主旨

就是“民主沙”與“沙民主”；這是民主的沙龍，內容就是民主的問題，以議論政治問題為主。

記者：中共當局曾經把方勵之和李淑嫻說成是您參與政治活動背後的“黑手”，這當然是一種誣陷。不過方、李兩位老師對中國一代青年確實有過很大影響。

王丹：我認識方老師和李老師是在“草地沙龍”活動的時候，也是方老師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遭受批判處理之後，由於青年們具有一種逆反心理，大家對他們更加欽佩。後來我經常去他們家。方老師從科大回到北京之後，我成了他們與北京的大學生們聯繫的一個管道。方勵之與李淑嫻兩位老師對我的影響不一樣。李淑嫻老師對我主要是一種關懷，對我個人發展的前途包括生活方面的一種母親般的關心。方老師對我來說更多是一種人格魅力，大無畏的精神和看問題的深刻。他對我思想認識最深的是一種很理性的知識份子的立場。就是說，一個知識份子在政治上要採取一種理性的立場，這對我啟發很大。另外還有一些思想概念，比如民主是天賦的但不是恩賜的，要通過努力去實現；還有就是，他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的生活實踐本身，對我們就是一個很大的教育。

記者：許良英先生是中國老一輩知識份子的優秀人物，對您也有過很大的影響，曾公開發表文章為您辯護。

王丹：我與許先生的認識也是開始於 1988 年的“草地沙龍”。後來我打算搞 1957 年反右鬥爭歷史的研究，據我所知許先生是中國科學院系統揪出來的第一個右派分子，我就去採訪他，他告訴我反右運動很複雜，建議我先收集資料，要寫文章等到歷史系畢業時也不遲，我接受了他的意見。我還參加系裡的“文革歷史研究會”，為了籌備研究會的刊物又訪問過許先生。許先生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東西，主要是一種知識

份子的骨氣，這也是許多人之所以敬重他的原因。他的特點是剛直不阿，還有嫉惡如仇，有人說許先生凶，其實他是對觀點而不是對人。我始終認為許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的這條基本人生道路受許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告訴我一個知識份子不僅是一個工程師、教授、專家或者技術人員，首先應當是一個關心社會事務，有社會責任感，一個介入和參與社會事務的人。知識份子與一般文人或學者專家的稱號是有區別的，要無愧於“知識份子”的稱號。

記者：許先生是愛因斯坦問題專家，他和范岱年、趙中立先生編著《愛因斯坦文集》三大卷，在 70 年代底到 80 年代的中國起了重大社會影響。

王丹：他經常和我講愛因斯坦；一生研究科學，又有很大貢獻，但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在核武器問題上，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後來關在監獄中的時候還在讀《愛因斯坦文集》，主要是第三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自然科學的內容我看不懂。

記者：1989 年 2 月許先生曾經委託您替他出席一次新權威主義的討論會，據說您在會議上的發言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王丹：那時在北京市委黨校召開的一次當代政治思想討論會。許先生因為身體不適無法出席，就委託我和另外兩個學生參加。在發言中我談了新權威主義的十個“誤區”，認為在新權威主義後面有新極權主義的陰影。這種政治設計缺乏民主政治過渡的可靠保證。我的發言後來在《深圳商報》上發表了，當時參加會議的不少新權威主義鼓吹者當然不同意我的觀點。我記得當時還提出要和王軍濤辯論，可惜他不在現場。現在看來，王軍濤的主張與新權威主義也有不一樣的地方。不管怎樣，中國知識界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討論突破了一些政治禁

區，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記者：在我所看到的範圍內，社會公眾輿論對您的評價似乎相當高。許良英先生說您心地善良，虛心好學，待人熱情寬厚，性情溫和開朗，關心國家命運，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同情苦難者而不計較個人恩怨。李淑嫻老師也告訴過我，您是一個挺好挺好的孩子。陳小雅則認為在您的心中有一種超越小圈子裡的屬於全人類的價值的存在。您如何看待這些讚揚之詞？

王丹：我覺得這些都是一種過高的厚愛。我也認為這種比較高的評價完全是一種對比的結果。有些長輩或者老師對國內外一些人士或者一些事情表示失望，而我一直在監獄裡，說實話也沒有機會犯錯誤，有條件保持一種基本上沒有過指責的狀態。所以很多人就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我能不能承受得了這種厚愛，還要讓實踐來說話。我個人覺得自己都沒有很大的信心，但是我會儘量去做。對個人的評價總是要由歷史去做的，我剛剛到海外，大家不要貿然下結論。（記者：有些媒體說您是“中國民運的新希望”）那我就更擔當不起了。我對自己的希望和抱負始終是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如果能夠這樣，我覺得就是盡到自己的責任了。如果說到我的真正的政治野心，我早就說過了，是當北大校長。

1998 年 8 月，王丹的母親王淩雲，在女兒和外甥的陪同下，前往美國探親。母子終於在美國相聚，王丹興奮地向他們介紹波士頓，陪同她們遊覽哈佛廣場，一家老小漫步在哈佛大學校園，王丹要在這裡完成他在北京大學未竟的學業。

1999 年 1 月，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王淩雲所著的回憶錄——《歲月蒼蒼——我與兒子王丹》。

她請三叔為此書作序，三叔欣然答應。書中序言，還配有

一張作者提供的三叔與王丹合影的照片。(照片說明寫道: “王丹同恩師許良英先生在一起”。) 此照片於 1993 年 2 月王丹第一次出獄來看三叔時，在三叔家中愛因斯坦畫像前拍攝。“序”的第一段抄錄如下:

“這是一本不同尋常的回憶錄, 作者王淩雲女士以凝重感人的筆觸訴述了她的兒子王丹兩次被捕入獄前後母子二人的遭遇和情思，譜寫了一曲令人憤慨和辛酸的悲歌，它既有震撼力，又發人深省。由於對自由民主的共同的真誠追求，王丹和我成了忘年之交；他的不幸遭遇，又使我和他的父母成了知交。我為王丹有這樣一位正氣凜然、威武不屈的母親而感到欣幸。出於這種緣分與情誼，王淩雲囑我為她這本洋溢著風雨如晦歲月中相依為命的母子情的回憶錄作序，我自當欣然應命。”

附:《為王丹辯護》

為王丹辯護

王丹於 1996 年 10 月 30 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 11 年徒刑，舉世譁然。這不禁令人回憶起 1955 年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冤案, 1957 年將 55 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的冤案，以及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冤案。想不到在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標榜解放思想，許諾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改革開放”十年以後，竟然又出現象王丹這樣的大冤案，不能不使人感到意外和震驚。更使人感到意外的是，號稱法制建設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的今天，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對王丹的

《起訴書》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中所顯露的思維方式、邏輯推理以及所使用的語言，都與 41 年前對胡風因給毛澤東上 30 萬言書而被定為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的斷語，以及反右、文革時無數冤案的定罪書如出一轍。這無異是對所謂法制建設成就的極大嘲弄。

起訴書中控告王丹的罪名，要不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就是過去大家都熟悉的“無限上綱”，沒有一條是有真正事實依據的。對此，在法庭上，王丹本人、他的母親王淩雲和辯護律師楊敦先已一一予以批駁。開庭後不到 4 小時，法庭就匆忙作出判決。判決書只是刪去部分所謂“事實”，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起訴書中的帽子和結論。當日下午 1 點鐘新華社即對外國通訊社發佈了消息，隨後又發表了審判長的長篇談話，說這是一次“公開、公正的”審判。如果這真是一次“公開”的審判，為什麼除了王丹的直系親屬以外不允許其他親友和任何非官方人員旁聽？據外電報導，有兩位美國前司法部長、一位法國前司法部長和一位加拿大前檢察長要求旁聽，都遭到拒絕。不僅如此，審判當天，法庭外軍警密佈，如臨大敵，幾乎王丹所有親友的家門口都有警察監視，我住的宿舍樓也有幸從 10 月 1 日起天天有警察來“守衛”。更令人哭笑不得是，新華社關於王丹審判的新聞稿在國內只發表在英文版的《中國日報》上，所有中文報紙和廣播電視都不予披露，一邊對全國人民實行新聞封鎖，一邊卻自詡為“公開”，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見識了如此一場所謂“公開”和“公正”的審判之後，不無痛心地回憶起 48 年前國民黨政府設在杭州的“特種刑事法庭”對浙江大學兩名地下共產黨員的審判。特種刑事法庭是國民黨政府總崩潰前一年專門為了對付共產黨於 1948 年 3 月成立的。當年 8 月浙大地下黨支部書記不幸被捕（當時我是浙大

物理系助教，又是地下黨杭州工委委員，分工負責浙大工作，對處理此事件負有直接責任)。特刑庭審判時，給浙大和被捕者親屬發了 30 張旁聽證，竺可楨校長就親自去旁聽。審判結果，我們這個黨員被判 10 年徒刑。9 月又有一名地下黨員被捕，她供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結果被判 7 年徒刑。當時中共地下黨的任務是作為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從後方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就是要“顛覆政府”。對比之下，王丹只不過盡力以和平、非對抗的方式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他既不會搞“陰謀”，也從來沒有要“顛覆政府”的意圖，所有活動都是公開的，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的。就在大張旗鼓宣傳“精神文明”的今天，卻要對這樣一個青年判處比當年岌岌可危的國民黨政權判處共產黨員更重的徒刑，實在令人費解和深思。可以肯定，這對我國政府不可能是一件光彩的事，也不是一種有自信的表現。

今年 5 月，王丹再度失去自由一年後，我即表明，如果又給王丹判刑，我要公開為他辯護，以示抗議。因為我認為自己對王丹有比較深入的瞭解，確信他不僅無罪，而且是當前變革時期中推動社會進步的健康力量，我有責任讓世人瞭解王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1993 年 2 月王丹因 1989 年學潮坐了 3 年又 8 個月牢假釋出獄；3 天后就來看我，他說在獄中交代，他思想上受我和方勵之、李淑賢夫婦三人的影響最大，三人中又與我交談次數最多。獄方如獲至寶，認為我們三人該是他的“黑手”了，他是受了我們的“指使”。他坦然回答：“如果當初我真的聽了許良英他們的話，我就不會來到這裡(指監獄)！”事實確實如此。

他第一次找我是在 1988 年秋天，他當時只有 19 歲，已在北大政治系讀了一年，剛轉到歷史系，打算寫一部反右運動歷

史，知道我 1957 年因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而被劃為“極右分子”，1986 年 11 月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因遭當局禁止未開成，隨後方、劉被開除黨籍），想同我討論如何寫反右運動史的問題。我告訴他：反右運動很複雜，你年紀太輕，一時難以全面瞭解，等你歷史系畢業後再考慮也不遲。他接受了我的意見，並開始留意收集有關歷史資料。在這次交談以前，他可能在“草地沙龍”上聽過我講《談談民主概念的基本認識》。不過對此我不能完全肯定。這裡不妨順便澄清一個誤會，人們往往把 5 月間由原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劉剛發起的“草地沙龍”和以後由王丹發起的“民主沙龍”混為一談。草地沙龍只舉辦過 5 次，各次的主講人是：方勵之，我，吳祖光，邵燕祥，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夫婦。活動場所在賽凡提斯像的草地上。王丹大概是“草地沙龍”的熱心聽眾，在“草地沙龍”因柴慶豐事件中止半年後，他約了二、三十個同學辦起了“民主沙龍”，活動時間大概從 1988 年 11 月到 1989 年 4 月，我沒有參與過。

王丹在發起“民主沙龍”的同時，又參加了歷史系同學組織的“文革歷史研究會”，12 月間他曾為研究會籌辦的刊物採訪過我。我指出，文革和以前的反右、大躍進組成一個三部曲，這三項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一種“返祖現象”。這個刊物流產後，他和一些同學辦了一個油印刊物《新五四》，請了不少校外的顧問，我也在內。1989 年 2 月間有人籌畫新權威主義討論會，托王丹送通知給我，我因另有約會不能去，建議王丹代替我去，並告以新權威主義實質上類似於 1915 年為袁世凱稱帝作準備的“籌安會”。以後獲悉，他和另外一位北大同學在那次會上的發言，引起新權威主義鼓吹者的強烈不滿，計畫要對我們“開展全面的理論攻

勢”。

王丹第一次入獄前與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 1989 年 3 月下旬，是我偶爾讀到香港刊物上關於民主沙龍和王丹的報導後主動約他來談心。我懇切地對他說，學生的基本任務是學習，首先要把功課學好，要好好完成 4 年學業，不要放棄學業成為社會活動家。中國封建遺毒深重，民主決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長期觀點，不可急躁。當前首要任務是開展民主思想啟蒙，沒有這個基本建設，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次見面後不到 20 天就爆發了悼念胡耀邦的大規模學生運動。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後的第二天，我找了李淑嫻，希望她作為北大的人民代表（1987 年以 90%得票率當選的）和教師，規勸學生儘快結束罷課，恢復學校正常秩序。他和方勵之都表示同意。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幾乎與此同時，有人卻鼓動王丹放手大幹，不要怕坐牢，我們潑冷水的意見自然很不中聽了。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的出現，使矛盾突然激化，險象環生，我為青年人的生命安全擔心，希望他們保持冷靜理智的態度，千萬不可賭氣硬撞。5 月 10 日晚在人民大學青年教師主辦的“五四”70 周年紀念會上，我重申學生的基本任務是學習，不可長期罷課，希望各校立即復課；並且嚴肅指出，學生運動應保持自己的純潔性，不要讓校外人插手，因為民主運動很複雜，什麼人都會進來，有人會利用學生為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火中取栗，使學生成為個人政治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兩天后，王丹一個要好的同學告訴我，北師大和北大學生在醞釀絕食（要求當局收回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我深感不安，估計後果十分嚴重，建議他回校盡力勸阻，可惜已無濟於事。順便也要說明一下，當時方勵之、李淑嫻也同我一樣反對絕食，權貴們指責他倆“操縱”學潮，純屬莫須有的誣陷。

王丹 1993 年恢復自由後的兩年，與我交往較多，並經常給我來電話。看來他比以前成熟多了，但仍然有幾分童真和稚氣，連我家 10 歲的孫女也說他象個中學生。他說自己在獄中 4 年讀了上千本書，等於上 4 年大學。但我發現他由於沒有受過嚴格的理論訓練，缺乏精讀和對問題深思熟慮的習慣，讀書往往不求甚解，一些重要概念沒有搞得很清楚。他希望正式完成大學學業，一出獄就向北大申請複學，未果。後參加美國一所函授大學歷史系學習，讀了校方指定的一系列參考書，並用心地寫作業，但由於郵件被扣，不到一年就被迫中斷了。他心地善良，虛心好學，待人熱誠寬厚，性情溫和開朗，凡是與他交往過的年輕人和老年人幾乎都喜歡他。他關心國家命運，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他對受苦受難者深切同情，而對個人的恩怨卻不大計較，很少有仇恨和報復情緒。他矢志於中國民主事業，曾被官方認定是 1989 年學生運動的第一號人物，但他沒有人們屢見不鮮的那些以民運領袖自封者的權力欲和統治欲，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他不想當官，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做一個獨立的政治評論家。

這兩年，他對民主的理解比以前更深刻，更合乎理性。他出獄不久“奉命”去海南旅遊一趟，回來發表了一篇相當混亂的文章，題為《金錢制衡權力》，附和海內外一些流行的看法，以為有了中產階級就會民主。以後他認識到這種看法並不正確，知道要實現民主化，首先需要一批有民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並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批判精神，不依附任何權貴和勢力集團的獨立知識份子。前幾年有人熱衷於仿效歷史上那些改朝換代的造反、打江山、坐江山的經驗，認為當前民主運動應該與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相結合，把工人、農民發動起來。王丹不為所動，並且與這些人保持距離。他多次寫文章聲明：“民

主運動不是造反”，“民主運動不是反政府運動”，“維護人權不是顛覆政府”。他始終認為，爭取民主的運動應該是民主的，理性的，和平的，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公開的，反對任何暴力行為和秘密的地下活動。這明白無誤地表明，他不僅不會，也反對搞“陰謀”活動；他公開發表不同於官方輿論的意見，不是要推翻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在 1994 年 3 月給全國人大代表的公開信中說，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社會穩定，推進民主進程”，他的行為“不是指向政府，而是針對具體問題”。但他意識到，“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中，對政府的行為提出異議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我已經做好了為此受到專政極權鎮壓的準備。但是我不會後悔。我相信我的行為是正義的”，符合他“出獄時對自己提出的三條要求：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歷史，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今天重讀這樣一曲善良而純真的感人心聲，不禁老淚縱橫。他的言語不幸而言中，而他竟被判處如此重刑，這是國家、民族之不幸。但我深信，只要正義和公理尚在人間，這個冤案一定會像反右、文革時的無數冤案一樣得到平反昭雪。我在期待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1996 年 11 月 10 日

29、第三次北京之行

1998 年，我撰寫了《高中英語教學與素質教育》的教學論文，在全國優秀教育教學論文評選活動中獲得一等獎，應邀出席在北戴河舉行的“全國教育教學學術研討會”。

7 月 13 日下午，我第一次乘坐飛機，從杭州飛抵北京。在北京國際機場出口處，外甥何邦曉已在那裡迎接我。我們先驅車中關村，看望三叔和三嬸。三叔得知我要去北戴河開會，

他說：“我從來沒有去過北戴河，還不如你這次能去。”然後來到東直門外北大街邦曉家。

10 多年前，何邦曉從老家來到北京做木匠活，妻子陳彩君隨同做裁縫。夫妻倆勤勞起家，後來在雅寶路做服裝批發生意（主要賣給俄羅斯等國的客商），生意做得火紅，在北京買了房子和小汽車。

許曉光，1996 年杭州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攻讀科學哲學碩士學位研究生，為了搜集撰寫碩士論文有關的材料，他這次與我同來北京，住在邦曉家。

翌日，我從北京乘火車去北戴河。15-19 日，研討會如期舉行，我在會上宣讀了《發散思維與高三英語復習》教學論文，該文被大會組委會評為“優秀論文”。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勝地，這裡建有多處中央首長的別墅，每當夏天，中央有多次重要的會議在這裡舉行。

利用會議空隙和早晚時間，我約了幾位與會者一起，漫步在海邊，在沙灘上玩耍；爬上聯峰山，鳥瞰北戴河的全貌；去看林彪出逃時，曾經住過的別墅。

會議期間，大會還組織我們集體去稱為“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以及南戴河國際遊樂場等處觀光、遊覽。北戴河秀麗的景色真夠迷人，讓人流連忘返！

我從北戴河開會回來的第二天，去中關村三叔家，按響門鈴，三叔的孫女許蒙出來開門，她說爺爺正在書房與客人談話。我進了書房，三叔就向我介紹丁子霖和她的丈夫蔣培坤，他倆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我早已熟知他們的大名。三叔拿給我一份剛寄到的材料，打發我到另外房間去閱讀，繼續他們的談話。我看完資料，估計他們的談話可能快要結束，便去書房，我提議我們可否一起拍張合影照，他們表示同意。三叔拿出照

相機，叫許蒙代拍下了我與三叔、三嬸和他們夫婦這張有紀念意義的合影照。

丁子霖，這個“六四”失去親生兒子的母親，這些年來，為了尋找“六四”受難者，她不顧個人的安危，到處奔走呼喊。她是一位堅強的“天安門母親”，令人敬佩！

2004 年 5 月 30 日，在“六四”15 周年前夕，“中國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了由丁子霖執筆的《為了生者與死者的尊嚴——“六四”十五周年中國天安門母親告海內外同胞書》。

現選錄其中幾段，聽聽她們的血淚控訴：

“當我們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的手是那樣的沉重，因為在我們面前，擺著一份由我們親手記錄下來的 182 位死難者的名單的，有我們的兒子或女兒，有我們的丈夫或妻子。他（她）們都是普普通通的學生或市民，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公民，有幾位甚至連公民的身份都還沒有來得及取得。今天，當我們面對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時，我們的心仍在顫抖，仍在滴血。

在十五年前的那個黑色週末，他們從我們的身邊抽身而去，從此便成永訣。

我們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聽到大屠殺的槍聲以後毅然離家奔赴死亡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橋頭阻擋軍隊向天安門方向開進時被密集的槍彈掃射致死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長安大街的西單和東單路口與戒嚴部隊的對峙中飲彈倒地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大屠殺現場救護傷患或同軍隊搶奪同伴屍體的時候被射殺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抗議軍隊的暴行或用照相機記錄下這種暴行的時候被奪去生命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在撤離天安門廣場時在西單的六部口被從身後開過來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至少有三人是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的，而且有一人恰恰倒在了廣場中央懸掛共和國國旗的旗杆下。這個人的名字叫程仁興。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一些照片，照片上死者的屍體一排一排整齊地堆放在一所醫院的化驗室，其中一具編號為“30”。他的名字叫杜光學。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這樣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死者腦部和肩、臂部都留有槍傷，但最後他死在了戒嚴士兵的刺刀下，他的雙手手心還留有深深的刺刀刀痕。這位死者的名字叫吳國鋒。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另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屍體全身沾滿了泥土，面目已很難辨認。這具屍體是在天安門西側紅牆外的一個土坑裡挖出來的，死者的名字叫王楠。在同一地點還掩埋了許多其他死難者的屍體。這些死者都是誰？詳細數目有多少？他們的屍體後來又運往了何處？這一切至今不得而知。他們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六四”失蹤者。”

“讓我們一起來推動時代的變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觀者，更不要做舊制度的維護者。

十五年前的那場大屠殺，使我們蒙受了深重的苦難，但也使我們經歷了一次靈魂的洗禮和思想的啟蒙。今天，我們至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牲口，也不是靠主人豢養供主人消閒取樂的寵物。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有民族的自尊，但更應該有個人的自尊。一個社會的

文明進步，皆來自人們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求；而任何一種專制制度的最主要有民族的自尊，但更應該有個人的自尊。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皆來自人們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求；而任何一種專制制度的最主要特點，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扼殺並最終消滅人的這種渴求。發生在 1989 年的那場天安門民主運動，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上說，是人性中這種對於自由、尊嚴的渴求與專制極權主義之間一場規模空前的衝突與較量。這場較量以前者遭到毀滅性打擊而告終，而其最直接的一個災難性後果，就是在全社會造成了對於自由和尊嚴的畏怯與逃避。中國再一次躑躅於世界文明圈之外，整個社會被一種到處彌漫著的晦暗、冷漠、絕望、墮落所籠罩，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誠信，沒有羞恥，沒有敬畏，沒有懺悔，沒有寬容，沒有責任，沒有同情，沒有愛……。難道這就是民眾的選擇？不！這是專制者的選擇。因為，這一切恰恰是專制制度賴以生存的土壤。

然而，我們相信，歷史終將服從人民的選擇。而這，也正是我們的希望之所在。

在這封信即將結束之前，我們願意重申“天安門母親”群體關於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的口號，這就是：說出真相　拒絕遺忘　尋求正義　呼喚良知”

我已到過北京二次，曾路過北京大學校門口多次，但都未進入。

北大的民主精神和學術自由的風氣，幾代人相傳，從“五四”時期的陳獨秀、胡適……，到“六四”的王丹、劉剛……，一脈相承。北大的光榮傳統吸引著我，這次與曉光一起到北京大學參觀，尋訪當年他們的足跡。

走進北大校園，你就會喜歡上“一塔湖圖”的風景。未名

湖畔，柳樹成蔭；湖面上碧波瀲灩，塔影重疊……

我們來到北大校園中心“三角地”，據說這裡是北大的“敏感區”，每當一場政治運動來臨，這裡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由此波及全國各地。

校園裡賽凡提斯像前的草地，是我早已想要尋訪的地方。不是綠草如茵的草地吸引我，而是 10 年前劉剛、王丹在這裡舉辦“沙龍”所播下的民主種子，在隨後的民主運動中開花結果。

我佇立在賽凡提斯像前，沉思良久，遐想當年這裡舉辦“沙龍”時的情景，為了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他們都付出了不少的代價！

我在北京期間，正好許成鋼從英國回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說話慢條斯理，沉著穩重，確有學者的風度。我一直來很欽佩這位堂弟，他雖與他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長，但所受的影響卻非常大。對比之下，我與三叔一起生活的時間比他長，雖然三叔對我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比起成鋼來卻差得很遠，使我感到慚愧！

許成鋼在他的一篇《自述》裡，這樣寫道：

由於我出國前在學校學習年數甚少，談到出國前的經歷，需從家庭背景開始。我父母對我有很大的影響。父親在培養我對科學問題和對社會問題的興趣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鼓勵我提問，鼓勵我尋找對問題的理解，即使為了理解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不被人理解甚至受打擊的代價。這使我自幼就不滿足於僅僅知道事情的表面現象；感到世界上重要的事往往是有深刻道理的，道理應該是能夠找到的。科學是用於尋找這些道理，它既有作為工具的價值又有其自身的價值。在道理不

清楚的時候，應該去尋找，而不應囫圇吞棗地記住別人告訴的結論，不應該人云亦云。

我的父親許良英是科學史家（中科院科學史所），母親王來棣是歷史學家（社科院近代史所）。他們都曾是共產黨的幹部，包括曾是地下黨的幹部。我父親原來對共產黨十分忠誠，1956 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受到極大鼓舞。1957 年 6 月突然發動反右派鬥爭，他認為這是違背當初反復動員“鳴放”時許下的“言者無罪”的諾言，完全失信於民，感到非常氣憤，到處奔走呼籲反對反右運動。他因此被打成右派，並且被定為“極右分子”。批鬥他的新聞曾在國內主要大報上刊登。吳敬璉先生曾向我提起，他記得特別清楚，中科院全院第一次鬥爭右派大會鬥爭我父親的情景。

作為懲罰，科學院要送他到黑龍江勞改，他拒絕接受勞改，而選擇了所謂的“自謀生路”，於是被開除公職。隨後，我母親也被開除黨籍。在重壓下，1958 年夏天父親離開北京，回到浙江農村老家做一個被監督改造的右派農民。當時我還在幼稚園。從此到 1975 年，我一共只見過他兩次。但他對我的影響超乎尋常的父子。他對我的影響主要通過同我的通信。

由於出身，我從小就面對政治壓力，連院子裡同我年齡相仿的小孩子都會告誡我：你爸爸是右派。不過，我很小就知道，父親雖是農民，但他同時也是愛因斯坦研究的專家——他在當農民期間做了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的工作。我父親有時把關於愛因斯坦和其他有關科學家、科學史、科學哲學的文章寄給我，並在信中給我講解。這使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關心科學、歷史，以及有關愛因斯坦的方方面面。那種精神影響貫徹了我的整個人生。

成鋼這次帶回在美國買的一台數碼收音機。三叔付支了這筆上千元買收音機的費用，作為禮物送給我。我要感謝他們，使我每天都能及時地收聽到新聞，尤其是“外銷轉內銷”的新聞。

這裡附帶記述一下，許成鋼第一次來故鄉的情況。

2003 年 12 月 30 日，三叔給我來信說：

“上午寄出昨天寫的短信。中午接到成鋼從 Boston 打來的電話，說他想研究台州的經濟問題，清華大學有個研究課題與北大經濟管理學院合作，由清華出錢，北大出人，負責出問卷題和調查，由成鋼指導。他問我是否可以選台州為調查研究對象，我覺得這個主意太好了，向他講了“台州現象”和最近在台州開的全國民營經濟研討會年會的情況。他說他們要調查的不僅是民營經濟，也包括國營經濟，融資管道，政府和企業的關係等等，需要得到台州有關領導的支持。我認為這不成問題，他們正求之不得。他希望先與台州有關領導取得聯繫。我想這件事就委託你去辦。你是否可以找朱汝略或僑聯商量一下。你可以先準備一份成鋼的材料，特別是他長期對中國鄉鎮企業的關注。他的三篇博士論文中就有一篇專門研究中國鄉鎮企業的。90 年代初他還曾研究過蘇南鄉鎮企業。同時希望你儘量搜集有關“台州現象”，台州經濟發展的具體材料寄給我。我手頭一本 1995 年出版大厚本《台州地區志》，反映的只是 10 年前的情況，而這 10 年台州的發展可以說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你能否找到新出的《台州年鑒》之類的資料？我也想多瞭解一些。”

我受三叔的委託，經多方聯繫，終於使許成鋼實現了“台

州之行”。

這是成鋼第一次來故鄉。2004 年 4 月 15 日，臨海市僑聯秘書長趙懷妹和括蒼鎮黨委書記徐志勇親自去杭州蕭山機場迎接。下午 1 時到達臨海後，即由臨海市委副書記李建安陪同，去吉利集團（製造轎車）、偉星集團（管業）、彪馬公司（製造農用汽車）等民營企業參觀。晚餐由市委書記馬世宙在華僑賓館宴請。晚上在回浦中學學術報告廳舉行“經濟形勢報告會”，市委、市政府各級領導及各有關企業負責人參加。盛況空前，可容納 600 多人的大廳座無虛席，還有許多人無法入座，掃興而回。由許成鋼報告一小時，現場提問一小時。臨海電視臺在第二天的《臨海新聞》節目中作了報導。

第二天去椒江，在台州市僑聯負責人陪同下，參觀並考察了飛躍集團和寶石集團（兩家企業都是製造縫紉機出口），分別與他們的董事長邱繼寶和阮小明座談。還參觀了星星集團（製造電器）、海圳集團（藥業）等民營企業。

第三天，在台州市政府經貿委辦公室舉行座談會，有關負責人全面介紹了近年台州經濟發展的情況。成鋼認真筆記，不時提問，我坐在一邊旁聽，也瞭解到許多有關台州經濟發展的情況。

4 月 18 日，即第四天，許成鋼第一次踏上故鄉張家渡的土地，括蒼鎮鎮長以及張家渡村委會主任等人早已在那裡迎候。

我們首先來到從眾哥家，然後來到高臺門。一路上，成鋼用攝像機錄下了張家渡老街、古屋，高臺門更是他要尋訪的地方。我指給他看當年三叔的住處和當時的情狀，以及西首廂房樓上當年的“風翻書樓”。如今，高臺門這座古宅已被鎮裡列為“重點保護”。

接著，我們來到村南端王莊山腳，這裡有一座被稱為“王墳”的明代古墓——援朝抗倭名將王士琦墓，是臨海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年已修繕一新。墓前有石人、石馬、石虎、石羊和華表（又稱望柱）各一對，每對相向而立，形象逼真，神態各異。石人手捧笏板，形象肅穆莊重；石馬雕鞍昂首，石虎蹲而生威，石羊臥而生態，華表刻有龍紋，雕紋精緻，紋飾優美，均是明代建築風格，具有頗高的藝術水平。成鋼爬上墓的最高點，用攝像機，攝下張家渡村全貌。

據《台州府志》、《臨海縣誌》和《中國名人大辭典》記載：王士琦（1551－1618），字圭叔，號豐輿，臨海城關人。明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歷任南京工部主事，兵部郎中，重慶太守，山東參政，河南左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兼領冀北軍防。明萬曆二十六年間（1598），倭冠三路入侵朝鮮，士琦受命監援朝抗倭水陸兩軍。當倭寇進犯朝鮮半島南端時，分中西東三路登陸。西路頭目行長佔據栗林曳橋，士琦奉令從略邢玠出兵抗倭，劉綎領陸軍，陳璘領水師，士琦率兵直趨朝鮮。行軍途中，聞裨將楊元首戰喪師，人心震恐，都勸他暫歸全州（今韓國全羅北道行政區中心）。他竭力主戰，號召“強敵在前，有進死，無退生”，奮不顧身，督師激戰旬餘。倭寇西路行長求援於東路另一頭目平義智。士琦恐其合勢叵測，一面令水師窺伺於海，一面新率陸軍急攻曳橋，斬首數百，乘勢入城。平義智與中路頭目石曼子來救，陳璘水師邀擊，毀倭寇船隻數百，石曼子當場被擊斃。陪臣鄭六同被倭寇所虜而得到信賴，士琦暗地預約六同內應，急焚火藥庫，終於全殲三路倭寇，大獲全勝。王士琦久鎮雲中，嚴守北疆，處理邊疆事務，剛柔相濟，威信素著，被時人譽為“邊才”。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升任都察院右都禦史、巡撫大同。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奉

調巡撫江南，未行，以積勞成疾而卒，年 66 歲。我曾以古韻新調擬詩一首，頌之：

日夜驅馳奇用兵，
三軍奏捷靖鯨鯨；
於今翁仲端然立，
青史常留報國名。

我們一行人又驅車來到下洋顧村，穿過樹林、跨過小溪，來到象鼻岩遊覽。成鋼對象鼻岩並不感到陌生，他早已就聽他父親介紹過。這裡的自然景觀的確是優美，但卻今不如昔，溪水已被上游仙居的化工企業污染了，不再是“清澈見底”。

後來，我寫信告訴三叔，他回信說：“永安溪水被仙居化工企業污染了，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是一條死路，必須大聲呼喊。黃岩、路橋這個問題也十分嚴重，報上已有披露，怎麼台州領導對此熟視無睹？”

在鎮黨委書記和鎮長的陪同下，我們參觀了鎮裡的二家民營企業，其中一家是生產玩具的，產品大部分是銷往國外的。他們贈送給成鋼一套精美的玩具，以作留念。

中午在鎮裡用餐，鎮領導特意做了“家鄉菜”來招待成鋼。飯後，在他們的陪同下，驅車芳溪山裡，到“九台溝景區”入口處黃石坦遊覽。

括蒼山主峰下，海拔 800-1000 米左右，有一條山溝谷地，兩岸懸崖峭壁，地勢險要，奇峰異壑，澗深水清，神奇俊秀，幽靜深遠。那滿山的青翠，滿山的風景，裹挾著滿山的春光與野趣，讓人神清氣爽，為之傾倒。由於地處偏僻高山，是近年才發現的旅遊景點。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沒有爬上九台溝，而是在黃石坦遊玩，在這裡也大致能領略到相似的自然風光。

成鋼這次“故鄉行”，給我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我一直全程陪同。我把陪同成鋼這幾天的情況，寫信告訴三叔。5月3日，他回信說：

“信收到多日了。信中詳細敍述了成鋼在故鄉 4 天的行程，比成鋼自己講的還清楚。椒江、臨海的建築、市容，以及回浦的報告廳使他感到驚駭。我說，‘你到臨海開了洋葷了！’比起倫敦市中心區的倫敦經濟學院的老房子（校裡沒有草地，連一株樹也沒有），的確是開了洋葷。”

2007 年，台州市僑聯編了《台州學子在海外》一書，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我寫了一篇介紹成鋼的文章：《一位頑強、堅韌、執著的經濟學家——記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許成鋼》也刊載在書中。全文如下：

簡介：許成鋼，男，祖籍臨海市括蒼鎮張家渡村。1950 年出生。1979 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1982 年獲機械工程碩士學位。1984 年赴美留學，1991 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兼任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全歐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許成鋼的成長歷程和學術成就，讓我們聯想到了“百煉成鋼”這個成語。許成鋼博士鋼鐵般的意志，是經過千錘百煉的；許成鋼博士的成才，也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最近出版的《理性的激情——國際經濟學殿堂的中國建築師》一書中，許成鋼

在《自述》裡，道出他“成鋼”、成才的“秘訣”。

許成鋼，195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於杭州。1952 年隨父母（科學史家許良英、歷史學家王來棣）工作調動遷居北京。1958 年入北京香山慈幼院小學，1964 年入清華大學附中就讀。許成鋼自幼夢想是做個工程師。1967 年，16 歲的他主動去北大荒黑龍江省綏濱農場。和絕大多數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不一樣，他是自己選擇去的。

到農村後，許成鋼開始系統地自學《資本論》及其他關於社會主義學說的文獻，並開始撰寫論文，通過郵件與同學討論。勞動之余還自學數學、物理學、電子學、哲學。他在《自述》中回憶道：“微積分就是在這時候開始學的，我讀教科書、做習題，當自學有進展時，會高興得唱起歌來。”1976 年，經過許多周折回到北京，家居自學。1979 年，唯讀了兩年初中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的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是清華大學唯一沒有念過高中和大學的研究生，也是清華大學機械系電腦輔助設計方面的第一個研究生。1982 年，獲機械工程碩士學位。1982 年至 1984 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計量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4 年，接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赴哈佛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1991 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從 1991 年到現在，任教於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1998 年獲該校終身教職。

許成鋼博士出國後早期研究工作的核心問題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在這方面，他研究了中央計劃經濟在一定時期為什麼很不成功、為什麼會有鄉鎮企業奇跡、中國改革的機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蘇聯和東歐轉軌失利的制度原因。他的許多研究成果已經成為轉軌經濟學中的重要文獻。還是在哈佛大學做研究生時，許成鋼就到世界銀行作暑期調研，在該行發起的第

一個鄉鎮企業調研之前，為其寫了背景報告。他對中國鄉鎮企業尤為關注，在他的三篇博士論文中，其中有一篇專門研究中國的鄉鎮企業。上世紀 90 年代初以後，他到江蘇、廣東、河北、山東等地的鄉鎮企業作過多次實地調查。1994 年，在《比較經濟學》雜誌上發表論文《作為模糊合作的中國鄉鎮企業》。這是世界主要經濟學期刊中的第一篇關於鄉鎮企業的論文，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對鄉鎮企業這一重要現象的廣泛注意。在鄉鎮企業、經濟組織、轉型經濟制度和金融理論方面，許成鋼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是國際經濟轉型學界知名的學者。

近年，許成鋼博士的研究領域又擴展到有關法律與經濟關係的基礎理論方面。這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他著重研究金融與司法制度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提出的不完備法律概念，為深刻認識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套新理論。當代馬克思研究所主辦、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等主編的《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 2001 年第 5 期首篇，刊載了許成鋼的文章：《法律、執法與金融監管——介紹“法律不完備性”理論》。他的這一階段性研究成果，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2001 年 7 月，他應邀出席兩個國際學術會議回國期間，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分別邀請他做專場學術報告。從 2002 年開始，他兼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每年三四月間回國講學 5 個星期。

許成鋼博士是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名頑強、堅韌、執著的探索者。他一心撲在經濟學的研究上，正以鋼鐵般的意志和驚人的毅力，向世界經濟學研究的高峰攀登！

30、情繫桑梓

我曾三次登上括蒼山頂。

第一次，1955 年 8 月 1 日，那時括蒼山氣象站剛剛建成，我們“回鄉同學”（那時城西還沒有中學，村子裡在城裡讀書的學生，每年寒暑假回鄉組織集體活動），有三四十人集體登山。我剛讀完初一，年紀小，從東方山腳開始爬一段很陡的石級就感到吃力，到了“橫障坷頭”上氣不接下氣。山上的風大得可怕，頭上戴的帽子也會被吹走；風雲變幻，霧氣襲人，雖是夏天，但感到很冷，我們曾向氣象站同志借來大衣。回來後我寫了一篇日記。

第二次，1973 年 5 月，我在更樓中學任教，更樓距離張家渡 10 多里，先帶領學生在井頭城西中學住宿一夜，第二天才登山。都是初中學生，他們爬山的速度比我快。

第三次，1981 年 9 月，我已調到城西中學，帶領高中學生登括蒼山。我們先從東方山腳上山，下午下山，經過跑馬坪前山回來。那時，山頂上除了氣象站，還建有電視轉播台，轉播塔高高聳立，括蒼山頂又多了一道風景。

九十年代初，在括蒼山頂建成了大型風力發電場。該場由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投資建設，全套設備從丹麥進口。如今一片片風槳迎風旋轉，宛如一艘艘巨型客機正在騰空翱翔，給括蒼山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如今，括蒼山頂又多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中國 21 世紀曙光碑》。

2000 年 7 月，台州氣象局鄭金忠、楊齊聰二位工程師，根據“登高遠望，高山先照”的原理，利用球面三角公式，通過周密計算，撰寫論文：《21 世紀中國大陸第一縷陽光的最佳觀測地——括蒼山》。後得到曆算權威部門中國科學院紫金山

天文臺研究員何玉囡的複算證實：2001 年 1 月 1 日臨海市括蒼山日出時間為 6 時 42 分 54 秒，將比溫嶺石塘要早。9 月 12 日，紫金山天文臺台長陸文魁簽署發文，並於 10 月 29 日在臨海市舉行新聞發佈會，向世人宣佈了這一結論。由此，引發了臨海括蒼山與溫嶺石塘之間的“曙光爭奪戰”。爭論期間，全國共有 300 多家新聞媒體競相參與報導。

1999 年，認為浙江省溫嶺市石塘鎮是 2000 年 1 月 1 日中國大陸第一道陽光的著陸地。為此，溫嶺市曾搞過一次“曙光節”。這次北京天文臺仍然宣佈溫嶺石塘是“陽光首照地”，並且該台王綬綰院士發表談話，肯定這一結論。由於院士的“權威”，又經新聞媒體的炒作，這次論戰幾乎到了熾熱化的程度。

2000 年 11 月 6 日，三叔給我來信說：

“關於 21 世紀中國大陸第一縷陽光將照在括蒼山頂的兩次報導，我都在浙江衛視上看到，當然感到高興。想不到中間殺出個程咬金，北京天文臺宣佈仍然是石塘是首照陽光的地方，還用中科院院士王綬綰的名義和英國格林威治天文臺來壓人，當時我就覺得很可笑。因為紫金山天文臺一向是每年負責發佈天文年曆的機構，擅長於太陽系各個星體的觀測，去年也是他們宣佈石塘是 2000 年首先見到陽光的地點。而北京天文臺並不搞這一行，王綬綰是搞射電天文學的，憑什麼越俎代庖？紫金山天文臺能頂住壓力，馬上出來公開對抗，是值得欽佩的。如果這事發生在 15 年前，我一定也趕回故鄉上括蒼山享受這新世紀的第一縷陽光。可惜身體不爭氣，無法遠行。關於括蒼山，有兩件事值得告訴你們：

①1932—35 年，我在海門東山中學念初中這三年，幾乎每

天晚飯後都一個人佇立在校園最高處六角亭旁，向西眺望椒江盡頭群山後面矗立的括蒼山。由此可以推測，台州沿海一帶大多可以見到括蒼山。

②括蒼山不僅是浙東（除了麗水地區）最高山，也是整個中國大陸（從鴨綠江口到北倉河口）離海岸 60 公里內最高的山峰。這件事恐怕迄今還未有人注意到，我是 1936 年看到《申報》報館出的地圖集就發現了。

我登過兩次括蒼山頂。第一次是 1939 年，同大哥、小哥（也可能有良容）一道。第二次大概在 1965 年清明前後，同陳建元一道。那時氣象站已建立，他們的水缸中有冰。主峰東邊的第二峰（約 1200 米，很平坦），抗戰前也曾同大哥、二哥登過，是從和尚山上山，經義平頭、前山下山。另一高峰仙人基、道場基，系 1965 年夏天同陳天彪、李××（名字一時記不起了，是臨海一所中學的生物教師，文革時被判 20 年刑，後來專門搞香功，發了財）一道登過。總之，故鄉的幾座高山，包括北面的貓兒威，我都爬過。”

（＊信中“李xx”名叫李君，臨海師範生物教師，後調台州衛校。——從平注）

三叔對故鄉懷有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從童年時代就開始形成。此時，80 歲高齡的他，人在京城，心系故里，情牽括蒼山。

臨海市人民政府決定主辦“中國 21 世紀曙光節”。重修從張家渡通往括蒼山頂的公路，較大型的客車也能到達山頂；張家渡鎮區街道張燈結綵，披上節日的盛裝，到處洋溢著節日的氣氛。我及時地把各種有關“曙光節”的材料寄給三叔。12 月 4 日，他回信說：

“括蒼山的材料和《臨海日報》的有關報導，引起了我們很大興趣。這是故鄉頭一回成了全國的新聞。欣喜之餘，也感到不足。首先是商業氣息太濃，匆匆忙忙搞什麼‘世紀封’，大概是為了向大款斂錢。鎮裡出的畫冊，印刷很精良，可惜那幅地圖令人莫名其妙，有雁蕩山、仙都，卻沒有括蒼山；仙居成了交通中心，臨海卻無路可通。有機會見到鎮領導，問問他們怎麼會畫出這樣的地圖？開篇的文字說明也有問題。”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正值新世紀伊始，《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新華社、《浙江日報》、《台州日報》等眾多新聞媒體相繼報導了新世紀中國大陸第一縷陽光首照慶典地的日出時間，最早是浙江省臨海市的括蒼山，日出時間是 6 時 42 分 54 秒，與有關專家們事先推算的日出時間分秒不差。繼括蒼山之後，依次是吉林省森林山，日出時間為 6 時 44 分 12 秒，浙江省溫嶺市石塘鎮的雷公山和阿金頂兩山頂日出時間都是 6 時 46 分。原本不大出名的括蒼山，由此便聞名於世。

括蒼山，又名蒼山，真隱山，天鼻山。唐天寶年間改為今名。《唐六典》稱其為江南道名山。據《台州府志》引《五嶽圖序》雲：“登之見滄海，以其色蒼蒼然接海，故名括蒼。”高，一萬六千丈，周圍三百里，為浙東之最巨大之山（《台州府志》載）。其山脈由浙閩交界的洞宮山脈向東北延伸而來。主峰米篩浪位於東經 120°55′，北緯 28°49′，海拔 1382.4 米，在臨海市張家渡鎮境內。主峰西北兩側地形高差 1000 米以上，山勢直降，坡陡峻險，峰巒疊嶂，雄奇綺麗。山頂多雨日霧日，常年雲霧繚繞，雲海漂浮，空蒙變幻，意趣無窮，是觀賞雲海的絕佳處。黎明，雲霧給峰巒腰間系上輕紗似的白色彩

帶，或給峰尖戴上白色的帽子，彩雲片片，隨風飄蕩；黃昏，夕陽的餘輝灑滿了山崗，染紅了座座峰尖，那淡如青煙的霧氣又籠罩了蒼翠的山峰。煙雨時，雲煙繚繞，千山萬壑都淹沒在雲濤裡 ；風起時，萬丈雲煙翻騰在群峰之間，峰巒隱現，有的像風帆，有的宛如巨艦，迎風破浪，奮勇向前。在平常的日子裡，站在頂峰，環顧四周，到處可見漂浮在雲海上的奇山怪峰，時隱時現，變幻無窮，恰似仙島，令人神往。霧氣過後，腳下萬山俯伏，朵朵白雲冉冉飄升，連成一片雲海，翻翻滾滾，如濤似湧，好一派雲海奇觀！

括蒼山，一年四季都是旅遊的好去處。盤山公路，自白雲深處旋繞而下，與藍天碧海相映，勝似錦帶飄舞。這正是“身纏絲絹半遮臉，婀娜異常惹人愛”的山海奇觀。括蒼山不但是人們盛夏避暑和療養的好場所，更是冬季旅遊觀光看日出的最佳地點。

站在括蒼山頂向東遠眺日出方向的海面上，恰逢無島區，一望無垠。日出前即可欣賞到海在雲上、山立雲間及海天相接的優美畫卷，此刻的地平線早已彤紅一片了。每當第一縷陽光在海天的銜接處乍現時起，該太陽下方的日虛影不是海水中的倒影，而是正影。這一奇觀，在“曙光節”那天觀日出時，被一位名叫羅森南的攝影師拍攝下來，這幅被稱為“括蒼山三日疊影”的照片實為珍貴。

括蒼山東瀕大海多水氣，當東襲而來的雲海浪花鋪天蓋地地拂過觀者嬉戲西去時，你會有幸看到自己經初升陽光照耀而被投射到雲霧幕上的帶有七彩光環的身影，這就是寶光，俗稱佛光。每當高空有低壓槽線移近時，天幕上常常滿布毛捲層雲或薄膜捲層雲，此時仰望太陽周圍，就會看到十分壯觀的日暈奇觀。

冬上括蒼山，你可有幸一覽冰瀑、霧凇等自然奇觀。此時的括蒼山冰刀、冰柱隨處可見。樹叢間水晶鋪地，漫步其間可以聽到沙沙作響，一彎腰，隨處即可掬得一手晶瑩；背陽的崖壁上，冰瀑飛懸，一瀉千里，確是鬼斧神工；臨近山顛，滿眼的霧凇更可帶你進入銀裝素裹、舞影飛刀的奇異世界。

1 月 7 日，三叔來信說：

“7 天內先後 5 次收到你寄來的有關新世紀陽光首照括蒼山的資料和報導，我都仔細讀了，很是振奮。做夢也沒有想到，故鄉和全國各地 2 萬人會在-7℃的嚴冬深夜聚集在 1382 米高的括蒼山頂等候新千年第一縷陽光的來臨，這是何等壯麗動人的場面！這真是史無前例的壯舉，我為故鄉和括蒼山感到自豪。

你寄來的許多資料中，最吸引人的是 5 萬字的小冊子《陽光首照括蒼山》和 1 月 1 日的《臨海日報》關於日出的報導，其中最有價值的當屬楊齊聰的幾篇文章，特別是他批駁王綬綰的文章，所表現的膽識，令人肅然起敬。我為故鄉有這樣一位科學家而感到高興。通過他的文章介紹，知道最早提出陽光在中國大陸的首照地是括蒼山的，是曾在括蒼山氣象站工作 10 年的鄭金忠（現年 55 歲）。單憑他曾在括蒼山上生活過 10 年這一經歷，就引起我對他的無限敬佩。因為我 1965 年清明到過括蒼山氣象站，深知他們工作和生活條件的艱苦。我還記得，在‘文革’時，有個站長病死在橫嶂岢的路上。鄭金忠同志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了括蒼山的氣象觀測，現在又為括蒼山爭來陽光首照地的榮譽，生於括蒼山下並終生思念這座雄偉高山的客居他鄉的我，當然要深深地感謝他。我本來想直接寫信給鄭金忠、楊齊聰兩位同志，向他們致敬，但考慮到他們對我

並不瞭解，直接去信會過於冒昧，不妨先請你去拜訪他們，轉達我對他們的敬意。你可以先到台州府路市氣象局宿舍東單元找楊齊聰同志，向他買他主編的《天文曆法．氣象科普萬年曆》（氣象出版社出版，定價 20 元，《陽光首照括蒼山》書末有此書的書訊）。請你代我買一本，托民立的女兒丹丹於下學期開學時帶來。見到鄭金忠同志時，希望他把他的論文《21 世紀中國大陸第一道陽光落在臨海括蒼山頂》送一份給我。你同他面談時，希望盡可能多瞭解他的情況（包括簡歷）。”

1 月 22 日，又收到三叔的來信：

“1.16 信和 7 分有關括蒼山的剪報都收到。1.5《臨海日報》頭條長篇報導已讀了，詳細瞭解到當時山上山下的許多情況，很有意思。其他文章待以後慢慢看。

從信中知道了楊齊聰的經歷和目前的工作，他的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科學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編的有很高科學價值的《陽光首照括蒼山》竟要由他個人出資出版，這太不合理了。書上印的，他僅是“責任編輯”，連主編也不是（主編掛的是郭斯甫的名字），這本書不僅為括蒼山爭來了陽光首照地的榮譽，還為臨海市和張家渡鎮帶來了無限“商機”。因此，此書的出版經費應由臨海市和張家渡鎮承擔，不應該由楊齊聰個人來承擔。不僅如此，來棣和我都強烈認為：楊齊聰和鄭金忠兩同志為括蒼山爭得陽光首照地的榮譽立了大功，臨海市人民政府應該給他們記功表彰。為此，我鄭重地建議你，給市長陳廣建同志寫一封信，請市人民政府考慮，以適當的方式對楊齊聰、鄭金忠兩同志予以表彰，並幫助楊齊聰同志解決《陽光首照括蒼山》一書的全部出版費用。信中也不妨提到這也是我

的意見。”

我遵照三叔的意見，起草了致臨海市市長陳廣建的信，並到市長辦公室遞交給他。信的全文如下：

陳廣建市長：

您好！

我名叫許從平，現任教於回浦中學，中學高級教師，並擔任民進回浦中學支部主任委員。張家渡鎮張家渡村人。因為我出生於括蒼山腳、永安溪畔，所以對家鄉有著特殊的深厚感情。去年，當得知新世紀第一縷陽光首照括蒼山的消息時，為之振奮，並熱切關注這方面的情況。我不時地將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寄到北京給我三叔許良英，今年已 81 歲高齡的他，比我更為之振奮，他說要是早 15 年的話，他也要上括蒼山頂，享受著新世紀第一縷陽光的沐浴。

這次“中國 21 世紀曙光節”辦得非常成功，是由於在市政府的正確決策和領導下、在全市人民共同的努力下所取得的。然而，這個為臨海市爭來新世紀第一縷陽光首照地的榮譽首先應該歸功於楊齊聰、鄭金忠兩位同志。我們臨海市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為有像朱洗、馮德培這些對科學作出過重大貢獻的科學家而感到自豪！在崇尚科學、崇尚科學典範的今天，更應該為科學做出貢獻的任何人給予表彰，廣為宣傳，以激勵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學習科學，熱愛科學，並立志為科學做出貢獻，這方面的意義更是深遠的。楊齊聰、鄭金忠兩位同志為臨海市爭得了新世紀第一縷陽光首照地的榮譽立了大功，臨海市人民政府應該給他倆記功表彰。為此，我，並代表我三叔許良英，建議以適當的方式對楊齊聰、鄭金忠兩位同志

予以表彰。

此致

敬禮!

許從平

2001.1.31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一下：

1988 年，第一次評職稱，我既沒有大專畢業文憑，又不足 20 年教齡，但被破格評為中學一級教師。通過在职業餘進修，我於 1989 年獲浙江電大英語專業畢業文憑。1999 年晉升為中學高級教師。

接讀三叔的信後，我即去找鄭金忠，向他索要他的論文：《21 世紀中國大陸第一縷陽光的最佳觀測地——括蒼山頂》，並瞭解到他的有關情況。他說自己最近寫好一篇論文，但無處可以發表，他希望托三叔代為聯繫有關刊物。我把他的論文寄給三叔，2 月 14 日接到三叔的回信：

“2.6 信 2.9 收到，書和鄭金忠的論文昨天收到。剛才去找了葉篤正，他可算是當前國內大氣物理學的元老，今年 85 歲，就住在我們樓前的一座小樓裡。他西南聯大畢業，在浙大當過研究生，後留學美國。80 年代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為人正直，同我常有往來。他流覽了一下鄭金忠的論文後，答應轉給適當的氣象刊物，至於那篇與某天文臺博士爭論的文章，我也請他抽空流覽一下，考慮如何處理為好。此外，我送給他楊齊聰編的小冊子、日出照片和楊的說明。陽光首照地的爭論，他原來沒有留意，我向他作了簡單的介紹。

你在信中講的同鄭金忠談話的情況，很有意思。我也讀了

他的論文，覺得他的工作很實在，有台州人的風格。

你給陳廣建市長的信，很得體，特別是提到了要弘揚科學精神。上括蒼山觀日出的那一天，市里請了那麼多人，恰恰忘了鄭金忠和楊齊聰，實在太不應該。”

由於我們的建議，不久，臨海市人民政府舉行表彰大會，頒發給鄭金忠、楊齊聰二人獎金各三萬元。

三叔身在北京，情繫桑梓，他關心故鄉的父老鄉親，關心故鄉的發展變化。2002 年 4 月 23 日，他來信告訴我，他最近買到了一本新書：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讀後深受感動，不時熱淚盈眶。他建議我也買來讀，並可向鎮幾位領導幹部介紹。

“曙光節”後，市政府決定將張家渡鎮與愛國鄉合併，改名為“括蒼鎮”。此時，括蒼鎮第一屆新領導剛上任。我即去新華書店買了一冊《我向總理說實話》贈送給鎮黨委書記徐志勇和鎮長崔曉萍，並附上一信：

徐志勇書記、

崔曉萍鎮長:

你們好!

此次回鄉，承蒙你們的熱情接待，謹在此表示感謝!

從張家渡回來的當天，即收到我三叔的來信，他信 中說，“前幾天有個朋友給我買到一本新書: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定價 23 元。我一口氣把它讀了，深受感動，不時熱淚盈眶。我在農村生活過 30 年，想不到今天農民這麼苦，官僚機構這麼黑。此書望你也買來讀一讀，並可以向鎮幾位領導幹部介紹。”今天，我特地到書店買來此書，贈

送給你們。

你們雖然新上任，時間短。但已獲得群眾的好評，很是難得！我相信你們通過此書的學習，一定會激發更加巨大的精神力量，出色地做好各項工作。在那天與你們交談時，正如崔鎮長所說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家鄉的鄉親父老們一定不會忘記你們的功績，古鎮的歷史將會增添光輝的一頁！

專此即祝

工作順利！

許從平 2002.4.28

＊附上我三叔來信的影本　又及

31、《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在香港出版

2000 年 5 月 3 日是三叔 80 歲生日，我曾寫信建議三叔在此時能出一個文集，他在幾次給我的信中談及有關出文集的事。

1999 年 6 月 21 日，他在信中說：

“關於我的文集之事，我看不必急。反正我身體還可以，至少可以再工作十年，沒有必要趕在 80 歲出。而且已編集的 45 篇總共只 17 萬字，太單薄，內容僅限於民主這個問題，缺了科學和理性兩方面。我想如果真要搞，最好內容全面一些，時間可以延伸到 40 年代。究竟應該怎麼搞，需要認真考慮，決不是幾個月就可以趕出來的。總之，不可倉促，應從長計議。國運如此，明年也不會是舒暢的，80 歲生日那天沒有什麼可以慶賀的。因此希望你們不要為我的 80 歲費心，我只希望平平

靜靜地過去，不要有什麼干擾。至於 1991 年以後的所寫文章的目錄，我會抽空把它補上。”

7 月 10 日，三叔給我信上說：

“你說文集可以分兩次出，先出較貼近現實的。這樣的考慮也有道理。即使按照這個設想，原來的那個集子還要重新安排，需要增加一些有份量的文章，刪去一些單薄、重複的短文。已經錄入的部分需要列印出來我們自己過目一下。這項工作不是一兩個月內所能完成的，托成鋼帶已不可能。我覺得還是應保證質量，時間不必急。”

12 月 14 日，三叔在信中說：

“我的那個文集，一波三折。先是夏天我發現錯漏太多，於是我和來棣分頭全部校了一遍，搞到 9 月才完成。這個月初才托人帶給了成鋼，估計半年內能出。出版商考慮銷路問題，要縮一半以上篇幅，我同意縮至 25 萬字。”

2001 年 12 月 7 日來信：

“我的那個集子，據說半個月後可出書，但怎麼寄來，還是個問題。出版進度被拖延，據說是受‘9•11’事件影響。現在的篇幅只原來的一半。”

2002 年 1 月 19 日來信：

“我的那個文集終於出來了，現只收到 2 本樣書。那個出

版社編輯部在美國，印刷、發行都在香港，全書 394 頁，定價要 99 港元，17 美元。印刷裝訂還可以，只是字體用仿宋我看不清，要用放大鏡，排印錯誤也已發現幾處。待將來能收到更多本書後，會寄一本給你。現先把書的封面、封底、目錄和序複印一份給你。這篇序比較有衝擊力，有些人看了會害怕，目前，除了陳立中，不宜給更多的人看。”

2 月 28 日來信：

“我那個文集，春節前成綱托人帶來 4 本，我托罕立帶一本給你，2 本給晨光。你的那一本放在陳建元處，你可自己直接去他家取來。民立大概不知有此書。”

《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2001 年 12 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我捧讀這本文集，感到無比欣喜，這是三叔的第一本文集。雖然許多文章我以前都已看過，但重讀起來，更有新的感受。

早在 20 年前，1981 年 4 月 1 日三叔就曾給我來信，告訴我，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動約他寫書，要給他出文集，但他說“在目前的情況下，我當然不會去考慮這個問題。”1988 年陝西科技出版社約他出文集，他曾編過一個，題為《科學・民主・理性》。當年已排好版，看過校樣，不巧碰上“六四”劫難，拆版了。現在仍舊用這個書名，但篇幅增加了許多。

在欣喜之餘，我更有幾分感慨。在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國內，不可能出版這樣的文集，此書只好在海外出版，但此書怎樣“入境”還是個難題。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怎麼來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規定的：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

由？

展閱文集，扉頁上的“內容簡介”寫道：

“中國的先哲說過‘雖九死其未悔’，‘覺今是而昨非’。本書著者、81 歲的科學思想史學者、中國民主和人權活動家許良英先生的身上，閃爍著的正是這樣的精神光芒。

作者不僅一生遭遇峰迴路轉，心路歷程更是披荊斬棘。早年懷抱‘科學救國’理想，後來投身地下鬥爭，中共建政後本來仕途順遂，卻因言獲罪，沈淪底層。在中國政局劇變、社會轉型的年代，作者重新‘啟自己的蒙’，通過系統學習西方文明發展史和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反思中國走過的道路和現狀。出生於‘五四’運動次年的作者，以‘五四’精神的繼承者自命，成為不倦地呼籲‘賽先生’（民主）、‘德先生’（科學）的鬥士。

本書是作者自己從 1978 年以來所寫的文字中精選出來，涉及六個方面：科學史探討，愛因斯坦研究，哲學思考，為民主、自由和人權呼喊，念師友，憶往事。這些文字，記錄下作者破除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迷信後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思想足跡，更展示了一條中國老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共同走過的道路。”

書的卷首還配有：“王丹第一次假釋出獄後 3 天由他父親王憲曾陪同來看我（1993 年 2 月 20 日）”，以及與老同學胡濟民、周志成、汪容拜望恩師王淦昌先生（1997 年 2 月 18 日）等照片。

在長達 5000 多字的序言中，作者回顧自己的一生，娓娓道來，平實中蘊含著“雖九死其無海”的理想主義追求，和覺

今是而昨非的反省精神和大徹大悟。筆墨觸及百經磨難，但隨處可以感受到不失一個正直知識份子傲骨的浩然“硬氣”。書的封底刊有序言中的幾段精彩段落，值得一讀：

純真的科學精神，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虔誠的宗教精神的真諦，三者融合為一體，是感情與理智的統一，我稱之為“理性”。遺憾的是，它卻鑄成了我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迷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原是一場要使中國倒退兩千年的大騙局。由此想來，1957 年的反右運動和 1958 年的大躍進也都是大騙局……1957 年以來黨報充滿謊言假話，我卻一直信以為直。受過科學訓練又立志追求科學真理和革命真理，甚至當了 17 年的專政對象後，仍然絲毫覺察不出自己 34 年來所崇拜的領袖竟是這樣一個暴君和騙子。我為自己的極端愚昧和愚蠢感到愧羞。因此，我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的現實，重新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

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並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導致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政。

過去從國內流行的著作中所瞭解到的近代民主史是片面的，錯誤的，把盧梭作為民主啟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把法國大革命作為近代民主革命的標誌，對殺人如麻的雅各賓專政予以肯定，卻不知道洛克、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民主革命（獨立戰爭）對整個人類歷史的影響遠遠超過盧梭和法國大革命，更不用說盧梭比洛克晚生 80 年，法國革命是直接受美國革命的影響；而成為 20 世紀最大禍害的極權主義正來源於盧梭和雅各賓專政。

“六四”屠殺後，親友們為我的安全擔憂，勸我躲避一下。我謝絕了，因為我已做過三世人（1920－1949, 1949－1969, 1969－ ），已活得夠長了，現在能夠為中國民主事業做一個譚嗣同，當死而無海！

現實既然如此，80 歲對我依然是沉重、抑鬱的歲月，依然是無盡的苦澀和窒息。

文集出版後，法國國際廣拖電臺“書香世界”節目，以及美國“自由亞洲電臺”等，對此書的出版都曾作過報導。

2002 年 4 月 29 日，自由亞洲電臺廣拖一篇書評：《可以推論的人——為〈許良英文集〉出版而寫》，作者：胡平。全文如下：

今年一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許良英文集。這部文集精選出許良英先生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發表的四十二篇文字，按內容分為六個方面：1、科學史探討，2、愛因斯坦研究，3、哲學思考，4、為民主自由和人權呼喊，5、念師友，6、憶往事。全書共 395 頁。文集取名《科學、民主、理性》，這個書名既概括了許良英先生的畢生追求，也反映出這部文集的內容和風格。

許良英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科學思想史學者，傑出的民主和人權活動家。許良英一九二零年出生於浙江臨海。少年時代，許良英懷抱“科學救國“的理想，後來又參加了中共地下鬥爭，既是老革命，又是專家；然而在五七年卻被打成”極右“，回農村勞動二十年，”四人幫“垮臺後，許良英先生一方面繼續從事專業研究，一方面為自由民主大聲呼籲，在”六四“之後的高壓下毫不退縮，發表文章，參與公民上書，以“五四”

精神的繼承者自命，成為不倦地呼籲“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堅強鬥士，成為中國社會直言不諱的象徵。

我第一次知道許良英的名字是在一九七七年買到有他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認識許先生本人則是在一九八二年。那時，我從北大畢業已經一年多，由於在讀書期間參加過競選活動，鼓吹言論自由，當局甚感惱火，很想整治一番，卻又苦於師出無名，因而只好在分配工作時給我製造麻煩。當局不敢公開宣佈不給我分配工作，但又暗地裡責令有關單位不得收留錄用。當時在中科院科學史所的許良英先生（還有趙中立先生）得知我這個人民代表竟然沒單位肯收留，立馬拔刀相助，打算把我要到他們科學史所。我的專業是西方哲學史，畢業論文寫的是休漠因果學說，對科學哲學略知一二，若分到科學史所也還算專業對口。許先生這次幫忙雖然沒有成功，不過我卻由此結識了許先生。

八七年一月我來到美國，當時國內正在開始反自由化，據說這次反自由化的起因之一是方勵之、劉賓雁和許良英等三人計畫發起反右運動三十周年討論會，踩到了鄧小平的痛腳。我在哈佛大學見到了許良英的兒子、正在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許成鋼，談起他的父親，談起許良英在自由化運動與反自由化運動中的非凡之舉。許成鋼說，其實，我爸爸做的事都是事前可以料到的，我爸爸的行為是可以推論的。

說得妙極了！這就是許良英之為許良英。出了一件大事，許良英會作何反應，你不知道嗎？你用不著去打聽，你只消推論就行了。許良英在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含糊，從不躲閃，該怎麼做就一定怎麼做。這就叫信譽，這就叫剛直方正。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風雲多變，人心莫測，多少英雄好漢，哪怕手眼通天，遇事也常常免不了要躊躇猶豫，權衡算計

的。象許先生這樣直來直去，具有高度的可預測性或曰可推論性，實在少見。

文如其人，讀許良英先生的文章，除了文字上的簡潔明快使人聯想到許先生為人的質樸與方正外，還有兩點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雖九死其未悔”的理想主義追求，一是“覺今是而昨非”的反省精神。

如許良英自己所說，他的一生有過三次大的轉折，最終回到民主與科學的立場上。早年，許良英熱情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在五七年被打成“極右分子”後仍然對毛澤東十分崇拜，直到八七年反自由化之前，許良英還對共產黨抱一線希望。也許，在老一代知識份子中間，許良英並不算特別的先知先覺，然而，由於他的真誠，他不斷地自我超越；又由於他那永不熄滅的理想主義精神，一旦從謊言中覺悟，不是墮入虛無，不是變成犬儒，而是更頑強、更清醒地抗爭，從而成為老一代知識份子的代表性人物，並為那一代知識份子充滿曲折艱辛的生命歷程樹立了一個人格典範。

（自由亞洲電臺）(4/29/2002　19：39)

32、關心故鄉教育事業

張家渡鎮提出要建“文化強鎮”和“旅遊大鎮”。為了大力發展旅遊業，鎮領導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旅遊系楊正泰教授為其設計制訂一期和二期發展規劃。我將一期規劃中《王士琦墓園暨張家渡景區總平面圖》等資料寄給三叔，2001 年 8 月 18 日，他回信說：

“看到《王士琦墓園暨張家渡景區總平面圖》，很感興趣，引起了不少回憶和遐想，可惜圖中多數字體太小，用放大鏡也無法辨認。看了這張圖，找出了我 1958 年在故鄉為整個城西區（那時叫‘城西公社’，後改稱‘管理區’）測繪地圖後，自己留下一張故鄉附近永安溪兩岸示意圖，去複印了幾張，寄一張給你，留作紀念。

對於復旦大學楊正泰教授設計的規劃，我有如下意見，請轉告郭斯甫、崔曉萍兩同志：

（1）‘許良英故居’這一專案應該取消，理由有二：1）我不是什麼‘名人’，不應該用我的名義保留高臺門舊屋；2）我認為，凡致力於中國民主化事業者，必須以‘平常心’做‘平常人’，不可自視高人一等。1938 年我在故鄉自學時讀到愛因斯坦的話：‘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受到啟迪十分深刻。基於這一信念，愛因斯坦死後不留骨灰，也不准立紀念碑和保留故居。1983 年我訪美時，在 Princeton 逗留了一天，參觀過他 1933－1955 年居住過的一座二層小木樓，外面沒有任何有關愛因斯坦的標誌。去年成鋼告訴我，這座小樓已被他以前哈佛大學的一位老師買去，裡面還有愛因斯坦用過的鋼琴。連愛因斯坦都沒有‘故居’，為什麼要給我搞‘故居’？當然，作為一座古建築，把高臺門保留下來，我不反對。這透房子至少有 200 多年歷史，小時聽母親說，父親買下來時已十分破舊，不能住人，曾簡單地修繕過一下。但即使把高臺門保留下來，也無論如何不可與我的名字掛鈎。說實在話，我對當前到處搞什麼‘故居’，到處題詞，時時宣揚個人崇拜，十分反感。

（2）在我的印象中，故鄉最值得保留的古建築應該是鷗園‘西溪草堂’，何達興主編的《張家渡》書中有詳細介紹，

而這張規劃圖中卻沒有，應補上。它可以成為一個吸引人的旅遊景點。鷗園後面的三個花園很有特色，應該設法恢復。鷗園門前的那座古橋也應該包括在內。

（3）象鼻岩連同整座象山可設一個大景區。象山東坡和北坡可種松、柏，南坡可養護成片的杜鵑花木。從東坡可以修一條登山的石級。象鼻岩岩頂很平坦，景色絕佳。象鼻岩水邊擋住遊人視線的樹木應全部砍掉，以保證溪上的遊人見到象鼻岩的全貌。象鼻岩西側長東坑邊上的‘白象書院’應設法恢復，因其創辦人為明代著名地理學家王士性，而他又是王士琦的堂兄。又，岩下的張汝鍇（竹屋）祠應好好保護，並可在渡口修一紀念亭和一座‘竹屋’。

（4）愛國鄉合併到張家渡鎮以後，可考慮設兩個景點：①長潭陶凱故居。1938 年我和大哥良其曾去長潭尋訪陶凱故居，借來陶氏宗譜。陶氏後人待我們很熱誠。②獅山、前應山和岩門潭是一個很美的景點，它又是永安溪故道，估計會有地質和古地理研究價值。

（5）王士琦墓園南面的王莊山，應封山育林，種上松柏。

（6）建議鎮政府把‘張家渡小學’恢復原名‘立本小學’。立本小學創辦於 1906 年，是臨海縣最早的一所新式學堂，在全縣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十幾年前，臨海二中已恢復原名‘回浦中學’，立本小學也應予以恢復，否則，有悖於張家渡是‘歷史文化名鎮’的稱號。這件事不應再拖下去了。

以上意見請轉告鎮領導同志。也不妨把我的信連同我 1958 年畫的地圖一併複印轉給他們。”

我把三叔在信中所提的 6 條意見及時轉告張家渡鎮幾位領導。第 6 條意見：“建議鎮政府把‘張家渡小學’恢復原名

‘立本小學’。早在十幾年前，三叔就已向他們提出建議。

1987 年初，張家渡鎮人民政府就召開知名人士春節座談會發出邀請信，三叔在給鎮政府回信中提出：“張家渡自從創辦立本小學以來，直至解放前的幾十年，在全縣的教育事業上有突出的地位，希望能認真繼承並發揚這一光榮傳統，為此，建議恢復‘立本小學’的名稱。”這次，三叔又重新提出這個建議。

根據三叔提出的要求，我草擬了一封致市人民政府和鎮人民政府有關恢復“立本小學”校名的聯名信寄給三叔，經他修改後，向全國各地校友徵集簽名，得到了許多校友的積極支持，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及本地校友共 89 人在建議信上簽了名。其中年齡最大者是上海校友、立本小學創辦人金劍青的兒子金煒（85 歲），他是抗日戰爭中擊落多架敵機有功的空軍飛行員。

信的全文如下：

關於“張家渡小學”複名為“立本小學”的建議

臨海市人民政府、張家渡鎮人民政府：

我們都是張家渡小學前身、原“立本小學”的校友。立本小學創辦於 1906 年，是臨海縣第一所私立新式小學，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畢業生遍佈全國各地，有不少成為傑出的人才。如革命先烈林炯，就是這所小學的首屆畢業生。由於辦學成績卓著，在全市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張家渡鎮已成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臨海西部的一個“歷史文化名鎮”。地處我國大陸陽光首照地括蒼山北麓和靈

江上游永安溪南岸的張家渡，綺麗的山光水色，造就了不平凡的地域文化，構成了臨海傳統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了尊重歷史，為了尊重近百年來對張家渡民智的啟迪作出過重大貢獻的立本小學的不朽歷史功績，我們認為應盡速恢復“立本小學”校名，懇切地希望市人民政府和鎮人民政府果決地接受我們這些客居他鄉、心系故里的“立本”老校友的建議，以遂我們多年的心願。

此致

敬禮！

原“立本小學”校友：（89 人簽名）

2001.10.15

2002 年 3 月，臨海市教育局正式發文，批准恢復“立本小學”校名。4 月，三叔寫信給他的浙江大學老師、百歲老人陳立先生，請他為立本小學題寫校名，並列舉四點理由，主要是：他今年整整一百歲，百歲老人為將近百年的鄉村小學恢復校名時題寫校名，將是雋永的人間佳話；他是今天浙江教育界最年長最有威望的長輩，他解放初任浙江師範學院院長，後任杭州大學校長，而台州各中學教育和行政人員多數畢業於這兩所學校，他為立本小學題寫校名，對整個台州教育界都將是一種鼓舞力量。

4 月 14 日，我收到三叔的來信：

知道“立本小學”恢復校名問題已經解決，非常高興。碰巧前幾天陳立先生來信，說他曾兩次為竺可楨故里上虞東關小學題字。我想，如果他也能為“立本小學”題字，該是最理想的了。他今年整整一百歲，是浙江教育界最老的前輩。50 年

代初他任浙江師範學院（文革時搬到金華，後改名浙江師範大學）院長。杭州大學成立後，他歷任副校長、校長、名譽校長，現是浙大終身教授，仍在帶博士研究生。他與竺校長、王淦昌先生都有很深情誼，他比王先生還長 5 歲。我只在 3 年前才開始同他通信，他把我當作知心朋友，碰到煩惱的事就向我傾訴。我已寫信給良容，不必麻煩呂國璋（他原是杭州藝專地下黨員）寫了。如果他同意，我就寫信請陳立先生寫，估計他是會樂意接受的。

5 月，陳立先生親筆題寫了“立本小學　百歲老人陳立”這幾個大字，通知在杭州的小叔良容去他家取。

小叔自從 1979 年“右派”平反恢復工作後，一直沒有回過家鄉，他“右派”平反後將近 60 歲才結婚。這次他與小嬸一起來到濶別 20 多年的老家。小嬸名叫朱蘭英，上海人，她還是第一次來到張家渡。在鎮政府，小叔親手把陳立先生題寫的“立本小學”校名的真跡，遞交給鎮黨委書記徐志勇。不久，括蒼鎮人民政府和括蒼鎮中心校向全國各地校友發出了參加復名大會的邀請函。

2002 年 10 月 23 日，復名大會在括蒼鎮中心校如期舉行。主席臺前鋪滿了紅地毯，鼓樂齊鳴，校園內喜氣洋洋，呈現出一派節日的氣氛。應邀的各級領導和嘉賓，以及來自各地的近百名校友，與 1000 多名師生一起參加了大會。臨海電視臺和《臨海日報》的記者也趕來採訪。

大會首先由臨海市教育局副局長鹿先法宣讀了有關“立本小學”復名的文件，接著括蒼鎮黨委書記徐志勇講話。校友、浙江大學教授潘祖仁和台州學院副教授許紹棻分別代表校友講話。隨後，舉行揭牌儀式。此刻，歡呼聲、鼓掌聲、鞭炮聲、鼓樂聲匯成一片歡樂的海洋，創辦於 1906 年的“立本小

學”正式復名掛牌，終於遂了我們老校友的多年心願。

揭牌儀式後，舉行校友座談會。校友們從各地趕來歡聚一堂，無不興高采烈。幾十年未見面，許多人都已白髮蒼蒼，多數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最年長者是 90 歲的洪紹炳。

座談會上，我代三叔宣讀了賀信。他在賀信最後說：“一所好的學校必須有一個好圖書館。因此，我希望母校恢復校名後，應該盡可能建立一個像樣的圖書館，各位校友是不是可以盡一分力，幫一點忙？”

他的建議引起了校友們的積極回應，當場就有 34 位校友解囊捐款。三叔也囑咐我代他在會上宣佈認捐一萬元。

為了紀念母校誕辰 100 周年，記錄下母校不平凡的辦學歷程，在座談會上，我提出建議，編寫一部《立本小學校誌》，當即得到與會校友的一致贊同。經過大家的提名和推選，成立了校誌編委會，著手史料的徵集和編寫工作。

不久，我們校誌編委會向全國各地校友發函徵集史料和稿件，三叔最早寄來他的回憶文章：《關於立本小學回憶點滴》。選摘幾段如下：

“1925 年春節後，鄰居孟叔（許則孟）上了立本小學，帶回課本讓我看見，上面畫著兩隻狗，很有趣。母親問我想不想上學，第二天我就高高興興地跟小哥良舜一道上學。小哥比我大兩歲，已是二年級了。語文第一課的內容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語文教師是本村的‘老先生公’許竹亭。算術教師金常忠，體育教師金達忠也都是本村人。以後還來了兩位外地的教師：謝中琪（白水洋人）和季正源（好像是雙港人）。還有兩位教師名字我已記不起了。一位姓龔，好像是龔慶平的父親，他的書法全村第一（第二是我的姨丈王燕

卿)。另一位姓金。他們都是本村人。

那時立本小學稱為完全小學，有初小四個班和高小兩個班。但人數很少，每班不到十人，全校同學不到 50 人。上課是用複式教學，一、二年級、三、四年級和五、六年級都分別合在一個教室裡上課。全校共只三個教室。教室是新式平房，坐西朝東。左側是一個朝南的大廳，是集會和雨天活動場所。它原來是一個尼姑庵的佛堂。被縮小了的尼姑庵仍在學校旁邊，住著兩個尼姑，她們與我母親常有來往。學校的東側是李氏祠堂和土地廟。祠堂裡有一株橫斜著的‘三姓樹’，是自然生長的一株樟樹、一株沙樸和一株楝棗扭成一體而成，象徵著張家渡村主要中許、金、李三姓居民所組成。土地廟裡供奉著張竹屋塑像。張竹屋就是宋進士張俞仲，他隱居象鼻岩東側，設義渡。

校園裡長著一株大柳樹和幾株‘白粉球’之類的灌木。教室外面階沿邊種著四季常青的‘階沿草’和一排低矮的冬青。北面的後操場很小，沒有什麼體育設施。課餘玩的，除了踢小皮球、滾鐵環，主要是到溪邊捉蟋蟀，在溪水裡捕魚蝦，或者在溪邊草坦上放風箏。

學校原來都是春季入學的，大概在我三年級開始，一律改為秋季入學，因此，我們都多讀了半年書。當時學校經費拮据，沒有圖書室，也沒有訂一份報紙、刊物。幸好我的姨丈王燕卿在海門（今椒江）工作，從我三年級開始，他每次回家總要帶十本《小朋友》（上海出版供小學生讀的週刊）和一些故事書給我讀（我小哥讀書興趣不大)。他說這些書刊是向海門慈幼院小學借來的，我讀完歸還後再換一批。當時慈幼院小學的教務主任沈洪波先生以前曾在立本小學任校長。

當時立本小學本身的條件雖然並不好，但自然環境卻十分

優美。村旁有高大的古樟樹和深幽的樹叢、竹林，樹叢裡經常有松鼠、雉雞出沒，清晨到處悠揚著鵑啼、雀鳴。西側蜿延清澈的溪流，南面屏障著雄偉的蒼山，更是令人嚮往。故鄉的自然風貌，如實地反映在立本校歌中。它開頭是：‘括蒼之巔望海尖，地勢莫嫌偏；上通永安下靈江，人文地理擅。象岩獅山東西列，拱護中心點。’薰陶在這樣清新秀麗的環境中，我的童年是幸福的。現在回想起來唯一感到遺憾的是，那時我不懂衛生，鼻子常掛著鼻涕，呼吸靠張開的嘴巴；夏天生疥瘡、癤子，冬天身上長虱。這種不衛生的習慣，1930 年到了海門以後才改過來。”

立本小學創辦人金劍青（1881－1940），名伯忠，字肇振，號幹卿，張家渡本村人。青年時赴上海就讀於馬相伯所辦的震旦學堂，後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初曾被選為浙江省議會議員。他立志“教育救國”，說服母親，將祖遺田產，除母親陪嫁田外，全部賣掉，投資辦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春，他和許臥松發起創辦“立本兩等小學”，即初等四年，高等三年。其校名，就取其家“立本堂”之名，這是臨海第一所私立的新式小學。辦學數年，成績日見，總統黎元洪曾頒發題有“毀家興學”的金字匾額。

立本小學既重視國文、算術主科，又注重體音美教學，至於科學常識等，則以實驗為主。學校還開展課外興趣活動，捉昆蟲、採礦石、制標本等，深受群眾和社會各界好評。

這裡，讓我們錄幾段回浦學校董事長陸翰文，1929 年 6 月 22 日《歡迎海門慈幼院小學旅行團的講話》（原載《回浦潮》第 95 期）：

“臨海之有私立學校，始於距今二十餘年前臨海西鄉張家

渡之立本學校。立本學校是金幹卿先生手創的。辦事人的精神和學生的成績優秀，臨海教育界中無人不知道。偏僻的小縣，荒涼的鄉村，能有這樣一個學校，真是空前之舉！

以後我們創辦回浦，雖有其他種種原因，但是受立本之影響亦是原因之一。所以立本校可說是回浦的哥哥。

回浦既有開闢草萊的哥哥——立本，又有後來居上的弟弟——慈幼院。今日好弟弟忽然降臨，回浦對此，如何欣悅，如何誠意，那也可想而知了！”

陸翰文先生的歡迎詞，既反映了當時臨海的教育狀況，也讚揚了金劍青的辦學精神，從而可以反映出立本小學對當時臨海教育界的影響是很大的。《立本小學校誌》初稿編好後，編委會曾寄初稿影本給三叔，他花了七天時間通讀全稿，對初稿多處作了修改和補充，並提出修改意見。經過 5 年的努力，《校誌》終於付梓成書。

《立本小學校誌》中，刊載有《為“立本小學“題寫校名的陳立先生生平簡介》：

陳立，字卓如，著名心理學家、教育家。1902 年 7 月 22 日生，湖南長沙人。1928 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1933 年獲英國倫敦大學理科心理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在英國劍橋大學、英國工業心理研究所、德國柏林大學心理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35 年回國後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合聘的工業心理研究員。1939 年任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後兼任教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52 年起歷任浙江師範學院教授、副院長、院長，浙江省監察委員、教育廳副廳長，杭州大學副校長、校長、名譽校長。並曾擔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室籌委會副主任、中國心理學會副理事長、浙江分會理事長，浙江教育學會副理事長，國務院學術委員會教育學科評議組心理學組

召集人，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發起人，浙江省科協名譽主席等職。1993 年獲倫敦大學院士稱號，1997 年和 1998 年分別獲“中國心理學會終身成就獎”和“中國人類工效學學會終身成就獎”。我國工業心理學創始人。

1952 年陳立參加九三學社，曾任浙江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浙江省政協副主席，二、三、五屆九三學社杭州分社主委、名譽主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及參議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79 年參加中國共產黨。

先生暮年猶老當益壯，97 歲還招博士研究生，每年都有論文發表，真是人間奇跡。100 歲時，他說自己要從零做起。那年 5 月他為剛恢復原名的立本小學題寫校名。熟料半個月後，先生不慎跌跤骨折。成功地做股骨關節置換手術。但因創傷面積過大，嚴重影響心血管，體質一蹶不振。2004 年 3 月 18 日逝世，享年 102 歲。

33、第四次進京

2003 年 1 月，我正式退休。從此，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自己安排時間，做自己想要做的事。2004 年 7 月，我第 4 次來到北京，一住就有二、三個月，這樣與三叔見面的機會也更多了。

我到北京後，即去中關村看望三叔。離第三次來京已有 6 年時間了，談了一些近況後，三叔向我推薦一本剛出版的新書：《往事不並如煙》。作者：章詒和，頭號“右派”章伯鈞之女。

書的作者，以晚輩的眼光來寫父親的友人：解放後曾任森林工業部部長，“章羅同盟”的二號人物羅隆基，曾任《光明

日報》總編、“大右派”儲安平（因說“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而招大禍，1936 年被國民黨逮捕、為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後任司法部部長的史良，以及康有為之女康同璧，“右派”作家聶紺弩等。作者憑藉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深切的體驗觀察，刻畫了當代幾位著名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側影。

我是於 7 月 15 日到達北京的，開頭一個月住在“雍和家園”外甥何邦曉家，他家地處“雍和宮”附近，為他的兒子何凱華補習英語，他剛初中畢業，即將升入高中。後一個多月住在邦曉的妹妹何巧文家（在北京“現代城”）。巧文於十年前也來北京做服裝批發生意，生意做得不錯，買了二處新房和小轎車。9 月中旬，杭州小叔和小嬸來北京，巧文特地開車到北京火車站迎接，直接把他倆送到中關村三叔家。

小嬸是第一次來北京，他們倆人都住在三叔家。最為難得的是，兩位歷盡滄桑的八十多歲老人住在一起敍舊，從小時“西樓”、高臺門……到投身革命、參加地下黨，戴了“右派”帽子，“難兄難弟”在老家改造……

他倆無所不談。有幾次，我坐在旁邊聽他們的回憶，我也知道了不少他們的往事。遺憾的是，我當場沒有把他們的談話用答錄機錄下來，這已是無法彌補的遺事。

小叔、小嬸在北京期間，我陪他倆一起遊覽香山、天壇等處。記得去天壇那天，剛好我的中學同學謝銘傳，臨海白水洋人，他父親謝中琪（又名謝天心）是三叔在立本小學讀書時的老師。武漢水電學院畢業後，一直在四川攀枝花電業局工作，這次也來北京遊覽。在天壇我們一起同遊，他熱情地為我們拍了多張照片。

在京這些日子裡，最令人難忘的是，10 月 6 日上午，三

叔、小叔、三嬸、小嬸、許平、罕立以及我，一起去新修復的“元大都遺址公園”遊覽。

這裡原來是元代建都北京時最早的“京城“，古城牆遺跡尚存。我們首先爬上已經長滿草木的“土城牆”，然後來到公園幾處新景點。有一處柳樹成蔭，又有鵝卵石的“溪灘”，酷似故鄉的“後門溪”，三叔招呼大家在這裡集體照相。我們一行 7 人，在這裡玩得非常開心，尤其是陪同三叔、三嬸和小叔、小嬸一起遊覽，今後恐怕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在京期間，為編寫《立本小學校誌》徵集史料，我曾特地約同在京校友許榮滿、周立農一起回憶小學生活，在立本小學讀書時，他們倆人都是比我高二、三年級的同學，而且都是同村。許榮滿，1957 年回浦中學高中畢業，1962 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同年分配至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工作至今。周立農，1958 年台州中學高中畢業，1963 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是科大第一屆畢業生，同年分配至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後改稱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倆位鄉友都非常熱情。尤其是周立農，對我講話滿口鄉音，並直呼我的小名“米央”，聽起來倍感親切。

9 月 5 日，我約了在京工作的高中同學在景山公園聚會。我們高三（2）班有洪用對（國家質量監督局工作，北京鋼鐵學院畢業）和姚兆和（空軍第一研究所工作，南京航空學院畢業）；高三（1）班有倪秋芽（中科院工作，天津大學畢業）、趙秀麗（中科院工作，浙大畢業）、何慶喜（兵器科學研究院工作，哈工大畢業）等人參加。

明年（2005）將是高中畢業 45 周年，我們這一屆兩班合在一起還沒有開過同學會。中飯在景山公園附近的一家餐館裡用餐，由趙秀麗同學做東。在飯局上，大家商定明年 10 月召

開同學會，當即由洪用對同學執筆起草發起召開同學會的通知。

由於同學會的籌備工作落實在我的身上，從北京回來後，我即找在臨海的同學商量如何開好同學會。

我們班在此之前曾開過多次同學會，但（1）班卻沒有開過同學，而且同學之間矛盾很深，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他們班有一位黨員學生幹部，是當時的“大紅人”（畢業時作“保送留蘇”，因中蘇關係惡化未成，後保送浙大），班上同學的“畢業鑒定”都由他作出，這些“鑒定”就是考大學的“政審”，有人就因鑒定上的一、二句評語而“降格錄取”或“不宜錄取”。班上有幾位成績撥尖的同學也因此而拒之大學校門之外，有三人已錄取最後卻被取消。這次，當他們得知要開同學會，有十幾位同學表示：如果某某人參加，他們將拒絕參加同學會。

所有這一切的後果，都是這個時代所造成的，在“政治掛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誰能逃脫得了？這些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由於有些同學的勸說，原來拒絕參加的人，後來也前來參加；反而那個“大紅人”，卻背著沉重的“包袱”，如何面對這些昔日的同窗？

2005 年 10 月 18 日，回浦中學 60 屆高中 45 周年同學會如期在回浦中學新校區舉行。

會議首先由校領導致歡迎詞，接著張忠良代表本地同學講話；吳錦地、洪用對代表外地同學講話，方世龍介紹臨海的歷史，隨後自由發言。會議由我主持，在會上我向每位同學分發我剛發表的文章《培養“和諧的人”——重溫愛因斯坦教育思想》（刊於省民進刊物《開明》雜誌 2005 年 10 月號）的影本。

第二天分班活動，（1）班同學去洛河公園等新景點，我們

班租了旅遊車去桃渚風景區（地處臨海東部海邊）旅遊。那裡有桃渚古城（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地質公園，海濱天然浴場等。

旅途中，大家都興高采烈，有說有笑，回想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如今都步入老年的行列。閒聊中，我說，“目前我們國家仍處於人治，而不是法治，並且還是一黨專政。”有人（此人 80 年代中期還曾去西德進修過）說我是“反革命”。

我當即予以反駁並與他爭辯起來。我說，“你不能帶著舊腦袋，用“文革”語言來給我扣帽子，要曉得現在已經沒有‘反革命罪’了。

1979 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還有所謂“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罪。”1997 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已經把“反革命罪”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我還舉了一些事實，說明我國仍處於人治和一黨專政。

我曾把這一情況寫信告訴三叔，他回信說：

“你說與高中同班同學遊覽時，因為你說了目前仍處於人治和一黨專政，竟有人罵你是‘反革命’，這實在是太豈有此理了。要是碰到我，我會把他罵得狗血噴頭，甚至還可能給他一個耳光。你們爭辯時，旁邊的人是何態度？”

當我們爭辯起來時，同車的其他同學竟然都保持沉默。這個同學的思想，正好代表了我們這一代所受共產黨正統教育的思想狀態，雖然已經進入 21 世紀，但還是半個世紀前的“頭腦”。社會在進步，時代在變化，但他們頭腦中還死抱住階級鬥爭的“僵屍”不放，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悲哀！

34、物理學家束星北的一個歷史懸案

三叔在浙江大學求學期間，有幸遇到二位對他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教授，一位是三叔的恩師王淦昌先生，另一位是束星北先生。他們倆是浙大物理系的兩大台柱，一個擅長理論思考；一個擅長實驗探索，性格都極其開朗、坦誠，思想都異常活躍。他們是同齡，又都是江蘇人，一個生於江北邗江，一個生於江南常熟，正好是隔江相映。他們之間始終存在著最真摯的友誼。三叔說，“我能夠同時受業於這兩位老師，實在是我人生的一大幸運。”

束星北先生是三叔的科學理論啟蒙老師。通過束先生的課，使三叔比較徹底地理解牛頓力學基本概念的物理內容，對於古典物理理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開始有了欣賞能力，認識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重要性，並且開始養成對問題窮根究底的習慣。這也啟示了他應該怎樣認真地去精讀名著和學習哲學，深入地探索宇宙奧秘，嚴肅地思考社會和人生問題。

束星北（1907－1983），8 歲進村塾，10 歲入新學堂。1924 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翌年轉學到山東濟南的齊魯大學。1926 年，赴美留學，在堪薩斯州貝克大學的三年級插班。1927 年初，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三藩市分校。當年夏天，離開美國前往歐洲，後在德國的漢諾威工業大學等地“遊學”了約一年。1928 年 10 月，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1930 年 1 月，愛丁堡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隨後又到劍橋大學進修了 7 個月。9 月，回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繼續學習，1931 年 5 月，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他的第二個科學碩士學位。同年 9 月回國。先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教了一學期物理，隨後被聘任浙江大學物理教授，並在該校任教 19 年。解放後，院系調整，1952 年，到山

東大學物理系任教。1955 年的“肅反”運動被打成“反革命”。1957 年反右運動被批鬥，1958 年被戴上“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兩項帽子。他的冤案直到 1979 年徹底平反，並恢復了名譽。在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職，1983 年去世。

1993 年 9 月，束星北先生逝世 10 周年，為了緬懷這位鄉賢，政協江蘇省邗江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邗江文史資料第六輯：《物理學家束星北——紀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此書出版後，三叔即寄給我一冊。我通讀了全書，對三叔的回憶文章《憶束師星北先生》，以及書後作為“附錄”的三叔來信，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對書中有關束星北是否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的爭論，也給我留下了一個疑團。

三叔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第一次聽束先生的課，是 1939 年 10 月在廣西宜山，聽他為浙大物理系二年級學生開的“力學”（即理論力學）課。上課前，聽說這門課要從牛頓運動三定律講起，我很失望。因為牛頓運動定律我已學過四遍（初中三年級的物理，浙大高工一年級的物理和二年級的應用力學，以及大學一年級的普通物理），以為自己早已懂得，沒有什麼可學的。而我在上大學前讀過十幾本關於現代物理學的通俗讀物，知道一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基本知識，急於想跳過 250 年前牛頓的古典理論，徑直學習 20 世紀的新物理學。想不到聽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課，我就覺得自己的想法完全錯了，原有的自滿情緒也就破滅了。

束先生講課的最大特點是：以啟發、引入深思的方式，著重、深入地講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學生能夠融會貫通地理解整個理論框架。他由日常所見的自然現象出發，通過

高度的抽象概括，從各個不同側面，對基本概念和原理進行透徹的分析，並不厭其詳地用各種唾手可及的實例，深入淺出地反復論證，使學生能夠一通百通地領會、掌握基本概念。他講課，既不用講義，也不指定參考書，黑板上也沒有可供學生抄錄的工整的提綱；而只是用質樸生動的語言，從大家所熟知的現象，來闡明物理理論和思想。他舉止不修邊幅，說話非常隨便、直率，喜歡在教室裡到處走動，還愛坐在課桌上高談闊論。

力學第一課，他先講物體的運動，接著講速度，平均速度，瞬時速度；由此引進數學上的極限和微分概念。然後著重論證，是運動的變化，而不是運動本身需要“原因”。所謂原因，是指外界影響，可以叫做“×”，或“鬼”，牛頓把它叫做“力”。以前人們，包括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都以為物體運動總需要有一個推動者在不停地推動著；伽利略和笛卡兒卻發現，只有當運動狀態改變時，才需要有外界的影響。就這樣，他把古代運動觀和近代運動觀作了鮮明的對比，使哲學和物理學融為一體。

這一堂課，我聽得出神，覺得茅塞頓開，精神上得到很大的享受。就這樣，束先生把牛頓運動三定律足足講了一個月，而其回味無窮。對比之下，以前我雖然學過四遍運動三定律和二遍微積分（高工二年級學第一遍），也能熟練地運用牛頓定律解決不少力學問題，但對於運動和力並沒有形成清晰的物理概念，實際上是似懂非懂。由此我才開始真正領會什麼叫理論，什麼叫原理。遺憾的是，並不是每個同學都能欣賞束先生的課。有個同學就埋怨他講得雜亂無章，無法記筆記，課後無法溫習。這位同學剛從別的大學轉學來，在那個大學各門功課都考高分，聽束先生的課卻不得要領。他很用功，但由此也產生了自卑心理。

在宜山，力學課只上了一個多月就中止了，因為日寇從欽州灣登陸進犯廣西，浙大不得不開始第五次搬遷，遷到了黔北遵義。正當我們陸續到達遵義準備復課時，束先生獲悉父親噩耗，即請假赴上海奔喪。力學課由另一位教授代教。這位教授照本宣講，平鋪直敘，引不起我多少興趣，因為所講的內容，任何一本力學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我只盼著束先生早日回來。1940 年 6 月束先生回到遵義，給我們講牛頓力學的發展——分析力學，著重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頓原理講透，使我們並不很困難地攀登上古典力學的第二座高峰。

我還有幸在三年級聽束先生開的“熱學”（即熱力學）課。他講熱學也象講力學那樣，用一個月時間講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熵”概念。他用高度的執掌概括，把自然界中的變化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可回復的，如人的死亡，生物的生長。一種是可回復的，如 2 個 H_2 分子和 1 個 O_2 分子合成 2 個 H_2O 分子；一個物體從 A 處位移到 B 處。而可回復的變化又可分為“真變化”和“假變化”二類。真變化是指：在變化後雖然可以使其中一物或狀態還複，但在還原過程中必然要使另一物或狀態引起變化；即使再令這種變化還原，可是其他方面又發生了變化。如此繼續下去，縱使竭盡種種方法，也終不能使一切事物或狀態都恢復到變化以前的情況。兩個不同溫度的物體相接觸所出現的就是這種真變化。假變化是指還原過程中至少可以用理想方法使之絲毫不留任何痕跡於宇宙間的那處變化。卡諾熱機的運行，平衡狀態下壓縮氣體，都屬於這一類。這樣，他就把不可逆的變化稱為“真變化”，把“熵”理解為真變化的精確量度，使物理概念增添了豐富、深邃的哲學內涵。

在回憶文章中又寫道：

“1982 年 9 月，周志成出差去青島，見到了束先生，帶回束先生給我的情意深長的口信。他說有很多話要向我傾談，希望我去一次青島，他要好好款待我。他還十分中肯地提醒我：研究科學思想史（這是我當時所研究的）固然重要，但還應該研究社會史，要著重研究那些能讓後人深刻接受的歷史教訓。束先生給我指出的研究方向，正是我多年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而反復思考的問題。”

束星北先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物理學家，又是一位有獨特教學風格的優秀物理教師，他善於生動、清晰地向學生講解物理學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他啟蒙並培養過一批國內外頂尖的物理學家，如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物理學會會長吳健雄、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開拓者、中國核武器試驗的創始人之一程開甲等。李政道是束星北在 1940 年代初的學生，30 年後，他給老師的信中寫道：“我物理的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後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在《邗江文史資料》這一期紀念來星北的專輯中，收錄了一篇發表於 1979 年 3 月 9 日《光明日報》上束星北的署名文章：《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裡》。說自己於 1928 年 5 月在德國柏林大學拜訪了愛因斯坦，經過一番談話之後，愛因斯坦決定設法聘請束星北做他的研究助手，時間是 1928 年下半年至 1929 年上半年。還說，他與愛氏討論學術問題，協助其工作，到其家中做客。在這期專輯中，有多篇文章都把束星北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憶述當作既成事實而予以引述。但三叔卻提出了質疑。

最初引起三叔懷疑的，是束星北的履歷表。1987－1988年間，遼寧作家協會專業劇作家張大凱來訪問三叔。他為束星北先生傳奇式的一生所感動，寫了一部電視劇，曾在青島住了半年多，進行過大量採訪，並查閱過全部檔案。他給三叔看了束星北於 1954 年和 1964 年填寫的兩份履歷表，表中都未提到 1928 年當過愛因斯坦助手之事，三叔就開始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三叔打電話問王淦昌先生，他說從未聽束先生向他談起與愛因斯坦的關係。為了核實歷史真相，三叔查閱手頭所有的愛因斯坦傳和有關史料，都與《光明日報》這篇文章不符，斷定此文是虛構的，完全不可信。

邗江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紀念束星北逝世十周年專輯，準備把束氏回憶文章收進去。三叔為此給編者寫了一封長信，論列《愛》文之不實，信中最後說：“鑒於這篇文章根本不可信，建議你們編的紀念文集不要收進去。如果一定要收，請把我這封信也附上，以供後人研究參考。”

20 世紀 80 年代末，三叔招了兩個物理學史研究生，其中一個叫胡大年，後來，他去了美國，進了耶魯大學，在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史家馬丁・J・克萊因（Martin J klein）門下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原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中國》，三叔建議他改成《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在中國》（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書，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 2006 年已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出版，書名為《愛因斯坦在中國》，系第一部論述中國接納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歷程的專著），並提供他許多有關資料。由於馬丁・J・克萊因當時正擔任《愛因斯坦全集》的主編，接觸愛因斯坦檔案相當方便，三叔就請胡大年查閱愛因斯坦檔案，看是否有與束星北有關的材料。

在三叔的建議下，胡大年檢索了存於波士頓大學 Mugar 圖書館的愛因斯坦檔案（影本），並於 1997 年 8 月 15 日發現了束星北在 1943 年 12 月 17 日寫給愛因斯坦的英文信。

1997 年 10 月，胡大年給三叔回信，說沒有找到束星北 1928 年當愛因斯坦助手的材料，卻意外地發現了一封束星北 1943 年從貴州湄潭寄給愛因斯坦的信。

現按中文書信格式譯錄於下：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教授:

我為無緣與您相識而感到遺憾（原文為“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不過，我從少年時代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都一直受到您在自然哲學領域巨大成就的激勵。我們殷切期望您能做一次能為我們國家和人民帶來榮光的訪華之旅，乃至能在敝國安度餘生。我們很感謝您的偉大發現，您的到來無疑會受到我國政府和人民的歡迎，會得到全體中國人的崇敬。與西方國家的觀念有所不同，中國人只崇敬那些擁有偉大思想的人。例如，對孔子，我們不只是在口頭上表達虔誠，而且幾乎在中國的每個城鎮都建有文廟。雖然我們不能為您提供像美國那樣的現代舒適生活，但我確信您會喜歡中國人的。如果您有意來華，我們將與政府安排相關事宜，以解決您來華過程中及在中國期間的所有不便。

浙江大學物理學教授　束星北

敬上

1943 年 12 月 17 日於中國湄潭

另附上鄙人最近論文之摘要，希望能如同您的一個學生那

樣得到指教。

信文的第一句話：“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很遺憾我還沒有機會與您結識），這已經給出了極其明確的表示：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過去沒有機會相識。這個過去的 chance（機會），當然也包括 1928 年和 1929 年。這就證實了三叔的懷疑：如果束星北在 1943 年尚未與愛因斯坦“結識”，他顯然不可能在 1928 年為愛因斯坦做過“研究助手”。

2005 年 12 月 23 日，《科學時報》以整版的篇幅作為“特稿”，刊載了三叔的文章：《我所瞭解的束星北先生》。文章比較客觀地介紹了束星北先生的情況，其中一節《束星北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嗎？》，分析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稱的束先生為什麼會在 1979 年要偽造這段歷史時，這樣寫道：

“我從張大凱訴述的束先生 1957 年以後的遭遇找出了答案。1958 年他被戴上兩頂帽子：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並被判處管制 3 年（到 1965 年才解除管制，1974 年才摘掉這兩頂帽子），每月只發生活費 20 元，而全家十口，生活之窘迫已難以忍受；加上無盡止的精神折磨，人格和尊嚴被無情摧殘，過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更有甚者，他的大兒子原在空軍當軍官，因受他牽連被遣送回家，心裡窩了一肚子火，希望他儘早檢討過關。可他秉性倔強，不肯檢討認錯，兒子無以容忍，經常罵他，甚至有一次還打他一個耳光，他竟不吭一聲。聽到這裡，我感到揪心之痛。一個剛直耿介、極其自傲的人竟能忍受兒子的耳光，實在無法想像，唯一的解釋是，在政治、經濟、思想、社會和家庭內外的恐怖的“改造”壓力下，他被壓垮

了，心靈不得不被強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 年《光明日報》上的文章顯然就是心靈被扭曲的可悲的產物。

20 世紀 60 年代，束星北這個桀驁不馴的彪形大漢終於被改造成一個俯首貼耳的可憐蟲，這段心靈被完全扭曲的悲劇，《束星北檔案》一書描繪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文革”時他說的寫的全是紅衛兵的假大空語言；對打掃廁所竟非常“熱愛”，要包下全校的打掃廁所工作；“文革”後他所器重的一個研究生說了一句“不妨讓卡特（當時的美國總統）幫忙改革”，就擰著他的胳膊提到所長辦公室，要開除這個思想糟糕的學生，更荒唐的是，“文革”時他竟主動參加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見樊洪業文章中所引的竺可楨日記）；可是“文革”過後，他又杜撰當過愛因斯坦助手的神話。

心靈被扭曲了，原來的是非標準都會顛倒過來。特別是 1957 年開始，說真話的倒楣，說假話的得勢，被“改造”成功的束星北自然會“覺悟”到，你們都大說假話，我為什麼不可以？1979 年 2 月，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愛因斯坦誕辰 100 周年大會（這項活動是我於 1977 年倡議的），會上唱主角的是他並不服氣的周培源（周先生 1974 年向我透露過對束先生的不滿），他心裡一定有氣，要設法宣洩。正是這兩個因素促成他於 1979 年 3 月虛構了 1928 年的那個神話。”

2005 年 12 月 8 日，《南方週末》發表了中科院樊洪業的文章《束星北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嗎？》。文章對於束星北為什麼虛構上述“研究助手”的故事，也作了比較詳實的分析。文章這樣寫道：

許良英當年是束星北的及門弟子，1942 年畢業於浙大。他

十分敬佩和尊重束老師，在解放初政治審查中曾經保護過束老師。是他，最早撰寫了較為全面介紹束星北生平業績的文章（“束星北先生傳略”，載《浙江大學在遵義》），在客觀描述的筆觸中傾注了對束師的一片真情。對於束星北回憶愛因斯坦的文章，他起初也還是相信的，在那篇傳略中，也提到了束氏“在柏林時，曾慕名拜訪愛因斯坦”。

然而，許良英又是一位極有原則的人。他敬重束老師，但當束老師與愛因斯坦相偕闖入科學史研究尤其是闖入愛因斯坦研究的視野時，尊師之情並不能遮蔽他作為科學史家來審視這份新史料的眼光。此時許良英的選擇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得出了“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的結論（許良英 1992 年 12 月信件，《邗江文史資料》第六輯《物理學家束星北》）。

文章最後“餘論”這樣寫道：

“社會是複雜的，人生是複雜的。束星北是人，就有人的真善美和假惡醜。與常人相比，束星北是奇人奇才，他的真善美和假惡醜還要比常人更奇些。他恃才傲物，前半生還真春風得意，後半生苦不堪言。他崇尚科學，早年曾徜徉在世界物理學革命前沿，探討相對論，晚年在特殊的境遇下卻曾研究‘道在溺中’的便池積垢問題。他曾屢因過於看重孔方兄而放棄或失掉科研的機遇。他曾為阻止王淦昌家庭的破裂而仗義奔走，自己卻也曾有婚外情牽。他曾替蘇步青打抱不平而表現出為朋友兩肋插刀，卻也曾為檢舉告密出逃計畫而往朋友的兩肋插刀……”

35、紀念“愛因斯坦奇跡年”一百周年

三叔曾經對愛因斯坦作過這樣的評價：“他是 20 世紀初科學革命的先驅，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創建者，量子論的奠基者之一，現代宇宙學的開創者，雷射技術的理論先驅；同時，他又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哲學家和堅持獨立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一位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並終生為和平、民主、自由、人權而鬥爭的世界公民。按照諾貝爾獎的評獎標準，他一生的科學貢獻應該至少可以得到七個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外可以得到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可是，他一向鄙視追逐名利和安逸享樂，而始終嚮往真、善、美的生活理想。”

1905 年，愛因斯坦分別在物理學理論的三個重要領域——原子論、量子論和相對論中的四個方面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1）提出光量子論，提示微觀客體的波動-粒子二象性，推動量子論的發展；（2）由液體中懸浮粒子運動推出測定分子大小的方法，徹底解決了原子是否存在的爭論；（3）創建相對論，開創物理學的新紀元；（4）由相對論推出質量與能量相當性，預示核能時代的來臨。這四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成就，都是年僅 26 歲的愛因斯坦於 1905 年 3 月至 9 月這 7 個月內完成，而且他當時與任何學術機構都毫無關係，只不過是專利局的一個小技術員。當時他已結婚，有了一個男孩，家累不輕，但他利用業餘時間，寫出了劃時代的物理學論文，創造了科學史上的一大奇跡。

由於物理學對於瞭解自然和技術進步的重要性，以及物理教育對於人類發展的必要性，同時“意識到 2005 年是愛因斯坦作出了為現代物理學奠定基礎的開創性科學發現的一百周年”，2004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宣告 2005 年為“國際

物理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Physics）。德國政府乾脆把 2005 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Einstein Year），並且決定把愛因斯坦的名言“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鐫刻在政府大樓上。

2001 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三叔和范岱年譯的《愛因斯坦奇跡年——改變物理學面貌的五篇論文》一書。此書主編約翰·施塔赫爾（Stachel,J.）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物理學教授、愛因斯坦研究中心主任、《愛因斯坦全集》主編。在所收的愛因斯坦 5 篇論文中，其中 4 篇是三叔在老家張家渡當農民時翻譯的。

范岱年在此書的《譯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許良英教授是我國翻譯、研究愛因斯坦論著的先行者，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早在 1946 年的浙江大學物理系，他是指導我熱學實驗的助教。1948 年 10 月的一天，在杭州浙大物理系的一個實驗室（暗室）中，他是我加入中共地下黨入黨宣誓的監誓人。1949 年 5 月，杭州剛解放，我們一起到杭州軍管會青委從事學校方面建立青年團和發展黨的工作。1952 年，由於他的提名，我被調到中國科學院《科學通報》編輯室，又在他的領導下工作。1957——1958 年，他和我先後都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從 60 年代初開始，他在農村勞動以及‘文革’動亂期間一直在從事《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工作。我是在‘文革’後期，在他的推動下，才參加該《文集》的翻譯工作。今年是許良英教授的 80 壽辰。我願以此書的出版，來慶祝他的壽辰，紀念我們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紀念我們 1/4 多世紀以來在編譯愛因斯坦的論著方面的合作。”（注：《譯後記》寫於 2000 的 10 月）

2005 年，為了紀念“愛因斯坦奇跡年”一百周年，便於廣大讀者瞭解愛因斯坦，接近愛因斯坦，三叔特意編撰了一本愛因斯坦文集——《走近愛因斯坦》（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5 年 7 月 22 日，《中國圖書商報》發表廣州中山大學物理教授關洪的書評文章。他說：

“最近我進京一趟，訪問了許良英先生，承蒙他贈送我一本剛剛出版的《走近愛因斯坦》”。

“從《走近愛因斯坦》這部文集精選的內容，可以瞭解到他在人生信念、哲學思考、科學探索、教育思想和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等眾多方面的看法。正如編者在《前言》裡說的那樣，可望這本文集能‘喚起人們對作為一個人的愛因斯坦的關注’。此外，書中還載有精心收集的一百多幅圖片，包括愛因斯坦各個時期的肖像以及一些珍貴的歷史照片。所以，這本文集真是一本圖文並茂的高質量普及讀物，適宜於收藏到廣大讀者的書架上面。

許良英先生在這部文集的附錄裡，還收進了他編撰的《愛因斯坦年譜》以及他後來在《科學文化評論》今年第二期上發表的近作《愛因斯坦奇跡年探源》。這篇為“愛因斯坦奇跡年”而寫的文章，可以看作是他長期孜孜不倦倦地對愛因斯坦的研究工作的一個簡要概括，也可以幫助讀者對愛因斯坦的生平作一種全面的瞭解。”

三叔在《愛因斯坦奇跡年探源》這篇論文裡，對於愛因斯坦創造“奇跡”探其源頭，歸納為三個原因：

首先，是他始終保持對自然界奧秘的驚奇，對科學探索的執著，不顧任何困頓險阻，始終信守為科學奮鬥的信念和決心。

其次，是他的不願隨波逐流，不願固步自封，敢於向舊傳統和任何權威挑戰的反叛精神。他生前的研究助手霍夫曼（B.Hoffmann）和秘書杜卡斯(Helen Dukas)合寫傳記《阿耳伯特·愛因斯坦創造者與反叛者》（Albert Einstein Creator and Rebel,1972,Viling Press），這個不同凡響的書名，正是對他這種精神的中肯表述。

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他具有深邃的哲學探索精神，使他與同時代的物理學家相比，在思想境界上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眼界更廣。正如他在逝世前５天對一位科學史家所說的，20 世紀初只有少數幾個科學傢俱有哲學頭腦；而今天的物理學家幾乎全是哲學家，不過“他們都傾向於壞的哲學”。既要有哲學頭腦，又要不傾向於壞哲學，並非易事。他自己是怎樣走過來的？對他的科學探索產生影響的哲學思想又是什麼？

愛因斯坦幼年時雖然發育遲緩，但少年時卻相當早熟，愛好窮根究底地思考各種問題，包括大自然的奧秘和人生價值問題。在一位醫科大學生引導下，12 歲就讀過康得的代表作。1902——1905 年的“奧林比亞科學院”的活動中，他和兩位大學生一道閱讀並認真討論了理性論哲學家斯賓諾莎（Spinoza）的代表作《倫理學》，經驗論哲學家休謨（Hume）的《人性論》，物理學家兼經驗論哲學家馬赫（Mach）的《感覺的分析》和《力學》（此前他自己已讀過這兩本書），以及其他一些哲學家的著作。愛因斯坦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以獨立的批判精神，認真吸取各派哲學的精華，而不拘泥於任何一派哲學體系，不盲目附和任何哲學教條。他的哲學思想，是通常的物理學家難以企及甚至無法真正理解的。最近我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90 歲高齡的彭桓武先生在一次言談時坦誠地說，

對愛因斯坦兩段論及哲學的話，他至今未能真正理解其意義（見 2005 年 1 月 6 日《大眾科技報》）。這兩段話正是愛因斯坦對知識和理論本性的精闢論斷，值得向讀者介紹：

1．“純粹的邏輯思維不能給我們任何關於經驗世界的知識；一切關於實在的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又終結於經驗。”（1933 年 6 月 10 日在牛津大學的演講《關於理論物理學的方法》）

2．“我們現在特別清楚地領會到，那些相信理論是從經驗歸納出來的理論家是多麼錯誤呀。甚至偉大的牛頓也不能擺脫這樣的錯誤（‘我不作假設’）。”（《物理學和實在》，1936 年；“我不作假說”是牛頓的話，他認為他的理論全部來自經驗。）

2006 年 1 月 4 日，《中國青年報》刊載《因求真而可敬》一文，作者：方舟子。文章列舉“三位老人，三本書，都因為求真而可敬”。這三位老人：三叔、鄒承魯（著名生物化學家）、高耀潔（社會活動家）。文章並配發了三人的照片。文中提到三叔贈送給作者一本新書《走近愛因斯坦》。他說：

“許良英先生是另一位以敢講真話著稱的老人。他聽說我在北京，約我見面，我於是得到一本新出的愛因斯坦文選——《走近愛因斯坦》。我的科學思想啟蒙源於大學時代閱讀《愛因斯坦文集》，因此它的譯者許良英先生從某種程度上也可算是我的一位啟蒙老師，雖然我後來已無需再借助譯文閱讀愛因斯坦著作，甚至能發現《愛因斯坦文集》中的誤譯了。……

“幾天前我路過一個小書攤，裡面只擺了幾十種暢銷書，其中居然有這本《走近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的著作、思想能在中國如此流行，得益於許先生不懈的引進和推介。相比之

下，在科學成就和思想上都可與愛因斯坦並肩的達爾文就沒有這麼幸運，我見到的達爾文著作中譯本都算不上合格。”

我對這篇文章的作者方舟子並不瞭解，於是寫信問三叔，2 月 21 日，三叔回信說：

“方舟子是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畢業，後去美國得博士學位，做過博士後，從事諮詢工作，夫人在新華社工作，每年一半時間在國內。幾年前他搞了一個中文網站，專門從事學術打假工作，應該說是好事，但他有些主張過於偏激，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反對‘偽科學’，但打擊面過大。最糟糕的是，他與棍子何祚庥搞在一起，我找他談，主動勸他不要與何祚庥搞在一起，估計不會有實際效果。”

正當人們紀念“愛因斯坦奇跡年”100 周年，適逢第 22 屆世界科學史大會在北京舉行。

2005 年 7 月 25 日，在世界科學史大會的專題討論會“跨文化視野中的愛因斯坦-——紀念愛因斯坦奇跡年 100 周年清華論壇”上，清華大學教授劉兵（他是三叔 80 年代初的一個研究生）作了題為《〈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出版與作為意識形態象徵的愛因斯坦》的報告。

後來，這份報告以“本刊特稿”刊載在《博覽群書》雜誌 2005 年第 10 期的首篇。作者在開篇中說：

“愛因斯坦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其思想學說的傳播，包括科學之外的哲學、社會、政治言論的傳播，直接影響到他在公眾中的形象。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傳播過程，又

不僅僅是將其思想學說簡單地轉達給公眾的過程，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諸多複雜的因素。從對這些因素出現和存在的歷史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一個影響巨大的科學家，其形象也往往是與意識形態象徵不可分割的。

在中國，就公眾對於愛因斯坦其人其學說的瞭解來說，除了在‘文革’的特定時期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運動外，最直接、最有影響的事件，恐怕莫過於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編輯出版的曲折過程，對愛因斯坦之評價的相應變化等的歷史梳理，試圖發現不同時期建構在愛因斯坦身上的意識形態象徵及其變化。”

這份報告共分為八個部分，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愛因斯坦文集》編譯出版的曲折過程而展開。通過對這些歷史的回顧，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瞭解到作為意識形態象徵的愛因斯坦，在不同的階段所受到的不同對待。報告最後指出：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觀點也還是在不斷地改變，逐漸走向開放和理性。

除去那些批判者不說，甚至於《愛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編譯者許良英先生本人，也經歷了這樣的轉變過程。今天重讀前面曾提到的那篇許良英先生基於專著《愛因斯坦文集》“編譯後記”改寫、以筆名與李寶恒合作發表的論文《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人們會在文中的許多地方看到對愛因斯坦不恰當的評價和批評。許良英先生在與本文作者的談話中，也承認他當時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的文章是很“左”的，他對愛因斯坦的看法也是在後來才又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三卷本的《愛因斯坦文集》的最終出版產生了巨大的影

響，但在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時代的印跡。1988 年，《科技日報》上曾發表過一篇書評，作者方勵之在充分地肯定了《愛因斯坦文集》的價值和意義並強力推薦之後，也指出了編譯者在注釋等部分的一些問題，如在愛因斯坦《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手稿意見》一文下的註腳中，編譯者說：“‘真正可笑的’恰恰是愛因斯坦的無知和他的頑固的資產階級偏見”等。書評作者認為這些問題是一種“反科學的時代污染”。對此，許良英先生在一篇題為《〈愛因斯坦文集〉中為什麼會有這些錯誤》的回應文章中，說明這個錯誤註腳已於 1978 年改寫，1983 年重印時按改正的版本刊出，但他仍然坦率地接受了書評中“一針見血”的批評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說：“可悲的是，這種污染不是由於我迫於外界壓力，不敢承擔時代的風險，而是出於自己內心的盲目忠誠和迷信。”“這個教訓使我體會到：迷信是真理的大敵，必須用科學和民主來破除形形色色的現代迷信，破除由忠誠所支持的迷信，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從 1974 年到 1987 年，這段漫長而痛苦的路許良英先生一共走了 13 年之久。

《愛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編譯者許良英先生的心路歷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時代變化的縮影。”

2005 年 9 月 23 日，三叔給我來信說：

“世界科學史大會我沒有參加，只是參加了在清華分會場開一天的 Einstein 專題的會。這個分會場基本上是劉兵主持的，他有一個報告專門講《愛因斯坦文集》。《中華讀書報》報導了這次大會，配發了 4 張照片，想不到其中一張是我的。現複印一份給你。

又，《南方週末》和《中國圖書商報》也出現了我的照片。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的 Nancy 女士看到《南方週末》大為驚喜，立即複印發給成鋼、王丹等人。”

2005 年 7 月 14 日，《南方週末》發表了三叔的一篇短文：《名家推薦大學生暑假閱讀書目》，並配發了三叔的照片。1989 年“六四”以後，三叔的文章被禁止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南方週末》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解禁”的開始。但有關政論文章仍然被禁止發表。

三叔信裡所說的《中國圖書商報》上出現他的照片，即上面曾經提到的中山大學物理教授關洪的書評文章中所配發的照片。

36、“堅持民主信念，紐約時報推崇許良英”

2006 年 8 月 22 日，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以一整版又 1/4 的版面，發表了該報記者 Dennis Overbye 對三叔的採訪報導，題為《Einstein;s Man in Beijing : A Rebel With a Cause》(《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這篇採訪報導，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三叔的情況，還配發了三叔不同時期的 7 張照片。

9 月 1 日，三叔給我寄來《紐約時報》上這篇採訪報導的影本，他在信裡說：

“昨天寄去兩本《愛因斯坦在中國》，一本給你，一本請轉送臨海市圖書館。這是我 80 年代後期的研究生胡大年在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的譯本。同時寄的又有 8 月 22 日《紐約時

報》對我的採訪報導的影本。作者 Dennis Overbye 是學物理出身的資深科學記者，寫過一本《戀愛中的愛因斯坦》(有中譯本)。他是 6 月 23 日採訪我的，可惜他不識中文，對中國情況也不熟悉。花了 2 個月寫出的這篇訪談還是錯誤很多，我已寫了一張勘誤。”

現將該訪談報導的其中幾段選譯如下：

“七十年來，許良英作為中國的愛因斯坦傳人，投身於革命與物理學的雙重事業，宣揚政治自由和科學探索的價值，不時地與中國的官方立場針鋒相對。他索取回來並得以出版的愛因斯坦譯著，在中國重新點燃了人們對愛因斯坦與科學的興趣。”

“作為一位兩百多篇論文的作者和六本圖書的編者，如果他不是年歲最高的，那麼，他至少應當在中國知識界中是最為顯著的一位持不同政見者。歷史學家列曼·米勒在他的《後毛澤東時期中國的科學及政治分歧》一書中稱許良英為一位‘典型人物’。用‘德高望重’來形容這位老者，就猶如白雪覆蓋於高山般的貼切，儘管他看來還沒有丟失毫釐的叛逆之心。”

“許先生說，‘科學和民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相互為用，但民主更為根本。’儘管當前的中國領導人們表面擁護科學，但他們並沒有讓許先生認同。

江澤民，鄧小平權力的繼承者，在 1997 年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為中國的人權記錄辯護，稱民主是相對的概念，這被許先生大為恥笑。‘完全是胡扯蛋，因為愛因斯坦的相對性原理首先實際在根本上是強調絕對，它是指物理的規律和光的速度對於所有的觀察者是相同的觀念。’”

“另外，民主和自由也是絕對的，因為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And the other part is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e also absolute because human nature is universal and needs to pursue freedom and equality.”）

在接受採訪時最後談到，中國在未來會實現這些理想的，他持樂觀的態度。他指出，當 1988 年學生領袖王丹開始組織民主沙龍時，僅來了 20 個人，但僅半年之後，卻超過了 3000 人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絕食抗議。他說，“因此，我從沒懷疑過青年人的力量。”

在《紐約時報》發表對三叔的採訪報導的當天，中央通訊社發佈了題為《堅持民主信念　紐時推崇許良英》的電訊稿。第二天（23 日），紐約《世界日報》刊載了這篇電訊稿。全文如下：

〔中央社紐約廿二日電〕紐約時報稱高齡 86 歲的許良英是“有目標的叛逆者”，因為這位精研愛因斯坦論述的科學史家，經歷了中共政權的整肅、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和六四天安門的鎮壓，始終堅持人的價值和民主的理念。

紐約時報記者奧弗拜（Dennis Overbye）指出，70 年來，許良英一直是愛因斯坦論述在中國的代言人，從政治的開放到對科學的好奇心，透過許良英的譯作，愛因斯坦的學說對中國大陸科學研究有很大的啟發。

對於目前中國當局鼓勵科學研究，許良英認為言論自由是科學進步的前提。他強調，學術自由是人類進步的必要條件。

報導指出，西方學界稱許良英是中國大陸科學界及異議人士的典範。1920 年出生浙江臨海的許良英在中學時代讀了愛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提出：“國家是為人而

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個人，並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他深為感動，也期許要成為這樣的人。

許良英在 1949 年進入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由工作中發現，他不可能同時信奉愛因斯坦和毛澤東，1957 年中國大陸的“百花齊放”運動演變成整肅右派，而許良英也被打成“極右派”。在右派標籤被取下之後，1962 年科學院要他翻譯愛因斯坦的論文及講稿，他用兩年的時間完成 197 篇文章的翻譯，並撰寫個人對愛因斯坦哲學的論述。

香港明鏡出版社於 2001 年出版了《許良英文集》。自中國科學院退休之後，他也積極在撰寫一本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書。他表示，科學和民主是分別的理論，不過，二者相互為用，而民主更是根本。

2008 年 8 月 7 日，美國總統布希來北京參加奧運會開幕式前夕在泰國首都曼谷的長篇講話中，曾引用三叔在《紐約時報》採訪報導中所說的一句話。

布希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2008 年 8 月 19 日，三叔給我寄來原載於《美國參考》、在網上下載的布希講話全文的影本，並在信上說：“布希引用我的話，完全出於意外。”

37、三叔獲得“薩哈羅夫獎”

時間：2008 年 4 月 13 日晚。

地點：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聖路易麗晶大酒店。

酒店大廳燈火通明，金碧輝煌。在這裡正在隆重舉行 2008 年度美國物理學會的“薩哈羅夫獎”的頒獎儀式。

美國物理學會的“薩哈羅夫獎”旨在表彰科學家在推動人權的領導成就，每兩年頒贈一次。本年度的得主——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許良英。

在全場的熱烈掌聲中，該會會長畢能斯達克（Arthur Bienenstock）頒贈這項殊榮及獎金一萬元，由許成鋼代表父親接受。

許成鋼又代表父親，回贈給美國物理學會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贏得了全場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

在頒獎儀式上，還宣讀了三叔《接受美國物理學會 2008 年 Sakharov 獎答謝詞》（全文附後）。

王作躍，1982——85 年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科學思想史研究生，1986 年去美國，也參加了這次頒獎活動。事後，他給自己的恩師寫信，介紹了參加這次活動的情況以及自己的感受。

他在信中說：

“參加給您頒發薩哈羅夫獎的活動，是我留美 22 年來最高興的一件事。這是國際科學界對您在自由、民主和人權上的努力的讚譽，也會對中國民主改革起到推動作用。胡大年和我作為您的學生，能夠參加這次盛會，感到非常興奮，非常光榮。”

“參加這次會議總的感受是，美國物理學家們極其關心國際科學和人權問題，尊崇愛因斯坦的民主自由思想，推崇您為中國人權所作的努力。”

信的最後說：

“我能有幸參加我所研究和參與的美國科學共同體頒獎給自己的恩師，可以說是我學術和人生上的最有意義一刻。”

這次頒獎活動共持續了三天。

4 月 12 日中午，美國物理學會專門為三叔獲薩哈羅夫獎舉辦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會上由許成鋼介紹他父親的生平經歷；王作躍介紹了愛因斯坦、薩哈羅夫和恩師許良英在民主、自由、人權方面的言論、活動和聯繫。美國物理學會薩哈羅夫獎評選委員會的許多成員也參加了記者招待會。

有記者問了一些問題，由許成鋼和王作躍回答。

記者：許良英教授和其他中國科學家是否現在行動和研究仍受到限制？

答：目前沒有行動限制，一般的科學研究也沒有問題，但書報檢查，包括自我檢查，仍然是一個問題。

記者：APS（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美國物理學會）應該如何幫助中國改進人權？

答：應該繼續與中國保持交往，保持和促進中國的開放。

記者招待會後，《世界日報》記者周密與許成鋼、王作躍、胡大年、曾敏兒教授，舉行了關於許良英教授的經歷和對他們的影響的座談會。

在座談時，王作躍和胡大年都一致認為，許良英教授和其他老師對他們在為人、道德、學風上的影響，比在學問上的影響更大。王作躍還介紹了恩師為“民主”、“自由”正名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並特別提到恩師在他做研究生時，對他說過的一段使他終生難忘的話。許老師說自己要像魯迅所說的那樣，“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我們這些年輕的一代“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在寧靜的環境下做學術研究。這

些年來，許老師的這句話一直在激勵著他。

在最後一天（4 月 14 日）的演講會上，胡大年用成鋼的 Power Point 介紹了三叔的生平，王作躍放了幾分鐘三叔的演講錄影，然後宣讀了演講全文。當王作躍讀到“In 1994, after the application was unsuccessful, the authorities again put many dissidents into prison，”聽眾會意地笑了。當讀到“We have just finished the period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全場大樂。

演講結束後，聽眾問了三個問題：

1. 中國科學史家如何看待李約瑟？

王作躍答：據我所知，許良英教授的態度（我也贊同）是，像李約瑟這樣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有價值，但很容易被官方利用，做愛國主義教育。

2. 如何能夠最好地推動中國民主？

胡大年答：要保持和促進中國與世界的開放（“open”）。

王作躍答：應該保持和促進中國和世界的交往。

3、中國人民如何獲得外界的資訊，包括剛介紹的《世界日報》對許良英教授獲獎的報導？

王作躍答：資訊封鎖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不可能完全封鎖。

在會上，王作躍遇見了三叔 1983 年訪美時交的同行朋友、哈佛大學著名物理學史家霍耳頓（Holton）教授，他曾於 1985 年應邀來中國講學。他獲得 Pais 物理學史獎，但他表示，許良英教授的獲獎是他參加這次大會的最令人高興的一件事。

會後他在給王作躍的一個電子郵件中說：“For me, a highpoint of the APS meeting was the award to Professor Xu, and meeting many mutual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from our

much-remembered China trip in 1985."

2008 年 4 月 14 日，美國《世界日報》以《人權鬥士許良英獲薩哈羅夫獎》為題，作了如下的報導：

〔本報記者周密密蘇里州報導〕從一個忠貞的共產黨員轉變為真理和民主人權鬥士，中國科學院高級研究員許良英的道德勇氣為他贏得本年度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的“薩哈羅夫獎”。該會會長畢能斯達克（Arthur Bienenstock）於 13 日晚在聖路易麗晶大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頒贈這項殊榮及獎金一萬元，由許良英的長子許成鋼代表接受。現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的許成鋼，於頒獎儀式上回贈《愛因斯坦文集》三卷給美國物理學會，贏得全場熱烈掌聲。

今年 88 歲的許良英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在書面答謝詞中表示，青年時代，愛因斯坦的思想照亮他的人生道路，後來信奉馬克思主義，投身革命。中共執政後，卻被打成右派成為“人民的敵人”。1962 年下鄉在農村，他開始編譯《愛因斯坦文集》，這三卷本文集於 14 年後陸續出版，在中國知識界產生很大反響。他說：“正是愛因斯坦的思想使我醒悟，開始致力於捍衛人權的抗爭和民主思想啟蒙事業，使踐踏人權的專制的中國，轉變成為尊重人權的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

許良英於 1989 年起草發起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開放言論自由，並呼籲釋放政治犯。這封公開信徵集了 42 名知名科學家和知識份子簽名，其中半數以上是共產黨員。這封公開信在海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成為後來八九民運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1994 年，他和六位異議人士撰文呼籲當局重視人權，宣稱中共推動現代化卻罔視人權，無異緣木求魚。1995 年許良英獲得紐約科學院的裴傑斯獎（Heinz R. Pagels award），該獎讚揚他為民主自由達成重大的貢獻。美國物理學會的薩哈羅夫獎旨在表彰科學家在推動人權的領導成就，每兩年頒贈一次。甄選委員會五名成員之一哲傑西（Edward Gerjusy）說，許良英能夠勝出是因為他幾十年來致力人權和自由，即使遭到迫害，仍堅持不懈，深具愛因斯坦的精神。該會會員包括 4 萬 4000 位來自工業界，大學及國家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及相關專業人士。

2008 年 6 月 5 日，三叔給我來信，介紹有關薩哈羅夫的情況。他在信中說：

“薩哈羅夫（Sakharov, 1921-1989）是蘇聯‘氫彈之父’，1975 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由他領導設計的氫彈於 1953 年試爆成功。核子試驗所產生的放射性塵埃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使他憂心忡忡，由此開始致力於國際和平與人權事業。1961 年他反對赫魯雪夫計畫空中試爆氫彈，1963 年推動蘇聯當局在限制核子試驗公約上簽字。這是冷戰時期東西方兩大敵對陣營第一次簽約。1964 年，他成功地阻止了赫魯雪夫提名的李森科親信當選蘇聯科學院院士。1968 年，他發表宣言，呼籲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認為這兩者是現代社會賴以生存的兩大支柱。隨後他被蘇聯當局開除出軍事研究機構。1970 年，他協助建立‘莫斯科人權委員會’。1980 年，他被當局放逐高爾基市。1986 年，戈巴契夫允許他回莫斯科。1989 年 4 月，他被選為蘇聯議院議員。1989 年 12 月 14 日，病逝於莫斯科。”

2008 年 6 月 22 日，《世界日報》的星期天雜誌——《世界週刊》，發表了該報記者周密寫的長篇報導：《“薩哈羅夫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高級研究員許良英死心塌地追求民主》，並配發了 7 張照片 。

報導的題記：

八 O 年代，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和《愛因斯坦文集》編譯者許良英在青年學生中間有很大的影響力不是偶然的，他們對獨立思想的理念身體力行，是提倡科學和民主啟蒙的著名中國知識份子之一。

報導開篇寫道：

“今年 4 月 13 日，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在聖路易召開年會，會長畢能斯達克 (Dr. Arthur Bienenstock)頒贈“薩哈羅夫獎”及獎金一萬元給中國科學院高級研究員許良英，但許良英因健康因素不宜遠行，由長子許成鋼博士代表接受。許成鋼並代表回贈父親所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三卷給美國物理學會，贏得全場人士的熱烈掌聲。

許良英一生際遇與中國現代史吻合，可說是當代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年輕時，他一腔熱血想為中國的進步而投身革命，曾是忠貞的共產黨員，搞學運，更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然而，科學家求真求是的精神，促使他在中年的時候，重新衡量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因而發出“覺今是而昨非”的正義心聲，致力於闡揚民主自由的真正精神，即使遭到中共當局的密切監視，他也不為所懼，堅決的為人權而奮鬥。

美國物理學會的“薩哈羅夫獎”旨在表彰科學家在推動人權的卓越領導成就，每兩年頒贈一次。哲傑西（Edward Gerjusy）是甄選委員會五名成員之一，他接受採訪時表示，今年被推薦角逐該獎的候選人很多，而且條件都很好，至少有 10 名以上。許良英之所以能夠勝出，是因他幾十年來致力於推動人權和自由，即使遭到迫害，仍然堅持不懈，深得愛因斯坦的精神。另一位甄選委員曾敏兒（Betty Tsang）也是這麼表示。

許良英在書面答謝詞中以一慣的勇氣，疾言厲色：“正是愛因斯坦的思想使我醒悟，開始致力於捍衛人權的抗爭和民主思想啟蒙事業，使踐踏人權的專政的中國轉變成為尊重人權的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88 歲的許良英一路走來，什麼苦都吃過，也曾自殺過，但他自認已重生過三次，一心只想為中華民族的未來而進言，什麼都不怕了。”

在“只問是非，不計個人利害”為小標題的一節中，這樣寫道：

“正如許良英的門生胡大年博士所說：‘許老師最大的特點是做人正直，學術嚴謹，容不得一粒砂子，即使親密的朋友，也直言指出，絕不講情面的。我們做學生的在做人上和學風上都學到很多！’

另一位高足王作躍博士深表贊同，並補充說道：‘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許先生的話，就是他的勇氣（ Courage ），借用其師竺可楨（注：浙大校長（1936——1946）及中科院副院長（1949——1974））的話，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是非的問題要比利害問題要高得多。許先生做得非常好，看到不應該的事情都會說出來。’

當問及許成鋼如何被嚴父教導時，他說父親雖然嚴厲，但講道理，可以和他辯論。王作躍說，他曾指出許良英翻譯上的

錯誤，老師馬上虛心接受，不會擺架子。”

報導最後寫道：

“誠如愛因斯坦於 1954 年接受一項人權獎時所說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愛因斯坦的這份崇高的人道信念，成為許良英為中國民主和人權奮鬥的原動力，這也是為什麼他一直為民主大聲疾呼、老爾彌堅之故。”

***附：《接受美國物理學會 2008 年 Sakharov 獎答謝詞》**

女士們、先生們、主席先生：

感謝美國物理學會授予我 Sakharov 獎這一崇高的榮譽。由於健康條件，我不能乘飛機，只能請兒子許成鋼代為領獎。

Amdrei Sakharov 是我崇敬的科學家，他一生最崇敬的科學家 Aibert Einstein 也是我人生的楷模。1934 年我 14 歲就夢想要做一個像 Einstein 那樣的科學家。18 歲上大學前讀了他的文集《我的世界觀》(The World As I See It) 的中譯本，深受啟迪，使我開始思索人生的價值和人生道路問題。兩年後在大學二年級時，由於無法容忍當時中國的政治腐敗和社會黑暗，接受並信奉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決心投身於中國革命事業。1949 年革命勝利後，幾經波折，終於在 1956 年開始從事自己所愛好的科學哲學與科學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1957 年，由於公開反對反右派運動，被定為“極右分子”，成為革命專政的對象，回老家當了 20 年農民。

1962 年，毛澤東企圖與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要使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理論中心，指使有關專業人員收集、翻譯國際知識界代表人物的反馬克思主義言論，供批判之用。科學界首選的對象自然是 Einstein，編譯 Einstein 思想資料的任務就落到我的頭上。我欣然接受了這項任務，到北京借來能夠找到的全部文獻資料，回家鄉夜以繼日地閱讀、選編、翻譯。這項工作隨後得到外地 4 位朋友的合作，其中兩位 1957 年都因受我牽連而成為“右派”。經過 14 個寒暑艱難的折騰，我們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於 1976～1979 年間陸續出版。這個文集選譯了 410 篇文章，是當時世界上已出版的最全面的 Einstein 思想彙編。文集中所傳達的 Einstein 終生為之不懈抗爭的民主、自由、人權信念，直接衝擊了共產極權主義政體的官方意識形態，為中國新的民主思想啟蒙運動開闢了道路。當時我和方勵之就是在 Einstein 思想的感召下開始思考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問題的。Einstein 於 1954 年接受芝加哥律師十誡會（Decalogue Society）授予人權獎時說過：“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In long intervals I have expressed an opinion on public issues whenever they appeared to me so bad and unfortunate that silence would have made me feel guilty of complicity.）這一浩然之氣，永遠激勵著我。

《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引起巨大反響，也引起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胡耀邦的關注，他先後向青年工作幹部和黨組織幹部推薦學習《愛因斯坦文集》。

1978 年我回中國科學院工作，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近現代科學史、科學思想史和愛因斯坦。1980 年 2 月中共中央重新設置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他即要科學院組織科學家為

書記處和國務院領導成員講授科學技術知識。第一講為科學史，講稿主要由我撰寫。我在講稿中著重提出這樣一個論斷：“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記憶體動力。”隨後，我發表論文《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加以全面論證。

1985 年出版了由我和生物學史家李佩珊共同主編的《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th Century），在我寫的《結束語》中有一節標題為“政治民主和學術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1986 年 12 月下旬《人民日報》轉載了這一節文字，對當時各地湧現的學生民主運動起到了相互呼應的作用。在此以前一個多月，方勵之約我和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以推進改革進程。結果，這個會遭到封殺，方勵之和劉賓雁被鄧小平下令開除出黨，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辭職。這使我對共產黨的幻想和對馬克思主義僅存的殘餘信念徹底破滅。1988 年 11 月在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上，我提出：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是逆人類文明歷史潮流，主張專政，反對民主。

為迎接“五四”70 周年和《人權宣言》發表 200 周年，從 1988 年秋到 1989 年春我發表了 5 篇論文，闡述民主理念，批駁反民主逆流，如官方支持的民主緩行論和新權威主義。1989 年 1-2 月，我和老同學、冰川學家施雅風共同發起呼籲中國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信中指出，政治民主化是經濟改革、杜絕腐敗的必要保證；要求保證公民各項自由權利，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獲罪的青年。簽名者 42 人，多數是有成就的科學家，還有兩位知名作家。有如此眾多的科學家共同表達政治見解，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1989 年 4 月胡耀邦含冤去世，引發了空前規模的學生“反

腐敗，爭民主”運動。結果，於6月4日前夕遭到鄧小平的血腥鎮壓，中國歷史倒退了幾十年。

1992年，鄧小平發表要繼續經濟改革的講話，中外媒體為之歡呼，我給他潑冷水，發表了《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如果人僅僅是經濟動物，生產力的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那麼值得稱道的並不是亞洲‘四小龍’，而是希特勒當政時的德國。”“應該高呼‘希特勒萬歲’”！“何況他搞的也是‘社會主義’（Nazi）”。

1993年，我發表綜述民主發展歷史的論文《人權概念和現代民主理論》，指出人權概念是現代民主理論的基礎和前提。

這一年，為申辦2000年奧運會，當局陸續釋放了一批政治犯。1994年，申奧失敗，當局又開始大肆拘捕持不同政見者。我聯合6位知識份子發表要求改善我國人權狀況的呼籲書。呼籲書引述了1789年《人權宣言》的引言：“對人權的無知、忽視和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呼籲當局“果敢地結束我國幾千年來因思想、言論、文字治罪的歷史”。3月11日《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發表記者對我的訪談，並刊出呼籲書全文，又以呼籲書中的一句話“舍人權而侈談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作為該報當天的箴言。可是，中共統治者不僅不考慮我們提出改善人權狀況的呼籲，反而肆無忌憚地侵犯呼籲者的人權。3月12日，大批警察進入我們宿舍區，並堵住我的家門，把我軟禁了3天。從此以後，我們的宿舍區經常有警察把守，不准外國記者來採訪，甚至隨意拘禁來看望我的青年人。至於我家的電話，從1989年開始一直受監聽。中國人權狀況反而更加惡化。

1995年為“聯合國寬容年”，我起草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先從歷史上論證寬容是人類文

明的標誌，而我國自古以來缺乏寬容精神。呼籲書中希望當局不要再把有獨立思想的人當作“敵對分子”；重新評價“六四”事件；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和信仰問題而被關押的人員。同時希望全社會培育尊重他人的寬容精神，切忌暴力行為。呼籲書請我的恩師、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領銜，他欣然同意；簽名的共有 45 人。發表後，反響強烈，一批國際知名人士共同發起響應這個呼籲書的簽名運動，一個月內共有一千多人簽名，其中 10 位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出人意料的是，這個寬容呼籲書竟遭到一個諂媚鄧小平的美國物理學家的惡意詆毀。他給王淦昌先生寫恐嚇信，胡說這是“不利於 12 億中國人民的事”，是“嚴重的事”，“極為不幸的事”。王先生被他嚇懵了，回了一封令常人無法理解的信。他如獲至寶，送香港報上發表，嚴重損害了王先生的聲譽。為此，我不得不公開澄清事實真相，揭露此人為虎作倀的無恥行徑。這種卑劣行徑，與半個世紀前德國兩個賣身投靠希特勒的物理學界敗類 Lenard 和 Stark 的惡行如出一轍。

鑒於中國專制主義傳統根深蒂固，民主化的道路必然是漫長而崎嶇的，首先必須經歷一個思想啟蒙階段，使作為現代文明基礎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思想在中國生根發芽，成為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這種啟蒙，首先要啟知識份子自己的蒙，清除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污染。為了推進中國民主啟蒙運動，從 1985 年開始，我與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伴王來棣合作，計畫寫一部夾敘夾議、學術性與普及性並重的闡述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著作。由於我們對西方社會政治歷史知之甚少，且充斥訛誤，必須閱讀大量文獻和各家代表作，才能考慮下筆。加上我們年事已高，視力很差，記憶力也已開始衰退，且經常有各種雜務干擾，工作進展很慢，現在還只寫

到美國建國初期。但我們有信心，一定要把它完成，為中國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盡自己應盡的力量。

38、傳承民主理念　著述《民主的歷史和理論》

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的認識也會隨之改變。三叔的一生跌宕起伏、悲喜坎坷，但卻波瀾壯闊、可歌可頌！

三叔說自己一生走過的道路很曲折，有過三次大的轉折，也可以說已做了“三世人”。

他一生三個轉捩點：

第一個是 1940 至 1941 年，確立了獻身社會、獻身革命的人生觀。

第二個轉捩點——反右運動。儘管備遭打擊欺騙，在思想上卻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主要的變化是社會和生活環境，在老家當了 20 年農民。這期間，他認為有三方面收穫：（1）知道了中國大多數人民是怎樣生活的；（2）通讀了 39 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大部分《列寧全集》，使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發言權；（3）編輯翻譯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這些都為第三次轉變——思想信念的轉變準備了基礎。

第三個轉捩點：1974 年，在北京耳聞目睹“批林批孔”中江青和毛澤東的表演，才醒悟到整個“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騙局，毛澤東原來是個大暴君和大騙子。但當時還迷信馬列，以為毛澤東和斯大林是違背了馬克思。對馬克思的迷信直至 1987 年才徹底破除。

三叔從少年尊崇愛因斯坦，青年立志“科學救國”，做“當代物理學權威”，到大學期間，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投身革命，為共產黨“賣命”，不惜掉頭顱，拋盡韶光，從“愚

忠”毛澤東、共產黨，到轉而大徹大悟，終於找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民主自由之路。

從讀小學開始，三叔就喜歡讀書，除了正課書，更喜歡課外書，凡是書本上講的事他都相信。初中時，讀到有關愛因斯坦的書，立志要做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進大學前就開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又從閱讀西方文明史和民主史中，徹底否定了信奉大半生的馬克思主義，從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轉變成為一個堅定的民主鬥士。三叔說，自己是個書呆子，這些都是書本上學來的。

為了中國的民主啟蒙事業，為了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90歲高齡的他，老而彌堅，仍筆耕不綴，繼續《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著述。

1988 年三叔曾說過，中國知識份子真正搞清楚民主概念的，恐怕不到一百人。1989 年以後，人數有所增加，但總數恐怕也只在百人左右（包括在海外流亡的）。所以，他一再呼籲，走向民主的道路，必須經歷一個民主思想啟蒙階段。

1999 年，三叔在為紀念“六四”10 周年的文章《“89”十年感言》一文中說：

“所謂啟蒙，首先應啟知識化分子自己的蒙，徹底打破官方意識形態所養成的自我封閉和夜郎自大的心態，虛心地學習西方文明國家早已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並有效地實行了幾百年的東西。說來慚愧，我自己雖然青年時代也投身於民主革命鬥爭，向國民黨政權要民主，要人權，但由於迷信馬克思教條，實際上，根本不懂民主和人權的真正意義，以為只要代表多數人民利益的共產黨掌了權，就民主了。經歷了三次民族大災難

後，直到 70 年代中期才猛然醒悟，然後通過不斷的認真學習，總算搞清楚民主概念的內涵。鑒於民主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格格不入，我們這一代和‘在紅旗下長大’的知識份子，不經過一番抗爭和努力，不可能真正民主的真諦。這種努力就是反思和學習的自我啟蒙。”

2000 年 7 月 12 日，三叔在致李慎之的信裡指出：

“根據我自己多年的觀察和思考，我覺得，中國要實現民主，首先要有一批獨立知識份子，他們應該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和獨立的批判精神，他們不依附任何權貴和勢力集團，而具有民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主動承擔起民主思想啟蒙的重任。但我又從自己切膚之痛的反思中認識到，所謂啟蒙，首先應啟知識份子自己的蒙，徹底打破幾十年來官方意識形態所養成的自我封閉和夜郎自大的心態，虛心學習在西方早已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並有效地實行了幾百年的代表人類現代文明的基本制度。我說的民主意識，指的是，不僅真正懂得民主概念的正確涵義，自身還應堅持民主精神，不可自視高人一等，更不可以以領袖自居，而應以平常心，做一個平常人。這正是當前海內外民運人士所缺乏的。據我瞭解，他們大多具有‘文革’造反派的心態，其基本特點是：狂妄的領袖欲；貪婪的權力欲；說假話不臉紅。他們雖然口頭上也反對一黨專政，但骨子裡依然可見毛澤東的陰魂。”

1995 年 12 月初，我受人之托，將傅國湧的長篇論文《民主階段論》寄給三叔。12 月 16 日，三叔看了傅國湧的文章後，給我回信說：

“傅國湧的文章，一個月前有位年輕朋友從杭州回來帶來過，當時沒有看。現在你又寄來，於是粗略地通讀了一遍。據說作者僅 29 歲，中專畢業，現住在杭州。看來作者是用心地讀了一些書的，這比一般的民運人士要強。多數人根本不讀書，有些則讀書不求甚解（如王丹）。作者是一位認真讀書，勤於思考的有為青年。可惜他讀的東西過於雜亂，而沒有集中精力去認真研讀關於民主理論和歷史的基本著作，而受了一些錯誤思想的影響，在一些基本認識上顯得很混亂。他把顧准、孫中山的著作奉為經典，事實上，他們的許多觀點是很成問題的。關於孫中山，來棣 9 年前寫過一篇長論文，你們不妨拿來對照一下。顧准是一位有骨氣、有獨立思想的難得的人，但他對民主並無深刻的理解。傅文開頭第一句“民主運動沒有最終目標”就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民主的“最終目標”自古至今都很清楚，只要認真讀一讀法國的《人權宣言》就知道了。文中引邱吉爾的話，是抄錯了。邱吉爾是貴族出身的軍人，不是政治思想家，他的話並無多少價值。

文中對英國《大憲章》的評價和法國大革命失敗原因（參見我的論文《人權…》）的分析都不正確。說“民主本來就是城邦自治的代名詞”也是毫無根據的。希臘城邦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自治”，而是獨立主權國家。

文中雖然也提到我的論文《人權概念和現代民主理論》，但並沒有真正理解我的基本論點。他把雅典由於缺乏人權觀念所造成的錯誤，說成是我對“直接民主制”的不滿意，顯然是要把我的思想納入顧准的思想框框裡。

傅文以“市長民選、城市自治”開始的所謂“民主階段論”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試問：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

由，連最起碼的公民權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有可能“民選”市長，實行“自治”嗎？如果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有了保障，各級選舉都可以公平、自由地進行，為什麼非限於市一級不可？

據我所知，所謂從基層選舉開始逐步實行民主，是一、二年前一位副部長提出來的，得到了在美國教書的崔之元（此人1988年我曾寫文章批評過）的吹捧。這顯然是一種裝飾品，不可輕信。

讀了傅文，我更覺得民主啟蒙（首先是關心民主事業的知識份子）的必要，首先要把民主的基本概念和歷史事實搞清楚。至於具體的民主實施方案，應該等到真正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時，大家一道來討論。現在一個人閉門造車，難免要鑽牛角尖而成為無效勞動。”

1996年6月，傅國湧去山西姐姐家探親，路過北京，來中關村拜訪三叔，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在此之前，傅國湧已將他的第二篇長篇論文《從我做起，和平抵抗》寄給三叔，請三叔提意見。

他的文章竭力宣揚亨利·大衛·梭羅《論公民的不服從》這篇文章的觀點，以非暴力抵抗政府，採取不服從、不合作主義來反對政府。見面時，三叔說，他閱後，認為這篇文章不能發表，否則會引來牢獄之災。傅國湧說，這篇文章已寄到海外去發表。果然被三叔所言中，一個月後，傅國湧以“非法政治活動”罪名被收審，11月，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勞教三年。在此之前，他因參加八九民運於1989年12月入獄，1990年6月以“非法組織”、“非法刊物”、“非法串連”、“參與動亂”等罪名勞教兩年。

亨利·大衛·梭羅（1817——1862），美國自然主義者、改革家和哲學家。《論公民的不服從》這篇演說稿發表於 1849 年，當時，這篇文章沒有引起什麼反響。但到了 19 世紀末，這篇文章卻成了經典之作，在國際上出現了一批追隨者。聖雄·甘地在南非當律師時，宣讀這篇文章為觸犯了種族歧視法規的印度人辯護，甘地深受梭羅的影響，成了一位終生非暴力反抗和消極抵制非正義權勢的典範。通過甘地，梭羅的主張，變成了政治活動的工具。後來，在 20 世紀，年輕的小馬丁·路德·金也深受甘地的影響，梭羅的主張，便在美國民權運動的思想基礎中的到了新生。

有關傅國湧，《名人傳記》2009 年第 3 期，有一篇介紹他的文章：《學者傅國湧的文字生涯》。作者：許驥。現不妨摘錄文章其中一段：

1995 年的冬天，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主動走入了傅國湧的世界，他就是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許良英先生。許先生是著名的自然科學史家，是中國核彈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學生，是中國研究愛因斯坦思想的權威，曾經主持編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這套書是迄今最全面的愛因斯坦思想資料。傅國湧稱許先生為“真正讓我站起來的人”。

事情的機緣是許先生偶然讀到傅國湧寫的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認為在他見過的年輕人中，傅國湧是讀書最多的。所以，許先生專門寫信給傅國湧。一來二去，他們之間建立了忘年之交。許先生不願稱師，願意跟傅國湧平輩論友。他們彼此交流頻繁，每個月都有書信往來，所談之事古今中外無所不包。許先生雖然是學自然科學的專家，但是因為學習方法好，知識淵博。傅先生說：“許先生有世界視野，所以就把我推到

一個能夠看到世界上所有值得看到的東西的位置上。從那以後我的一切都改變了，讀的書變了，思考的問題也變了。”醍醐灌頂，傅國湧的思想從此發生質的飛躍，再也沒有什麼能夠鎖住他的靈魂了。

三叔在讀了傅國湧的《民主階段論》的文章後，“更覺得民主啟蒙（首先是關心民主事業的知識份子）的必要”。由於認識到民主啟蒙的必要性，但國內尚缺少有關民主啟蒙方面的著作，尤其是比較全面系統地闡述民主思想的普及性啟蒙讀物。從 1985 年開始，三叔把自己的研究重點從科學史轉移到對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學習和研究，與三嬸合作寫一本啟蒙性的學術著作。書名最初擬定為《民主論》，1989 年胡績偉出了一本《民主論》，於是決定改名為《民主的歷史和理論》。書的重點放在從希臘開始的西方民主發展史，以及清末以來民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歷史的寫作，學習司馬遷以史帶論、夾敘夾議的寫法。最後部分準備針對當前國內的各種混亂的認識作些理論分析。

三叔說，由於原來對西文歷史不熟悉，要讀很多書，查閱很多資料才能形成初步概念。每作出一個論斷，都必須旁徵博引，反復思考。加上視力極差，看書要用放大鏡，而記憶力又不好，有時書看了兩三遍才留下印象。本來，這類工作應該由年輕人做，但沒有人願意做，所以只得拼老命去幹。他還說：“我們是一邊學習一邊寫作，雖然十分艱難，倒是樂趣無窮。因為這也是給自己的啟蒙。”

我一直關注著書稿的寫作，希望早日完稿出書，為中國的民主啟蒙發揮一點作用。得知三叔的寫作進展“十分艱難”，我很想像上世紀 60 年代三叔在老家編譯《愛因斯坦文集》時

那樣，協助他做些抄錄卡片，謄抄稿紙之類的工作，利用暑假較長時間去北京，為書稿幫點忙，出點力。

1995 年 2 月 7 日，三叔回信說：

“你要為我們寫書的工作盡點力，這種精神當然是難得的，在北京確實還沒有這樣的志願者（因為謀生的壓力太大）。但你是難以幫上忙的，因為你不可能長住北京，而且你對世界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文獻資料並不熟悉。事實上，我們這部書稿的歷史部分（篇幅占全書大半），棣已經寫出初稿，現在是如何加工、修改的問題，別人是幫不上忙的。至於理論部分，主要是分析、論證和闡釋，不需引證很多文獻，別人更是難以幫忙。”

後來，三叔在給我的來信裡，多次談及有關書稿事。

1996 年 2 月 9 日來信：

“近來我和棣身體都還可以，已經一道開始回到寫書的工作了。這項工作已擱了十個月。已經定稿的有：第一章　希臘雅典民主制；第二章　漫長的歷史隧道——發生在羅馬和義大利的故事；第三章　人的覺醒——現代文明的開端，寫的是文藝復興，正在寫最後一節。關於歷史部分，棣早已寫出初稿，在定稿時，我還需要查閱大量資料，順便也讀些書。”

1996 年 9 月 1 日來信：

“書稿進度慢，是因為一來雜事多，如這次成鋼來，加上別的事（寫信，接待客人），就擱了一個月；二來這項工作非

常吃力，以前我們對荷蘭、英國早期歷史不熟悉，要讀很多資料，為了落實一個史實往往要查閱不少文獻，遠沒有象寫科學史和愛因斯坦那樣順手。我覺得這樣做是值得的，讀者就可以少花功夫瞭解到可靠的歷史進程。”

1997 年 3 月 16 日來信：

“我們的書稿決不是一兩年之內所能完成的。以前曾告訴你，從事這項工作是十分吃力的，比我寫科學史著作要困難得多。因為這個領域我們原來並不熟悉，十幾年前才開始涉足，要讀的書和必須查閱的資料非常多，從整個歷史背景、關鍵性的歷史情節，到思想理論的演變和深層次的理論思考，都需要逐個問題把事實和概念搞清楚，才能下筆。每寫一、二百字，都要參閱十幾種資料，碰到事實敘述不一致之處，還需特別考證一番，甚至象《大英百科全書》，也發現有不少訛誤。而且我視力不好，晚上和陰天不能工作。除了這項工作，其他有些事也不能不管，不能對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漠然視之。原來以為 3-4 月間可以完成英國光榮革命和 Locke 的民主理論，想不到最近一個月，棣突患帶狀皰疹，整日疼痛難忍，夜裡難以入眠，而我自己也幾次心律失常，這一個多月書稿基本上擱下了。今年還要花半年左右時間參加《愛因斯坦全集》的翻譯工作。翻譯的班子是我幫助物色的，我不能完全不管。現在 1-5 卷都已有人負責；我只答應第二卷中一部份工作，主要是把我 1963 年譯的關於狹義相對論和分子運動論的論文重新校一遍，並翻譯全集的有關編輯說明。告訴你這些情況，無非是讓你瞭解我不能單打一地幹一件事，可以閉門著書，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催我趕快完成書稿，這會增加我的精神壓力。順便說一

句，寫這部書稿，當然也很有趣，中間有不少自己的心得體會和獨到的見解（以前似乎還沒有別人把歷史和理論完全結合起來寫的），但這項工作基本上是屬於啟蒙性和普及性的，並不是“開創性”的。曉光所說的“開創性”，太廉價了，是對“開創性”的極大誤解。”

2002 年 3 月 20 日來信：

“你計畫退休後來北京住一段時間，這主意很好，屆時我們可以暢懷地談談心，共同回憶一些往事。至於書稿事，除了來棣，別人是幫不上忙的。因為我原來對西方歷史並不熟悉，需要讀大量的書，才能逐漸形成一個輪廓，理出一些線索和自己的看法，然後才能下筆，別人是插不上手的。這番話似乎以前也告訴過你。你的好意我是心領了。你來時，我可以把書稿已寫好的部分（到英國光榮革命和 Locke）給你看，並告訴你下面的計畫。”

20 多年來，三叔一直潛心於對世界各國民主的歷史和各個歷史時期民主理論的研究，從 2500 年前希臘雅典城邦民主制，到近現代英美的民主制度。他用兩句話來概括民主的真諦，他說：“民主政治的精神是：自由；民主政治的要素是：自由和平等。”正如前面已提到，“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這句話被美國總統布希所引用。

我們期待著《民主的歷史和理論》書稿早日完成付梓，正如李慎之 2002 年 1 月 21 日致三叔信中所說“我十分欽佩你研究民主的學術著作，十年二十年後必然成為‘國民必讀’”。我們也殷切期盼著《民主的歷史和理論》一書成為“國民必

讀”早日來臨，讓民主理念世代相傳！

2009 年 6 月 3 日
初稿完稿於桔鄉黃岩
2009 年 9 月 14 日—10 月 5 日
修改定稿於北京中關村

後　記

為了親聆三叔對書稿的修改意見，我於 2009 年 9 月 13 日來到北京，這是我第五次進京。

七月中旬，我將初稿的列印稿郵寄給三叔，他斷斷續續地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讀完了約 30 萬字的初稿。在初稿的扉頁上，他寫了兩條原則性的修改意見：“黨八股、套話全刪去，包括決心書、彙報之類；

應清除所有黨文化的痕跡！”凡需要刪去或錯誤的地方，都在稿紙上注明，連標點符號錯誤都作了訂正。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下午，三叔抽出時間專門與我談書稿的修改，每一處需要修改的地方都具體一一落實。根據他的意見，我把書稿從原來的 52 節刪減到 38 節，減少了約三分之一的內容。

為追尋往事的蹤影，在沉澱的記憶中尋覓，難免會有不準確之處。有多處史實我的記憶有誤，但三叔仍然親歷在目，使書稿的內容更加真實可靠。而且，我對他的心路歷程也多了一分瞭解。

修改書稿的過程，既是進一步瞭解三叔的過程，也是核對史實和提煉思想的過程。同時，我也深切地認識到，即使是這樣，我對三叔的瞭解還是膚淺的。

三叔學物理出身，卻文理兼通，有著深厚的人文素養，文筆清新，文字簡潔明快，王淦昌先生稱讚他文章寫得好。

三叔於 1999 年 3 月在《痛悼恩師王淦昌先生》一文中說：“去年 10 月我們去看望先生時，先生誇我‘文章寫得好’，希望我多寫寫他。這句話臨別時他又對我說了一遍，可見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對我的信任和囑望。”

三叔思維敏捷，邏輯嚴密，說話聲音洪亮，根本看不出是 90 歲的老人。他說話帶有很濃的“臨海腔”，有人曾對我說，在收音機裡聽到他的講話，就能猜出他是臨海人。

三叔生活儉樸，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價格最便宜買來的。日常生活簡樸到無一點嗜好，既不吸煙，也不飲酒，甚至連茶也不喝。

這次我在京逗留了 20 多天。臨別那天，三叔指給我看掛在書房門後牆壁上的對軸，是杭州一位老人於乙亥年（1995）六月贈給他的。

浩然之氣沛乎九洲，
耿兮我心實繫中華。

寫的多好啊！我從心底裡發出讚歎。我堅信，總有那麼一天，三叔的民主思想，必將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果，到那時，“只須抬眼望，何處不是春”！

完成了書稿的寫作，我思緒萬千，感慨無限。在這裡，錄下三條我的“人生感悟”：

回首人生走過的道路，領悟愛因斯坦名言：“人只有獻身社會，才能找到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更能品味人生的價值。

浙江省最年長的作家冀汸先生(92 歲)、浙江大學葉光庭先生、回浦中學黃崇楠先生以及許而權先生、項德潤先生、沈衛山先生等看過部分初稿，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書稿的大部分由朱合立、部分由許玄青、陳瑤打印，謹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許從平
2010 年 1 月 3 日

浙江台州黃岩

《文化情理》系列(37)

書　　名：肩住黑暗的閘門:我的三叔許良英
作　　者：許從平
出 版 人：何　頻
責任編輯：謝　銘
封面設計：一　劃
出　　版：明鏡出版社
網　　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SA.
　　電話：(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978-1-935981-10-7
定　價：HK$109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一版